出 版 说 明

《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是伊日·贝利康的回忆录。

作者是1939年入党的捷共党员，早年参加过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斗争，捷克解放后曾先后担任捷克青年团和国际学联的领导职务。1963年起任捷克电视台台长，是“布拉格之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68年8月21日苏军侵占捷克后不久，被派往捷克驻意大利使馆任参赞。1969年8月开始政治流亡生活。

本书是1975年写成的。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于捷克约三十年间的政治变化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于“布拉格之春”运动的前因后果以及对于苏联侵捷事件的始末作了系统的介绍。同时，作者还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和专政、对斯大林的评价、各国共产党之间以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东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作者五十年代曾两次访华。书中还谈到了我国的一些情况，其中个别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们作了删节。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罗莎·卢森堡

《俄国革命》

“星期二，前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台长伊日·贝利康在他的罗马住所收到了一个炸药邮包。这位侨居在意大利的记者是“布拉格之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贝利康在打开邮包时发现包中冒出一缕可疑的青烟，便在烈焰升腾以前及时地将邮包扔掉了。”

1975年2月6日《法兰克福汇报》

1975年2月4日……

就在那一天，我终于下定了写作本书的决心。我产生写这本书的想法已经很久了，大概是从1968年8月20日至21日夜间开始的，在那天夜里，苏联坦克使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希望破灭了。我当时觉得，在那天夜里，数十万共产党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们为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已经失去了意义。

但是，人是可以忍受很多次考验的。我想为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人经历过抵抗运动的锻炼，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后来又对这个社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式的检查——提出一篇诚实的证辞的打算一次又一次地被推迟，有时甚至被遗忘了。但是对于“布拉格之春”运动这场遭到破坏的“最后的斗争”，是不可能遗忘的，因为我怎么能够甘心自己三十年来的生活理想遭到歪曲呢？

1975年 2月4日那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一个装着炸药的邮包……。这一警告已经够明显的了。由于他们要使我保持沉默，我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终于只好开口讲话，谈谈那些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事情。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一直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积极的党员。在我读过党的关于所谓“破坏法制的行为”——这是他们的一种羞羞答答的说法——的报告以及听到我国警察及其犯人们所陈述的种种情况以后，我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完全不能排除他们有朝一日将我灭口的可能性，除非我象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博胡米尔·拉乌斯曼在1953年所做的那样突然下决心“自愿”返回布拉格进行令人高兴的自我批评。我也可能成为一次比炸药邮包事件准备得更加周密的车祸事件的牺牲品。总之，我在那一天终于接受了出版商关于写作本书的提议。

我知道，叙述我本人作为一个积极的共产党人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中的种种矛盾，并从中得出一些不但同我的祖国、而且还同整个社会主义的前途有关的结论，是一件需要冒风险的事。我也知道，在我的那些被迫保持沉默的同志们面前，我有责任这样去做。当然，本书所介绍的是我本人的生活，书中所谈到的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和感受。然而我知道，有数百万同胞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的人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基督教徒和自由党人）在很多方面同我有着相同的观点。他们无法开口讲话……。这种情况还要延续多久呢？

我也同样知道，不但布拉格和莫斯科的干部们，而且西方的某些人、甚至我的许多朋友都会对我的证辞感到不悦。到处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无疑都是些诚实而有教养的人，但却担心别人扰乱了他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以及他们的刻板的世界观。这些人对有些问题宁愿采取拖延的态度，对有些事实宁愿采取掩盖

的态度，“以免造成危害”——但是危害谁呢？我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本人也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有过类似的想法，而且保持了沉默。毫无疑问，我是经过一段痛苦的经历之后，才明白这样一点的，即：拖延问题或掩盖事实对于我们所捍卫的理想并没有好处，相反，这只会使我们的理想遭到歪曲。

我十分清楚，政治经常是以必要的妥协为基础的，所有这类妥协都要求人们对于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但是，假如我也用那种不痛不痒的“策略上的”考虑磨去我的证辞的锋芒，那么，这样的证辞难道还有丝毫的价值可言吗？

在人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刻，促使他去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我就曾经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时刻，它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第一次是1940年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当时我看到，我的同志们是如何地遭到拷打、杀害或被转送到集中营里去的。后来是1961年，党指控我是“叛徒”和“阴谋家”，而实际上我的全部思想和工作都是为了党，而且把党看成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再以后就是 1968 年 8 月 20 日至 21 日的夜间，当时我看到，苏联坦克怎样包围了捷共中央委员会的大楼，苏联警察又怎样把我们的领导人带走，对待他们就象对待“战俘”一样。最后一次是 1975 年 1 月 15 日，那时捷克报刊上对我和我的同志们的诽谤运动简直荒谬到了极点，例如党的机关刊物《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居然揭发我是从前盖世太保的特务！

我并没有去反驳《论坛报》的这种诽谤——即使去反驳也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当政的共产党的报纸曾经发表过一个受歧视的人的辟谣声明——，而是对我自己的一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员？如果让我再进行一次选择，结果会是怎样？我们从1945年开始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人原谅那些后来使它变得十分

可笑的错误和罪行？对于"现存的社会主义所发生的蜕化变质"，我本人作为一个积极的共产党员过去和现在应当负有多大的责任？在我已经看清我们的理想破灭以后，是应当继续以往的努力呢，还是应当完全隐退甚至转到对立的方面去？在1968年8月20日事件以后，是应当接受和屈服于"悲惨的现实"，期望党有朝一日会找到必要的力量来实现人道主义化呢，还是同这种"现实"进行斗争，努力改变这种"现实"更为正确，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呢？

在我经历了这种种事情以后，我是否还有权利去信仰一种确实能够保障公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正义和尊严以及更多的积极参与决定的权利的、区别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为了实现这种变化，应当具备哪些必要条件呢？此外，有什么东西能向我们担保，那个早已变质的社会主义不会去破坏发达国家中实现这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呢？真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这次我没有把这些问题一推了之。我让它们自由地表达出来，并力图找到答案，丝毫不抱成见，丝毫不加妥协。因为除了我的名誉以及我对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的信念以外，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就这样，我好象站在自己的良心的法庭面前。我希望读者同我一起来寻找正确的答案，因为其中的许多答案对于读者的关系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密切。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第一章　我是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

事情发生在1961年9月。我刚从保加利亚度假回来，一到布拉格，就被叫到党中央委员会去了。

"中央国际部的拉斯托维契卡想和你谈一谈。"

"巧极了"，我心里这样想。作为国际学联的主席，我很久以来就一直想跟他谈一次话，谈谈我的工作问题。

中央委员会大楼座落在伏尔塔瓦河畔，当我向门卫出示党证时，他们向我行了一个礼。一位彬彬有礼、但又冷若冰霜的秘书把我带到拉斯托维契卡的办公室。拉斯托维契卡友好地接待了我，问我国际学联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碰到了一些困难"，我说。"我们正筹备召开关于学生在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问题的国际会议。阿尔及利亚代表和中国代表反对苏联的路线，他们认为争取民族独立比争取和平更为重要。"

他打断了我的话。

"你跟我来，同志们想和你谈一谈。"

我想，一定是哪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要见我。我走进一间宽敞的会议厅，看见有几位我经常见面的布拉格的朋友，另外还有几位已经有两、三年没有见面的朋友。在场的还有一些我本人并不认识的党的干部，其中有马穆拉，他是令人畏惧的中央委员会主管公安和军事的负责人，是我国政权的铁腕人物，还有宣传部

长乌尔班。

显然，大家是在等什么人。乌尔班同志毫无拘束地同我闲聊着，直至两个我不认识的人走进房间。乌尔班的脸色变得十分严肃，他要我们大家坐好，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用冰冷的语调念道：党发现了一起阴谋，是由一些党员策划的，目的在于推翻党的政策而以修正主义路线来取而代之；参加这一阴谋的人同某个外国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准备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政变；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的结论是：我们现在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属于这一阴谋集团，党要求我们，在此案移交司法部门以前对我们所进行的颠复活动作出全面的交待。

这真象是炸弹爆炸一样。我在党内工作已经二十五年了，从未受过丝毫的指责。长期以来，我同党的负责人一直保持着一种友好的一般关系。诺沃提尼同志很了解我。如果有人这样对我说："听着，贝利康同志，你搞学生运动已经很久了。为了使你获得更丰富的政治经验，我们决定派你到党的县委会去"，或者对我说："你的工作实在太差了"，这我倒还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并不是这样！一纸三分钟的声明，我便给戴上了阴谋家的帽子……

"这里在场的人只是这个阴谋集团的很小一部分"，委员会主任接着说道，"其他人已经在邻近的几个办公室里受审。所以，你们应当向党交待全部情况，否则警察会让你们开口的，那就要糟得多了！"

我的一位朋友试图缓和一下气氛。

"亲爱的同志们，这是在开玩笑吧。我是从你们这里才听说有这么一个阴谋集团的！即使你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那也一定是弄错人了。说正经的：我在这里见到了贝利康。我认识他，这不假，但是我已经有三年没有见到他了！至于其他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果我们有失于检点之处，那么请告诉我们，在什么

地方、在什么时候。”

委员会主任板起了脸：

“有关什么问题，你们大家都十分清楚。我们发给你们每个人纸张和铅笔，然后每一个人由两位同志看守，单独到一个房间里去把所有的情况都写出来，直到写完为止。不许互相交谈或给外面的人通风报信。”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

“对于你们所干的肮脏勾当，按法律甚至该判处死刑。”

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肯定是个误会，我认识世界各地学生运动的几百名代表，我曾经会见过那么多的外国人，要把他们都说一遍，即使一个星期的时间也不够用。也许他们当中的某个人被捕了并且提到了我的名字？但是我一向是个遵守纪律的党员，假如我有什么批评意见，历来是藏在自己心里或写信向党的领导反映的。

我开始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写，很快就把纸交给两位看守中的一位。不久，他把我带到调查委员会的房间里，我刚才见到的那些人已经全部聚集在那里了，只有一个人不在。

“我看，你们是不愿意去进行回忆。那我只好恢复一下你们的记忆了”，委员会主任说道。“是关于——其实你们自己应当很清楚——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情，你们通过它把情报送到贝尔格莱德，然后这些情报又到了美帝国主义者手里。同你们进行联系的是一个名叫彼洛·伊瓦契奇的南斯拉夫人，他是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组织‘国家保安处’的上校……。”

接着，他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

“要老实交待！把你们所知道的有关情况统统写出来：你们是什么时候同他见面的，多长时间见一次面，谈了些什么，向他提供了哪些秘密文件，他给了你们多少钱！”

大厅里响起了愤怒的抗议声，同志们群情激愤。

“不错，我们认识伊瓦契奇。他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南通社驻布拉格记者。但是要我们承认，他出钱想从我们这里弄到秘密文件，这简直是荒唐！我们当中谁都没有那么高的职位可以接触这些文件，这一点你们是完全清楚的！”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劝你们都说出来。其他人已经招认了，并且对你们提出了十分严重的控告。你们要彻底交待，党将进行彻底的清查。”

他们又把我们分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我们又重新开始写材料。甚至上厕所时，他们也监视着我，大概是怕我上吊吧……。我请求给我一台打字机，进行着搜索枯肠的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伊瓦契奇是在贝尔格莱德，当时他是南斯拉夫学联的副主席，以后又在北京、维也纳和布拉格同他见过面。他在某某时候和某某时候曾经找过我，问过我某某事和某某事，我们在某某餐厅和某某餐厅会过面，吃过某某菜和某某菜！”我尽力回忆是否有什么他可能向我问起的所谓秘密情报，但是完全徒劳，我还是回忆不起来。

我完全垮了，对一切都根本无法理解。

我开始回忆同朋友们多次谈话的最小的细节以及他们的脸部表情，仍然没有发现什么令人不安的内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审讯时代的影子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又感觉到了那种给优秀的共产党人扣上叛徒和杀人犯帽子的怀疑气氛。难道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①和对斯大林时代的批判都徒劳了吗？

我想：“幸亏我们还没有落到警察的手里，还在中央委员会的掌握之内。不过以后他们会把我们开除出党交给警察的。”

---

① 指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译者

晚上，又一个一个地对我们进行了提审。

“先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看看。难道你想把那张纸藏起来吗？”

“那上面记的是我要汇报的内容”，我说道。“这是我当着你们派来监视我的两位同志的面写的。”

“这么说来，你承认同伊瓦契奇有接触了！他一定要你谈过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吧。”

“他根本没有向我提过任何要求，即使他提过，我又有什么可以向他透露的呢？再说，中央并没有意见分歧，总是意见一致的。我又能向他透露些什么矛盾呢？”

“他想要了解的是某些细微的分歧。你承认你们一起吃过饭，想必每次总是他付钱吧？”

“不，有时他付钱，有时我付钱。如果你们想要从这里证明他企图对我进行贿赂，那是办不到的。”

“这对你只会更糟！其他人刚才承认接受过他的钱！现在我们要把你的交待同实际情况进行核对，因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三年来，我们一直在步步跟踪你们。我们知道你们在哪里会面，甚至还知道你们谈了些什么！”

“那你们还要问我干什么？”

“因为我们想知道，你隐瞒了些什么。你很狡猾，表面看来，你没有隐瞒同伊瓦契奇的各次会见，但是有关你们阴谋活动的内容，你却几乎全部隐瞒了！你同你的那些朋友在布拉格的住所聚会，你把禁止阅读的材料、例如法国《世界报》①带到那里，还把外国报纸上的文章翻译给别人听！”

“当然！如果我在《世界报》①、《人道报》②或者《团结

① 法国的资产阶级报纸——译者

② 法国共产党机关报——译者

报》① 上找到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我就向大家介绍文章的内容，但不是全文翻译。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共产党员，当然要谈论政治，或者谈论一些党的会议上不会谈到的事情。”

那位同志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

“这就是你的错误！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对某一事情有怀疑，就应当把自己的想法公开地告诉党，而不应当在私下议论。你们这是在搞宗派。”

“不对！我们所谈论的是关于集体化之类的问题。我的朋友卢克什对我们谈到他那个地区的农民反对集体化的事。我们认为，集体化在原则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有时却把农民推向反动派的怀抱，于是我们对贯彻党的政策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进行了批评。此外，我们也谈论过五十年代的那些政治审判案。”

“好，我们现在就来说这件事！”他厉声说道。“你们给英国工党议员兹里雅古斯联名写信，请他敦促苏联共产党出面要我们党为政治审判案中被判刑的人恢复名誉。”

“兹里雅古斯？我只知道他是斯兰斯基案件中的被告人之一，后来得到了平反。此外，我还从报纸上知道，他经常到苏联去。我为什么要给他写信呢？”

“这封信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你也知道有这么一封信”，他说，“你还是老实交待吧！此外，你还对诺沃提尼同志进行了攻击。”

他又让人把我带走，我又重新开始写：我的朋友和我，我们经常见面，或者在我的住所，或者在卢克什同志那里，有时只是在一起喝杯酒，唱唱古老的民歌，或者谈谈政治。

① 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译者

将近午夜时分，审问又开始了。我想："这次也许会把我放了，也许就由警察把我带走。"

那位同志看了看我写的材料，脸色十分阴沉。

"你的保险柜钥匙在哪里？"他问道。

我的办公室里确实有一只保险柜，我把一些机密文件锁在那里，以免被人偷走。我简直无法理解，保险柜里并没有什么对我不利的东西。然而从审讯的过程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必须作好准备再也不能回家了。

"钥匙在这里"，我边说边把钥匙放在桌上。

"我想，你会慢慢认识到你的问题的严重性的。你的朋友卢克什刚才在审问记录上签了字，承认他是铁托分子的间谍。他已经被关押在鲁齐奈监狱里了。卢克什供出了许多对你们非常不利的情况。如果你想拯救自己，就把全部情况都讲出来，不要企图蒙混过关。"

突然，他把保险柜的钥匙还给了我。

"你暂时可以回家去了，"他说。"不过不许对任何人谈起这件事，也不许和刚才在场的任何一个人会面。即使对国际学联，你也要守口如瓶。你随时听候调查委员会的传唤，不准离开布拉格。明天就把你的护照交出来。"

大约午夜时分，我离开了空荡无人的中央委员会大楼。只有几个警察在楼下站岗。这时如果他们将我逮捕，拖进停在大楼前的黑色大轿车里，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但是他们只是检查了一下我的党证。

我象梦游症患者那样信步走着，肯定有人在后面跟踪。我连和朋友谈谈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对于我这样一个二十五年来一贯忠于党的共产党员，一个以能为党、为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人来说，这时的感觉就象是世界崩塌了一

样。我不能不看到，三年来他们一直把我当间谍一样看待，而外国却把我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特别危险的代理人”！现在突然又要我作什么荒唐的“交待”。我每时每刻都有被逮捕的可能。

对于监狱，我已有过领教。我知道，那儿是多么艰苦。我时刻准备为革命作出任何牺牲。但是我无法想象，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我居然还要进监狱。

二十年前，我曾经蹲过监狱。当年的情景这时又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老实交待”，盖世太保的队长这样吼叫着。

1940 年 4 月 29 日，盖世太保将我带走，关进了学校附近的一所监狱里。当时我十六岁，正是缔结德——苏条约的时候，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进行反对纳粹占领的无情斗争。我同其他同志一起在家乡阿罗木次市的各个地区、特别是夜间在工厂门口散发了许多传单。

盖世太保立即作出了反应：我们大家约四百人全部被捕。

一个星期以后，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把我从牢房带到盖世太保的办公室。盖世太保的队长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

“好好听着，你的事我们全都知道。老老实实地招出来，不然我们就强迫你招认。”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会讲德语。他便勃然大怒。

“你是高中生，还说不会讲德语？”

我回答说，我们的教员教得不好，我只懂几句话，可惜只会讲捷克语。

他大声地狂叫着，骂我。这时，另外一个人说：

“那好吧，替你翻译。”

这正是我所要达到的目的。

“要我招认什么呢，队长先生？我们学生不关心政治。”

旁边那个人走了出去，一会儿又带了一个人进来，他们开始用棍子打我。

“这只不过是先让你尝尝滋味！”他们这样咆哮着。

我装出一付很可怜的样子。

“我愿意全部招认”，我说。“我们只散发了一些反对战争的传单，传单上说，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责任在于西方帝国主义。传单上只写着‘斯大林万岁，苏联万岁’。这有什么不对呢，斯大林不是希特勒的一个很好的盟友吗？”

“不许再胡说八道！传单是从哪里来的？”

我就说，我在火车站遇见一个不相识的人，他问我几点钟了，我回答说“三点半钟”，他就交给我一个小包。

“他要你拿这个小包干什么？”

“要我在第二天交给火车站的另外一个人。我去了，但是并没有人来，于是我就把传单扔到厕所里了。”

“你是想把我当傻瓜吗？”

他们拿了一些人的照片来让我看，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又把我带回牢房。我心里想，第一次审讯还算对付得相当不错。

第二天，我又被传去审讯。这次的气氛非常紧张。

“你是个骗子。你把包裹放在一家店里，现在那家店里的人已经抓到了。”

他们把他带了进来，他认出了我。

我感到非常尴尬，盖世太保看出了我在撒谎。他们对我说，还有其他人也招认了。唯一能危及我的证据是他们在我家里找到的那些画，这些画全部都在地下刊物上刊登过，一眼就能看出是我

的作品。

我在狱中所见到的一切，使我的政治信仰变得更加坚定。我在那里结识了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其中有些人遭到酷刑而仍然进行了反抗，另外一些人被他们处决了，如1939年接受我入党的斯拉伐·霍尔尼克，又如始终没有吐出一句供词、直至在刑仗下牺牲的卡尔·特列尔。但是也有孱种，当时的县委书记便变节了。有一天，警察把我带到他的面前进行对质，让我们两人单独留在房间里。他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显出一付疲惫不堪的样子。

“你听着，”他说，“不值得再保持沉默了。没有人来理睬我们，斯大林、党和人民都不会来理睬我们。你也看到了，生活还是照样地进行着。我们怎么样了，谁也不会再来关心。莫斯科是希特勒的盟邦，而我们都是些理想主义者。我们将会白白地死去，还是说了好，为将来想想吧。”

我还是没有开口……

事隔二十年以后，现在又一次要我进行交待，而这一次我甚至不知道要交待些什么。

我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伏尔塔瓦河畔。河水缓缓地从桥下流过布拉格市中心。我很喜欢在那里散步，观看鸟儿在天空飞翔、在寻找食物。我力图整理一下我的思绪。

我成了一个“叛徒”，我的朋友们也一样，而我知道，这些朋友都是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尽管如此，疑虑还是阵阵向我袭来。也许是他们欺骗了我？也许他们是两面派？虽然我在这个案件中是无罪的，但毕竟还是有过错的，因为我缺乏警惕性，没有看透他们的虚伪……

这一定是个误会。但是产生这一误会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如

此说来，革命连它自己的孩子也要吞噬的看法是对的了？难道任何事情真的总是不断重复发生的吗？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我是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

每当我回想起自己的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我常常问我自己，它们对我的内心世界的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对我的信仰的形成以及1939年加入共产党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不是一种偶然性？我的政治道路是否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这条道路是不是我所受到的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教育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或者说得更一般些：在一个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人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有些人成为共产党员是出于对父母或对自己成长的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抗。我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我的父母从来不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我。他们二人都出身于一个名叫新乐村的摩拉维亚小村庄的贫苦农民家庭。我的父亲为了使自己能够上大学念书，曾经在德国做过工。他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考取了布拉格艺术学院，在捷克著名雕塑家密斯贝克的班上学习，后来成了摩拉维亚有数的几个著名雕塑家之一。他是一个学历不是很深、但却很有才干的艺术家，是一个十分正直、易于感情冲动而又心胸开阔的人。他放手让我阅读我想要阅读的各种书籍。在他的藏书中有很多法国书籍，其中有些是我当时还看不懂的。在那里，我很早就发现了罗曼·罗兰、阿纳托尔·法朗士、朱尔·罗曼、亨利·巴尔比斯，还有朱尔·韦尔纳、维克多·雨果、福楼拜、亚历山大·仲马和巴尔扎克，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我还阅读由恰佩克和奈兹瓦尔翻译的阿波利内尔的著作以及法国美术书籍。在

其作品中对社会的腐败进行了严厉的抨击的政治画家多米埃使我着了迷。我还特别喜欢戈雅和范·戈格的作品，还有戈甘、勒努瓦、图卢兹—洛特雷克和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我的母亲曾经在维也纳当过女佣人，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她在那里学会了德语，对周围的各种新鲜事物养成了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她朴实聪敏、通情达理。她给我的教益大概是最大的，因为从我的哥哥、妹妹和我小时候起，她总是对我们说，在人的一生中，不管是穷是富，最重要的是要诚实、关心他人、心胸开阔。我的父母并没有向我灌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对我有着十分有益的影响，因为他们传给我的好品质在我的一生中一直在起着作用。

童子军的活动对我和我哥哥的少年时代有着重要的影响。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们远离父母同一些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一起参加假期野营，这对我们说来是一种十分美好的冒险活动。我们在这里增长了许多有关大自然的知识，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尊重别人。我们小组里的人大都出身于小资产者的家庭，但也有一些出身于无产者的家庭，彼此没有任何歧视。不管是谁，只要接到家里寄来的包裹，就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自己动手做饭，自己洗刷炊具，夜间值班巡逻，经受各种恶劣气候的锻炼——这种朴素的野营生活使我以后在监狱中和从事地下活动时能够比较容易地克服各种困难。

学校也使我明白了不少事情。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城区里居住着许多工人和失业者，紧靠着一个以小职员和小官吏为主要居民的地段。我很快便注意到班级里的同学在社会出身方面所存在的差别。我可以吃到面包和黄油，但我的朋友们却吃不到，许多人甚至连面包也吃不上，只好向别人讨一点吃。我第一次为自己比同学们穿得好而感到羞耻。由于他们的物质条件是同他们父母

的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更使我感到社会的不公平。我想，为什么有些人找不到工作，有些人在挨饿，而另一些人却过着富足有余的生活？我对这些问题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当时大家谈论得很多的议会民主问题的关心，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同希特勒德国、甚至同半封建半法西斯的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真正的孤岛。

我当时对于议会民主的认识大概同今天西方青年对于议会民主的认识差不多。假如到处所见的只是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只是多党制的消极面，那么怎么可能理解和珍视这种制度呢？于是便认为过错在那些“老家伙”、“当权派”和“阔佬”的身上，心中充满反抗和愤慨的情绪。最后，同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我也相信不管谁用什么方式来反对这个制度，都是绝对正确的。

国际形势也促使我考虑很多问题：西班牙内战以及格尔尼卡的被毁坏的房屋和惨遭杀害的儿童的照片使我感到窒息和羞愧，热泪盈眶。我们从报纸上了解到从希特勒德国逃亡出来的人们的悲惨遭遇，以及反法西斯战士所遭到的酷刑拷打。当时，我每天都要把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画下来，算是一种“日记”。西班牙内战对我的震动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开始自己办报纸，并按照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的战斗口号将报纸取名为《“不许通过”报》。出版报纸一事使我们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因为学校里禁止从事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提出了“保卫马德里就是保卫布拉格”的口号，意思是说西班牙的斗争决定着反法西斯和反纳粹斗争的前途。这一立场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因为1939年3月初马德里沦陷以后，接着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就被占领，从而导致我国和整个欧洲所发生的悲剧。

众所周知，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正式盟友的西方国家在法西斯

面前表现出完全无能。他们不可能(或者不愿意) 理解，幕尼黑事件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和心理后果。盟国干脆将我们“出卖”给了希特勒。每个人都有这 样 一 种 感觉，似乎整个世界只知道追逐权势、名誉和金钱。

1938年不仅对我个人的发展，而且对于同我年龄相仿的整整一代人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一些最初步的了解，因为我在 1937 年加入了青年组 织（“青 年联盟”），这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的策略是扩大反法西斯阵线。我们的书记是一个积极的共产党员，他对苏联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所采取的态度感到愤慨。他说斯大林叛变了，并拿托洛茨基的态度同斯大林相比。当时我还不知道托洛茨基是谁。这位朋友的话在我们思想中引起了某些怀疑，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比我年长七岁的哥哥，他当时是医科大学的 学 生， 在 1936 年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我是把他当成自己的榜样看待的。

“如果你有怀疑”，他回答说，“就应当相 信 苏 联、相 信 党，因为苏联和党知道应当怎么办。”

后来我明白了，我们的不成熟表现在哪里。我们总是更多地感到需要相信一些什么东西，而不是更多地去思 考 问 题、去 怀疑、学习和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我在生活中经常遇见有人采取这种态度，这是青年们的思想的特点，他们拥护革命运动，但是丝毫没有想到，他们的热情和理想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十分缺乏必要的实际知识和理论知识作为基础。此外，我现在还记得，当那位托派朋友——他的绰号叫“皇上”，因为他的发型有点象前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发型——被开除出共产党的时候，同他之间的这一首次政治冲突在我们的思想中引起了一场危机。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同志，我们都很喜欢他。而这是我 第 一 次 听说，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依据的人仍然可以被 看 作 是“敌人”和

"叛徒"。

但是情况不允许我们化时间去继续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希特勒企图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上。

幕 尼 黑

1938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进行第一次动员：希特勒在并吞奥地利以后发出了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我现在还记得，在我故乡阿罗木次市的一些房屋的墙上贴出第一批动员告示的时候，我同父亲正走在街上。我父亲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因为不能应征而流下了眼泪。青年男子纷纷赶回家中，然后又带着背包乘火车或卡车奔赴前线兵站。九月间，希特勒的威胁更加严重了，又进行了一次动员。后来，在达拉第、张伯伦和墨索里尼的赞同下，同希特勒签订了幕尼黑协定，从而导致了我国政府的投降。应征入伍的人又复员了。

就这样，曾在1918年我们共和国诞生时支持过我们的盟国把我们出卖了。这一事实所引起的震动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我们该怎么想呢？许多人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西方盟国出卖了我们，既然希特勒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不是只好把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参与幕尼黑肮脏交易的苏联身上了吗？

接着，我们又感到羞耻，因为我们甚至未能保卫自己的人民，因为我们投降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士兵们的形象：他们从边境回来 身边没有武器，痛哭流涕，向着阻止他们投入战斗、迫使他们采取消极态度的军官们啐唾沫。我的家乡阿罗木次市离幕尼黑协定规定的分界线只有五公里的距离，大家甚至担心德国人当时就会占领这座城市。居住在被第三帝国并吞的村子里的许多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纷纷逃到阿罗木次。那些反法西斯的

难民的形象至今仍在我眼前浮现，他们的生活十分困苦，只好从饭馆里乞讨残羹剩饭充饥，不知道该到何处安身。可以肯定地说，象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战后会陷于共产党和莫斯科的统治之下，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西方列强在慕尼黑出卖了它。

我们感到无能为力，但同时又迫切地希望采取某些行动。然而，我们孤立无援，尤其是我们还太年轻，没有武器，况且又感到老一代已经垮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在哪里可以进行反抗呢？我同许多人一样在寻找出路。我的哥哥当时已经在积极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共产党是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唯一拒绝自动解散并对地下斗争作了最充分的准备的政党），他注意到了我的颓丧情绪。

“你虽然还很缺乏经验，不过我们打算组织一个夏令营，你可以在那里迁到许多有趣的人物，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你适合做些什么。”

夏令营的地点在雷特利切克湖畔，我们在1939年7月到达那里。从表面看，这个夏令营同当时已经解散的童子军曾经组织过的夏令营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后来知道，这个夏令营是由共产党组织的。当时，许多共产党员已经被捕或者已经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因此想物色一些青年人、物色一些新人参加斗争。我们在那里听关于马克思主义、反法西斯斗争、辩证唯物主义和苏联的课，晚上围坐在篝火旁唱革命歌曲，唱苏联游击队员歌曲并朗诵诗歌。就这样，老党员们帮助我们当中最有才干的人为将来的地下斗争进行着准备。我们觉得很自豪，因为我们感到自己是抵抗运动的一个成员（当时，我们准备迎接危险的决心中政治色彩并不很浓，主要还是浪漫主义的成分居多）。我们感到自己是属于一个大家庭的，而正是这个大家庭在困难的情况下帮助了我

们，驱散了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并使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充满了力量。

斯大林同希特勒的条约

有一天夜里，一个从布拉格来的通讯员来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的哥哥是夏令营的领导人之一。他带来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震惊：希特勒德国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当天夜间，党员们就命令我们离开夏令营："各自坚守岗位，等候进一步的指示。"我回到阿罗木次以后不到几天的时间，德国便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向波兰发动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有一位自称为本市党组织书记的朋友立即把我们召集在一起，问我们是否愿意散发秘密传单和党的报刊并在文科中学学生中间进行鼓动宣传。我们表示愿意。接着他向我们介绍了地下工作的守则。鉴于我们参加了地下工作，我们可以不经预备期而加入共产党。在小小的庆祝会上，党组织书记（后来他被盖世太保杀害了）对我们的义务进行了说明。从那一天起，我们便属于那个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而且是国际的大家庭，属于共产主义运动了。对我说来，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从此，我开始了一种双重的生活：一方面是学校生活，要根据党的要求表现得同普通学生一样，另一方面是晚上或者夜间从事秘密活动，执行各种任务。这些任务使我感到自己正在为一个伟大的事业服务。他们向我们具体描述了我们的理想：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失业和不公平现象的苏维埃社会……。我们是历史的推动力！

这段时间很不轻松：一方面，战争使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感到满意，因为不排除它以希特勒德国失败而告终的可能性，而我们从前始终担心西方世界会不会承认希特勒政权、从而使我们世世

代代受这个政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犹如晴天霹雳使我们目瞪口呆。在我们的想象中，苏联是希特勒德国的主要敌人——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这个条约呢？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接连许多天彻夜不眠，记得我同我哥哥和其他同志的谈话。他们对我们进行解释说，苏联受到了西方盟国的孤立，法国和英国不愿意真正地同苏联缔结条约，而希望德国进攻苏联、消灭苏联。

我哥哥总是说："你应当明白，在革命中有前进，也有后退。某一次后退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失败，然而这种失败以后可以转化为胜利。由于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必须使自己不受包围，所以只好同希特勒缔结条约，这同列宁当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皇签订条约是一样的：列宁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拯救社会主义并促使事情最后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这话有道理——但是我怎么向同学们解释呢？

"你好好听着"，同学们说，"斯大林已经同希特勒结盟，而你这个共产党人的同情分子也出卖了我们，因为现在连莫斯科也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我力图使他们理解签订这个条的策略考虑，虽然我本人的疑虑在讨论中也并没有完全消除，而且莫斯科的态度后来又更加加深了这种疑虑。一方面，盖世太保在我们这里搜捕、拷打和杀害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而另一方面，莫斯科电台的捷克语广播却在宣传苏联农业的成就、生猪头数和农业机械数量的增长，这使我感到十分惊奇。对于盖世太保在我们这里的所作所为，从莫斯科电台听不到只言片语，没有一句话是批评希特勒政权的。德国的报刊也渐渐改变了调子，用友好的语言谈论苏联。我们这些天天在进行反对纳粹占领者的现实斗争的人为未来而感到担忧。

有一天晚上，我哥哥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里。“我们要散发一份传单，我还没有起草。直接从莫斯科传来的党的指示不能直接散发，必须加以改写。”他把当时设在莫斯科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读给我听，主要内容是：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瓜分世界而进行的非正义战争；我们捷克的共产主义抵抗战士毋须支持这场战争；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士兵是德国军队中穿军装的无产者，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因此，应当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宣传，因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英、法、美帝国主义以及流亡伦敦的贝奈斯总统；对于贝奈斯总统，我们也必须展开斗争。

“我们不能散发登有这种指示的传单”，哥哥对我说，“这里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你来帮我改写一下。”

我生气了，“不，不行！党在莫斯科的领导人采取这种立场，这说明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反对主要敌人纳粹占领者的斗争。另外，他们想过那些参加抵抗斗争的非共产党员没有？他们也是我们的同盟者，没有任何理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去反对他们！”

有人可能会说，我这里所讲的纯粹是一段个人的经历。只是到了以后，我才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找到哥特瓦尔德寄给当时地下中央委员会的同样内容的秘密电报。例如，正当波兰在希特勒军队及其飞机的进攻下危在旦夕的时候，哥特瓦尔德在1939年9月8日的电报中写道：

> “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交战各国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各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共产党都不应当支持这场战争。资产阶级进行这场战争并非象张伯伦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为了反对法西斯；这是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争霸世界的战争。国际工人

阶级绝不应当支持拒绝苏联援助、镇压其他民族的法西斯波兰。”

电报最后说：

“由于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区分已失去任何意义；因此，策略也必须改变。在现时正在交战的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应当是动员群众反对战争并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担任国会议员的共产党人应当投票反对战争拨款，应当向群众说明，战争只会给他们带来困难和灾难。在中立国内，对于那些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为了从中渔利而支持在其他国家进行战争的政府（特别象美国政府在日本和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必须予以揭露。在任何地方，共产党都必须对社会民主党的叛卖政策进行坚决的打击。迄今采取与此不同的立场的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的共产党，应当立即纠正它们的政治路线。”

哥特瓦尔德（签字）

1939年10月16日给中央委员会的另一封电报说：

“托马斯的第二次来函收到并表同意。贝奈斯已经投靠西方帝国主义，成了苏联的敌人，他所进行的斗争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因此，你们在解放斗争中应当摒弃任何反德沙文主义。望将人民中间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贝奈斯的作用所抱的幻想告诉我们。”①

① 上述全部文件曾发表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论文集》，1967年3月版，第375—433页。电报的缩微胶卷保存在布拉格的捷共中央档案馆，存档号：81号。

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文字。我们的传单所反映的问题并不是个别问题。各种文件和我们的经历都表明，西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时服从了苏联的政策需要，而苏联则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当时留在国内领导反法西斯地下斗争的捷共领导人的电报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当时所面临的危险是有所感觉的。例如，在 1940 年 4 月 15 日发给在莫斯科的哥特瓦尔德的电文中说：

> “对于只有西方公开表示关心捷克人民的现象，你们不应当加以容忍。请在美洲、斯堪的那维亚和巴尔干国家发动反对恐怖统治、反对迫害和反对压迫的运动。请向舆论界介绍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情况。”

这几乎已是一种绝望中的呼声：这是党在国内的活动同莫斯科的领导之间的公开矛盾。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党组织从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反对纳粹占领，但是这种斗争在大多数时间内是违背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的。留在国内的地下中央委员会把重点放在罢工、反对饥饿和反对压迫的斗争上，而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却主张不要进行斗争、不要卷入没有准备的行动中去。一方面，成千的捷克人准备在国外——起初打算在波兰、以后又打算在苏联——继续坚持斗争，还有人经过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逃往法国建立了一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军队；而另一方面，我们党在莫斯科的领导人却干脆屈从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监狱——学校

我们已经十分了解盖世太保在帝国内所使用的方法。有人对

我们说，假如被捕，就绝对不要开口。然而想象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时是非常大的。阿罗木次的盖世太保特别危险，因为他们当中不仅有来自帝国本土的德国人，还有很多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人中雇佣的人员。我们惊讶地发现，许多德国人具有双重人格。在德国占领以前，他们在我们这里当侍应生、旅馆老板和理发师，而同时又是已经为盖世太保服务多年的、活动很积极的特务。因此，他们对我们的环境、语言和心理了如指掌，对于在城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也十分清楚。

我的几个朋友和我本人都参加了捷克的党组织。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尽可能多地散发宣传品，其中有"从上面来的"以及我们自己写的传单，还有党的地下报刊《红色权利报》。此外，我们的任务是组织青年小组，为被捕入狱的人的家属募捐，特别是根据党的路线开展政治鼓动工作。例如，我的任务是夜间同一个和我素不相识的人在公共场所接头，有时在火车站，有时在城里的某个地方。这个人交给我一包报纸，然后由我将它们分成三个同样大小的小包，分别存放到同志们告诉我的几个公共场所去。最后再由三位我不知道名字的同志从那里将小包取走。

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存放材料的地方也愈来愈多了。我们感到很高兴，但同时也可能产生麻痹思想，因为参加我们活动的人数愈多，危险性也就愈大。我们不仅将小包存放到指定的地方，而且开始彼此结识，建立个人之间的友谊。就在那时，我认识了奥尔德里希·斯蒂博尔，他是现代戏剧的著名导演，是苏联导演麦耶尔霍尔德的学生和朋友，同时，我还结识了当时在阿罗木次图书馆工作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瓦茨拉维克。后来，他们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盖世太保杀害了。为了庆祝1940年的"五一"节，党终于决定发动一次反对德国占领的大规模的运动。当时，我们印刷了数千份传单并在夜间在各个城区、特别是各工厂

大门口进行散发。1940年4月25日夜间的这次行动十分成功，但也招来了盖世太保的反扑。

我还清楚地记得1940年4月29日那一天，仿佛就是昨天一样。我和几个同学从操场出来，在学校的走廊里有人告诉我，盖世太保的特务要把我抓走，并且正在校长那里等我回去。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躲进厕所里，关起门来好好地进行一下思考。盖世太保为什么要来找我呢？我搞不清楚。只是因为学校里的某一次讨论呢，还是因为我传播了伦敦电台广播的讽刺小品和新闻？这是对学校采取的一次报复措施呢，还是同时也在搜捕其他人？

我决定逃跑。我从窗口向外张望，看到盖世太保的汽车停在学校门口。过了大约二十分钟，警察上了汽车，立即开走了。可能是老师告诉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现在我该离开这个藏身之所了：我跑到父亲的一位朋友那里，他给了我一些钱，好让我乘火车到离阿罗木次大约五十公里的几位朋友家去躲避一下。

临别的时候，我对他说："请设法打听一下，盖世太保为什么要抓我。"

我向特洛勃基镇的几位朋友保证，只在他们那里呆到天黑，等有人来告诉我盖世太保抓我的目的。到了晚上，我家的一位朋友骑着自行车来了，他说，盖世太保曾经先到家里找过我和我哥哥。

"因为你不在家里，也不在学校里，他们就派车到士林去了"——我的哥哥在那里的医院里当助理医生——，"他们抓走了你的哥哥，还在你们家里等着。如果你不回去，就把你的父母作为人质带走。"

这一手很厉害，我决定当天晚上就回去。盖世太保正在家里等我。

"你为什么要逃跑？"

“我并没有逃跑。放学以后我到外面逛去了，现在我回家来了”，我装做十分天真地说道。

他们把我带走了。街上巳经戒严。盖世太保的汽车把我带到我们学校附近的一所老式的军事监狱里，对于这所监狱，我前面巳经提到过了。盖世太保队长会说一口流利的捷克语（我后来听说他的名字叫德沃夏克）。

“你的家庭出身很好，为什么也干起这种勾当来了呢？”

我回答说，我并没有干什么勾当。他打断我的话说：“你会招出来的，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准备对你用文火在原汁中慢慢地煨。”

他们搜走了我口袋里的东西，然后把我关进牢房。他们一直没有说明逮捕我的原因。突然，我理解到了周围可怕的现实，而以前它对我说来一直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牢房里巳经关着两个人，其中一人身上带着伤，躺在一个草包上。他们问我被捕的原因。

“我不知道”，我说，“这是个误会。”

“一开始都是这么说的！”

他们是什么人？我感到他们不十分可信！

“我们是捷克爱国者”，他们对我说，“不过，你会明白的，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互相了解！”

这第一个夜晚我一直没有合眼。有好几次，我听到犯人的叫喊声，他们在过道里拷打犯人，为的是吓唬别的犯人，特别是新来的犯人，使他们产生“现在一切都完了”的想法。我很快就了解到，与我同监的那位受伤的难友叫柯贝切克，在铁路上当职员，是摩拉维亚的国际象棋大师。不久以后，他告诉我，他身上的伤是受刑后留下的。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夜里他曾试图在窗钩上上吊。他对我说过，他是在帕洛斯特约夫车站被捕的，他们

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他在昏迷中说出了几个朋友的名字，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说出来的。后来，盖世太保将他们逮捕了，并要他进行对质。

“他们是无辜的”，他保证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我一定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提到了他们的名字。”

他又遭到了一阵毒打。我所见到的这种悲惨情景是我以前从未想象到的。

监狱里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的记忆，我一下子成了一个不同于常人的集体的成员。外部世界成了幽灵一般的东西。开头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因为老是想着从前的生活，还想着：“明天我要到学校里去上学，星期五同一个姑娘有一次约会。”而这里的囚犯早就已经忘却了外部世界，他们所想的只是狱中的生活：今天会不会提审我？明天谁来分饭？这个看守很凶，那个稍微好一点。什么时候自己还能给家里捎个信去呢？他们今天会不会把我们押送到集中营去，让我们在那里完蛋？

监狱的环境有其特有的逻辑，尚未习惯于这种逻辑的人是比较容易被摧垮的。盖世太保的那套办法显然是要把囚犯的神经搞得非常紧张：他们过了好几天以后才对你进行审问；在此期间，你已经通过敲墙的声音知道了受审和受刑的人的名字以及头一天夜里刚刚被捕的人的名字。例如，我就曾通过这种途径了解到，我们捷克地下组织的领导人雅列克·赫鲁比同志在要逮捕他的时候侥幸逃脱了。

我还了解到，我的青年朋友伊日·斯塔雷克和其他许多同志也被捕了，都关在这所监狱里。我曾设法同他们进行联系。我还始终没有得到有关我哥哥的消息，他被关押在另一所监狱里。

我们的监狱虽然是由冲锋队和党卫队担任领导和警戒的，但是1940年时负责监狱内部秩序的还是保护国的捷克警察。可能是

第六天或是第七天的夜里，我的牢房门被打开了："跟我来"，一个捷克警察对我说。我想，现在该是真相大白的时候了，要提审我了。我对自己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我跟随那个警察穿过一条灯光昏暗的过道。他把我带到一个厕所里，那里站着我的青年朋友斯塔雷克。

"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警察说。"你们谈谈吧，我过一会儿再来，那时你们就得分手。"

这时，我看到斯塔雷克的一只耳朵在流血，已经被撕裂了一半。

"我们快谈"，他说。"盖世太保几乎全都知道。在审讯时，我没法否认他们已经知道的一些事情。有一个名叫德尔卡尔的党委书记被捕了。一开始，他表现得不错，但是在用刑以后就开始招供了；他知道很多人的地址，都供出来了。在这以后，我们很多人都被捕了。"斯塔雷克大声地喘息着，说话的声音低得几乎难以听清。

"最好的情况是"，他接着说道，"他们一开始不马上问你详细的情况。你可以说，你愿意全部招供。你得编造许多不会连累别人的谎言，这样也许可以少受点刑。你必须一口咬定，我们散发共产党的传单是因为已经签订了德苏条约，以为这样做并不触犯帝国的利益。你得装成一个傻瓜，扮演一个'好兵帅克'。"

那位警察又把我带回牢房里。毫无疑问，他帮助了我们，因为他同别人一样还没丧失爱国心。这种看法以后得到了证实，因为所有捷克警察后来都从监狱里调走了。

我在牢房里整夜都在想，我应该怎么办：我应当象党告诫我们的那样拒绝回答问题呢，还是应当开口、装成一个傻瓜、拿德苏条约作挡箭牌呢？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柯贝切克，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经验比我丰富得多。

"对付盖世太保是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的"，他说。"你想怎么办都可以，但是不要出卖同志。要顶得住。你要咬定说你不会讲德语，他们就只好派人替你当翻译，这样你就有时间考虑如何回答了。"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盖世太保的总部，它设在阿罗木次的一个广场旁边。在这种情况下乘汽车穿过自己十分熟悉的城市，真有一种奇特的感受。你可以看到，没有你，生活仍然在照常进行，人们纷纷去上班，一些朋友正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一切都依然如故！你自己完蛋了，而生活仍然在继续。这时，你会产生一种想法，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

在本书的开头，我曾经讲了我第一次受审的经过情形，还讲了我同那个已经"变节"、并劝我全部招认的老共产党员的谈话。后来我听说，在他被捕的第一天，他们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以后他就慢慢地开始招认了，而他们又利用他来软化其他犯人。他的结局很悲惨：无论在牢房里还是以后在集中营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同他讲话。最后他自杀了。

反抗的代价

还有另外一种摧残人的意志的方法。几个星期以后，他们把我换到一个比较大的牢房里，里面关着二十五个犯人。牢房的铁窗正好对着一个专供人们散步的场所，从前这里是练兵场。每到星期天，犯人的亲属就假装在那里散步，为的是想看看我们。虽然禁止我们接近窗户，但我们还是可以远远地认出自己的亲人，不过他们要想看到我们是很困难的。晚上，有时可以听到从附近公园的一家饭馆里传来的舞曲声。这时犯人们就会想：

"如果我们在这里发霉、烂掉，这对谁有好处呢？也许我们

这些人都是一种幻想的牺牲品。归根结蒂，决定战争胜负的地方是在前线，而不是在这里！”

有些人在黑暗中嘀咕：“还没有一个独裁统治是用传单推翻的！”

有人插话说：“要末在军事上把希特勒打垮，否则他就会取得胜利，而我们这一辈子也就在监狱里了结了。说真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有一位名叫柯希那的共产党员曾经在莫斯科上过党校，他象慈祥的父亲一样照料着我。我当时才十六岁，是全牢房最年轻的一个。

“我们的活动也许一时还看不出效果”，他对我说，“但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同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同流合污。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人问我们，我们当时都干了些什么！”

有些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有时，犯人中的共产党员同从前当过军官的人之间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军官们这样指责我们：

“你们共产党人对共和国的灭亡也有一分责任。起初，你们反对贝奈斯，现在你们又成了希特勒的盟友。你们的亲爱的苏联把你们出卖了。”

这种时候，双方甚至会动手打起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夜间，有些犯人在呼唤他们朝思暮想的妻子的名字。一般说来，对于狱中的这种令人沮丧的气氛，工人比知识分子容易忍受些。导演斯蒂博尔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就忍受不了这种凌辱和刑讯的环境。两年以后，他在集中营里牺牲了。在押往集中营以前，他曾对我说：

“我感到，我是挺不过去的。请你告诉我的妻子，”——她是阿罗木次著名的歌剧演员——“我一直在想念她，她是自由的，可以再嫁人！”

他拿出她的相片给我看，这张相片一直藏在他的衬衣里面。战争结束以后，我实现了他的愿望。

押解犯人的事总是发生在夜间。那是很可怕的。大约在清晨两、三点钟的时候，牢房门突然打开了，进来几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党卫队员。他们开始宣读名单，谁也不知道名单上可能会有谁的名字，因为盖世太保办事情的一条规则似乎便是毫无规则。例如，有些仅仅因为散发传单或是说了一句笑话而被捕的人在集中营里无声无息地死去，而有些从事过危险得多的政治活动的人却在几个星期以后得到了释放。哪里有什么逻辑性呢？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集中营”意味着什么。被送到集中营里去的人一般都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们希望那里的命运也许会稍微好一点……

三、四个月以后，我的母亲获准前来探望我。我当时十分激动，好象甚至还流了泪。盖世太保队长德沃夏克也在场，我的母亲当着他的面说道：“队长先生要我告诉你，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们全家，你应当说出来。想想你的哥哥吧，他也在监狱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我哥哥的消息。

突然，她又在拥抱我的时候向我低声耳语说：“要坚强，要挺住！”我明白了，她刚才说的那些话完全是被迫的。

我的母亲是反对纳粹的。尽管她不赞成我们的政治观点，但对我们的活动却抱有同情。她并不感到遗憾。战争结束以后，有人告诉我：1942年，纳粹将她逮捕了，盖世太保队长对她说：“你有两个儿子，两个都是帝国的敌人，他们对你多么不孝顺啊！”她回答说，即使她有十个儿子，她对他们的最大希望也是要他们象这两个儿子一样……。这使我内疚的心情多少平静了一点。对于她的死，我至今一直感到很内疚。难道她和我父亲不正是因为我当时潜入地下才在1942年一起被捕和作为人质扣押的

吗？

监狱也是一所政治学校。早在入狱后的最初的、也是最困难的几个星期中，我们共产党人就组织起来了。来自士林的西梅切克同志是和我的哥哥同时被捕的，曾经遭到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用非常小的字体写在偷来的卫生纸上，然后在各个牢房里传阅。负责倒便桶的犯人把纸条放在厕所的某个地方，然后由别人立刻拿走。奥尔德里希·斯蒂博尔导演则向我们作有关马雅可夫斯基、艾森斯坦、苏联的戏剧和电影以及捷克的先锋派戏剧等等的报告。

我们在狱中对于世界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德国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胜利。在法国宣布投降的那一天，一个党卫队军官来到我们的牢房，以胜利者的口吻说道："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因为德国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法国人已经完蛋了，几个星期以后英国人也要完蛋了，到那时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也听到一些谣言。据说，有一个刚刚被捕入狱的人说，苏联军队已经向德国发动进攻，离柏林已经不远了，也许甚至快到布拉格了。我们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但只有几个小时，这一消息便被否定了。

国民法院

秋天，从布勒斯劳的"国民法院"来了一位法官。我所在的小组的全体同志都被带到他那里受审。我的三位大学生朋友和我本人受到了特殊的待遇：由于我们都不满十八岁，尚未成年，因此适用于青少年法。当时，希特勒正取得巨大的胜利，还是遵守青少年法的。第一个出庭的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伊日·斯塔雷克。他十分巧妙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

“不错，我们散发过传单，但是这些传单并不是要反对希特勒，也不是要反对帝国，而是为了阐明德国的盟友——苏联的和平作用。我们想，这并不犯法。”

看来，法官感到很惊讶：“真有那么愚蠢的人会这样想吗？”

“但是，法官先生，斯大林是希特勒的好朋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抓起来。”

“你们在法庭受审是因为参加了反德阴谋活动”，法官说道。

“这并不是什么反德阴谋活动！正好相反，我们还说这场战争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无关呢”，斯塔雷克答道。

他利用了当时党的路线中所存在的矛盾。那位法官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德国司法官员，他请翻译替他弄来一份我们学校的学生守则，守则中规定学生不得参加政治活动。斯塔雷克对法官说，我们太幼稚了，头脑里有点糊涂。我确实相信，法庭庭长最后认为盖世太保的特务将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弄来是十分愚蠢的，因此他决定中止审判，暂时将我们释放。当然，他同时也明确地告诉我们，释放我们完全是因为我们年幼无知，今后我们每星期要到警察局去一次，并且不得离开住地。

“将来在布勒斯劳对整个小组开庭审判的时候，也要传讯你们到庭的，也许作为证人，也许作为被告。”

1940 年底，我出狱了。我立刻就听说，我已经因为参加颠复活动而被学校开除了。我的老师对我说：“重新接受你入学是不可能的。盖世太保插了手。你就在家里准备毕业考试吧。”这就是说，我必须很快找工作做。我以工人的身份进行了登记，因为这样我便可以留在我父亲身边工作，当时他的雕塑工场里急需

增加助手。在这段时间内，我依靠老师的帮助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我每个星期都去警察局报到一次。我一直在想，他们什么时候再来逮捕我呢？为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逃跑，我征得父母的同意想好了一个花招，因为我不愿意盖世太保把他们也抓起来或者作为人质拘留。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骂他们是小市民，申明同他们脱离关系，并且告诉他们我离开家到国外去了……。

我把这封信放在一只抽屉里。如果盖世太保来搜查，一定会找到这封信的……。

潜　　逃

1942年6月21日早晨七点钟，我父亲激动地把我从床上叫醒。

“快，快听新闻。德国人已经越过俄国边界，德苏战争爆发了。”

我们必须立刻作出决定，因为这场战争予示着全面的恐怖统治就要开始了。我匆匆忙忙地带了几样东西，告别了双亲，直奔火车站，跳上了火车。我乘车逃往士达尔山区，那是我父母的故乡。

“等着我们的消息”，他们对我说。

我们还不知道事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两天以后，我得到了父母亲捎来的消息。“你走了以后两三个小时，盖世太保就带了逮捕令来抓你。以前逮捕过你的那个队长也来了。”

父母亲说，他们不知道我的下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他们找到了一封信，我在信中申明同他们脱离关系。

“一个不肖之子”，我父亲说。

盖世太保队长假装相信了这场把戏。

对我说来，这意味着必须完全转入地下。而对我父母亲说来，这是一种缓兵之计，只是暂时太平无事，因为谁都明白，盖世太保不会如此幼稚的……。

幸亏我父母亲在士达尔有很多朋友，我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的一位农民家的阁楼里安下了身。在德国向苏联宣战的同时，宣布实行戒严，而军事形势则使人感到十分忧虑。国防军似乎已经进入苏联领土。最初几天，什么消息也没有。“这就是说，纳粹吃了败仗”，人们都这样说。我们想起了斯大林的那句名言：“那些企图侵犯我国的人会遇到毁灭性的打击，使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把自己的猪鼻嘴伸到我们苏联的菜园子里来。”在我的同志中，许多人都深信，几个星期之后战争便会在德国领土上结束。突然，传来了德国大本营的可怕的公报：“我们的军队已经进入乌克兰，俘虏了苏联士兵数十万人，摧毁了成千的坦克和军用飞机。”

起初，我们并不相信。但是伦敦电台的调子和莫斯科发表的“有保留”的公报都表明，情况确实有点不太妙。当天夜里，我通过天花板的一个小洞听到收容我的农民同他妻子的一段谈话。

“这个男孩子会让我们大家都丧命的，”他妻子说，“图什么呢？我们自己也有孩子，德国人说，凡是窝藏人的，全家都得枪毙。”

但是丈夫坚定地回答说：“我们有责任帮助他。”

我不能长期留在他们家里。我请求那位农民把我带到最近的一个城市里去，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可以为我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于是我来到了一个四周都是森林的村庄，村庄的名字叫做萨莫津，意思是“偏僻的村庄”。这里真象是世界的尽头；这是一个海拔九百米的人迹罕至的小窝，有几间彼此相距很远的小房子，里面住着几个林场工人，气候相当寒冷，景色非常美丽，但又显

得十分凄凉。周围没有公路，虽然德军占领已经两年了，但是这里的居民还没有见过一个德国兵。

“我把你带到一个工人那里。他不知道你是谁，只知道你是朋友。你就躲在他那里，直到我们为你搞到伪造的证件，那时你再离开这个地方”，我的朋友对我说。

他对那位工人说：我病得很厉害，需要休养，不要让我离开这间房子，饭钱和住宿费以后都会付给他的。

房子的主人是新城的一位国民小学教员，他的藏书中有许多苏联作家和其他反法西斯作家的著作。我以读书作画来消磨日子，等人送来伪造的证件，有了证件我就可以自由行动，重新过正常的生活了。我父亲的朋友们不久以后给我弄到了一张保护国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是约瑟夫·帕雷瓦克。接着，我在阿罗木次附近的贝切恩村找到了一个工作，给一位农民当长工，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盖世太保正在找我，但他表示，如果有人来检查，他一定守口如瓶。我在他的田地里和家中干活。我看到村里的人们都在互相打听我的来历，因为我的外表完全不象一个长工，这是很令人怀疑的。虽然如此，但因为当时到乡下来弄粮食的城里人很多，村民们也就不注意我了。

但是，我的处境突然恶化了：有一些从伦敦来的捷克伞兵降落在我干活的地方附近，德国军队，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立刻进行一连串的挨家挨户的搜查，并且严格地检查每个人的证件。他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我的证件同德国人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那一套并不相符。有一天晚上，我干完活回到家里的时候，主人告诉我，捷克宪兵已经来过了，他们要检查我的证件，并且明天还要再来。

怎么办？由于实行了戒严，我再也无法到别处去了。我必须

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等人给我弄新的证件。这时，收容我的那位农民已经成了我的朋友，我对他说："我现在已经进退两难。不让他们找到我，这也符合您的利益。请您立刻乘火车到阿罗木次去找我的父亲，问他能不能为我找个地方躲几天，在教堂里或者修道院里。"

我知道，我父亲曾经为一些教堂干过雕塑活，认识几位爱国的、反法西斯的天主教神甫。

那位农民从我父亲那里捎回了口信，我连夜乘火车赶到阿罗木次。有一位神甫已经在等着我，趁着漆黑的夜色把我带到一座我不认识的建筑物里。他对我说，这是一所修女院，里面从来没有住过男人。

"有一个修女正好死了，所以有一间房间可以空出来几天。"

他们把我关进那间房间里。每天由一位修女给我送两次饭，但从来不说一句话。我从来不到外面去，甚至连窗户也不靠近。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只打算躲两、三天，结果一拖就是几个月，因为无法为我弄到新的证件。就这样，我呆在阿罗木次离盖世太保总部约五百米的地方无法离开。在这里就象在监狱里一样，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状态中，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来搜查修女院。渐渐地，我同那位神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把一些书带到我的房间里。他的表现完全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位神甫（我一直不知道他真正的教职）的心胸十分开阔，他甚至没有试图劝我信教。

"你的处境很困难"，他说，"我不愿意再借机用别的问题打扰你。再说，每个人应当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

有一天他告诉我，事情已经有了一点头绪了。他打算设法为我搞一份真的证件，证件上所用的名字是确有其人的，这样就不会再有用帕雷瓦克这个假名而被发现的危险了。我首先不带任何

证件到一个名叫博斯哥维策的山区小城去。然后再由一个捷克宪兵照料我，替我办证件，找工作。

神甫说："今天夜里我们给你理发、刮胡子，由我亲自来办。……你再洗个澡，但是早上六点钟以前必须回到房间里，因为那时修女们就要做弥撒了，绝对不能让她们看见你。"

我后来听说，在我离开修女院以后不久，这位神甫就被逮捕了。他们把他判处死刑，不是因为我的事情，而是因为他收听外国广播，可能还隐藏过别的爱国志士。1942年，他被处决了。

乡公所秘书帕洛乌列克

第二天，我在朦胧的曙色中离开了修女院，乘火车来到博斯哥维策，宪兵帕洛乌列克已经在那里等我。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他说，"我有一个兄弟得了瘫痪病，他住在南摩拉维亚的米洛斯拉维策，那里也已经被帝国占领了。他从来没有出过家门。对于我的兄弟的情况，警察一无所知，现在我已经从教堂和市政府弄到他受洗礼的证明和他的出生证明。你可以拿着这些证明到县政府去，说你把自已的身份证弄丢了。"

我照着他的话办了，他们真的又发给我一张新的身份证。从此，我就变成了博胡米尔·帕洛乌列克，1917年5月17日出生于苏其策，未婚，信天主教。就这样，我一下子长了六岁。

那位宪兵考虑得十分周到。"我为你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一个乡公所秘书的工作。乡长正想找一个人，我就对他说，我认识一个合适的人……。"

那时正是1942年的2月。我在舍贝托夫下了火车。地上积雪很厚。乡长的儿子已经驾着雪撬在等我，看到我的行李很少，

感到很惊讶。

有一个青年工人在火车里曾经好奇地打量过我。这时，他也跟着一起下了火车，问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一起带走。乡长的儿子长得仪表堂堂，是一个很风趣的小伙子。一路上，他向我介绍村里的情况，那里的年轻姑娘和老人们的情况……。他说，他的父亲年纪已经很老了，是作为天主教派的代表当选的，他很想不当乡长了，但是占领当局不允许。

“我的父亲感到完全精疲力竭了。地里有好多活要干，而乡公所里又什么事都得由他一个人操心。不过我的母亲很好，她会帮您在农民那里找到一个房间的。”

这个村子的名字叫柯雷奈茨，村民们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接待了我。他们以为我是占领军派来监视他们的。作为乡公所的秘书，我对这个有八百个居民的村子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必须了如指掌。无论是食品票证的分配，还是哪家生了孩子、哪家有人结婚，总之，从“监督”村民履行他们对德国的“义务”直至批准杀一头猪，都由我经手。不过，村民们后来看到我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帮助他们，于是便对我变得十分亲热了。此外，我还是村里唯一能使用打字机、能用德语讲话和书写的人。我帮他们写申请报告，例如要求早日批准他们在德国做苦工的儿子们回来休假的申请报告。我现在成了许多家庭的座上宾，渐渐地充当了忏悔神甫、法官、甚至传教士的角色。我把青年们召集在一起，并试图启发他们对时事、文化和教育的兴趣。

那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的青年工人已经成了我的朋友。我同他一起决定在村里排演话剧、举办音乐会和报告会。我们演出了古典戏剧，由我担任导演，我还经常自己当演员。

我们的“首次演出”十分成功。观众们的兴趣使我愈来愈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有生以来连一首诗都未曾听到过，现在却聚精会

神地在倾听，并且事后还兴高采烈地发表议论——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也开始明白，文化上的进步必须伴之以物质上的进步。我设法使村子里能够用上电。为此，我只好化钱托人情，因为那些官吏们都想弄点食品，对于黑市交易已经司空见惯。我终于成功地使公共电网通过这个村子——这对于一直使用煤油灯的村民说来，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有一天晚上，整个村子突然灯火通明。村民们感到，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就要开始了。

斗争在继续

我并非只是躲避战争的风暴，而且还要继续同法西斯和占领者进行斗争。

起初，我完全是孤立地组织政治活动，因为我同阿罗木次党组织的全部联系都已中断。我只好单独活动，等待当地的抵抗小组来同我建立新的联系。作为乡公所的秘书，我当然尽一切可能去“破坏战争经济”，例如，不按规定的数量向国家交售肉类和小麦。我尽量设法将全部粮食都留在村子里，以便分配给那些逃到这里过着地下生活的人们。

希特勒同苏联之间的战争消除了我们的疑虑：一切都已经清楚了。这甚至等于对斯大林所做的事情进行了事后的解释。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既然苏联利用条约赢得了时间、作了更好的准备，那么为什么还会有最初的失败？从苏联的这种失败看，似乎更象是并没有作什么准备。

自从1941年至1942年的冬天纳粹遭到最初的失败以后，东线的消息又给了我们希望和信心。在莫斯科城外，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当局开始匆忙地筹集雪撬和冬衣准备在俄国过冬。看

来，德国国防军也同样是准备不足的。

我每天都根据伦敦电台的广播在办公室的欧洲大地图上关注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在1943年冬天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到惨败以后，当局命令举丧三天。我们村子里的人都明白，希特勒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苏联将对希特勒的失败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三天国丧期间，人们饮酒谈论、互相庆贺。

现在，最重要的是在各条战线上打击纳粹，为抵抗运动积蓄尽可能多的力量。共产党又重新宣传团结的口号了。自从贝奈斯在1943年访问莫斯科并同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进行会谈以后，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又一切都正常了，决定成立有各种政治派别参加的民族委员会。从最高层到基层，曾经使我们的良心十分不安的各种问题都完全烟消云散了。

1942年夏天对我来说是令人伤心的日子。我得知盖世太保逮捕了我的父母并且将他们作为人质关进了监狱。这种做法并不是个别的现象。纳粹开始感觉到苏军和盟军的压力，于是就开始逮捕所有他们正在追捕并怀疑已经逃往国外的人的亲属。他们将我父母关押在南摩拉维亚的斯沃托博希策集中营里。家中只剩下我的一个妹妹。我的哥哥被关在监狱里，判了十四年徒刑。父母所呆的集中营，我是亲身经历过来的，我的有病的母亲和年老的父亲怎么能够经受得住呢?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到盖世太保那里去自首，好让他们把父母亲放出来？但是这样做可能会产生另外的悲剧，因为在严刑拷打下，我有说出曾经躲藏过的地点的危险,那样一来,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就都会遭到处决。经过充分的考虑之后,我觉得还是留在老地方比较好,但是为了谨慎起见,应当采取措施，因为我的父亲知道我所在的地方。我为自己准备了一支手枪。如果盖世太保来抓我，我就进行自卫并将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脑袋。幸亏盖世太保猜测我还在国外，我的父母

没有再受到审问。

自从1943年以后，柯雷奈茨地区的抵抗活动愈来愈公开化了。许多捷克游击队员隐藏在森林中，他们身边带着从捷克宪兵和德国人那里偷来的武器。附近田野上出现了从战俘营里逃跑出来的俄国战俘，农民们送给他们面包，有时还留他们过夜。在别的什么地方还有苏联和英国的伞兵降落。我们这个很难控制的山区正是开展武装抵抗运动的理想地点。我们抵抗运动的代表同他们建立了联系。村民们一开始对俄国的游击队员十分欢迎。

由于盖世太保无法控制这一地区，便派出弗拉索夫军队的士兵来对付游击队。这些士兵化装成游击队并携带俄国武器到农民家里去，然后对农民进行告发。最后，农民们对任何人都不敢相信了，连对真正的游击队员也拒绝提供帮助。

这以后的日子十分艰苦。例如我还记得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德国次官海德里希被刺后的那几个可怕的星期。他是被伦敦派来的捷克伞兵杀死的。为了进行报复，纳粹把整个利迪策村都消灭了。数千名捷克爱国者被逮捕和处决，甚至连妇女和儿童也未能幸免。农村和城市的墙上到处都张贴着被枪毙的人的名单。对我个人说来，危险性也更大了，因为纳粹开始在各个村庄搜捕可疑分子。

有一天，我从办公室的窗户里看到，有数百名士兵从森林里出来包围了整个村庄。想逃跑是不可能的，我就留在我的岗位上，指挥官走进乡公所，问谁会讲德语。他任何材料都不看一眼，便歇斯底里地嚷着要我同他和他的手下人一起挨家挨户地进行检查，并要我告诉他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游击队员，谁是俄国人。

“这里没有这种人”，我说，“都是些规规矩矩干活的人。”

党卫队将所有房子都翻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撤走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倒在椅子上松了一口气：我是他们在柯雷奈茨唯一真正可以揭露的人，而他们对我连一句话都没有盘问。

我以博胡米尔·帕洛乌列克的化名在这个村子里度过的最后几个战争年头是我终生难忘的。我同工人和农民在一起生活，真正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学会了怎样去理解他们，同时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从此以后，每逢我在政治工作中需要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我经常这样问自己，柯雷奈茨的人们会有什么看法。

虚假的神话

在我们这里出现了一种神话，它在纳粹和法西斯占领的其他国家中也流传甚广，其核心内容以后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禁区，即：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都同纳粹占领者进行了斗争，而抵抗力量的先锋队则主要是共产党人。当我今天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来思考这个问题，便感到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不错，捷克人民中间的多数人是反对德国占领的，即使这种反对只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因为当时的问题是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参加真正的斗争，而是更多地采取了一种忍耐和等待的态度。

毋庸讳言，积极参加抵抗斗争的只是少数人，而这些少数人既有共产党人，也有非共产党人。我本人当时经常惊讶地发现，有那么一些人战前是共产党员，这时却不敢掩护我；而另外有些人——不管他本人是否是共产党员——却为了帮助一个受迫害的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亲身经历每天都证明着这一点，因此我更加无法对自己作出解释，为什么在战后连我本人也总是

说，我们共产党人当时是最勇敢的，因而是唯一有资格担负领导的。

事实证明：甚至在对法西斯进行过英勇斗争——不管是作为士兵还是作为游击队员，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在前线——的人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后来变得听不得不同意见，变得称王称霸了。这些人有些还干下了犯罪的勾当，对清白无辜的人进行毒刑拷打，例如在1949年和1953年斯大林镇压时期便是如此。在进行非法逼供而自以为是在为党进行有益的工作的警察中间，许多人在战争年代曾经是作战很勇敢的伞兵或游击队员。这就是说，决不是一旦正确便终身都正确了。为了保卫自由，必须不断地去重新争取自由。绝不能在中途忘记了自己的理想，或者滥用自己的理想去压制他人的自由。

此外还有一种神话：希特勒完全是由苏联军队打败的，完全是苏联军队解放了我们。换句话说，其他盟军并没有对纳粹进行认真的作战，而是盼望苏联受到削弱，以便于他们自己统治世界。毫无疑问，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这是苏联的历史功绩。对此，我的同胞和我本人将永远感激苏联。但是这并不排除，苏联人所遭受的牺牲中有一部份是因为他们自己准备不足，这要归咎于斯大林的错误。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他把苏联情报机构的谍报人员——如东京的佐尔格，布鲁塞尔的特雷佩尔和“红色乐队”，日内瓦的拉多——以及丘吉尔的英国情报机构、甚至捷克地下组织所提供的情报统统当成了耳旁风。

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也都作出了牺牲，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呢？为什么要隐瞒，它们也曾进行了斗争并支持过我们的事业呢？还有，为什么要隐瞒，南斯拉夫可能是唯一不满足于我们这样的抵抗而组织了一支真正的游击部队的国家，而且

这支游击部队牵制了德国很大一部分力量，不只是具有象征的意义，而且具有战略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呢？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和格列奇科在解放三十年以后企图篡改历史，说什么南斯拉夫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完全是由苏联军队解放的，这绝非出于偶然。

尽管如此，我还是得承认，我当时所经历的一切都使我的政治信仰更加坚定。我把苏联看作是伟大的凯旋者，在德—苏条约时期所存有的疑虑消灭了，被埋葬了。解放标志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而我们也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捷克人民要求复兴民主共和国，使正义得到更好的伸张，并实行更加开放的民主。当时，共产党正处在一个由于地下活动而需要加强集中领导的时期，这对于在党内和整个政治领域中实行民主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在战后，我们对于某些蜕化现象的苗头不够敏感，其原因也在于此。

解　放

在进行抵抗斗争的岁月里，我们哪一个人不在梦中盼望着解放的那一天，盼望第一个苏联士兵在我们村子出现、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们终于重新获得自由的那个时刻呢？对于能够走到他的身边、接触他、拥抱他的人说来，这将意味着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和艰辛之后终于结束了种种苦难和牺牲。

但是一切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远不是那么富有诗意。

1945年5月5日，我们收听到布拉格电台的号召，其中谈到首都的起义。对此，我们毫不感到惊讶。那时，我们在村子里几乎已经感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我们天天同游击队员会面，他们现在已经公开进行活动了。德国国防军到处都在撤退，他们希望能够挡住俄国军队的前进，直至美国人和盟军到来。周围地区

的战斗从未真正停止过。在我们这里，以顽固出名的德国将军朔尔纳尔甚至在希特勒自杀以后仍然拒绝投降，他命令部下在他占领的捷克领土上继续顽抗。

直到1945年5月9日德国宣布投降的那一天，我们这里的局势仍然十分混乱。朔尔纳尔的军队在我们这个地区的许多村子里进行报复性屠杀。到了5月10日，我们才见到第一批苏军士兵。他们实际上是捷克人，特别是斯洛伐克人。他们对我们说，他们是属于战争期间在苏联建立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

我们张开双臂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但仍然对他们不关心政治的态度感到失望。他们唯一关心的似乎只是吃喝，而我们却急着要告诉他们，我们是如何勇敢地进行了斗争，甚至还抓到了德国俘虏。一位军官对我们说，我们应当把钟表藏起来，因为他们的后面是俄国人，一定会把我们的钟表拿走的。这些话使我感到十分意外。

我想，这完全是造谣和挑拨！难道苏联军队里会有这样的贼吗？

军官们接着对我们说："我们要第一批进入布拉格。"

"你们已经不是第一批了，苏联军队已经开进去了"，我淡淡地回答说。

他们对这一消息感到十分失望。

5月11日，第一批苏联军队终于来到了。他们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岁数都不小了，身上穿着式样很怪的军装，头上戴着从邻村抢来的草帽，骑着几匹瘦小的马或者挤在几辆大车上，半路上捡来的各种牲口在他们身后慢腾腾地走着。

后来，有人对我们解释说，这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军队的一部分（同攻占柏林和布拉格的朱可夫的军队大不相同），其中一些人从前是刑事犯，他们对老百姓不大好。不过对我们说来，

他们毕竟是红军，是我们应当报以友谊和感激之情的士兵。

那天晚上，我在村里的一家酒店里组织了盛大的庆祝会。在庆祝会上，有人第一次向村民介绍，我的真名叫贝利康，是共产党员，为了逃避盖世太保的追捕而躲到他们这里来的。大家向我欢呼，我被选进了刚刚成立的民族阵线。我们立即开始工作并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首先，我们要保卫村子，因为森林里仍然隐藏着一些德国兵；此外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苏联人，为他们弄食品等等。

那一天，大家都十分高兴，虽然它同我们五年来所梦想的完全不同。

不久以后，我回到了阿罗木次，那里的情景使我想起那几位斯洛伐克军官的警告。很遗憾，事实证明了他们的警告是对的：俄国兵甚至连穷人的东西也偷。一支执行解放任务的军队，人们视作新世界的代表的士兵，怎么可以有这种行为呢？

后来，我们试图为这种行为进行解释：这些人在前线作战多年，一路上经过本国化成焦土的村庄和城市，失去了妻子、母亲和姐妹，见到自己国家所遭到的破坏，而我们这里却一切还相当完好，在这种情况下要期望他们的行为象天使一样，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明媚的春色和异国的文化风光大概也使他们觉得来到了一个一切都富足有余的国家，所以多少有点顺手牵羊的事也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真是这样吧。但是我们却想把苏联士兵当成是模范行为的象征。每当听说他们偷了东西，在公园里袭击手无寸铁的人们抢劫手表和自行车，我们都感到十分震惊。五月底，共产党在阿罗木次的主要广场上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党委书记尤拉·索斯那尔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在会上为苏联军队进行了辩护，他说：“请你们回想一下我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回

来时的所作所为吧！他们的口袋里不也是塞满了他们从所到之处的老百姓那里偷来的各种东西吗？世界上所有当兵的都是这么做的，不应当把这类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返回故里

1945年5月20日前后我重新返回阿罗木次的时候，心中十分担心。自从我逃离阿罗木次，已经过去五个年头了。我还能再见到父母吗？还能再见到哥哥吗？他大概已经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了吧？还能再见到在这个苏军和德军争夺得十分激烈的城市里孤身一人居住了这么久的妹妹吗？我们家里的房子没有遭到毁坏。在我的朋友、那位青年工人弗拉基米尔的陪伴下，我踏进了家门，心脏跳动得十分剧烈。房间里空荡荡的，当时天色已经很晚，我担心地想，为什么家里没有人呢？突然，我看见父亲从画室里朝我走来。他激动地拥抱了我，两个人都热泪盈眶。他是从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苏联护卫队的一辆卡车把他从南摩拉维亚带到家里。

我得知，我的哥哥曾经换过好几个监狱，最后两年被监禁在奥地利。苏军到达前不久，犯人们举行了一次起义，党卫军枪杀和处决了许多犯人。我们其他的三个亲人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父亲和我担心地互相注视着。

我首先来到了党组织的所在地，希望能够在这里遇到一些熬过了监狱磨难的老同志。这里的一切也同我所想象的不一样。我在这里见到的都是陌生的脸，这是一些身穿游击队制服的人们和政治委员们，我以前从未见到过他们。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

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成立一个青年组织。这使我感到有点

委曲，甚至感到愤慨，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大熟悉青年们的问题，自己已经很成熟了。我同年龄比我大的人在一起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如果让我在工人或者农民中间从事政治工作，我的兴趣会大得多。

有一天，党委书记办公室的房门打开了，我的哥哥冲向我的怀里。他逃脱了监狱里的大屠杀，骑着自行车穿过了整个奥地利。半路上，他遇到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奥托·什林，是他用车把我哥哥带到了阿罗木次。奥托·什林——他后来在斯兰斯基案件中被判处了死刑——来到县委会解释政府和民族阵线的纲领。他说：墙上所刷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共青团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等标语应当清除，“我们所要实行的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

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老党员组成的代表团回答他说：“亲爱的同志，这些日子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已经结束。社会民主党不再存在了，我们大家都一起作为抵抗战士坐过牢，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共产党员。”

“不，必须重建社会民主党，而担负这个任务的首先正是你们！”奥托·什林回答说。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一致同意不要再分裂了！”

然而什林毫不让步，他说他要组织一个巩固的社会民主党，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同盟军。四年以后，该党并入共产党，而它过去的党员和领导人则被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而遭到了迫害。

第二个星期，我的妹妹终于从她在德国人撤退前躲藏的山区回到了家里。她告诉我们，她把家里的一些东西和家具藏在附近的朋友们那里了。我们请求党组织借给我们一辆卡车把这些东西运回来。就这样，我们回家以后第一次睡到了自己的床上。

我们全家都在外面工作。父亲在人民法院工作，他被选到法

院参加审判前盖世太保分子和内奸的工作。哥哥从事党的工作，而我则在青年组织里工作。所以我们家里整天都是空着的。

有一天，我因为忘了带一份文件，中间回了一次家。我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苏军的卡车，士兵们正在七手八脚地把我们前几天刚刚搬回来的东西和家具往车上装。

我走到带队的军官面前，那是一位年轻的苏军少校。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我问道。

“苏军在没收财产，这是战利品。”

我肺都气炸了。

“这是什么战利品？我们是捷克人，是共产党员，我的全家都被捕过！这是德国人给我们剩下的唯一的一点东西。你们现在还想从我们手里把它夺走吗？”

“这是德国的财产，是属于我们的”，他回答说。

当时，我的俄语虽然讲得不很好，但还能够把我的意思说清楚。那个军官十分傲慢，对我的话几乎丝毫不加理睬。我向他出示了党证。他略微平静了一些，但是他拿出一份应当没收的德国财产的清单来，而我们的住宅也在这张清单上。

我忽然想起来，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有一个盖世太保的队长曾经住在我们的房子里并且把里面的东西搬空了，一定是市政府把我家的地址给了这位军官。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他终于明白过来了，于是便命令部下把东西重新卸下来。我记得，为了使我高兴，他还送给我一辆已经生锈的自行车和一匹老马。这可怜的牲口在我们园子里养了五天五夜，后来突然不见了。可能是被人偷去杀吃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担心。两个月已经过去了，但是母亲仍然没有回来。我们到哪里去打听她的消息呢？父亲说，他们在被捕后不久还一起关在集中营里，但是后来他们把母亲转到波兰集中营里去了，从此便杳无音信了。因为当时每天都有人从集中营

和监狱里回来，因此我们还抱有一些希望。我们听说，在这些被流放的人中间，许多人被弄到乌克兰和德国北部关了起来，一些身体有病的人还得晚些时候才能回来。但是最初的消息令人十分不安，同我母亲一起在铁丝网后面关押过几个月的几位妇女说，她在集中营里病得很厉害。

父亲天天盼着母亲回来，一听到有点轻微的脚步声便会受到惊动。见到他那样子我心中十分不安。

“你知道吗”，他坦白地对我说，“在集中营里，当我只能隔着铁栅栏才能见到你母亲的时候，我又爱上了她。我明白，要是没有她，我就没法再生活下去了。”

当时，我想起了母亲，感到非常难过。她曾经多少次地盼望得到父亲的一句亲切的话语、一个温存的动作，但都失望了，因为父亲从来不让自己的感情自由地外露。她曾经多少次地盼望他对她满怀深情所准备的饭菜说句夸奖的话，而他却很少这样做。

有一天，无情的噩耗传来了：她已经死了。我们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她究竟是在集中营里爆发起义时被党卫军杀死的还是死于瘟疫。但是我父亲仍然等着她。又过了一年以后，当正式的死亡通知书送来的时候，我对他说：

“现在你可以重新结婚了。我为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女人，她曾经在战争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热爱艺术，同我母亲一样是个很朴实的女人。”

我父亲摇了摇头。他说，我们的母亲将永远是他唯一的妻子。他始终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一直到他去世。

我们内部的法西斯

在解放以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居民们对苏台德地区的德国

人的态度使我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总共大约有三百万人，其中多数人在1933年至1938年间拥护主张同德国合并的亨莱因派，因此大家认为他们对于我国所发生的悲剧也负有一份责任。我当时觉得，除了那些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以外，把他们都赶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说，这两部份居民在战后已经不可能一起生活了，否则只会使更多的人遭到处决和杀戮，还是让这些德国人回到德国去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迁移的方法不对头。不经事先宣布便把他们从四处找来，强迫他们把全部财产留下，而不给任何一点补偿。他们只得一切从头开始。有一些令人发指的场面使我感到愤慨：在捷克警察或游击队员把这些德国人押往专门的营地进行强迫劳动时，有人冲到大街上往他们脸上啐唾沫，把他们打倒在地——有时直打得鲜血淋漓。我本人也有很多理由去仇恨他们，但是怎么可以容忍在大街上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我发现，那些表现得最凶狂的人往往是一些在战争期间连手指头都未曾动弹一下的人，或者是一些同德国人勾结过的人，而现在，他们却摇身一变把自己装扮成爱国者了。

我非常气愤，在党的地方报纸《人民卫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内部的法西斯》。许多同志都认为我做得对，但另外一些人则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婆婆妈妈？德国人是有罪的，而这类事情对于革命是必要的。"

第二章　斯大林的阴影

党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目标

当时，我们是怎样设想新生活的呢？在战争期间，我们对于未来的设想是相当笼统的：政党再也不存在了，民主不再徒有虚名，社会上的正义得到更好的伸张，此外还有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后来，在流亡国外以后，我有时间对当时的形势进行分析，这时我惊讶地发现，在伦敦成立的、由原社会民主党人、捷克社会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人组成的贝奈斯政府在战争期间并未制定任何纲领，而只是颁布了一些为解决诸如惩办叛徒之类的迫切问题而制定的法令。该政府认为，它在流亡期间不应当提出行动纲领，因为只有人民才能当家作主、才能对未来作出抉择。

与此相反，当时在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却要机敏得多。首先，它起草了一个重建国家的纲领，所以当贝奈斯及其政府成员 1945 年到达莫斯科时，就提出这个纲领作为讨论的基础。由于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因此就将这个纲领作为战后我国政治生活的依据。这又一次证明，共产党在制定纲领方面总是准备得最充分，尽管它后来按自己的方式对这个纲领进行了解释……。

这一纲领得到了由四个政党组成的民族阵线的赞同，成了共同的基础，其中共产党拥有领导地位。至于我国应当以主要盟国和

独立和安全的保障者苏联为榜样，这在当时是没有疑问的。不错，纲领明确指出，我们还应当同反对希特勒的其他盟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共产党总是以当时人们记忆犹新的慕尼黑叛卖行为为理由把上述规定解释为只能实行一边倒和同苏联结盟，而对其他盟国则持极大的保留态度。尽管如此，这个纲领仍然有助于开辟一条具有捷克斯洛伐克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当我们发现从莫斯科回来的捷共干部总是避而不谈社会主义，反而提出了一个令人奇怪的“民主和民族革命”口号时，我们都感到迷惑不解。就是在那个时期，我打算在马克思主义方面进行深造，于是便进入布拉格大学的哲学系，后来又进入新成立的政治系学习。那时，在一起学习的大学生有好几代人。其中许多人是从监狱或前线回来的，他们身穿英国、美国或苏联的军装；有些人从前是游击队员，他们的穿着真是五花八门；此外还有一些学生是从德国的流放地和“总体动员”集中地回来的，这些人往往十分成熟，政治经验极为丰富。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争论，气氛十分活跃。其中有些共产党员表达了自己对党的路线的忧虑：“哥特瓦尔德同志怎么能说‘我们不打算建设社会主义’、‘人民还不够成熟’之类的话呢？人民要求社会主义，只有党的领导才害怕社会主义！”不但在大学生中间、而且在工人中间也有这种批评意见，他们认为党的纲领有点含糊不清。

布拉格县委会派我到农村去作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报告。有一天，我在一个干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哥特瓦尔德。他应邀对党的策略进行了说明。“你们的急切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不要去讲它”，他大声喊道。最后，他突然说道：“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群众现在还不成熟。我们必须首先打好基础……。”

哥特瓦尔德保证说，不是要照抄苏联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后形势又有了变化。“再说，我们的传统和需要也不同于苏联。有一天，我在莫斯科的一条大街上掉了一只鞋后跟，但我找不到修鞋的鞋匠，因为在苏联所有手工业者都消灭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消灭我国大批的小手工业者呢？让他们继续工作要好得多……。”

然而，事隔三年之后，哥特瓦尔德把鞋匠和其他工场和商店都消灭了。我曾经多次向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党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目标？它为什么不公开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虽然这要经历几个过渡阶段。再说，其他党派一直在提一些使我们为难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要象苏联那样搞农业集体化？党回答说：“不，这一切都是谣言，我们绝不成立集体农庄！我们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全部事情就是这样。”

“你们是不是要实行书报检查制度？”

“不，我们是反对一党制、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你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我们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要成为大学里的必修课？你们会不会反对宗教？”

“不，这些都是反动宣传的无耻谰言！”

后来，当我们采取从前曾说不打算采取的那些行动时，我问自己，哥特瓦尔德和党的领导当时所说的是他们真实的想法呢，还是为了欺骗人民、甚至欺骗党的干部？我个人认为，哥特瓦尔德当时是真诚的，但后来多种因素的结合使他原先的设想遭到了破灭：冷战的开始、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斯大林决定在东欧各国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另外，在破坏活动和对破坏者的镇压措施之间、反革命活动和用以镇压反革命的恐怖手段之间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互相交织的局面，这是几乎所有革命都不能幸免的

——而这一点大概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

1946年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在战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共产党在捷克地区所得的选票约为40%，在斯洛伐克为15%，在整个共和国内为38%。于是，它成了全国最重要的政党，掌握了全部政府要害部门。但是，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形势变得困难起来了，于是人们便开始寻找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人。商店里缺少商品吗？党就说："这是小资产阶级进行破坏活动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国有化。"工厂里原料不足吗？党就说："这是由于某些小企业主在搞破坏，因此我们必须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就这样，党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了。与此同时，参加民族阵线的各政党之间也发生了冲突。我并不认为这里所说的破坏活动完全是党凭空捏造的一种借口。破坏活动是确实存在的，特别在商业和私营经济中。但同时应当明白，私营经济之所以对贯彻政府的经济计划表现得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感到没有把握、是因为他们对党缺乏信任，还可能是因为缺乏必要的保证。当党宣布不对小商实行国有化的时候，东欧其他国家对小商的国有化已经开始。由于党从未公开表示不准备照抄苏联模式，所以人们想，它迟早也会照苏联的样子办的。这大概是每一个左派政府总有一天会遇到的普遍问题。左派政府努力使私营经济同国营经济并存，但是在左派内部——更不用说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了——始终有一股力量要求扩大国有化，指责政府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步子迈得不够快。因此，私营经济便开始犹豫和不安，担心自己同样也会被吃掉，从而出现了抽逃资金、不愿投资、囤积商品等现象。于是，政府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只好加强控制，特别是继续推行国有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恐惧、压力和紧张的气氛。

当我1961年第一次去古巴时，我发现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差

不多也有这种现象。

当时，古巴朋友——卡斯特罗本人以及副总理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对我们解释说："为了不重蹈你们犯错误的覆辙，我们不打算实行商业国有化。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尽管古巴领导人持有这样的态度，但是一年半以后我在那里亲眼看到、私营经济已经消灭！"这是必要的"，他们解释说，"因为食品的分配情况很糟糕。私营经济无视政府的指示，有东西不卖给大家，而是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搞黑市。"这样，要求全面实行国有化的压力就增加了，并开始出现某种恶性循环。

我认为，对于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宣言应当十分警惕；光有庄严的声明是不够的，哥特瓦尔德、卡斯特罗和其他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声明无疑是真诚的，但是无情的逻辑迫使他们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布拉格政变"

我现在试图加以分析的灾难的主要根源是：如果剥夺了反对派的存在权利，政权便失去了监督。捷克共产党不是努力同民族阵线中的其他伙伴进行更加忠实的合作，而是力图消除其他伙伴的影响。它的纲领是争取在1948年5月举行的下一届选举中获得50%以上的选票。它说：党只有获得了绝对多数，才能保证经济计划和其他改革的实现，才能战胜其他政党对《科希策纲领》的破坏①。这仅仅是一种宣传口号呢，还是它的真实意图？

① 《科希策纲领》是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第一届政府的纲领。该纲领是共产党人在莫斯科起草的，在征得其他政党同意后在该政府最初的所在地、斯洛伐克东部小城利希策公布。纲领规定对大工业和银行实行国家监督，但是坚持在民族阵线范围内实行政治多元化。在对外政策方面，纲领强调要同苏联结盟，但不妨碍同西方盟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今天，有些人在分析1948年2月所发生的事件时倾向于认为共产党在当时毫无获得50%以上选票的希望，相反有失去选票、得不到多数票的危险。因此，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宣传口号，目的在于制造混乱。

当时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战略。如果党不能在正常条件下得到50%以上的选票，它可以在选举中提出一个联合名单，名单中除了共产党的候选人以外还包括民族阵线中其他党派的几位候选人，这必然会使列为候选人的其他党派人士同各有关政党的领导人发生矛盾。换句话说，党还可以采取分化战术。这是一种合法的战术，它也许可以帮助共产党获得多数，而同时又不需要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消灭其他政党，这样也许可以防止后来导致全面接管政权的事件的发生。假如真能这样，那么其他政党便可以继续独立存在，组成反对派，继续保持它们的政治倾向。

实际上，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促成了1948年2月事件的爆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内务部任命了一批警官，而其他党派（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则要求罢免这些警官。由于内务部长拒绝接受这一要求，这些政党的部长们便辞去了他们在政府中的职务。

我认为，他们由于对共产党在议会问题上的态度存在着幻想而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他们设想（可能还同贝奈斯总统详细讨论过这一计划），社会民主党人也会同他们一起辞职（事实并非如此），这样便可使共产党人在政府和议会中居于少数地位而被迫辞职。这样一来，便有可能在下次选举以前——他们当然认为自己在选举中会获胜——成立临时政府。他们企图用这一步骤来改变政府和议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关系。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辞职，由于他们同共产党人一起构成了多数，因此便共同留在政府里了。除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以外，留在政府里的还

有几位“未挂号”的部长，如斯沃博达将军（他虽然是党的秘密党员，但当时一直以非党人士的面貌出现的）、教育部长兹德涅克·尼耶德利（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战后自称是“独立”派）和外交部长杨·马萨里克（他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统的儿子，确是一位独立人士，不属于任何党派）。总之，这些人都同哥特瓦尔德一起仍然留在政府里，哥特瓦尔德也就可以完全合法地对贝奈斯总统说：“我不辞职，我仍然留在政府里担任总理，并请您委任其他政党的人士充实政府中空缺的名额，但是不能任用那些自动退出政府的人。我们只能起用那些愿意实现科希策纲领的人。”

这是一种合法的、十分机敏的立场，对于那些退出政府的政党是一种惩罚和分化瓦解。简单地说，这实际上等于告诉这些政党：“我不要你们的代表，由我自己从你们的队伍里挑选我所中意的人担任部长，而且人数要大大减少。”贝奈斯表现出一种迟疑的态度，他不愿意接受这种解决方案，要求哥特瓦尔德在大选以前接受原来的各党派联合政府，而哥特瓦尔德则对此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布拉格和其他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此外，共产党还召集自己在各大工厂的代表举行会议，支持哥特瓦尔德政府；接着又召集了声势浩大的农民代表大会，取得了同样的结果。最后，党首次发动民兵——这是一种类似军队予备役的组织，其中包括武装工人——在布拉格举行示威游行，对反动派进行威胁。我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也举行示威，来与那些反对这一政治解决办法的学生相抗衡。那些退出政府的政党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他们的支持者（商人、手工业者、职员）对于上街游行这一套是不熟悉的，而工人和学生在这方面却已有丰富的经验。历史上共产党的组织性是一个经常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一次它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错，以贝奈斯总统为总司令的军队本来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因为从原则上说来，他可以命令军队对付这次示威游行。但是，这些日子是贝奈斯整个生涯中最可悲的时刻：他的世界以及他在战争期间所制定的计划又一次破产了。他的计划是建立在相信反希特勒同盟能够持久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的。他相信捷克斯洛伐克会成为一个进步的民主国家，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他以为可以同共产党人在议会制的政府中进行合作。此外，共产党人还充分利用了贝奈斯的弱点：他曾经接受了慕尼黑协定。哥特瓦尔德一直在对他进行威胁。

“总统先生”，他说，“如果您不接受我们的解决方案，我就告诉人民，您当年没有力量来抵挡希特勒的侵略，而今天却企图抵挡人民的意志！在 1938 年，您不命令军队向德国人开枪，难道今天您要下令对农民、工人和青年开枪吗？如果这样做，那就是背叛！”

这一点正是贝奈斯的致命弱点。不断有代表团来到布拉格宫，要求他签发命令解除那些提出辞职的部长的职务。最后，他在哥特瓦尔德提出的条件上签了字，但同时要求按原定时间、即在 1948 年 5 月举行选举。这就是说，贝奈斯认为他所接受的这种局面只是短时间的，因为他们答应他如期进行选举。

他不知道，共产党并不打算遵守议会的规则，而打算在 1948 年 5 月选举时提出一个一揽子的名单，从而保

并没有苏联的武装力量。毫无疑问，这一事件既受到了国际上的冷战气氛的影响，也受到了苏联施加压力的影响，但它同时又是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每个政党任何时候都力图争得多数、掌握尽可能多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纲领。

我必须承认，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这次斗争的结果感到十分高兴。我们想，现在可以前进得更快了，再也不会有破坏活动了，我们终于可以委派得力的人在政府中任职了，我们将向着更加公正的社会阔步前进……

我并不认为共产党想要接管领导是一种错误。我已经强调说明，夺取权力是每个政党的共同目标。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在获得多数以后是否允许其他政党有足够的活动余地，使它们能够参加政府或作为反对党而发挥它们的政治作用？共产党是否准备尊重民主选举和反对党制度，一旦自己在下次选举中居于少数地位便让出政权、而同其他政党分享权力或退居为光明正大的反对党？假如左翼联盟在今天的法国或意大利选举中获胜，同样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权力的逻辑

简而言之，假如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或者在一个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竞选失败，那末他们会不会接受这种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设想他们会以少数派的资格参加政府工作或者甘愿退居到反对党的地位？不管情况怎样，我认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其他政党同样地赞成科希策纲领，除了极少数几个派别以外，这些政党中没有一个愿意倒退到战前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去。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多党制和反对党问题在1948年未能

得到解决，因此二十年后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假如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要实现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政权就会发生蜕变，就会出现我们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中曾经见到过、并且现在仍然能见到的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化、警察国家、工人阶级非政治化和经济国有化等现象。

大家都知道，各个政党在“布拉格政变”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它们并没有遭到解散，但是共产党迫使它们单纯地起一种传送带的作用，成为一些几乎毫无影响的卫星组织，成为一些没有拥护者的假政党，而且它们的干部都受到共产党和秘密警察代理人的掌握和控制。这些政党能够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同意和赞成共产党的全部决定。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正是这样一种在其他东方国家（例如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同样存在的制度被某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誉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典范，甚至誉为政治多元化的典范。

所以，问题是卡夫卡的说法是否有道理，他曾经说过：每一次革命以后都会产生出一个以个人形式或以集团形式出现的“拿破仑”，使革命原来的宗旨遭到歪曲。我确实认为，革命都有一定的逻辑（这种逻辑当然是很可悲的）：为了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首先得到群众的支持；在群众的支持下，革命赢得了政权，同时不得不对那些拒绝自动交出权柄的少数派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一定的革命暴力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个前提，这种革命暴力在时间上应当有所限制，并且应当转化为比以往更广泛、更公正的民主。但是通常出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恰恰相反！在拥护革命的多数派中形成了一个人数很少的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在保护革命的口号下不但把保卫革命的矛头指向革命的敌人，而且还指向革命的同盟者中的那些被他们视为不够忠实，对他们持批评和保留态度的人。这个人数不多的集团之所以

强化镇压机器，使革命脱离群众，最终只剩下一个人数很少的领导集团来代表革命，而这个领导集团为了继续掌权就只好通过政治镇压和警察镇压的手段来传播恐惧心理——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此。这正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发生并且今天仍在一些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里发生的情况。

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布拉格政变"在国际上所带来的后果和消极影响。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对这种影响有所了解，例如我们给意大利共产党的竞选活动带来了重大的打击。这一政变是冷战的产物，但它本身又变成了促进世界分化的工具。

我本人的责任

我经常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1948年2月前后发生的事情，我本人要承担多大的责任。1968年，当我们本着民族和解的精神开展大辩论的时候，有人问我们打算怎样弥补我们曾经犯下的过失。直至今天，我仍然认为我们当时的夺权斗争在政治上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合法的。至于事情的结局弄得如此糟糕，这并不是事情本身的逻辑所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的结果。不错，许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这并不是党的领导的过错，有时甚至是违背党的领导的意愿的。任何一次结构改革都不仅会引起政治上的激情，而且还会引起个人的激情，而在个人的激情中，理智只起一种次要的作用，因此这种个人的激情几乎是无法控制的。

也就是说，当时有一种完全异乎寻常的气氛。虽然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我的心中渐渐地产生了一些怀疑，但我仍然真诚地拥护党的基本路线。从这种意义上说，我感到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假如一个人自愿作某一个政党的党员并且维护这个党

的政治路线，那么他也应当在总的责任中分担一份责任，尽管他的这种责任同总书记或中央委员的责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是因为毕竟还可以起来表示反对或者退党嘛！

现在，我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来说明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当时作为全国学联主席和大学生中的捷共组织——这是大学的权力中心——的书记，毕竟应对各个院系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当时，学生们成立了一种类似“苏维埃”的行动委员会，来决定教授的任免以及在学生中进行清洗等事项。我现在仍然认为，我们当时的目标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致力于大学的民主化，因为大学在这以前几乎总是落后于全国形势的发展，只有百分之六的工人子弟能够上大学。我们为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举办专门的训练班，使他们能够更快地参加高中毕业考试和进入大学。我们还公开主张大学应当更加密切地同现实生活相结合。我们强调指出，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法律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结构，教育事业必须同这种新的经济结构相适应，而它当时在经济和法律教学方面却仍然在沿用第一共和国、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教材。我们还宣布，要把法西斯分子、反动分子以及内奸从大学里清除出去。这里有一点情况需要说明：当1939年纳粹下令关闭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大学时，他们逮捕了数千名学生，对学生领袖进行枪杀，接着又动员一些学生在德国的大学里上学。虽然捷克流亡政府劝说学生们不要去德国的大学读书，还是有几千名学生在那里注册入学。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不同意这些人在我们的大学里继续他们的学业。我们说：“当其他人正在坐牢或者不能上大学读书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却叛变了。”尽管如此，由于在实践中搞了许多例外或者作了不少妥协，因此这些人几乎全部都被允许继续上学。

“这是不公正的”，我们说，“这些人必须开除，至少要通

过学术委员会的审查！”

毫无疑问，后面这个条件是非常成问题的，因为在那种时候要想把某个仅仅对国有化或某项其他改革表示不同意见的人说成是反动分子或内奸是最容易不过的了。而绝大多数的冤案正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最大的错误是用行政措施代替政治斗争，不但把政治上的对手从政治岗位上加以清除，而且还把他们开除出大学。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对所发生的冤屈事件并不知情，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吗？我认为不应当这样。这不能成为原谅自己的理由，尽管政治上的某些进步使这种错误得到了补偿（我们这里的情况正是如此）。

例如这次大变革的结果之一是使大学得到了发展：大学的社会成分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同以往的学生相比，他们更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所以，应当从事情的联系中去看待我们的行动。尽管如此，我对所犯错误感到内疚的心情还是变得愈来愈强烈。在“布拉格之春”的运动中，我们并不满足于作一点形式上的自我批评，我们曾试图建立一种能够避免这类错误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记得，早在1948年时我们就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如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奇科州立大学任教的伊凡·斯维塔克当时是社会民主党的学生领袖，他曾经找我谈过这个问题。他是我的朋友，我们共同进行斗争，尽管我们两人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不能接受的”，他说，“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我现在赞成右派的批评意见，虽然我曾经同这些反动的家伙进行过斗争。如果我们继续干这种不得人心的事，就会引起一场复仇运动，最终将会反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我对他说明了我的担心，但同时也表示，我认为应当用历史

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我们会有时间纠正错误的。我说，目前应当鼓励基层的积极性，哪怕这种积极性有点过火。不是有一句俗话叫“白玉有瑕”吗？这种“瑕”甚至可以使人感到很痛心，但是难道这是主流吗？我们讨论了整整一夜，最后我还是说服了他继续同我合作。

今天，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就不再这么简单了。我认为，即使在革命时期也无论如何应当避免冤屈好人，我们这样的非暴力革命中尤其应当如此。我们并未遇到武力反抗，所以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可以为这种破坏性的宣传运动辩解。

我的这种经历使我认识到：一些小的冤屈事件在革命初期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它们可以发展成为重大的冤屈事件并常常进一步发展成为犯罪行为，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一过程的时候往往已经为时太晚了。从1948年以后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认为，假如我们当时坚持走一条特殊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是可以排除这种危险的。但是党却说，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路线是不能改变的。

同铁托的冲突

1948年6月以后，共产国际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南斯拉夫被指责为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坚持说，他们是自己解放自己的，而斯大林和苏联的宣传机器却声称，南斯拉夫的解放完全应当归功于苏联。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渐渐地清楚起来了：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对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各种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对任何形式的民族独立的批判，目的是要推行苏联的模式，使苏联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效法的样板。

这对于我们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打击。我们同南斯拉夫之间很久以来就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早在1938年我国为抵抗希特勒侵略而实行战争动员时，就有成千的南斯拉夫人自愿报名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以后，我们对他们反对纳粹国防军的武装斗争也十分敬佩。难道最先拿起武器的不正是他们吗？我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榜样，同时还感到，他们的声望甚至给苏联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现在他们突然被扣上了徒叛的帽子，被斥为法西斯分子、盖世太保的代理人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中央委员会派来的同志对我们说明了形势，但对于他们的说明，我们无法理解。我认为，当时使我们消除疑虑的唯一论据就是："这是斯大林、苏联、世界革命中心决定的。如果斯大林对某件事情作出了决定，那就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尽管我们对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决定还不十分理解。"

听信这样一种"论据"，这已经是一种很老的传统了。过去，这种传统曾经支配了许多左派的行动；今天，它也仍然在继续起作用。1968年苏联入侵以后，我曾在西方遇到许多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他们对我说："这件事情确实是很可悲的。苏联军队把坦克开进布拉格，这在眼前当然是很糟糕的事，但莫斯科这样做一定有其充分的理由。我们相信苏联的决定是对的，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理解。"

我当时想："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已经习以为常的框框的束缚！"但同时我也发现，这是非常困难的。我本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不也是戴着这种宗教式的有色眼镜吗？"我们必须相信苏联，它是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唯一保证。"在一个分裂的、摩尼教①式的世界里，人们是很容易接受这种教条的。因为假如把世

①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一种宗教，也叫明教、末尼教和明尊教。该教宣传善恶二元论：以光明与黑暗为善与恶的本原，光明王国与黑暗王国对立，善人死后可获幸福，而恶人则须堕地狱。——译者

界划分为两个阵营并把苏联置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首位，那么苏联即使犯了错误也仍旧必然是永远正确的，因为归根结蒂它的力量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还记得，即使在1948年，南斯拉夫人也并未动摇他们自己对斯大林的信仰。"这是一个误会，斯大林一定是听了莫洛托夫的假汇报"，他们说，"一旦斯大林知道了事实真相，他一定会亲自结束这种诽谤活动的。"

在"敌人"那里的一次逗留

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使我感到特别痛心。因为我对这个国家十分敬佩。我曾经计划同一位年轻姑娘一起到亚得里亚海边度过我的第一个假期。虽然我们并没有结婚，但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一个共同的房间。

就在我动身之前不久，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决定。因为我当时已经选为国会议员，所以就担心地想，是不是只好打消去南斯拉夫旅行的计划呢？我该怎样对党讲才能使党不致于拒绝批准我的这次旅行呢？如果放弃这次旅行，我一定会很难过，这倒不是因为我感情脆弱，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想实地看看，在这个突然变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的国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先到国民议会的办公厅，以后又到党中央国际部去了一趟。他们对我说，放弃这次旅行无疑更好些，但如果我确实非常想去，原则上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次旅行很紧张。一进入南斯拉夫境内，就有一些南斯拉夫青年登上捷克斯洛伐克旅客的包厢，并且同我们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共产国际在造谣！"他们说。

而我们则相信，事情正好相反，同意开展批判的是斯大林。

每次讨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他们指责我们对苏联军队忘恩负义，但我们并没有忘恩负义！实际情况是：我们自己进行了战斗，解放了我们自己。公开说出这一点有什么不好呢，况且还是莫斯科自己鼓励我们起来斗争的呢！他们对我们说：'你们的集体化搞得太快了。'但是，为了改变富农仍然控制农业的状况，苏联不也成立了集体农庄这种合作组织吗？他们指责我们突出自己的革命、搞宗派主义，而我们却是为了发展列宁的思想，建立一个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社会！"

另外一些人对于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好象是个地下组织而感到气愤。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南斯拉夫共产党表现得非常谦虚。贝尔格莱德没有一座宫殿的门口挂着"中央委员会"的牌子。共产党员毫不引人注目地参加了各种群众组织。

"这是必要的"，他们解释道。"共产党员不应当享有特权。"

他们表示担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加入党组织是为了谋取权力。"我们则相反，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政策强加给南斯拉夫的公民，而是要通过正确的政策去赢得他们的信任。因此，我们在政府、群众组织和合作社内，在青年和学生中默默地进行工作。……"

我们很难用道理去说服他们，因为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也曾对1948年2月以后哥特瓦尔德要求所有人都加入共产党的号召有过保留意见。

"现在，由于党处在掌权的地位"，我们想，"形形色色的野心家和机会主义分子都会钻进党内，以便谋取某个职位，搞到一套住宅或者继续留在大学里。"

我们对这一指示所持的反对态度使我们同南斯拉夫同志的立场更接近了，因为他们认为组成革命大家庭的共产党人是不允许为自己谋取特权的。我们看到南斯拉夫人民紧密地团结在铁托的

周围，这时，我们感到对他们的指责太过分了。即使这些指责是有道理的，那也无论如何不是我们所能判明的。在我们看来，显然没有理由去相信人们灌输给我们的那种所谓“铁托集团”如何遭到南斯拉夫人民的反对以及如何有害的说法。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自己的领袖怀有如此衷心的爱戴——也许最多只有苏联对斯大林怀有这样的爱戴。再说，南斯拉夫人自己也感到很忧虑，因为他们也把斯大林同志看作一位伟大的领袖，他们向我们保证说：一旦冲突解决，他们将兴高采烈地欢迎斯大林。

正当我在南斯拉夫逗留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大会是在献给斯大林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开始的。乍一看来这似乎有点荒唐，使人感到迷惑不解。每当铁托的讲话中提到斯大林，会场上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同许多在那里的捷克人曾经谈论了几天几夜——这是我同党之间发生的第二次“良心危机”。不过，这次有党的权威斯大林在，并且我又一次想起了哥哥对我说过的话：“党是集体智慧的化身，它比任何一个个人都要懂得更多。不要忘记，知识分子总是喜欢标新立异。但是要想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就必须从内心彻底根除这种想显示自己的欲望。所以，你不要老是去想比别人更多的问题，要服从党的决定。”

我刚从南斯拉夫回来，大学生委员会的几位朋友就向我通风报信：“他们正在找你呢！干部委员会主任柯帕希瓦同志①听说你到南斯拉夫去了，简直是火冒三丈！”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找他。在这段时间内，形势变得更加紧张了，到南斯拉夫去的旅行无一例外地都被取消了。干部委员会主任的脸部表情十分严肃：“你怎么能在这样的形势下去南

① 他后来成了内务部长和很有权势的人物。

斯拉夫呢？”

我对他说，我是事先得到批准的。

“你真是没有政治头脑。你难道想象不出来，如果南斯拉夫人知道有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国会议员和学联主席在他们那里，一定会利用这个情况进行大肆宣传吗？”

“如果南斯拉夫人知道”，我回答说：“他们一定不会利用这一点来作文章的，因为他们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你这种举动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还要派人进行调查”，他严厉地说。

后来，我总算只受了一次警告就过了关，因为我当时还只有二十五岁，是国会议员中年纪最轻的，这一点又一次帮了我的忙。我已经多次受到“年轻”的好处了：首先是在学校里，我五岁就上学了，而别的孩子上学时已经是六岁了；后来又在监狱里，我是同牢房里最年轻的一个……

一次为莫斯科准备的汇报

1948 年 11 月的一个下雨天，国际学联书记打来电话把我从食堂叫到电话机旁。

“你已被邀请去莫斯科参加 11 月 1 日至 7 日举行的苏联共青团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苏联代表马姆里金同志坚持要你后天就动身。”

“但是我还没有护照，还要得到党组织的批准！”

“你去找一下格米德尔同志①，他会安排给你办理护照的”。

① 格米德尔是国际部主任，从前曾同季米特洛夫一起工作过。1946年以前一直生活在莫斯科，后来在布拉格工作，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1952年，他同斯兰斯基一道被处决。

我当时仍旧在大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担任书记的职务。我立即跑到那里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同志们。

“后天我要去莫斯科，这是一件很光荣，同时又是很严肃的事情。苏联人想必是要听听我们的工作情况，也许他们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想帮我们出点主意。所以我们要为这次旅行很好地准备一下。”

大家都帮我进行准备：我们写了一份有关教育民主化的报告，一份有关在大学里进行改革的报告，还写了一份包括思想工作、教援情况等项内容的报告。总之，准备了一大堆材料。

格米德尔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傍晚六点钟就把护照交给了我。七点钟，我急忙赶到苏联大使馆领取入境签证。但是领事正在国家剧院观看招待演出，因此无法签字。他们要我夜间十一点钟再去一次。

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十分新鲜，甚至感到很神秘。领事在看完演出以后居然还要回到办公室去，在深夜十一点钟为一个捷克大学生办理签证，这使我十分感动：苏联同志原来是这样进行工作的……。领事真的接见了我，他在我的护照的签证上签了字，还祝我旅途愉快。

当时，想去苏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只有官方的代表团才能得到许可。这就使得这次旅行变得更加令人激动，要知道，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梦寐以求的。不，我确实没有想到竟会有这样的好机会。

第二天，我把同志们整理的材料看了一遍。青年团主席海兹拉尔同志把我叫到他那里（1968年他成了广播电台台长，现在也在国外流亡）。当时，他是一位重要人物，是党的主席团成员。我想，他大概是要对我的这次旅行表示祝贺。

情况完全相反，他很不满意。“我们推荐了一位女同志——

南波希米亚的一位区委书记作为青年代表去莫斯科，而现在却由你顶替了她的名额，这是怎么搞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回答道。我对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他们要我们派一个三人代表团，于是我们就确定了代表团的人选。直到今天，苏联共青团驻布拉格国际学联代表马姆里金同志才通知我们，根据莫斯科的要求，你将以学生领袖的身份去莫斯科，顶替了那位姑娘的名额。”

接着，他又补充说：“这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你本应及时告诉我们。那位年轻的女同志是多么地失望，大概不需要我向你解释了吧。她已经带着行李来到布拉格了，并且为她的地方组织感到自豪。请你把事情的经过向她说明一下。”

我只好对这位可怜的、眼泪汪汪的女书记进行解释，我本人很愿意让她去莫斯科，但是苏联同志催得很紧，大概是有什么紧急的要事需要商量。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达科特型飞机，由于雾很大，飞机迟到了。途中的飞行很不平稳，后来我们降落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机场。乘坐同一架飞机的青年组织代表中有现在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当时的法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领导人莱奥·菲盖尔，现在的意大利共产党第一书记、当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设在布达佩斯）总书记恩立柯·贝林格。

我们得到通知说，因为天气不好，只好在利沃夫过夜。我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国土。我所向往的是莫斯科，而不是利沃夫。这是一座完全不同的城市，战前属于波兰。这里的某些房屋还是上个世纪末的建筑式样，同从前奥—匈帝国的一些大城市如维也纳、布拉格和萨格勒布的房屋建筑很相像。但是人们的穿着却同我们那里完全不一样：他们的服装很可笑，式样都是老式的，裤子很肥大。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很穷。这是遭到战争洗劫的苏联

的一部份，居民们的生活还十分艰苦。

我第一次懂得了，接待外国人对于苏联人意味着什么：不能让外国人看到他们的困难。一方面，斯拉夫人有一种尽自己所有招待客人的老传统；另一方面，政府还要考虑"宣传上的"需要，它要给外国代表留下最好的印象。

主人把我们安排在一家接待游客的旅馆里，由于我见识不广，觉得这家旅馆十分豪华，菜单上有鳇鱼子、斑鳟鱼等，都是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从未见过的东西，因为当时我们国内还吃得很差。当我看到法国代表或意大利代表把某一道菜退回去、要求另换一道菜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简直不可想象"，我心里想，"苏联人自己的生活十分困难，已经把他们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但别人却把它退了回去，另外点了鱼和天晓得是什么菜，而且居然马上就得到了。"我问自己，这算什么革命者呢，我觉得这些人更象是大资产者或贵族。

坐了三天的飞机和火车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莫斯科。我们参观了工厂和学校，学习苏联共青团的经验。我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收集起来，准备转达给布拉格的同志们。第一天，我就要求看一看红场。午夜时分，我来到了红场。广场上覆盖着积雪，克里姆林宫和列宁墓的上空飘扬着红旗。我想，原来这里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是一个很庄严的时刻。11月7日，红场上举行了阅兵式，我从观礼台上远远地望见了斯大林。我如今已经很难再来追述当时的激动心情。从前我只在照片和宣传画上见过斯大林的形象，而现在我见到了有血有肉的斯大林本人。他向接受检阅的队伍招手致意。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游击队员，想到苏联的、我国的以及世界各地的普通老百姓，他们高呼他的名字去迎接死亡；今天，他们再也不可能见到他了，而我则特别有幸见到了他，虽然只是从远处。就在那一瞬间，我闪过了

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假如他不再生活在我们中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瞪大眼睛注意地观察莫斯科的居民，观察那些曾经在各条战线上英勇作战，克服了饥馑、作出了牺牲并且生活得如此艰苦的人们。我觉得，在他们的目光中，似乎还含有几分对过去的悲伤。在他们面前，我有一种几乎是信徒对宗教的感情。我为自己穿得比他们好而感到惭愧，觉得似乎欠着他们一笔债需要偿还。我以后曾经到过苏联多次，而这种感情始终没有离开过我。

我特别盼望能够邀请我去共青团中央，以便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并汇报一下我的工作——这也是我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但是我想，苏联同志大概不便把我和其他代表分开对待，所以我也就完全服从一般的日程安排，但总是担心会错过一次"历史性会见"的机会。后来真的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我们接到通知说，在11月8日或者9日离开苏联。

于是，我就要求同共青团的代表谈一次话。"我是从布拉格来的，有许多事情要同邀请我来的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谈一谈。我能不能同他们见一次面？"

第二天我接到通知，要我下午四点钟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真理的时刻"来到了！虽然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但我能不能把我们的情况讲清楚呢？我带了一点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一面小旗和一张布拉格的画。那位苏联同志把我带到共青团中央的大楼。

团中央书记问我观感如何，我对他说，我感到十分高兴，在大学里参观和同有关负责人的谈话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你们比我们搞得好多了，我们要学习你们的榜样"，我说。

那位同志并不十分注意地听着我讲。他的年纪要比我大得多，大约四十岁左右，看上去不大象一个共青团的领导人，而更

象一个小学教员。在他的桌子上只有几张纸和一枝铅笔。在我们那里，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放得乱七八糟的文件，这张空荡荡的无懈可击的桌子对我说来就好象是条理性的典范。使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他并没有作记录。我试图向他介绍我们的情况，打算把在布拉格时整理的几份材料交给他，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

“看得出来，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他说。“这类变化是需要好多时间的。我们这里也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东西太多，妨碍我们的工作。”

他祝我旅途愉快，我们的谈话总共只有二十分钟。我开始怀疑起来：邀请我来到底是要讨论我们的工作，还是要我在苏联参观和参加观礼？我怎么向布拉格的同志们介绍这次“接关系”的情况呢？他们为自己如此受到重视而感到自豪，把苏联共青团当成自己的榜样，正以十分急切的心情等待莫斯科对于我们的路线提出表扬或批评呢！

一回到布拉格，同志们立即向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快说说，情况怎么样？”……我只好对他们说，苏联同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话。

“关于改革的问题，助学金、教授、大学生的社会成份、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以及工人培训班等问题，你是不是都谈了？”

“凡是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是很困难，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会议很多……”。

等到我带回来的两瓶伏特加酒喝完以后，我对他们讲了我在莫斯科所得到的印象：庄严的斯大林、红场、工厂里的工人和学校等等。我着重讲了正面的情况。对于某些使我感到失望和迷惑不解的具体事例我没有细讲：例如在工厂里接待我们的总是厂长或者厂长的代表，他们用单调的语气向我们介绍工厂的年产量、周产量和日产量，工厂的机器型号以及他们采用了什么特殊的技

术等等。对于工人的社会福利、工资情况以及真正存在的问题都只字不提。我曾经自我安慰地说，可能是因为我的俄语水平还不够，因此有些细节没有听明白，也许他们是故意不谈的，因为我们代表团的成员并非全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过了不久，又要我在一次大学生的集会上作访问苏联的报告。报告结束时，一位捷克民族英雄的妻子和捷共主席团委员玛丽·斯维尔莫娃对我说，她很少听到过有关苏联的如此激动人心、令人信服和非形式主义的报告，还说我的讲话充满了感情。通过这件事情，我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第一次到苏联去的人与其说是想发现和理解那里的现实，还不如说是想证实自己头脑里早已存在的那个框框，进一步加强原来就有的信仰或怀疑。此外，对于一个外国代表说来，要想了解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实际生活也并不是一种容易的事情，而在当时则更为困难。

一般说来，人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看到那里的情况的呢？不是从汽车里便是从火车的车厢里，或者是在正式集会上和在参观工厂的时候，进行交谈的人都是事先经过挑选的，他们已经习惯于同外国人打交道。如果再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有色眼镜，那就很可能无法看到真相。何况反过来说也有同样的错觉。我这里所指的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人从西方回到国内时有时也十分激动：琳琅满目的商品橱窗、夜总会、装束时髦的妇女、高速公路等等。他们说，他们所看到的简直是一个天堂。但是，虽然他们得出这种结论的时候心里真是这样想的，这种结论却是错误的，他们对于那里的昂贵的房租、食品价格以及真正的问题又有多少了解呢？

我还想起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年，大约二十名捷克学生第一次享受苏联的助学金待遇。当我在莫斯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向我抱怨伙食太差，教员讲课尽是些八股调、缺乏真实内容、特

别是马列主义课。一个从基辅来的学生突然对我说："这里对犹太学生的名额是进行限制的。"

我从他那里得知，每个院系、特别是法律系、医学院和哲学系对犹太学生的名额都有一定的限制。由于我当时认为这位学生可能有些偏见，因此我对他说，他没有看到事物的相互联系。我这样说的时候，自以为看问题比较全面，后来证明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大会以后，苏联人对外国人比较开放了，我对这个国家的现实情况也了解得更多了，便开始用一种更带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那里的现实了。但是，尽管我后来不再简单地把苏联看成是我们在战争年代经常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中心，我仍然对那里的人们，对他们的慷慨、好客和热情怀着极大的好感，因为如果把人民同官僚或党的领导的蜕化变质和错误混为一谈，那是荒谬的。1968年8月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宣传指责我"反苏"，这使我感到十分愤慨。我至今仍有许多忠实的朋友在那里，虽然我很难过，为了避免给他们带来麻烦，我不再同他们通信了，但是他们都知道我同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

怀疑的时代

1948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国内一片欢腾。"反动分子"被撤职了，破坏活动得到了制止，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都在向前发展。每个人都在想，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了。为了重建工厂、清理废墟和建造新房子，党组织了各种义务劳动队。学生义务劳动队来到煤矿里帮助矿工们解决对大学供煤

的问题。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重建家园出力。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也就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就在那个时候，我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和青年团的主席团委员。青年团的目标是要把所有青年联合在一个唯一的组织里。1948年5月，我成了国民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此外，我还给艺术史系的学生讲授马列主义课，当时学生中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这样做的，因为缺少教授的问题总得有个解决办法。我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马克思、列宁、普列汉诺夫、罗莎·卢森堡和高尔基的著作，阅读书店里摆得满满的各种苏联现代文学作品。我们想把一切都补回来，想了解各种知识。

但是，后来气氛又渐渐地变了。出现了“铁托病”，这是共产国际批判南斯拉夫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对于苏联，哪怕持有一点点的保留态度，对于逐字逐句地遵照苏联的指示行事，哪怕只有一点点最轻微的疑虑，就会被扣上“铁托主义”的帽子，就足以在党内和党外遭到猛烈的围攻。

首先，对全部人事档案进行了普遍的审查。我第一次不得不重新填写履历表，特别委员会仔细地审查了我的履历。我第一次听到中央干部委员会的一位同志对我说：“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你的履历表。从你的年龄说来，你所经历的生活是十分动荡的。不过，对于盖世太保没有抓到你，你怎么解释呢？”

“我不知道！他们大概以为我在国外吧。”

“但是盖世太保也在保护地寻找过你，并向所有警察局发出了通缉令！”

“他们对所有要追捕的人都发了通缉令。有时候我真觉得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的。”

“好吧。不过我们共产党人是不相信奇迹的，你还需要再补写几页详细情况。”

他用红铅笔在我写的材料中标出了几个段落，并补充说：

“这几个地方再写得详细些，并且要提出证明人。”

显然，这是在进行普遍的审查，我对自己说，这位同志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他并不了解我。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有点沮丧：如此说来，我还得为自己能够活下来而说明理由，非得人家枪毙了我，才可以不受怀疑罗！”

还有一个插曲使我更加感到不安。事情的主角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伊日·斯塔雷克，他和我是在同一天被捕的。1941年，他又一次遭到逮捕，受到严刑拷打，在战争结束前一直关押在集中营里。战后，他是外交部的一名党员干部。有一天，他的母亲来找我。

“我想问问你，到底出了什么事！秘密警察把我叫到战争期间曾经作过盖世太保总部的那座房子里，问我说：‘您的丈夫是犹太人吧？’我回答说：‘不错，这是谁都知道的，正因为如此他被捕了，死在奥斯维茨集中营里’。

‘我们只是想核实一下，他是否确实是犹太人’，那位警察说，‘因为您的儿子在交给外交部的履历表里没有提到这一重要事实。’

‘为什么说是重要事实？是因为纳粹杀死了他吗？’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您的儿子没有谈这个情况，而他是肯定知道这一情况的。’

‘难道强迫人们说明自己属于哪个种族的纽伦堡法还仍然有效吗？再说，我本人纯粹是雅利安人！’”

她对我说，她非常气愤：“你们居然有脸偏偏在这个办公室里问我这个问题，当年盖世太保就是在这里向我提过同样问题的！；

接着她就乘第一班火车到布拉格来找我，要我帮她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她简直要以为共产党人所使用的方法同当年的法西斯毫无二致。

我安慰她说，当前，因为出了南斯拉夫事件，正在对大家的履历进行详细的审查。第二天，我去找了瓦茨拉夫·戴维特同志，他是中央委员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后来当了外交部长）。

“我了解这位同志，他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我说。“我认为，对她母亲进行审问是直接违反党的指示的。”

他的反应使我大吃一惊。“你不要夸张。这种人很容易被人利用。国外的亲戚会影响他们，对他们施加压力，因为这些犹太家庭中的一部分成员还生活在国外。我们的责任是保护他们不受这类讹诈。”

我们收到了最早的一批检举材料。在学生党组织的办公室里，从各个系送来的信件和报告愈来愈多。

“甲同志是个铁托主义分子，乙同志在电车里批评过共产国际开除南斯拉夫的决议。应当把这些同志开除出党或者给以严重警告。”

渐渐地，出现了一种不信任的气氛。从前，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谈谈自己的看法甚至发表批评意见，可以聚在一起对一些问题共同进行讨论。而现在，大家都变得十分谨慎，甚至在自己的朋友面前也开始犹豫不定，不敢讲心里话了，因为这些朋友会不会有朝一日出于革命热情而揭发自己是铁托主义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呢？

于是，我们在抵抗运动时期和在狱中的最大的长处——在危难和风险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团结精神——渐渐地消失了。有多少同志曾经秘密地帮助过别人！有多少遭到非刑拷打的人曾经

得到其他难友的照顾！而现在，这种人道主义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基本品质——渐渐地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原因何在的不愉快感，不安全感和恐惧感。难道只是因为我们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才有这种感觉的吗？……

也许这是由于党的目标——在我们看来，这些目标是正确的——同实现这些目标时所采用的方法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党的行动仍然同它以前的保证恰恰相反：它把所有的商店，小商以及小手工业者的工场收归国有；它对小农的土地实行集体化，而它以前曾经说过，把刚刚分给小农的土地重新夺走是荒谬的。取缔政治上的反对派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将某些人革职；所有非共产党人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之外，成千的人被贬为二等公民。我们这些充当"喉舌"的人和"鼓动家"的任务是在公众集会上阐明党的政策，我们愈来愈感到不安，感到大家在听讲时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对于这样一个党的活动机体，有时从外部是看不清楚的。在党的机关里工作、很少离开办公室的人同那些负责向基层说明政策，从而很自然地对基层的不满情绪有所感觉的干部之间，存在着一条很大的鸿沟。整个气氛变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人们甚至连提问都不敢了。我心中感到愈来愈没有把握，同时也渐渐地失去了发表公开讲话的兴趣和勇气。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假如党和党的政策同它原来的目标背道而驰，大都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因为没有群众的自发的支持，掌握政权便会愈来愈困难。这时便开始用简单的行政手段、用强制和迫害的办法去处理某些事情。那些胆敢继续提问的人，不仅被看作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还被看作是应当加以消灭的敌人。于是，便开始进行镇压：起初是对付非共产党人，以后又用来对

付共产党人自己、甚至对付党的领导人，包括那些自己也曾采用过这类方法的人。

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的，怎样才能不再采取这种在多数情况下必然导致犯罪的方法？当然，政治压迫的危险并不局限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方国家，任何企图实行专权的运动都存在着这种危险。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危险，有必要回顾一些事实。

政 治 审 判 案

1948 年 6 月，我们听说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卢·帕特拉什卡努被开除了党籍。他被指责为“离经叛道”，后来被处以死刑。与此同时，当时担任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的哥穆尔卡初次受到批判：1948 年 8 月，他被解除了这一职务，1949 年 11 月被开除出党并遭到逮捕。1948 年 9 月，轮到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科奇·佐扎，他同样也被开除了党籍，以后又被处以死刑，“因为他想使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结盟”。1949 年 1 月，保加利亚开始了对特拉伊科·科斯托夫的批判，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之一，后来于 1949 年 7 月被捕和判处死刑。最后，1949 年 5 月，当时的匈牙利外交部长拉斯洛·拉伊克被捕，他曾经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进行过战斗，是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装模作样的审讯中，他被指控是铁托主义阴谋集团的首领。

所以，这一现象涉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只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算是例外，那里后来虽然也有一些政治审判案，但不是那么轰动，大概是考虑到有西德存在的缘故。被告人主要是一些战争期间在西方国家流亡的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前共产党领

导人。此外，对犹太血统的干部提出控告的倾向愈来愈明显。起初是从反铁托主义斗争的角度来提出问题的，还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主义现象，但渐渐地便开始从反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了。这种变化同苏联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态度的变化是一致的。众所周知，苏联原先曾经支持以色列国的建立，但它后来发现以色列主要受美国的影响，于是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中间寻找新的盟友。为了掩盖自己原先的政策，苏联领导选择犹太血统的共产党领导人作为攻击的靶子，声称这些人所主张的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从来都不是苏联的政策，而是一种破坏性的政策，为首的是那些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保持着联系的犹太血统的共产党人。苏联正是采用这种办法消灭了自己政策的见证人。

对于这种“把戏”，我在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苏联曾经选定捷克斯洛伐克在成立以色列国以后帮助以色列训练犹太军官。为此，共产党任命了一批曾经在苏联军队中服役的捷克军官担任教官，并把他们派到斯洛伐克的几个专门训练以色列军官的训练营工作。后来，甚至还根据军队和党的指示向以色列新成立的军队派出了教官。而在 1949 年以后却又突然指责这些教官搞犹太复国主义，搞破坏活动和阴谋活动！

目前有一种倾向：一方面虽然承认犯了这些“错误”，但另一方面又把它们轻描淡写，说成是“小小的插曲”。然而现实是十分令人痛心的。请看下列数字：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1968 年成立的比雷尔委员会的报告，1952 年共有 16010 名政治犯，被捕者中间大多数是工人，计 5962 人，而职员人数只有 3162 人。自 1948 年 10 月至 1952 年底斯大林恐怖时期的最后阶段中，国家法院曾因政治原因对 253 人判处死刑，其中确实被处决的达 178 人。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如此众多，以致司法部长在

1951年初不得不提出减少死刑判决数量的请求。他认为，如此迅速地作出死刑判决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数量不宜太多。这份材料现在还保存在司法部的档案里①。

政治审判案并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独有的问题，而只是反映了一种东欧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审判案和逮捕人数超过了其他东方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不是最为优越吗？这里的共产党不是曾经有过长期的合法斗争的历史吗？它曾经是第一共和国时期几个最强大的政党之一，党员中拥有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此外，同其他国家相比，它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彼此之间都有着更深的了解：哥特瓦尔德、斯兰斯基、斯维尔莫娃、格米德尔和柯佩茨基等人曾经一起在莫斯科流亡，其他人曾经在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或西线战斗过或参加过抵抗斗争。更何况这里的大多数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理想和苏联均怀有好感，而不象匈牙利和波兰那样存在着明显的反苏倾向。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1945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曾经试图找到一种从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新形式，不排除采用和平的、民主的和议会斗争的方法。起初，他们的这种努力似乎甚至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在一次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曾经这样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可以考虑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它的某些结构同其他西欧国家的结构十分相似，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假如它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

① 捷克斯洛伐克司法部——安全委员会档案（编号 T44474/56，第三卷）

上也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捷克斯洛伐克有能力通过一条特殊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在它的国内存在着一个可以成为普遍注意的中心的共产党——正是这一事实使得斯大林、贝鲁特、拉科西、乌布利希等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教条主义者十分不安。显然，如果这样的社会获得成功，势必要对已经开始朝着另一方向发展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影响。

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所施加的压力以及日益增多的谋杀、判决和逮捕事件表明，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并不需要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拥有自己的领袖和经验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完全相反，当时的苏联领导——很遗憾，今天的苏联领导也是如此——觉得同一个没有棱角和特殊威望的共产党、同一个依赖于苏联的支持并依靠行政权力和僵硬的纪律而不是依靠群众信任的闭目塞听的党打交道要方便得多。换而言之，它更希望要一个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并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苏军的存在的基础之上的共产党，苏联领导当时和现在都一直把这种著名的"军队的存在"看作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唯一保证。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苏联领导人对于那些依靠自己力量而不是依靠苏联军队获得解放的国家如南斯拉夫、中国、古巴和越南很不信任。

因为凡是某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以后掌权的是本国土生土长的、而不是由苏军坦克从外部带来的本民族的领导，莫斯科就很难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服从于苏联共产党。

老一套的指责

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这种观点的特点是缺乏对革命运动本身力量的信任，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共产党作为运动中心的领导作

用，把它看成是一种类似教会的东西，至于哪一种社会主义是好的、哪一种社会主义是不好的，某某人究竟是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领袖还是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只有这个教会才能作出裁决。1968年苏联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我们经常考虑的几个问题大概也能从中找到答案，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在这次干涉发生以后，"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成果丝毫未予保留？为什么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发展遭到了全盘否定？

从1948年至1968年，中间相隔二十年之久，但所提出的指责却同样是所谓"背叛"和"离经叛道"，而另一方面，人民却对建立"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的新方针自发地表示拥护，没有把任何一家工厂交还给从前的工厂主，也没有任何一个农业合作社遭到解散。这种情况同1956年波兰发生的情形不同，在波兰，当时大多数农民收回了自己的土地，而这些土地至今仍是私有财产。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未受到触动。所以，无论是在1945——1950年期间还是在1968年，冲突的根源在于苏联领导从来不允许有任何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因为他们认为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一旦在捷克斯洛伐克试验成功，将会在苏联本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产生使他们感到不愉快的影响。由于这种原因，苏联人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杀一儆百的办法，作为对其他国家的严重警告。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对于某些国家（如南斯拉夫）的某些不同做法及其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苏联毕竟还是允许的。这确实是一个例外，因为苏联完全明白，它对南斯拉夫是无可奈何的，于是便采取了在政治和经济上施加压力的办法，而没有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至于罗马尼亚对外政策中的相对独立性，苏联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前提是在其对内政策中不出现危及苏联模式的深刻变化。

1968年，苏联共产党亲自扮演了1948年时由现已解散的共产国际扮演的角色。因为正是苏联共产党决定迫使东欧最强大的共产党之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为儿子党，尽可能地使它变得比其他各国的共产党更加无足轻重。我已经说过，对于那些主要依靠群众支持的政党如意大利共产党，苏联领导人始终抱着一种不能容忍和不信任的态度。毫无疑问，希腊共产党所遭到的破坏也是莫斯科进行干涉的结果，因为它不愿意希腊共产党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拥有恩斯特·菲舍尔和弗朗茨·马雷克等有威望的领导人的奥地利共产党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也表现在同第三世界的一些政党以及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中，因为那些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地在解放区进行斗争的政治运动从来不允许苏联在他们那里拥有如同在其附属国里那样的强大影响。

潜在的敌人

苏联对待东方国家的态度的另一面是其对待人的态度，因为遭到最严厉镇压的恰恰是那些曾经在国内外参加过抵抗斗争、同外界保持着接触、在一部分舆论中享有威望并能批判地思考问题的共产党人。所以，那些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和抵抗运动的战士以及那些以善于独立思考著称的人都受到严重的打击。

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终生，必需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的个性。在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们看来，具有这两种品质的人都是一些不驯服的人。斯大林主义者常常有一种明显的偏爱，喜欢那些为了掩盖本人的某些历史问题或对党表示感激而对他们唯命是从的人……。斯兰斯基、克雷门蒂斯、什林、弗雷伊卡、马尔哥里乌斯、弗兰克、西蒙纳、格米德尔和萨沃兹基等共产主义

领导人和战士在1950年至1954年期间先后遭到处决，其原因无疑就在于此。很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在1968年8月21日入侵以后首先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人——由于他们本人的观点及其同人民的联系，这些人一开始就是“解决”对象——加以逮捕，接着将他们劫持到莫斯科，最后又把他们彻底排除出政治生活之外。

我知道，从特定的历史事件得出普遍的结论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事情并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重演的。但是，我认为不能排除、甚至很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意大利、西班牙或法国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真的决心开创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迟早会受到苏联领导集团同样的不信任和同样的敌视。他们会同斯兰斯基在1950年以及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在1968年一样，感到同样的威胁。

总而言之，最初是苏联施加了压力。这种外部压力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948年2月以后放弃了自己的建设一个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把国家和党的命运交给了苏联共产党及其工具共产国际。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怎么可能避免发生其他东欧国家中已经发生的那种政治审判案呢？党被迫在自己的队伍中、在那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者、铁托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中间寻找自己的敌人。同样，它被迫同意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中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命题。同样，它不得不接受苏联霸主的教条，而这个霸主还要求其他各国政党必须对苏联共产党盲目服从。

连接莫斯科的脐带

起初，哥特瓦尔德试图进行反抗。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们

知道，他并不认为苏联的某些要求是正确的，他为党的日益僵化感到忧虑。他大量饮酒，似乎想用酒来浇灭他心头的疑虑。但是，要解决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冲突，只有采取两种办法：要么拒绝莫斯科的决定，维护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冒暂时发生冲突的风险，即采取铁托的办法；要么进行让步，屈服于指挥棒之下。哥特瓦尔德选择了第二种办法，造成了悲惨的后果。他的这个错误——更正确地说，这是他的一个罪行，因为这是一个导致对同志和朋友进行残杀的决定，难道还能称作偏差和错误吗？——是党的总方针的出发点，同时又是党的总方针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一事实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尽管有些共产党对于苏联的现实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但仍始终担心同苏联共产党决裂。

1968 年 8 月，许多共产党虽然第一次对莫斯科的决定——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谴责，但同时却又急急忙忙地强调它们同苏联之间的团结，而且其中不少的党最终承认了所谓“正常化”的既成事实。

更可悲的是杜布切克的下台。在苏联干涉的第一天，即1968 年 8 月 20 日，杜布切克突然明白了苏联的目的是要把改革社会主义的尝试扼杀在襁褓之中，但他却没有勇气对同他关系十分密切的苏联党进行反抗。他虽然十分庄严地提出了抗议，但却屈服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服从苏联的观念在共产党人的心中是何等根深蒂固。“要么同苏联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尽管这是一种变了质的社会主义），要么反其道而行之，这就必然走向资本主义。”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现在也仍然是这样，尽管南斯拉夫和中国的例子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所有这些外部的影响虽然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还不足以完全说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当时的变化。这种变化还有内部

的原因：党把某些对手赶出了政治舞台，这些人对这种"不公正的行为"进行反抗，从而使党感到更有理由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不但应当通过政治上的说理斗争，而且还要用警察机器和司法机器去加以打倒"。在怀疑、告密和监视的气氛中，党渐渐地使自己在人民群众中孤立起来，把很大一部分群众（其中包括原先拥护党的人）推到反对派一边。

哥特瓦尔德明白，迟早必须对实行这种路线的理由作出解释。他也明白，还必须为此而牺牲一些人。他后来对斯兰斯基以及他本人的助手所进行的批判同时也就是对他本人过去的政治历史的批判。否则他本人就得出面负责，就会冒自己成为镇压运动的牺牲品的危险。很遗憾，这已经成了一种相当经典的做法了：每当人们改变路线的时候，便把错误的责任推到最亲密的助手身上，在批判他们的同时，对整个路线进行批判。就这样，哥特瓦尔德不得不背弃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以及自己的拥护者中那些已经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们。不久以后，这些人都遭到了处决。

可以这样说，要不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后又重演了这种政治审判案的历史，这种时代本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当时的情形同过去十分相似：古斯塔夫·胡萨克曾经是五十年代斯大林时期政治审判案的受害者，这一次却由于苏联的干涉上了台，为了使自己不垮台，他只好接受如下命题：在捷克斯洛伐克，叛徒们正在策划"反革命"；对捷克的军事入侵乃是"兄弟国家"（华沙条约五国①）"国际主义援助"的表现；通向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完全是一种不可宽恕的异端，必须对有关负责人（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等）进行清

① 这五个国家是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

算。胡萨克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曾经为他本人恢复名誉的杜布切克，同样毫不犹豫地牺牲了他的私人朋友米兰·许布尔，尽管许布尔在诺沃提尼当政时期曾不惜牺牲自己的前程竭力主张为胡萨克平反。

迫害运动中对党证不予考虑

我在这里提到了一些被判刑和被处决的共产党干部的名字，不是为了造成这样的一种印象，似乎我仅仅对于他们的冤案感到遗憾。我经常（包括在西方）听到这样一种辩解："斯兰斯基、克雷门蒂斯、什林、隆多以及他们的同志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但是其他被判刑和被处决的人都是反动分子，这里有很大的区别。"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对格里戈连科和麦德维杰夫表示同情，但并不同情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因为他们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右派或自由派。他们并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我反复地对这些朋友讲，这种态度是不公正的和危险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每次迫害运动的矛头起初虽是针对非共产党人的，而最后则总是针对共产党人自己的。我们既然声称能够带来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更多的自由，那么，如果说话算数的话，我们就应当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应当努力使我们的对手也有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权利。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权利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说理斗争。如果我们要想在道义上得到批判对手的权利，就必须如同维护自己的自由那样坚决维护政治对手的自由。

在 1948 年至 1952 年期间，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最严重的指控。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政党，它的许多党员和干部在 1921 年加入了共产党，它从前的

许多领导人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一共和国期间成了共产党领袖。在德国入侵前夕，它同共产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在战争和抵抗斗争期间，这种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1948年的二月危机中，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和议员没有同其他党派的部长一起辞职，而是同共产党结成了联盟。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绝对的权力，应当感谢他们。因此，两党之间本应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结果正好相反。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便主张同社会民主党融合。这种融合也确实实现了，但不是通过两党合并成一个新党的办法，而是通过社会民主党人个别加入共产党的办法。

在这一由共产党强制推行的统一过程中包含着很多歧视的因素。不久以后，数千名社会民主党人被投入了监狱，在长达一、二十年的监禁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如果今天一些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对共产党人提出的合作建议持不信任态度，我们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们应当好好地想一想，为什么在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遭到解散和破坏，它们的领导人遭到逮捕？

我比较详细地谈到了政治审判案问题。这是因为读者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当时斯大林恐怖时期的情况，便很难理解我国后来的发展。有些人曾经企图把这些罪行轻描淡写，另外一些人至今仍在企图这样做。同诺沃提尼当年一样，他们总是这样说：这无疑是我国历史上可悲的一页，但是在这段历史中也有许多光辉的篇章，如经济的高涨，大批电力中心、水库和工厂的建立，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等等，而“那些强调这些错误的人的真正目的是要丑化我国的形象”。但是，这种政治审判案已经成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毒瘤，它已经扩散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每个机体中，使得我国所进行的试验中的一切真正积极的因素不能发挥

作用并把它们扫荡殆尽，引起了我国最初的政治危机和道义危机。

不眠之夜

对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是如何经历过来的呢？那时真象突然从背后挨了一刀一样。一开始，逮捕和政治审讯的浪潮使我们感到震惊。我们努力去理解党和党的这种行动的理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反省。我同谁交谈过？我遇见了谁？我讲了些什么？也许这句话或那句话被认为是对党不信任的表现？也许这些朋友真的是阴谋家？我在那天晚上的讨论中对党的维护不够满腔热情，我是不是太软弱了？

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在我的生活的最深的角落里寻找自己可能有错的痕迹。即使那些深信自己是无辜的人，也开始进行自我反省。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有的人并未认识到自己犯了什么“罪行”，却作好了被逮捕的充分准备，甚至在当时觉得自己完全应该被逮捕。我还记得，我自己也在一个小箱子里装好了几件衣服以防万一，这种情形就象有人在瘟疫蔓延的时候感到大家都在劫难逃、自己也难以幸免一样。我当时是议会文化委员会的委员，并以这一身份同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部共同合作。中央文化部的部长是古斯塔夫·巴雷斯，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战争期间生活在莫斯科，是斯兰斯基的朋友。他也受到了指责，不过没有遭到逮捕。我们这些同他最接近的同事一起开会商量，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党揭露他。有一位同志说：“我们没有抓到他什么把柄，不过可以肯定，他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一定也是阴谋集团的成员。”

还有一些人走得更远：“我记得他曾经对苏联的教育制度和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表示过某些怀疑。"

此外，好几位同志发现，他的女秘书在1949年逃到南斯拉夫去了，以后一直在贝尔格莱德电台从事反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的宣传工作。我们挖空心思地想：这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呢，还是他亲自把这个女人派到南斯拉夫去反对我们的？如此等等。每当想起我们曾经多么轻率地给昨天的好同志扣上叛徒和阴谋家的帽子，我至今仍然感到十分惭愧。

1951年11月，斯兰斯基被捕，清洗运动蔓延到了中央委员会一级。不久，我也蒙受了嫌疑，因为我的知识分子腔太浓了。我被调到布拉格县委会担任宣传鼓动工作。

斯兰斯基被捕的消息并没有立即公布。这类行动一般都发生在夜间或清晨，直到事隔很久以后才正式宣布。报纸上没有透露任何情况，只是通过党内的消息，我们才知道对他提出了政治上的指控。

他是在参加哥特瓦尔德举办的一次家庭宴会以后在回家的路上被捕的。在整整几个月的时间内，对这一件事没有透露一点风声。直到1952年，在斯兰斯基被捕一年以后，我才在共产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上见到对他和他的集团的起诉书。起诉书占了报纸整整几版的篇幅，说他们是一个间谍、叛徒和杀人犯集团。我看了被告人的名单之后才知道斯兰斯基和其他被告都是犹太人，而在这以前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犹　太　人

当审讯开始的时候，我调到党的布拉格县委会工作已经达一年之久了。我想亲眼看看审判的情况，请求批准我参加旁听。虽然广播电台有实况转播，报纸上也要进行详细报道，但我还是想

在近处观察。

当审判开始的时候，无数的决议象潮水一般地涌向中央委员会：各地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要求对这些叛徒进行最严厉的惩办。哥特瓦尔德和其他领导人对人民进行了煽动。“这些家伙破坏我们的经济”，他们说，“我们的进步不象我们在1948年许诺的那么快，责任就在于他们。这些家伙都是异巳分子（应读作犹太分子），他们不懂得捷克人民的心理。他们的祖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些世界主义者的祖国是整个世界。”

我还记得，有一个名叫伊凡·斯卡拉的捷克“诗人”（此人现在是作家出版社的社长）甚至发表了一首诗，刊载在《红色权利报》头版显著位置上，题目是：“对于狗，应当象狗一样地处死。”

这次审判的旁听工作是由诺沃提尼亲自组织的。他过去是布拉格州委会的书记，刚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不久。旁听证有一天的，也有半天的，分发对象都是经过挑选的。我在审判的第四天参加了旁听。宽敞的潘克拉茨大楼是一所很老的监狱，在战争期间，许多抵抗运动战士曾在这里遭到严刑拷打和杀害。那一天，整个大楼戒备森严，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氛。我们坐在呈半圆形的旁听席上看到被告们进入法庭：斯兰斯基、什林、格米德尔、弗兰克和西蒙纳，还有一些其他人。这对于我们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过去，我们经常见到他们以党的伟大领袖的身份出现在主席台上，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他们的照片，而且总是带着一种几乎是神奇的色彩。而现在，他们浑身无力地坐在警察中间，在聚光灯的照射下脸色苍白，身穿便服，不时地站起身来有气无力地回答法庭庭长的问话。检察长是一个名叫乌尔瓦列克博士的人，他对被告进行了粗暴的审讯，辱骂他们是杀人犯和敌人，对

他们的每一句话都要进行一番傲慢的、盛气凌人的评论。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法庭庭长却并未向被告提出任何问题，而总是重复说："你讲吧！"

几分钟以后，他用一个纯属走走形式的提问把他们的话打断，然后又要他们接着讲下去："被告斯兰斯基，继续往下讲。"

就这样，由被告进行长篇的独白，而中间不断地插入那句滑稽的"继续往下讲、继续往下讲、继续往下讲"，使人感到这法庭就象是一场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恶梦。

所有这些人都说自己是人民的敌人，叛徒和受外国雇佣的代理人。坐在那里的是格米德尔，他是列宁勋章获得者和前党中央国际部部长，曾经同季米特洛夫一起在共产国际共过事。他是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人，战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定居，在这以前的整个一生都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的捷克语讲得很不好。

庭长拚命地抓住这一点不放。"被告格米德尔，你的捷克语讲得不好！你的德语一定要比这讲得好！现在也讲不好了？那么你到底算个什么人呢？是一个没有语言、没有祖国的世界主义者吗？！"

这是多么粗暴的侮辱！我们听到格米德尔顺从地回答说："是的，庭长先生。就是这样，庭长先生。"这时，我们坐在那里简直一个个呆若木鸡了。

我根本无法理解。这里所谈到的全都是二、三十年以来人所共知的事情。格米德尔曾经在德国上过大学，他是一个犹太人，德国共产党员，曾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生活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报纸上从前经常自豪地介绍他的不平凡的传略。

"你是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的？"，庭长问。

"1921年"，格米德尔答道。

“你是不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钻入党内来进行破坏的?”

“是的，庭长先生。”

在审判结束以后，有些同志感到奇怪。“格米德尔当时还只有十六、七岁。这样的年龄怎么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呢?”

后来我们听说，被告所讲的台词都是事先背熟的，他们必须完全照讲，而不得有片言只语的更改。我曾经想，既然党从前的领导人是这样的，那么谁能担保今天的领导人明天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遭到贬黜呢?

在审判中间休息时，我有时也同熟人交谈几句。他们对我所讲的真是心里话吗? 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只有少数人看来感到很愉快:

“你看，现在揭露出来了，犹太人是人民的敌人。他们起初同奥地利王朝同流合污，后来又同德国人搞在一起，希特勒纯粹是出于疏忽才要消灭他们。也只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不得不接受他们。实际上他们是十分危险的。”

另有一位同志说:“你看，这些知识分子，嘴上总是夸夸其谈什么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我们的敌人，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的代理人。”

那时的许多细节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因为我当时感到自己好象正在做一场恶梦。人人都得交待自己的经历和写自传，对于周围的人的信任消失了。县委会工作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淡薄，我们所谈论的只是计划完成情况、生产增长情况以及那些建立农业社最多的区的情况。在下乡的时候，我发现农民是反对集体化的。但是，在公开的会议上是不能谈论这一点的。我感到，我在工作时不象以前那样全力以赴了。我想，如果我抽出身来继续我的学业或者报考另一个院系，不是对我更好些吗? 我对党的

州委书记谈了这个想法。他对我说：“如果你当逃兵，在目前的情况下就会使你在别人眼里显得十分奇怪，表明党的政策已经不合你的心意了。对你说来，唯一的办法是，更加旗帜鲜明地投身到工作中去，以表明你‘毫无保留’地捍卫党的政策。”

“上帝”之死

1953年5月5日①，我在布拉格的办公室里接到一位朋友——一个斯洛伐克的老游击队员——打来的电话，他哭着对我说：“斯大林同志死了。”

在县委会的走廊里，男男女女都泣不成声，如丧考妣。整个世界似乎都要崩坍了，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斯大林占据了我们的整个思想，我们觉得很难想象有别人能够代替他。再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别人”会是谁。对于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我们除了名字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同志们绝望地、垂头丧气地想道，现在该怎么办呢？参加会议的人一个个都是泪流满面。对我们的制度抱敌视态度的人暗暗感到高兴。一个时代结束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共和国总统和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到莫斯科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我记得，在他回来几天以后的某一天，我正在离布拉格约四十公里的地方参加一个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大会，县委会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消息：“刚才电台广播说，哥特瓦尔德得了重病！”

又是一次命运的打击。两天以后，他死了，哥特瓦尔德的逝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如斯大林逝世时那样深。一个时期以来，

① 显然系3月5日之误——译者

哥特瓦尔德一直在布拉格宫内深居简出，只有在极少数重大场合才露面。在我当时的印象中，人们似乎并不十分悲伤，反而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也许党的路线会从此有些变化？尽管如此，我所认识的许多男人和女人虽然并非共产党员，还是不惜排几个小时的长队去看一看停放着哥特瓦尔德遗体的布拉格宫。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自从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先后担任总统以来，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始终在人们的心目中受到某种尊敬。哥特瓦尔德虽然是个共产主义者，还曾经当过工人，但对汇集在这里的人群说来，他毕竟是全国的最高人物——总统。

现在，对于哥特瓦尔德战前在人民阵线和反法西斯斗争时期以及战后在民族阵线中的作用一般都给予肯定的评价。但是，对于他无条件地服从苏联领导，历史将作出严厉的裁判。难道不正是因为他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化”路线，所以才在1929年起用他来反对那些主张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的人们的吗？正是这种对苏联领导的服从，使他身为被希特勒占领的国家的领袖却在1939年9月毫无保留地支持德苏条约，又使他在1949年背叛了他本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捷克斯洛伐克特殊道路的立场并出卖了自己最亲密的助手。如果说，对普通的杀人犯不应当宽恕，那么对于一个应当对杀害如此众多的无辜者负责的政治家，为什么要给予宽恕呢？

当我们在大厅里轻轻地移动脚步从棺材边走过的时候，我的内心同其他人一样，确实十分激动。可以肯定，我当时感到，随着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的逝世，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已经宣告结束。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会变得更自由些吗？

几个星期以后，这种希望似乎得到了证实。我利用几天休假到山区去滑雪。一位朋友来找我，惊讶地对我说：“刚才电台广播说，被斯大林指控为谋害高尔基并企图谋害他本人的全部医生

都已经恢复了名誉。这一指控是错误的，整个事情是贝利亚策划的。”

当时是否马上牵连到了贝利亚，我现在已经记不准确了。但这一消息使我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因为假如所指控的罪名是捏造出来的，假如这些犹太医生是无辜的，这就意味着苏联的制度中存在着某种问题。对于斯兰斯基案件和那些用斯兰斯基的犹太血统来证明他是叛徒的人，我们难道不也应当考虑一下吗？这两个案件之间不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吗？

回到布拉格以后，我们向消息灵通的同志提出了讯问，得到的答复是：“不，这同斯兰斯基案件无关，斯兰斯基案件没有问题。这只是一个插曲，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的错误是一向予以纠正的……。”

但是当贝利亚被捕和最终被处决的时候，大家对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参与领导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审判案的最著名的苏联顾问之一便是贝利亚的助手阿巴库莫夫。阿巴库莫夫本人也已经被处决。同志们之间所谈论的问题愈来愈使人感到不安。

过了两年以后，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全部罪行，未作任何深入的分析便把那个现在突然显得十分可怕的时代的责任全部推到斯大林的头上。直到这时，我们才掌握了证据，证明政治审判案是预谋的。

第三章　在毛和其他人的国家里

归　队

有一天我的老朋友、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那位“青年工人”拉迪斯拉夫来找我，他当时已是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的第一书记了。“我们需要一个捷克人来担任国际学联总书记的职务，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你”，他说：“你懂外语，又搞过多年的学生运动。”

他向我介绍了当时的困难处境：国际学联的第一任主席约查·格劳赫曼是个捷克人，在1951年格米德尔被捕后被免职了。第二任主席是罗马尼亚的贝列阿努，因为是犹太人，大概也被撤了职，不得不回罗马尼亚去了。

“在华沙举行的下一届国际学联大会上将要选意大利的乔万尼·贝林格同志当主席，他是恩立柯[①]的兄弟。但是国际学联设在布拉格，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总书记，然后由驻捷克斯洛伐克的成员国组织委派。”

我感到松了一口气，表示同意，尽管我也谈了我的顾虑：党的领导会同意我作候选人吗？“我会同诺沃提尼同志谈的”，拉迪斯拉夫说。

---

① 现在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几个星期以后，他告诉我这一提名已经被批准了。我非常高兴。我知道，参加国际学联的殖民地国家的学生正在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其他学生则正在开展反对法西斯主义残余、争取教育民主化、反对种族歧视和新的战争威胁的斗争。这是一种我能够全力以赴地投身进去的政治斗争，对我说来也是归队的一种形式。

不久，我就被叫到中央委员会去了。“这么说来，你要成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总书记了。我不怀疑，你是懂得政治问题的，但这个职务将迫使你到外国去，特别是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你必须十分清楚，你可能遇到威胁和挑衅。例如，当你晚上很晚回到旅馆发现在你的床上躺着一个裸体女人的时候，那你可别忘了，在她身旁会藏着一架照相机正等着拍照呢。这样你就落到敌人的手里了！”

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的这番指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有时我夜间回旅馆时心总是跳得很厉害：也许今天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裸体女人躺在我的床上吧？那我会怎么办呢？我会那么坚强，把她轰出去吗？然而我的床上可惜总是空的。

不久，我便领教到，我受到严密监视的地方恰恰是在布拉格。还是在我当选以前，我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一起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第四次世界青年联欢节，1953 年的这次联欢节预示着联欢节史上出现了一种转折。缓和的气氛虽然还没有从任何政治事件中表现出来，但从普遍的情绪中以及从联欢节的精神中都已经可以感觉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热情接待、街头的各种民间舞蹈（特别是称为“佩里尼查舞”的一种接吻舞）以及美酒对此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联欢节闭幕时在布加勒斯特的广场上举行了大会。紧挨着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是法国代表团。我同一个年轻的法国女郎进行了交谈。她对我说，她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秘书处

工作，当时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总部设在布拉格。我们交换了地址。回到布拉格以后，我给她的办公室打了几次电话。我们又见了面，并且经常在一起吃饭和跳舞。

有一天，我被叫到中央委员会的干部委员会。巴拉莫娃同志严厉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她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人，同季米特洛夫家关系很密切，是干部委员会主任勃鲁诺·哥雷尔的妻子（哥雷尔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分子，曾经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她冷冰冰地对我说："你知道参加国际组织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责任吗？"

"当然知道。"

"你遵守这些规定了吗？嗯？难道你不知道你作了些什么事吗？你打了许多次电话。"

"我同好多人谈过话，因为我有许多朋友……"。

"现在要说的不是捷克朋友，而是外国人！简单地说，你必须同那个法国姑娘断绝来往。她是外国人，不准你们再见面了。"

如此说来，有人对我进行了窃听，并且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

"可是，既然你们听了我们的谈话"，我说道，"那你们完全应当清楚，我们没有谈论过有关保安的问题或有关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在一起跳舞或者看电影。能在布拉格讲讲法语，这简直使我感到高兴。而且她是一个共产党员，是法国共产党派她到世界和平理事会来的！"

"还是奉劝你一句：不许再同她见面了。"

在华沙召开的国际学联代表大会上，当时的总书记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学生组织代表乔万尼·贝林格当选为国际学联主席，而我本人当选为总书记。当时的国际局势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

性，我们决心克服由于冷战所引起的学生运动的分裂，为全世界学生的团结而斗争。

国际学联是战争结束后不久成立的，在此同时还成立了许多其他组织，如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这些组织的成立应当归功于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但是它们后来逐渐成了苏联在群众运动中扩张势力的工具。现在，我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活动的，尽管我并不认为这些组织是苏联或者共产党人以推行自己的政策为唯一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在我看来，国际学联的宗旨是正确的：在战争期间，学生们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战斗，有些人一起被关过集中营，还有一些人则是在流亡英国期间互相认识的，后来在那里形成了国际学生集会的传统。这些青年人打破民族主义的界限而在战后共同进行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斗争，那是十分自然的事。

于是，1946年成立了国际学联。它的总部设在布拉格，第一任主席是曾被流放的捷克学生约查·格劳赫曼，而第一任总书记则是英国人汤姆·马登。欧洲各国的学联起初共同合作，努力为国际学联提供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新的一代学生——他们缺乏这种要统一的思想——的成长，那种团结的感情消失了，一部分学生运动则愈来愈多地向着工团主义和保护物质利益的方向发展。战后时期的统一逐渐瓦解了，今天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一方面，西方各国想要限制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苏联人和共产主义运动则要保持他们在这些组织中的政治霸权。

在1948年布拉格事件发生过程中，有几个国家的学联代表谴责布拉格大学开除大批学生并要求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从而引起了严重的冲突。由于国际学联总部设在布拉格，所

以多数成员国都觉得难以接受这个要求。起初，西方国家的学联在国际学联内部进行斗争，希望能够改变国际学联愈来愈片面地代表苏联政策的路线，而这时他们认识到，他们绝不可能使自已的立场得到贯彻。于是，当1949年南斯拉夫学生组织由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那些人所共知的决议而被开除时，西方国家的学联便脱离国际学联而成立了一个唱对台戏的组织，叫做国际学生会议，这是一个协调各国学生活动的组织，开始是不问政治的，但后来逐渐变成了反共组织。

所以，当我1953年开始在国际学联工作时，世界上有两个学生运动中心：一个是国际学联，一个是国际学生会议。鉴于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缓和倾向，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将学生运动统一起来，或者统一在国际学联内，或者将两个中心加以合并。

我发现，在国际学联内部存在着一种政治多元化的状况，这同1948年以前捷克的情况相似。这里总的气氛使我十分陶醉。各成员国组织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大家对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进行表决，大家可以提出建议并对这些建议进行讨论。这种制度比党掌握政权以来我们所习惯的那种制度要民主得多。我非常高兴，又能在进行政治斗争的组织中工作了。现在常常有人问我，苏联共产党是怎样在国际学联中起领导作用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类组织无非是苏联共产党手中的工具。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我还记得，有一家法国报纸曾经发表过一条“引起轰动”的消息，声称在布拉格伏采洛瓦大街三号（这是国际学联书记处的地址）有一个训练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恐怖主义分子的基地。这则消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记者们向我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我们告诉他们这个消息是不真实的，他们还很不高兴地指责我们不向他们说实话。后来，当我已经在流亡时，伦敦的一位高

级政治家问我，能不能把那个臭名远扬的布拉格训练基地的详细情况对他透露一点。我向他保证说，在伏采洛瓦大街三号从来没有过什么训练基地或间谍学校，他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惊讶。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是国际学联中的决定性力量。由于这个组织的书记处设在布拉格，所以主要靠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和苏联共青团的资助，因为其他殖民地国家组织无力交纳会费。这里也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在进行决策时，出钱的人当然要比其他人具有更大影响。苏联作为一个成员国担任副主席并且在布拉格有一个常驻代表，另外在国际学联出版的《世界大学生新闻》杂志编辑部中还有一名代表，后者可以列席书记处的会议。苏联代表通过书记处的会议表明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立场。他们的态度是豁达的，从不在每件小事上去系统地推行自己的主张。但是可以说，如果事情涉及到苏联的政策，这时他们总是特别敏感，甚至可以说从不让步。

我还记得1956年布达佩斯暴动和苏联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以后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在国际学联书记处执委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印度尼西亚和厄瓜多尔等国不是受共产党领导的学联对逮捕和流放匈牙利学生的问题反应特别强烈，要求我们尽快采取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想，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做，而同时又不触犯苏联。于是，我们指定了一个国际委员会，由我同一名印度代表和一名日本代表组成。我们来到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其他大学城，同一些政府代表和学生进行了会晤。我们在有关报告中提到了一些应该受到指责的事情并强调了某些事实，但非常小心，既没有批评苏联，当然也没有对它的干涉行动表示赞许。我们想以此表明，国际学联并非象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组织，而是一个能够对问题作出客观判断的组织。我们原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求

得表决时意见的一致，并保持我们的团结。但是来自莫斯科的苏联代表图曼诺娃强烈反对我们的报告，要求我们对报告进行修改。我记得，我曾为此彻夜不眠。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苏联人不愿意明白，无论对于国际学联还是对于他们自己，我们的态度都是正确的。

在我们的苏联朋友看来，只要一个非政府性组织所作的决议对苏联政策有丝毫怀疑，那么这个决议本身就是一种灾难。

还有一件事曾经使我深感不安。那是1961年赫尔辛基联欢节之后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学联大会上。当时，国际学联正在进行一场反对核试验的运动。但是，由于战略上或宣传上的需要，苏联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世界都愤怒地谴责苏联这一行动，特别是学生们。日本的学生组织“全国学生自治会联络会议”（“全自联”）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重要的一个学生组织，它坚决反对原子武装和战争，在大会上立即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强烈谴责一切原子武器试验、包括苏联的原子武器试验。我们知道，“全国学生自治会联络会议”的代表途经莫斯科时曾以他们特有的战斗热情在红场上举过一幅“打倒原子弹！”的巨幅标语。苏联警察立即将他们逮捕，借口说他们都已喝得“烂醉如泥”。在列宁格勒大会开幕的时候，苏联共青团的代表令人作呕地给我们看了一些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全自联”的代表如何在莫斯科的一个戒酒所里被剥光了衣服绑在床上。

“这些照片应当在代表们中间进行传阅”，苏联同志说，企图以此“证明”这些谴责苏联的人都是没有出息的酒鬼。

我生气地说：“绝对不行！特别是日本人已经一致提出指责说，莫斯科的警察使用暴力往他们肚子里灌伏特加酒！”

再说，日本人在大会上的举止始终是那么彬彬有礼，他们仍然同以前一样开朗。他们一再重申，他们对于苏联丝毫没有敌意，但是如果国际学联想要忠于自己的路线和避免西方国家学联的批评，那就应当继续反对一切原子武器试验，而不应当有所例外。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但是国际学联的主席，同时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学生组织的代表，而后者的任务则是无条件地支持苏联。

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说服苏联同志：国际学联是一个学生组织，为什么就不能对违背人类利益的任何原子武器试验进行一般性的谴责呢？

“不行！”苏联同志说。“不行，因为美国的核试验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而苏联的核试验是为和平利益服务的。不能把这两种情况混为一谈，而必须严格地加以区别。”

日本人失败了。同时，我们的政治道义也遭到了失败。

这些例子说明，苏联代表是如何地不能理解国际学联在国际运动中应起的作用，以维护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和政治派别的学生之间的团结。

当时，许多政治家都看不到第三世界殖民地国家的学生所起的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学生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常常冲在前面，把国际学联当作能够表达他们的主张的第一个国际舞台。印度尼西亚、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印度、摩洛哥、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和苏丹等国当时都是殖民地国家，而且尚未参加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力量都还比较薄弱，还没有同国际组织建立联系。这些国家在巴黎或伦敦的留学生——有人把他们称作“殖民地人”——是最早的独立使者，他们最迫切地希望其他国家的学生保持团结。殖

民地国家的学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了解遥远的外国的现实的。

所有这些例子说明，学生们虽然没有力量改变一种制度或推翻一个政府，但却能起某种先锋的作用。他们是独立的，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对各种事情作出反应并且能够毫不犹豫地走上街头，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一般说来，对于他们正在研究的某种社会理想同周围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他们的感觉要灵敏得多，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反抗行动也就更加激烈、更带有一种自发的性质。

尽管如此，学生运动的这种革命性和民主性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虽然一再强调学生运动的意义，但从不认为学生们可以不同工人和全体人民密切结合而能单独进行革命和改变社会。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冲击

1954 年，我又一次参加了苏联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亚历山大·谢列平当时是这个青年组织的第一书记（后来他成了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当时离开著名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还很远，因为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直到 1956 年 2 月才召开。但是，同我 1948 年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相比，那里的气氛明显地缓和多了。在这前一年，斯大林逝世了，贝利亚也被镇压了。谢列平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外国代表，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

“共青团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我们这里引起了一场很大的争论。有一些部门认为，这里的工作中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空话说得太多。所以我希望你们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工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请告诉我们。我们很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

谢列平是一个比较坦率的人。后来，1957 年在莫斯科筹备

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时，这种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在联欢节开幕的几个月以前，部分外国代表应邀对一些体育场、餐厅、剧院和其他建筑物进行了参观。“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谢列平问道。

好几个同志急忙回答说：“一切都很好，苏联同志做了大量的了不起的工作！”

“谢谢你们，但还是请告诉我们，你们觉得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这时，有几个人就开始说了：“莫斯科的一些餐厅门口排长队的现象似乎不是很好。人家还在吃饭，身后就已经站了好几个人等他快点把桌子让出来。这一点是否能改进一下？”

“为什么莫斯科人的衣着都这么单调？”另一个同志问道。

我从苏联共青团的几个领导人的阴沉的脸上看到，他们认为这些意见是一种挑衅。

“你们说得对”，谢列平回答说，“我们对于颜色还不大懂：裤子和上衣的颜色要不一样？为什么不可以呢？虽然我们不大习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也很好。”

一位英国同志壮着胆子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苏联会缺少卫生纸。

这时，苏联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气呼呼地说：“这种资产阶级宣传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胜利地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同这些成就相比，卫生纸的问题实在无足轻重。”

“不对”，谢列平打断了他的话，“有能力制造人造卫星的国家也应当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

以后我再次到苏联去的时候发现，人们的谈话自由得多了。党和共青团的作风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外界的防范似乎不象以前

那样严了。苏联的翻译工作人员说话也比较多了。有一位翻译对我讲述了某个工厂里当着文化部长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的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工人们问福尔采娃：

"亲爱的福尔采娃同志，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实际上所得到的工资是多少？不只是名义上的工资，也包括装在封袋里的？"

众所周知，直到赫鲁晓夫时代以前，苏联对党的干部实行双重工资制。他们有一份名义工资，比工人的工资高不了多少，此外还得到一只蓝色的封袋，这里面装的钱相当于名义工资的五、六倍，这笔钱在帐本上是无法查到的，它使党的干部成为与人民群众明显不同的上等人。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某些禁区被打破了，于是工人们也就听说了这件事。

"你们要我们多干活，要我们作出牺牲"，工人们对这位部长说，"但我们要求领导人也这样做，而不应当是这样的：领导人过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而我们则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凑合着过日子。"

我的翻译带着明显的快意对我说，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费了好大的劲才摆脱了当时的尴尬处境。

情况确实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我看了一部由楚赫莱伊导演的苏联影片：影片讲的是一位遭到逮捕、后来又得到平反的飞行员的故事，描写了迫害时期的气氛。影片在描述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情况时，银幕上出现了一条正在解冻的河流：耀眼的、白色的巨大冰块在流动着，慢慢地在远方消失了。虽然我们当时并不确切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堤岸被冲破了，在某个地方已经出现了某种新的因素。

我以紧张的关注心情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作为国际学联的主席，我经常旅行，有时到莫斯科去，有时又到别的地方。我能看

到我的同胞们无法看到的外国报刊。我还能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同西方政治家会面，而这些人是无所不问的。在由各种互相很难拼凑在一起的事件拼凑起来的五光十色的图案上，暂时还看不出个究竟。

这仅仅是一场对过去的方法不会有丝毫改变的接班人之争呢，还是意味着一个崭新的阶段的开始？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对以前的情况进行了揭露。

我从埃及回国途中在罗马停留时，从法国《世界报》上看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报告。我仔细阅读了几遍，因为在捷克斯洛伐克无法弄到这份报纸，而想带回几份去也是不可能的。只有某些国际组织能够收到这份报纸，前提是报上没有什么“不受欢迎”的报道。

在罗马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中，我都有许多朋友。当时，这一事件对于我们说来还是“禁区”，但他们却可以畅所欲言，这使我感到振奋，同时又使我感到沮丧。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干部，但却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才能读到这一重要文件，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呢？我只得象走私犯那样把内容记在心里，因为在布拉格也还得避开警察才能在朋友中间谈论这件事。

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我立即象过去一样把几位捷克朋友找到一起。我把我所读到的内容向他们作了介绍，但我十分惊讶地发现，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知道存在这样一个报告了。他们向我保证说，这个报告确有其事，我们的第一书记诺沃提尼从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回来以后一定会作报告的。

诺沃提尼确实作了一个长篇大论的报告，报告中充满了对苏联共产党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赞誉。他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个人迷信和党的一些过于主观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今后将予以纠正。但是对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

他却只字不提。在他看来，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东西，因为他说幸亏我们这里没有个人迷信——实际上全世界都知道，对于哥特瓦尔德完全可以说是存在着个人迷信的——，因此我们党只要安安稳稳地继续走它的路就行了。

我的朋友们和我十分注意苏联发生的情况，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政治审判案以及妨碍我们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种阻力的根源是什么，现在只有苏联能够帮助我们从已经走进的死胡同里摆脱出来。

我们知道，诺沃提尼和内务部长巴切雷克以及所有其他领导人同政治审判案都有牵连，他们并不打算进行自我批评，因为这样做只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对赫鲁晓夫说来，事情比较好办，他只要把全部责任往斯大林或贝利亚身上一推就行了，而这两个人都已经死了。对诺沃提尼说来，则没有这么简单。哥特瓦尔德虽然已经死了，他也可以对他提出指责；但是他自己的威信还不足以使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诺沃提尼原先只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完全是靠了一种奇怪的逻辑而晋升为第一书记的。在哥特瓦尔德逝世以后围绕接班人问题的斗争中，莫斯科选中了同党的机构联系最密切的诺沃提尼。如同教皇需要上帝或神甫需要大主教一样，诺沃提尼认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需要使自己的形象同哥特瓦尔德继续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更加不想去损害哥特瓦尔德的权威，因为哥特瓦尔德享有1948年“布拉格政变”的领袖的声誉。如果他现在把哥特瓦尔德牵连到政治审判案中去，就有可能引起他将来再也无法控制的事态发展。

但是，诺沃提尼无法对党和群众长期隐瞒赫鲁晓夫的报告。外国报刊已经发表了这个报告，“德国之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等广播电台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节目中也播送了这一报告。

人们开始在会议上提出问题：这个报告是不是真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无法解答这一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由于在苏联的各种党的会议上当着许多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面宣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因此它在这些国家内也慢慢地流传开来了。这就迫使党的领导和诺沃提尼在形势尚未激化以前作出反应并向党公布这一报告：难道要让群众比号称洞察时局的党先知道这一报告吗？这是不堪设想的，也是危险的。

不久以后，各个党支部传达了对斯大林所提出的指责的要点，由中央委员会或县委会的代表进行宣读。他们得到严格的指示，只许根据一本经过登记编号的专门的小册子照本宣科，宣读完毕后材料立即上交中央，不许进行任何讨论。那时的情景是爆炸性的：很多人痛哭失声，特别是一些妇女和老共产党员，对于他们说来斯大林意味着革命，意味着自由，甚至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游击队员，有军人，也有参加过斯洛伐克和布拉格起义的战士——曾经高呼"为了斯大林！"的口号参加战斗。还有一些人刚刚克服斯大林逝世的噩耗所带来的悲痛，对于他们终生崇拜的偶像其实是个疯子和罪犯的说法，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叛卖行为，另外一些人则干脆不相信，认为这一切都是不着边际的夸张，是根本不可思议的："这一切都是某个人的阴谋，这个人无法同斯大林相比拟，便设法糟塌斯大林，以便取而代之。"

几个月以后，有人在莫斯科对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宣读完毕时，大会主席团收到一张纸条，纸条上提问说，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等斯大林逝世以后才出来揭发。

"请写这张纸条的人站起来"，赫鲁晓夫说。

没有人站起来。赫鲁晓夫笑着说："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了！"

渐渐地，人们产生了许多问题。斯大林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一个单独的个人怎么可能犯这么多的罪行呢？这样一来，不是整个制度都成问题了吗？但是党解释说，这同制度根本无关，全部过错在于斯大林和"个人迷信"。

这种解释反映了"赫鲁晓夫报告"的不足之处，因为报告中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可怕的恶魔，而一切都是他一个人造成的。但是，如果有一种制度容忍一个如此可怕地滥用职权的国家元首继续掌权并且接连残杀党的最优秀的干部，那么这还不足以证明这是一种坏制度吗？很快，人们就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资本主义的第一共和国时期，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都是合法的，没有一个共产党人遭到处决。而我们现在知道，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却几乎将列宁时期的中央委员会的全部委员都杀害了！甚至在我们这里，在接管政权以后也杀死了许多共产党员，难道能够说这只是个人的责任吗？"

不，肯定不能这样说。但是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报告还是我们的党中央都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我们愈来愈感到不安，党内思想十分混乱。各地都寄来了"决议"，要求中央委员会作出解释。中央委员会被潮水般地涌来的问题压得透不过气来，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在党的某些组织内，压力愈来愈大，有些人甚至建议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来讨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引起的后果。根据党章规定，假如有三分之一的基层组织要求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则中央委员会必须满足这一要求。

诺沃提尼和党的领导看到，要求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基层组织很快就会超过三分之一，从而将迫使他们召开非常代表大会，于是他们便转入反击，扬言这种颠覆性的要求来自一些知识分

子、修正主义分子、铁托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必须坚决予以批判。党的领导要求已经表决赞成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每个组织撤回自己的提议，并且威胁说，凡是坚持这种提议的人都将被毫不留情地清除出党。这一恐吓手段十分有效，大多数人担心被开除党籍和丧失自己的地位而撤回了自己的提议——因为这一威胁并非是装装样子的，最先提出召开党代表大会要求的人确实被开除了——，那些拒绝改变原来立场的党组织则被迫解散。

与此同时，报刊上再也见不到批评意见，并要求各个党组织停止"无谓的和不健康的议论"而"开始进行工作"。要对这一运动进行急刹车，并不十分简单。但是很可惜——历史上经常有这种情况——，一些外部事件帮了诺沃提尼和他的班子的忙，使他们得以阻止国内事态的继续发展。

1956年10月，波兰爆发怒潮，结果只好让哥穆尔卡回到党的领导岗位。接着又发生了布达佩斯起义和苏联干涉匈牙利的事件。

"现在你们看到了吧，你们的这些议论和所有这些翻案活动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给拉伊克恢复名誉，为他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国葬，但是所有这一切只是发动反革命暴动的信号。"

我们知道，当时党内正在准备为政治审判案的受害者恢复名誉。一些没有处决的政治犯如阿图尔·隆多、欧根·勒布尔和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得到了释放，他们向自己的朋友们或向党的有关委员会介绍了审判案的内幕。于是真相大白，原来这些审判案中没有一出戏不是预先排练好的，因此必须加以纠正，虽然有人很不愿意这样做。

党的领导人对那些积极主张平反的人恼火地说：

"你们大家只知道在那些审判案里转圈子！似乎现在已经不存在想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帝国主义了"——当时把匈牙利事件说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策动的——，"似乎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并未重新开始活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同伙西方帝国主义一起已经向我们的盟友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发动了进攻。那些抓住政治审判案问题大做文章的人唯一目的是想削弱党的地位！"

许多人相信了这种说法。

赫鲁晓夫来了

赫鲁晓夫1957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问以及他在俄斯特拉发一次集会上的讲话对于我们的领导干部说来不啻是当头一棒。他在那次讲话中说："所谓布达佩斯的暴乱是中央情报局策动的说法是不对的。这次暴乱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引起的，因为责任在于我们自己！当然，中央情报局利用了这一事件，它就是干这一行的。但是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责任在于我们。"

赫鲁晓夫讲话在报纸上发表时，这一部分被捷克斯洛伐克的书报检查机构删掉了，虽然讲这番话的人是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而我们党又是听命于苏联党的。这表明，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党的机构内部已经出现了对赫鲁晓夫的某种反抗，表明存在着某种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后来推翻了赫鲁晓夫的领导并把他说成是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人。

我曾经见过尼基塔·赫鲁晓夫多次。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期间的一次庆祝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我们曾经进行了交谈。他对事物的令人折服的、有时却又自相矛盾的自发反应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好感。显然，他很聪明，是一个谈吐十分风趣的

狡黠的农民，善于在陌生的小路上行进。我们常常惊讶地看到，他是怎样打破官僚机构设置的各种禁区的。

我至今还记得他当年访问捷克期间在拉科夫尼克的一家瓷器厂参观时受到该厂厂长和党委书记接待时的情景。“苏联是我们的伟大榜样”，那位厂长说。“我们要在各方面、包括陶瓷生产方面向苏联学习。”

赫鲁晓夫一听就炸了：“您在胡说！当然，你们可以向我们学习一些东西，但不是在陶瓷方面。我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十分了不起，而我们则相反，在这方面毫无传统可言。我刚才正想问你们，我能不能派一、二百名苏联专家到你们这里来学习技术。”

另一天，在比尔森和斯科达工厂参观的时候，有人请他看从苏联进口的农业机械并对他说，苏联的联合收割机太大，我们国家耕地的地块要小得多，因此要费好大的劲改装后才能使用。“为什么要这样呢”，赫鲁晓夫大声嚷道，“既然你们的耕地没有我们的那么大，为什么要照搬我们的机器呢？你们最好还是到西德去看看，他们的机器对于你们的情况要适用得多。”

我们的领导人听了十分吃惊。

因为就在几个星期以前，有一位捷克党员工程师想要根据我国的情况对苏联的联合收割机加以改进，但因此遭到了批评并被开除了党籍。据说，改进苏联的东西反映了一种敌视苏联的思想，因为“人人都知道，苏联制造的机器都是最好的，它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也不可能是坏机器”。在当时，凡是苏联货就一定是最好的，在这一点上不容许有任何怀疑。

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报界对于赫鲁晓夫的即兴讲话经常是嗤之以鼻。但是群众却对他报以掌声，他的话使人感到痛快，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敢于讲这些话。干部们感到很尴尬。要是有那么一个党员讲了赫鲁晓夫所讲的话的百分之一，他就会立即

被开除党籍。但是赫鲁晓夫是苏联党的第一书记，所以我们的领导人只好强压住心头的怒火。赫鲁晓夫对现代艺术等问题持有某种过于简单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他对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看法动摇不定，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斗争缺乏足够的重视。此外，他的关于“超过”美国和“在二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许诺则是轻率的——这一切有时影响了我对他的好感。

毫无疑问，他曾试图在党的机构内部进行改革，例如他取消了臭名远扬的“特殊封袋”，这种“封袋”是发给干部的，里面所装的钱是不入账的。但是他从来不敢发动群众参加这种改革。对于一个在党的机构内飞黄腾达起来的人说来，这种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赫鲁晓夫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矛盾的境界。当他把数十万人从监狱和集中营里解救出来的时候，他给予人们多大的希望啊！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不久，在学生、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中间引起了公开的热烈的讨论。但是赫鲁晓夫一次又一次地刹车，从而逐渐损害了他自己的形象。

当我 1959 年第三次去中国的时候，我在北京见到了赫鲁晓夫。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想对毛泽东解释他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签订的协议。在观看一次长达四小时的京剧演出时，我有机会对他们两人进行观察。我的座位离开他们只有几公尺远，我发现除了毛请赫鲁晓夫喝茶以外，他们俩人没有说过一句话。这种情景象征着苏联和中国之间出现了最初的矛盾。当时还未公开谈论这些矛盾，但对我们的工作已经产生了影响。这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沉默使我预感到今后的决裂。

一个来自东方的共产党人在世界上

在 1953 年至 1963 年期间，我属于因职务关系可以在全世界

周游的特权人物之列。因此我想把问题扯得远一点，谈谈一个积极的共产党人到了长期向他封锁的西方世界后的反应。

我前面已经说过，起初他是透过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观察现实的，这种有色眼镜的形成是由于党的宣传、他本人的观点和想象。因此，当他初次面对据说是充满敌意的西方世界时，他自然而然地力图使他所看到的现实同思想上早就形成的看法统一起来。而当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或迟或早地暴露出来的时候，当他发现他所看到的情况同他所预期的情况并不一致的时候，于是就开始出现一个觉悟和思考的过程。

在旅行变得比较方便的今天，仍然可以观察到这种过程。我甚至发现，象我们党的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以前从未到过西方，对西方的看法十分肤浅——也同样存在着这种过程。显然，他初次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旅行以及去加拿大参加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旅行给他留下了印象。虽然他和其他干部都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不再相信他们自己一向所宣传的那套愚蠢的教条了。对待新思想和对我国制度的缺陷的批评意见，他们的态度比较开明了，而且也不再认为这种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了。

我的情况也完全如此。我把在旅行中看到的一切都向我的捷克朋友作了介绍。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在国际学联的工作加速了我在政治上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因为我拥有难得的特权，可以对两种制度进行比较，并同不赞成我的立场的人进行讨论，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国外有些规定很民主，是我国和我们的机关中所没有的，在我们那里是禁止公开讨论的。

作为国际学联的主席，我几乎天天都要参加对各种问题的讨论，有时这些问题是十分棘手的。起初，我设法回避这些问题，但是很快就发现，虽然有的问题使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提出问题

的人的出发点却不一定是挑衅性的，而经常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我尽量做到实事求是地回答对方，而不仅仅是重复那套宣传的东西，从而自己也开始对现实进行探索。

例如，我曾经想：我们在国际学联里正确地、全心全意地抗议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伊朗和巴西等国对学生的镇压，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内（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却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社会主义者在道义上还有什么权利对这种镇压提出抗议呢？因为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东方国家的学生不能发表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也不准组织自己的团体或举行示威游行。难道我亲眼所见的各种惩罚措施和迫害活动还不够令人反感吗？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独立的斗争。假如我们对苏联干涉匈牙利的事件保持沉默，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去抗议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呢？

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

我的几次莫斯科之行使我对苏联领导人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我曾经匆匆地见过勃列日涅夫多次，与某些西方专家的看法不同，我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从来就不是很高。在我看来，他是党的官僚机器的典型的产物，视野狭窄，同十月革命时期那些伟大的领导人毫无共同之处。我认为他只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根本不懂得社会主义，但却能用一种多少带点人情味的态度打动同他进行交谈的人。不过，他的这种人情味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婆婆妈妈的东西。

某些领导人的智力水平是如此平庸和低下，以至于我经常在想，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领导苏联的。对于各种问题都有一个概括

的了解并且思想开通的米高扬虽然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是伏罗希洛夫将军和布琼尼将军（他们是内战时期的传奇式的英雄）的空洞无物的言谈使我们感到沮丧。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领导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呢？

我不无感慨地想到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当时，团结在列宁周围的人都是十分卓越的革命家如布哈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洛维也夫、加里宁、基洛夫、拉狄克和斯大林等。这些人尽管各有自己的弱点，但都有某些伟大之处。同他们相比，现在这些毫无光采可言的苏联领导人真有天壤之别。这些人的权力虽然要大得多，但是缺乏自己的个性，没有新的思想。这无疑是苏联革命整个悲剧的一个缩影，斯大林主义的迫害消灭了苏联革命最优秀的干部。

后来，在1968年夏天，我们党的一位领导人——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元老——参加了捷苏两党领导人在边境城市蒂萨河畔的切尔纳举行的那次意义重大的会谈。在他回到布拉格之后，证实了我前面所谈的印象。他说："自从切尔纳会谈以后，我再也无法安睡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骂了我们！我们同苏联领导人谈了整整三天，不但在会上谈，而且还在私人场合谈。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些人的平庸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从来就没有读过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著作！他们对社会主义理论一窍不通，只会说'禁止、贯彻、开除、不准、控制事态发展'之类的话。他们对权力的全部认识就是这些。他们的水平只相当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县委书记。我一想到世界的命运系在这些人的身上，就无法安心睡觉。"

相反，我对于谢列平还是怀有几分敬意的。无论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的时候还是后来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以后，我都很了解他。

谢列平出生于十月革命以后，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在赫鲁晓夫居于少数、莫洛托夫一马林科夫集团居于多数的那次历史性辩论中，正是由于谢列平的作用，才得以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从而拯救了赫鲁晓夫：众所周知，正是谢列平和朱可夫派出专机将中央委员们火速接到了莫斯科。我同谢列平及其同代人曾经多次谈到那个时代，谈话表明，他们虽然对揭露斯大林的罪行作出了贡献，但本身也受到这一时代的很大影响。在打破对于斯大林的迷信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习惯、处事方式和神话以后，他们不能用新的东西去加以代替。在当时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和心理上出现了一种真正的真空。人们开始产生一种玩世不恭、悲观主义和一切都无所谓的想法。这使谢列平及其继承人和许多干部感到不安。他们该怎样来填补这种真空呢？谢列平常常谈到要恢复十月革命时期的理想，恢复 1917 年的革命精神。有些人主张在青年中宣传从前的革命歌曲、过去的戏剧以及某种斗争精神。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当美国人首次轰炸河内的时候，谢列平建议苏联领导对此作出响亮的回答，立即轰炸停留在越南海域的美国第八舰队① 或对西柏林实行封锁。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多数领导人反对这一建议，因为勃列日涅夫已经准备对美国实行一种开放的政策。就在那个时候，谢列平被当作勃列日涅夫的竞争对手而赶下了台。

特别是在谢列平垮台以后，人们常常说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者，并把他的垮台说成是灵活路线的胜利，但我并不认为他是教条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假如他继续当权，很可能会实行赫鲁晓夫的路线，甚至有可能为杜布切克和他的同志们恢复名誉或同中国实行和解。我认为，他的伦敦之行和突然垮台

① 原文如此，显系美国第七舰队之误——译者

是党和警察机构内各个集团操纵的结果。

197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肯定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倾向：领导集团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维持现状——继续保持以往的路线，老家伙们继续掌权。我并不是说，党和共青团的所有比较年轻的官僚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都比老一辈更高，但是我相信，新的一代干部将逐渐掌握权力并克服他们前任的因循守旧。而了解苏联的人都知道，在苏联，哪怕是微小的变动也会在政治上引起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在西方，人们对于苏联的现实只有一些极其模糊的认识。当然，现在有很多西方国家的公民去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旅行，各种报纸都作了一些报道，另外还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但是从这一切所得到的有关苏联的政治现实和苏联公民日常生活的了解，仍是很不全面的。旅游者几乎都不懂俄语，神通广大的苏联国际旅行社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防止游客接触普通老百姓和了解他们的生活条件，许多游客又只想证实自己原先对苏联的那些积极的或消极的看法，即使完全撇开这一因素不谈，外国人一般说来也是无法深入了解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经历、烦恼和政治观点的。有谁见过为领导干部开设的特殊商店以及他们的专用医院、住宅和别墅呢？这些地方都有巧妙的伪装，而且戒备森严，以防止人民起来反对党的上层分子的这种特权。游客怎么可能了解到农民和工人的实际收入以及他们在物质上有些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呢？特别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十分好客，总是用最好的东西款待客人而很少谈论自己日常的困难。经常有一些西方朋友对我说，他们在莫斯科的“阿拉格维”饭店或在布拉格的“雅尔塔”饭店或“阿尔克劳”饭店吃得如何好，商店橱窗里摆满了各种商品，在东方集团国家里除了政治上自由较少以外什么也不缺。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只好对他们苦笑一下。他们同来到西方国家

访问的东欧人一样，同样受到了表面现象的迷惑。

当然，我知道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现在确实比战后要好。但是我相信，他们的生活本来是可以比这更加好得多的。许多同志总是对我说："苏联五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已经成为强大的工业国！"这无疑是对的。但是谁也不问一问，要是它所经历的是另外一种发展过程，譬如说，要是没有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不是强制实行集体化、不是片面发展重工业、没有官僚主义的行政管理等因素，苏联今天的发展水平会有多么高。因为，归根结蒂，那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如伊朗、巴西和日本等国不是也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吗？难道只有工业力量和军事力量才是衡量进步的绝对标准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假如没有那些错误和偏向，苏联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不是比现在要先进得多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至今还在说，这种错误和偏向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在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中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甚至坚信情况正好相反。不错，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但是它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青年的吸引力已经大大减小了，甚至可以说，它在客观上已经开始阻碍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走向高涨。

十月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社会担心小小的列宁格勒广播电台号召西方无产者举行起义。而今天，身为大国的苏联却害怕西方的广播电台：它干扰西方广播电台的广播，没收西方的报刊和书籍。同样地，它还十分害怕开展"人员自由来往"和思想交流，而这本来是社会主义应当加以利用的一种手段。

中国使我们觉醒

对我说来，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

1956年，正是“百花”年①。陪同我的是中国驻国际学联代表程极明。我们首先参加了在锡兰召开的国际学生会议，然后一起经由印度和缅甸来到中国南部的昆明。当时，只有很少数的外国人才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因为该省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苏联同志总是拒绝参加某些讨论，并对有关社会主义的某些问题采取回避态度。要不是我对这一点已经多次感到不愉快，并且抱有某种怀疑，那么中国本来是不会引起我如此强烈的兴趣的。

当我在中国发现，我可以向共青团和党的领导人提出任何问题时，我感到十分意外。

那时已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了。中国人不赞成赫鲁晓夫的批评而为斯大林进行辩护。我当然维护苏联的立场，因为对我说来，斯大林仍然是对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各种歪曲的象征。当我们看到中国人坚持为斯大林辩护时，感到不可理解，而且有些恼火。

到达昆明的第一天晚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就对我说：“我们认为，把全部责任推到一个人的身上，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犯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也许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应当对它们加以客观的和冷静的分析，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匆匆忙忙地作出主观主义的结论。我们应当对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进行权衡和比较。”

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中国朋友们接着说：“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斯大林曾经反对我们同蒋介石进行斗争，那时我们也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意义是同一定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

---

① 书中多次提到的“百花”或“百花运动”系指我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译者

我心里想："他们的革命完全是自己搞起来的，没有依靠苏联军队，也没有搞政治审判案，没有做什么不光采的事情。他们不可能理解我们。"后来，我又发现，我们不但在这一点上，而且在别的方面——例如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的意见。中国人强调说："不应当害怕战争。因为假如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他们将会由此而遭到毁灭。从这种意义上说，战争对于人类是一个进步。"

而我则坚决赞成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政策。起初，我感到中国人提出的论据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直至有一天他们进一步向我阐明了他们的想法：公开表示我们害怕战争，这只会使帝国主义者受到鼓励。希特勒不是在看清西方民主国家的弱点以后发动了战争吗？我也明白，对于一个拥有七亿人口的国家和另一个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说来，失去几百万人所带给它们的灾难的严重程度是不完全一样的。不管怎样，这种语言同苏联人的语言相差太大，我们感到不可相信……。

在整个"百花运动"期间，各种讨论非常开放。"我们打算邀请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教授到北京和上海的大学里来讲学"，中国人说，"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才能得到发展。"我觉得这种态度是革命的，使我怀有很大的好感。我们想：十月革命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也许能够在一个不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实现。

为什么这种开放的政策如此粗暴地被中止了呢？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自由的争论暴露了党的干部在思想上的弱点。同苏联的冲突日益迫近大概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第二次去中国是在 1958 年，正是"大跃进"的时候。在

中国的第二次逗留是十分迷人的，对我说来甚至可以说是戏剧性的。我们经历了许多新鲜的事情，但当时却对它们的重要性没有加以注意。

当时，在工业生产方面所提出的口号引起了一场收集废铁的运动。从火车车窗向外眺望，可以看到从北京到上海的铁路沿线有数以千计炉火通红的小高炉，真是一派奇妙的景象。在中国工作的捷克技术人员对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不久他们就会发现，靠废铁是不能建设工业的！"

还有一些别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北京和上海的大学里，学生们自己决定将哲学专业的学制从五年缩短为三年。有一位音乐学院的学生自豪地对我说，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将学习钢琴的时间从四年改为两年。另外有些学生对我们说，他们抛弃了以前强加给他们的一些过时的讲义和旧课本，并且说："我们决定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编写革命的新教材。"

"他们所说的是些什么样的教材呢？"我向北京的一些懂得中文的捷克留学生问道。

"只是在旧教材中加入一些毛泽东的语录，基本上并没有什么新内容"，他们回答我说。

这一切使我们十分迷惑不解并使我们感到有点蹊跷。我们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外国人想要理解中国的政策是多么困难。因为中国人似乎不善于向欧洲人说明，他们打算做什么或不打算做什么。至于如何才能理解，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对于1958年摆到我们面前的各种事实，我们并没有理解：为什么要如此匆匆忙忙呢？为什么要缩短学制呢？搞社会主义革命毕竟不是靠把钢琴课减少为两年或是把培养医生的时间从五年缩短为三年。

这使我联想到唯意志论。在苏联革命初期，也曾有过这种唯

意志论的东西，后来证明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东西。我们当时想，这是一种革命幼稚病。

现在，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完全不同了。中国确实是第一个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发展可能使革命在思想上发生蜕变。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以外）一直拒绝加以讨论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力图防止这种过程的出现，办法是发动基层，发动基层所蕴藏的抗议和怀疑的力量。对于中国领导人说来，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就不仅仅要比资本主义提供更多的食品和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且还应当保障更多的人类尊严。因此，有必要利用外敌入侵的威胁和动员人民进行全面建设的气氛来保持一种革命的声势。

在国际学联会议结束并在中国各省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访问以后，我们于10月1日中国革命的大庆日子重新回到北京，参加例行的节日检阅的观礼。我坐在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上。晚上，正当举行焰火晚会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出现了。

顿时间，大家都肃静了下来。远处出现了毛泽东的高大的身影，犹如一尊塑象，静静地站立着。后来，他象传奇中的人物那样向我们的桌子走来，同一些人打招呼。他走到我和我的中国翻译的座位前，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注视着我并用中文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我的翻译是如此地激动，以至于不知道该怎样翻译毛泽东所说的话才好。这使我很生气，然而万分激动的翻译只知道不断地重复说："You are happy"（"你真幸福"）。但这并不能使我满意。直到夜间很晚的时候，他才平静下来对我说："实在很难翻译，毛主席说的是诗一样的语言！"

看到我十分茫然的样子，他努力尝试着翻译道："毛主席

说，清风已经飘过山岳平川把您的大名传给了他。”

接着他解释说，毛的意思是他知道我这个人，他完全知道我是国际学联的主席，而这种诗一样的形象比喻则是对我的一种少有的称赞。他还说，毛主席——我曾经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他的一些诗——说话时经常运用诗一样的形象语言。

我当时经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不发表公开演说，不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从前的有些文章已经有了译文，另外还有一些文章，据说都是他的思想，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这些东西是他亲自写的。

“为什么毛同志不向党员、党的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发表讲话呢？”

我曾经多次提过这个问题，但是所得到的回答却不十分令人信服：据说他讲话的声音比较低，他讲的是方言，甚至许多中国人也听不懂，如此等等。我认为，这是有关中国的许多谜之中的一个，我们欧洲人将永远无法弄清楚。这里的人们和事物同我们那里完全不一样。在中国生活时间长了以后就会渐渐地忘记欧洲的一些烦恼事，就会懂得：要想对中国说明欧洲的标准同要想把中国的方法照搬到欧洲去一样，都是徒劳的、十分有害的。

大　跃　进

我觉得，多次到过国外（特别是法国）的周恩来同其他领导人一样是一位思想非常敏锐的人，他对于欧洲的各种问题了如指掌。我曾经这样想过，当然罗，对中国人说来，欧洲的面积比中国的一个省大不了多少，我们认为是大问题的事情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些无关宏旨的小事。毫无疑问，周恩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翻译们劝我们同他谈话时要注意言辞的斟酌，

但他本人从未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对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都一一予以答复，任何时候总是带着他那传统的微笑——我们知道，这种微笑所包藏的含义与欧洲人的微笑不总是相同的。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有关当时的现实情况的。当时，在对待美国、印度、第三世界、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和苏联的态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尽管已经同苏联发生了冲突，但是中国人在公开场合从来不涉及这一点。相反，他们十分谨慎地掩盖同苏联的分歧，避免公开谈论这些分歧。"这是内部矛盾"，他们说，"这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件具有很大积极意义的事情。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特点应当自动地成为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榜样。不过，前面已经讲过，中国人是最先注意到革命所面临的危险和蜕化变质现象的，他们最先注意到那种可能导致革命衰退并倒退到从前的特权制度和权势制度去的过程。苏联人当时既不打算同意、又不打算理解这些观点。同苏联人一样，我当时也持一种不相信和保留的态度。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中国的立场是正确的，虽然这种立场是用我们很难理解的语言、是用亚洲国家的语言加以表述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

中国人发动了一场群众性的抗议运动——文化革命：毛号召青年"炮打"司令部，以便摧毁党的机构。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第一次号召青年去摧毁自己的机构。但是结果如何呢？在这一机构受到打击以后，难道他们不觉得有必要回到正常的、更加稳定的局面中来吗？这种办法是否足以实现结构改革并排除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官僚主义化的危险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基层的民主问题，即普通老百姓参预政治生活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在这方面比苏联和东欧各国先进得

多。例如，人民公社的形式就很好，因为它似乎是从各地自发的民主运动中自然形成的，它使农业和工业互相结合，并且保护教育事业，使人民享有决定问题的权利。简而言之，这似乎是回到了列宁时代的苏维埃一类的组织。当然，有一个问题连中国人也还没有解决(我甚至没有把握，他们是否提出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更高一级、在地方一级和中央一级的民主问题。因为领导层内所发生的各种情况——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林彪或同邓小平的冲突——表明，冲突都是在最高领导层一级发生的，而基层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事隔很久以后才告诉基层，要他们对反对派已被解决的既成事实予以追认。也许在最高领导层中有过激烈的争论，也许毛泽东曾经在争论中对最主要的问题发表过意见？不管怎样，并没有透露任何情况，而在社会主义民主下是应当毫不含糊地对所有问题向人民作出交代的。

不管怎样，中国革命是1917年10月以来对社会主义进行积极的改革的最重要的尝试。当然，条件是中国人本身不把他们自己的革命宣布为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必须模仿的新的理想模式。此外，他们打破了社会主义世界的铁板一块，从承认苏联的领导地位转到同苏联公开冲突。现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认识到必须拒绝苏联共产党的霸权，甚至不惜冒同它暂时发生冲突的危险的唯一的共产党。中国不但谴责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入侵，而且至今仍在谴责苏联对我国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是一再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上并不断地要求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唯一的代表团。

菲 德 尔 和 切

我还了解一个相反的例子，那就是从独立和反抗走向顺从、

从朴素的自发性走向官僚主义化的古巴。

我第一次到达古巴是在1961年粉碎猪湾登陆①之后不久。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和革命气势的时期。当时有人把这称为“巴强加”革命（“巴强加”是一种民间舞蹈），因为古巴人带着武器在大街上跳舞和唱歌。这是一场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人民自己进行的革命，一场不必被迫向外国援助者进贡的革命，因此也是一场——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举行以后——有可能从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错误中真正吸取教训的革命。

例如，卡斯特罗到处跑来跑去同人谈话，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没有办公室，你们可以在大街上见到他”，他们这样对我们说。我十分钦佩卡斯特罗，他不是躲在大楼里，也不是躲在警察的影子里。

我还记得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他兄弟劳尔家里的一次约见。已经将近午夜时分了，而菲德尔尚未来到。大约凌晨两点钟光景，他打来电话表示歉意。在当天晚上的一次集会上，他谈了知识分子问题，他们向他提了成百个问题：他是否打算采取苏联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严厉的卫道士日丹诺夫时期所采取的文化政策？他十分坚决地在人们的掌声中回答说：“不，我们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将采取一种自主的政策。对我们说来，革命就是言论自由。”

劳尔是一个苦行僧式的内向的人，远远不如菲德尔富于人情味和大方。他对我们说：“你们看，菲德尔是最后的一位理想主义者。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就会完全是另一种说法。我恨不得把这些知识分子派到各省去，让他们去收割甘蔗，把他们关于言论自由的废话统统打消。但是菲德尔没有勇气这样做，结果将会很

---

① 指1961年4月17日美国肯尼迪政府组织雇佣军在古巴吉龙滩登陆事件。吉龙滩又称“猪湾”。——译者

糟糕！”

我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次数更多了。我们住在哈瓦那海边的里维拉饭店。隔壁的房间里住着萨尔瓦多·阿连德，他当时是智利的参议员，他的夫人和女儿同他住在一起。菲德尔有时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来同来访者接谈。他的身边总是跟着一大群年轻的“大胡子”，对我们捷克人说来，这是很少见的。他开诚布公地对古巴的政策进行十分详尽的说明，从不回避任何问题。但是我发现，要想使他对别人的问题发生兴趣和倾听别人的意见，那就要困难得多了。我在政治家们的身上经常发现这种情况。我后来如此尊敬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就是因为据我所知他是唯一能够真正倾听而从不打断别人讲话的政治家，而且一旦了解到新的情况，他从来不怕修正自己的观点。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有人把杜布切克看成是一个软弱的人，因为他可以被别人说服。

在那次访问中，我还有幸见到了切·格瓦拉。那是在1961年，国际学联执委会决定在哈瓦那建造一所学校，以表示同古巴人民的团结。在几名古巴专家和工人的带领下，各国学生参加了这一工程的劳动。他们一连工作了许多天，连星期日也不休息。工人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犹如亲兄弟一样，十分亲密。我们还在周末晚上一起跳舞，边喝边谈，通宵达旦，肚子里灌满了著名的巴卡尔西—罗木酒。某一个星期日早晨，大约在七点钟光景的时候，我们还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这时来了一位古巴朋友，他把我们叫醒，激动地要我们马上起床，并说：“切·格瓦拉到工地上去了，独自一人在那里干活，因为国际大队里谁也不在。”

真是可耻！我们睡眼惺忪地从床上跳起来，直奔工地。确实，切·格瓦拉同几个古巴工人一起在大楼工程的第二层干活。

他那严肃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很不高兴和失望的神情。有人向他汇报了我们大队的情况，他就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在干活。我们大家力图以双倍的干劲向他表明：我们干起活来都是好样的。大概中午的时候，我们彼此认识了。他会讲几句法语，是唯一不需要通过翻译讲话的古巴领导人。我们向他提了一些有关古巴经济方面的问题，因为他是主管经济的。他的回答相当坦率，但是可以感觉到，对于东欧国家在经济问题上的做法，他持有某种保留。他对我们说(以后在阿尔及利亚会议上也这样讲过)："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想互关系上的态度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一样。应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树立一种新的风尚，以便建立一种强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占便宜的互助关系。"

午饭以后，我们同他一起踢足球，接着又继续干活，顶着40℃以上的酷暑一直干到五点钟。切·格瓦拉连一分钟也不休息，我们大家只好跟着他那拼命一样的节奏一起干。到了五点钟光景，他居然还有精力在长达四小时的临时集会上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后来，一个同他很接近的人对我说，他离开古巴去玻利维亚表明，他对菲德尔·卡斯特罗使国家恢复平静和屈服于苏联的政策有保留。切是一位革命家，他不惜一切代价地想避免同他的朋友和战友菲德尔·卡斯特罗发生分裂，虽然他已经看到，古巴革命当时正在向着违背他本人意愿的方向发展。

在 1962 年加勒比危机(即导弹事件)期间，我又一次来到古巴。从当时的情况看，似乎古巴有可能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独立，因为菲德尔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正达到顶点。但是结果完全相反。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协议决定了卡斯特罗的命运。由于美国实行封锁，他只好完全依赖苏联的经济援助。在哈

瓦那大学的学生面前，菲德尔再也掩饰不住他对赫鲁晓夫的做法的愤怒和怨恨。赫鲁晓夫直接同肯尼迪进行谈判，根本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便决定撤出导弹，这是对他的完全蔑视和侮辱。对我们大家说来，这是紧张的一周，许多古巴人都准备进行战斗，在首都的海滩上体面地"迎接"入侵者。这种高涨的热情使我们感到心中很难过，因为古巴的命运实际上是由华盛顿和莫斯科决定的。我预感到，要想挽救已经遭受凌辱的古巴革命，只有"就范"一条出路。

当我1967年第三次访问古巴时，我发现情况正是这样。我清楚地看到，古巴领导人虽然十分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错误，但他们正准备重复这些错误：对整个经济和小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业实行集体化，聘请苏联顾问，实行一党制、书报检查制度和颁布各种法令，对苏联和东方集团各国进行大肆颂扬，再加上"间谍病"的流行，结果使得人们彼此不信任，觉得到处都有特务，最后便事事明哲保身。整个气氛完全改变了。

在大学改革问题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1961年我曾同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进行过一次谈话，当时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马列主义规定为必修课。我们的经验证明，大学生们起初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但是一旦把它规定为必修课以后，他们对这门课程几乎都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只是把它当成官方的主义来学习。罗德里格斯曾经对我们说，他对此十分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定为必修课不属于改革的范围。一年以后，我惊讶地发现，古巴人所做的正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对待非共产党人以及对待一些发表批评意见、对革命持不同观点的人的态度也同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人有"发言"权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在第一次访问时，我们曾经参加过左派学生和民族主

义学生之间的热烈的讨论。但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时，我发现人们有点害怕，不再畅所欲言了。我所见到的正是斯大林主义时代笼罩在我国的那种气氛。我惊讶地发现，对斯大林主义时代持批评态度的俄国电影不再放映了。他们向我们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在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时期，总是对古巴人民说，苏联是一个敌对的国家。这些影片可能有利于某些反苏偏见的继续存在，因此还是不放映为好！"

这并不能使我信服。我想，古巴人民已经足够成熟，他们是会理解的。相反，使他们了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某些蜕化变质的现象，是很有好处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国家中经常出现的那种父权主义的做法：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自由以及人民是否已经足够成熟，一切都由领袖人物来作出决定。

后来，一位意大利记者有一次告诉我，葡萄牙共产党在1975年初如何阻止里斯本电视台播放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视片，因为其中提到了德一苏条约。这时，我又想起了上面这个插曲。说什么老百姓会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可理解，这真是一种狂妄自大的借口。就这样，领袖们自以为处处比其他人高明，自作主张地扮演书报检查官的角色，要由他们来决定什么是"老百姓"能够理解、什么是"老百姓"不能理解的。他们显然丝毫不信任人民，却还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先锋。

我经常在考虑这一过程的逻辑性。凡是共产党掌权的地方，到处都发生了这种错误，虽然每次重演的方式均有所不同。这种错误究竟能否避免呢？如果能够避免，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已经认识到，只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模式"换成另外一种模式是绝对不够的。我的许多朋友对于苏联所发生的情况感到失望，

他们拼命地寻找一种新的模式，以便加以模仿，崇拜和颂扬。

起初是南斯拉夫模式，以后是古巴模式，后来又是中国模式。简而言之，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教会。在部分左派中间，存在着这种企图制造某种“革命圣地”作为自己的依据的倾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经验证明，更正确的应当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式和形式均采取一种审慎的和独立自主的态度，去弄清它们的这种或那种积极方面的客观原因。

我在国际学联的工作中虽然也曾遇到各种问题和意外事件，但它仍然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之一。也许正是我的这种国际地位使我免遭1961年对我的许多朋友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国际学联的工作对于我在政治上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并不是说，它改变了我的观点和理想。相反，我感到自己比那些没有机会出国的朋友们更加了解这场斗争。当然，我可以对西方的生活同我国的生活进行比较，可以阅读我的同胞们从未见过的报刊和书籍，可以在公开的和私下的场合同别人交换意见。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仍然没有改变，但我的思想变得复杂多了。特别是，我比布拉格的朋友们更清楚地懂得，我们为社会主义改革所进行的斗争并不是一场孤立的和没有前途的斗争，而是世界上总的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比十年以前有了更加充分得多的思想准备，准备重新投身到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去。

第四章　官僚体制的幕后

怀　疑

当时，我在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有许多抵抗运动时期、监禁时期和学生运动时期的私人朋友。我们都是在抵抗运动时期入的党，大家相互信任，可以公开地讨论那些不宜在公共集会上谈论的问题。我向他们讲述我的旅行印象，他们则向我介绍他们的见闻。

我们感到忧虑的是：我们大家曾把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结论看作是革新社会主义理想的出发点。为什么这些结论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呢？为什么没有丝毫本质上的变化？

我们虽然不再生活在1949—1953年间在我国横行的那种血腥镇压之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时刻都感觉到秘密警察的存在，此外还有电话窃听、新闻检查和普遍的不信任。党的领导仍然坚持推行自己的政策，根本不考虑党员的意见，其他各种人的意见就更不考虑了。

在这万马齐喑的气氛中，我们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党和赫鲁晓夫的身上。赫鲁晓夫力排众议，想要把事情推向前进，尽管他从未触及官僚主义的结构。因为我当时经常去莫斯科，所以同志们一再对我说："你得和苏联同志谈谈，告诉他们，他们的革新政策在这里遭到了破坏！"

事实上，我也设法同他们谈论过此事，尽管他们的反应很谨慎。苏联领导当时不想象斯大林时代那样直接干予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事务。

我们特别关心五十年代的政治审判问题和为受害者恢复名誉问题。大约在 1960 年前后就已经证实，这些审判纯属骗局。大批的人得到了平反，不过都是秘密进行的。

1956 年，我凑巧同阿图尔·隆多在保加利亚的同一所疗养院疗养。隆多是斯兰斯基案件的被告人之一。由于患病，他被释放出狱，但是尚未公开平反。他本来应当去科特达祖尔治病，但是，法国政府没有发给他签证，于是，捷克斯洛伐克党便送他到保加利亚疗养。

此后不久，我问他："据我所知，你出身在一个普通家庭，但是，你在受审时却说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他迟疑了片刻，没有马上回答。"世上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他喃喃自语道。

不过，第二天他告诉我，凡得到平反的人在释放当天必须签署一项声明，保证对所发生的事守口如瓶，否则就要再次被捕。

阿图尔·隆多对我讲述了审判案的情况及其整个来龙去脉，同他后来在《我招认》一书中所描绘的一模一样。我把这一切讲给了我的朋友们听，而他们又根据其他政治犯的"供词"，把他们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我：关于胡萨克、洛埃布尔、哈伊杜、斯姆尔科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他们全部都是老共产党员。党始终还没有勇气公开为他们恢复名誉，讲出昔日所犯错误的真相，这一事实激起了我们的愤慨。我们每个人都曾多次给党的领导写信，反映问题，与此同时，我们遵守有问题必须在党内讨论的党的纪律。尽管我们这样做了，但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

复，得到的只是闪烁其词的搪塞，说什么党不希望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重演，以及诸如此类的花言巧语。

南斯拉夫问题也使我们感到苦恼。我们看到，怀疑、蜕化、内部斗争的时代是随着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开始的。赫鲁晓夫1955年对铁托表示道歉的访问证明，尽管南斯拉夫被孤立达数年之久，它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及铁托在普拉发表的讲话使苏南关系又冷了下来。后来，又缓和了一阵；而在1959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发表以后，关系再次遭到冻结。在党的会议上经常对我们说，对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大家都得留神，尽管党没有公开这样说。我们在想，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虽然对我们说，南斯拉夫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却又否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是说，既非资本主义国家又非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呢？

作为国际学联的主席，我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讨论会。讨论会使我和我的朋友得出结论：南斯拉夫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它持有不同观点。在我们看来，它的那些不同观点往往比我们的更正确，例如关于自治、自由地发表意见、更公开的讨论以及反对各种权力集团的政策等等。

1961年，我同南斯拉夫前学联副主席彼洛·伊瓦契奇就这一问题进行过几次谈话，当时他正担任南通社驻布拉格的记者。我在国际学联工作时，同他就很熟，他是一个很惹人喜欢的人。我企图使他相信，南斯拉夫应当消除各种分歧，回到社会主义阵营来。我们以积极的共产党人的态度进行讨论，既不隐瞒我们的分歧，也不相互威胁。我觉得，同志之间可以进行原则的、然而却是友好的讨论，而不是动辄对别人的意见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这是十分重要的。

阴　谋

我一开始曾经讲过，当我1961年从保加利亚回国后是怎样被传唤到中央委员会去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当时怀疑我参与了修正主义叛徒的阴谋，说这些人同南斯拉夫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并对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审讯。当时，我获悉，三年来我已经作为间谍受到暗中监视。这一天半夜前后我获释了，条件是：禁止探访任何人，禁止同任何人谈话，第二天早上必须把护照送交党的办公室。我神情恍惚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游来荡去。我成了一个阴谋家，我觉得似乎整个世界崩溃了。

尽管他们要我保持绝对缄默，我还是冒险去找了苏联驻国际学联的代表伏洛佳·契列伏伊，他认识我已有多年。

但是，如果警察跟踪我，指控我拿苏联同志当挡箭牌，那该怎么办呢？不过，通知苏联同志乃是我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是我的义务。我走进公共电话间，寻找伏洛佳的电话号码。如果他不愿意和我通话，如果我使他感到为难，因为他同“叛徒”保持着联系，那该怎么办？但是，我已经拨完了电话号码，不一会就听见他那睡意未醒的声音。

“伏洛佳，”我说，“对不起，打扰你了，不过，我无论如何得同你谈一谈。”

“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半夜三更来电话？你今天在哪里？我们在到处找你！国际学联书记处今天开会，大家就等你一个人，而你连假都不请一下。另外，明天我还得去莫斯科，需要你答应过我的那些材料。”

“电话里没法跟你解释清楚，我想同你见一面……。你走之前，我必须跟你谈一谈，以便你能通知莫斯科的同志们。”

“能不能等一个星期？那时我就可以回来了。”

“不行，到那时我也许不是国际学联的主席了，我大概早被判刑了，国际学联内说不定会出现一场风波！”

“喂，你是不是喝醉了？胡扯些什么呀？”

我显得不耐烦了。“我必须立刻跟你谈一谈！我请求你！我坐出租汽车去，十分钟之内到你那里。请下楼给我开门。”

沉默几分钟之后，我听他说：“那好，你来吧！”

半夜一点钟要找一辆出租汽车并非易事，于是，我决定徒步前往。伏洛佳住的地方离党中央大楼和我当时所站的那座桥不远。我一路跑去，心中稍微平静了些。

伏洛佳身穿睡衣，披了件外套，已经在房前等着我。他不安地瞧着我，面带怒色，颇有些不高兴。我们上楼进了他的房间，他为我斟了一大杯伏特加，问道：“究竟出了什么事？”

“伏洛佳，我得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我本来是根本不许说的，因为他们禁止我说。但是，你毕竟是苏联代表，而且象我一样，是一个共产党员。我遇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有人诬陷我是南斯拉夫反党阴谋集团成员。我向你发誓，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向他讲述了那可怕的一天，诬告、审讯、警察跟踪，可能还要进行审判和课以重刑。

“我认识你的那些同志，我认为他们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伏洛佳说道，“但是，也许你们扯得太多了，我也弄不清楚。我对他们了解得太少，不能替他们打保票，况且这又是你们党内的事。不过，他们怎么会把你同南斯拉夫人扯到一起去的？”

“因为我们同伊瓦契奇有来往，此人你是了解的。你也知道，我有时候同他讨论过一些问题；我从未向他泄露过‘党的机密’。总之，我完了！即使事情全部弄清楚了，我也不会再受到以前那样的信任了。”

伏洛佳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我告诉他，从今以后我被禁止出国旅行，而我本来还得去巴西参加巴西学联的代表大会，并且已经通知了我的到达日期。我该怎样取消这次旅行？找个什么借口呢？因为中央已经责令我保持沉默。此外，在这种气氛下我感到无法再进行工作，去考虑奖学金、大学改革等事情，因为我可能就要在精神上被消灭了，即使不是肉体上被消灭的话。

“我只能对书记处说我病了，不得不取消一切旅行。再说，大家只要看到我的脸色就会知道，我完了。”

“真的，”伏洛佳说，“几乎认不出是你了。”

回到家里我寝不安席。真想给谁通个电话，但是，肯定有人在窃听。我对所有的会见反复考虑过上百次。一切都检查过了吗？我沉浮于无底的深渊，孑然一身；我虽然已有一定的阅历，但是，却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第二天九时左右，我接到中央委员会的电话，要我在翌日早晨到那里报到。接待是冷淡的；马穆拉的脸色显得更是阴沉。“贝利康，我们看过你的材料了，材料表明，你没有把事实真相全部告诉我们。现在我把有你的朋友卢克什签字的记录给你看：他承认接受了南斯拉夫人的报酬，为他们提供情报，我们有证据——照片——证明，你的另一个朋友利斯也同南斯拉夫人会过面。”

“既然你们手里拥有照片、记录等其他东西，你们找我究竟想干什么呢？我只能对我最亲近的朋友负责。可以让我同你们所怀疑的人进行对质！”

他勃然大怒。“这可能吗？你有义务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

显然，他们也连夜研究了我和我的朋友们所写的交待材料，因为他们说：“你写道，你没有同伊瓦契奇谈论过我们内部的事

情。这是撒谎！阴谋集团的另一个成员已经向我们供认，你在卢克什的家里曾对南斯拉夫同志如此清楚我们党内的情况表示惊讶。那么说，你曾经感到过惊讶罗？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曾对你说过一些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事？”

“我想起来了。他确实对我讲过中央委员会的一次辩论，而我对这次辩论却一无所知，所以使我感到吃惊。此外，西方报刊也提到了这件内部事。”

他们并没有放松。“恢复名誉的事怎么样了？你曾经去过阿罗木次，会见了陶西戈瓦、海兹拉尔等人……。”

“海兹拉尔！”我叫了起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的主席，再就是1951年他被清除出党中央的时候见过面。十年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不对！你们在阿罗木次一起同给议员兹里雅古斯写信的人碰过头。”

“什么信？我已经跟你们说过，我对此一无所知。”

审讯在严密的监视下继续着，问题一个接一个，整整一天。其他人肯定谈到过我；他们大概讲过：我在这一天见到过贝利康。

马穆拉用犀利的目光盯着我。“你为什么对9月14日在卢克什家里的会见只字不提？”

“你说什么？我再重复一遍，我无法回忆起每次见面的情况，因为我没有做记录。再说，我们彼此经常见面。”

“这就更严重”，马穆拉接着说道，“你把你去外国旅行的结果告诉了你的朋友们，而这些情况本来是只能向党中央委员会汇报的。”

“我也同高级干部讲过这些情况，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我们共产党员究竟应该谈些什么呢？难道光谈足

球？我们一生都在搞政治，而政治不象一般职业，办公时间结束就可了事的。”

马穆拉跳了起来，显得异常激动。“好极了，你们都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我甚至同最亲密的朋友也从不谈政治！我们在一起玩纸牌、叙家常，但是，从不谈政治！”

“难道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吗？”我说，并力图使自己保持镇静。

第二天，他们又放我回家了，审讯延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我继续避免同任何人见面。然而，仍然有人告诉我，卢克什的“供词”是编造的。他已双目失明，他们把一份无关紧要的材料念给他听，而叫他签字的却是另一份。

“如果他们把有他签名的材料拿给你看，你不要相信！”

我松了口气。被他们说成是敌人的这位朋友并没有出卖我。然而，事情的结果仍然可能很糟糕。今天我才明白，最初几天的打击是如此之大，好象他们把我抛进了监狱，用《我招认》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方式在对我进行审讯似的；要是当时对我动了刑罚，我说不定会承认那些我从未犯过的罪行。

后来有一天，委员会办公室的房门突然打开了。中央委员会书记斯拉维克进来对主席说：“我要求中断对贝利康同志的审讯；诺沃提尼同志希望同他谈一谈。跟我来。”

委员会不知所措，迷惑不解。斯拉维克把我带到第一书记诺沃提尼的办公室。他不十分情愿地打量着我，目光冷冰冰的。“瞧你弄成这个样子！”他说。“我对你寄予这么大的信任。你同我共过事，我也对你在国际学联中的任命表示了同意，而你却落到这个地步！”

“诺沃提尼同志，这是误会，”我说（说得相当费劲，因为

我的嗓子发干）。“我相信，委员会的同志们慢慢地会明白，把我同一桩我毫无所知的事情牵连在一起了。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并且会发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你完全清楚，我从未阴谋反对过党。”

“听着，我们发现把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情况捅到国外已有好多年了，特别是到了美国人手里。长期以来，我们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渠道，后来，我们发现原来是通过南斯拉夫人透露出去的。你同他们的关系很好，不是吗？这前前后后的情况一定也同你有关。”

“不过，诺沃提尼同志，我曾经提过好多次意见，因为我作为国际学联的主席，也就是说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在一个国际组织中的负责人，从未被邀请参加过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而且其他代表能够看到的报告我也看不到，总之，对我封锁任何消息。我又怎么会向南斯拉夫同志通风报信呢？”

诺沃提尼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你否认参加过卢克什家里举行的一次会议。”

“不，我只是不知道这次友好的会见是在哪一天举行的。我常常到那儿去，这件事对谁也不隐瞒。”

“你们在这次会议上把我当笑料，讲我的笑话！”

是的，有这么一回事。我们经常说有关诺沃提尼的笑话，藏在屋子里的麦克风大概把模仿他在“五·一”节讲话的腔调录了音。

诺沃提尼怒不可遏。人人都知道，他在主席台上常常发表一些令人可笑的、俗不可耐的即兴讲话（他不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他的演讲稿非得由他人代笔）。例如在肉类供应紧张时，他曾大声宣布说：“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肉一定会有的。亲爱的妇女们，肉会有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共产主义道路上走过了一半的

路程，这就是说，肉和黄油也同样会有的。我听说，孩子们没有胡萝卜吃，我告诉你们，胡萝卜也一定会有的！共和国万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万岁！苏联万岁！”

大家一定可以理解，我们几乎无法忍受一个党的领袖竟会如此笨拙。他使全党丢了脸。

“对，有这回事。不过，你自己一定也知道，诺沃提尼同志，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许多笑话：我如果处在你的地位，是不会生气的，捷克人就是这个样子……。”

“不要再找借口了，你滥用了我对你的信任！”

最后，我对诺沃提尼说，依我看，这起事件可能完全是无中生有，是那些希望制造新的审判案的人捏造出来的。

于是，诺沃提尼向我承认说：“听着，同志们主张逮捕你们，确实想对你们搞一次重大的政治审判。但是，我反对这样做。我们不希望五十年代的局面重演。我要求首先由党组织听取你们的交待，如果证据确凿，然后再交警察局。只有卢克什一人被捕，不过，已经又放了。你们必须对党的最高机关负责。”

停了一会，他又用比较友好的口吻问道：“调查委员会的态度如何？他们向我保证说，对你们没有施加任何压力。”

“事实并非如此”，我说。

我向他讲了被传讯的情况以及受到的审问、监视和威胁。我说，我的护照已被吊销；此外，我为纪念国际学联成立十周年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已经出版，但是没有署我的名字；最后，还有人不等调查结果就在党的会议上把我说成叛徒。

“谁干的蠢事？”诺沃提尼喊道。“相反，我说过，从全局利益考虑，贝利康在尚未撤职以前仍然是国际学联的主席，不过每次出国之前应当得到党的书记处批准。”尽管如此，我的哥哥（当时已是医学院的教授）在布拉格机场还是被扣留达四小时之

久，直至弄清楚并不是我才算作罢。内务部已经向所有边防站通报了我的名字。

为西柏林的解放干杯

我头脑里塞满了这些问题。此外，我还看到，机械地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可以从争取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媾和的运动中看出。运动的起因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一项突如其来的声明，这一声明的动机至今还是个谜——也许这是对毛泽东的压力的回答，当时毛泽东指责他同“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情况总是不断地变化，在整整十五个年头之后，甚至连下台总统尼克松也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而受到了毛的接见！）。

受苏联影响的所有组织无论如何都必须对赫鲁晓夫的讲话给予有效的支持。国际学联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一起匆匆忙忙地在东柏林召开了一次“世界青年与学生代表大会”，以对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媾和的要求表示支持。

这件事情发生在1961年9月，当时我正因所谓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合作”而接受审查。本来根本就不允许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然而，由于这次大会很重要，苏联代表为了保证国际学联的主席也能出席会议，进行了对我有利的干预。我们同国际学联的苏联代表弗拉基米尔·契洛伏伊一起乘坐国际学联的汽车从布拉格直奔东柏林。在同东德交界的边境，我们受到了检查。在正常情况下，这只不过是例行手续而已。但是，这一次我的护照却使边防警察惊恐万状。我们只好下车在哨所等候。三个小时过去了，契洛伏伊越来越不耐烦了，老是问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不好意思向他解释，这次耽搁的原因在于我，因为我完全

明白，警察正在请示布拉格，该不该让贝利康出境。因为自从九月事件以来我的名字已被列入“黑名单”，而这意味着：我不得离开共和国。

布拉格的答复终于来了。我们可以继续前进。我当时的感受，每个人都能想象得到。在东欧各国，成千的人都和我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他们经常会在最后一分钟被扣留在机场或边境，尽管他们各种证件一应俱全。

即使在柏林代表大会期间，我也是心不在焉。我老是惦记着家里的朋友们和我们的“案子”。我脑子里始终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怎么竟会被指控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这一切仅仅是出于偶然呢，还是真象有些人在文章中所说的“革命也要吞噬自己的孩子”？掌权者早已另有所图，而我们这些人仍始终相信社会主义理想，是不是我们太天真了呢？

在这次旅行中，我得到了一个令人可怕的答案。这次国际会议结束时，我同苏联共青团第一书记谢尔盖·巴甫洛夫以及东欧其他各国的干部应邀参加了在东柏林国家人民军大楼举行的招待会。大厅的桌子上摆满了葡萄酒、伏特加和鱼子酱；桌前站着许多东德军官，他们的军服上挂满了勋章、红旗奖章和肩章。他们的外表同国防军①十分相象，这情景几乎使我透不过气来。此外，还有一支军乐队在演奏跳跃性很强的进行曲，祝酒声此起彼伏——都是为光荣的苏联军队和东德军队干杯。

我们站在国家人民军的将军和高级军官中间。人人开怀畅饮，个个谈笑风声。话题主要是围绕着修建柏林墙。东德的干部把修建这座墙看成是对西方的一大军事胜利。军官们不但对他们的成绩感到自豪，而且沾沾自喜地嘲笑那些对整个工程的日期显

① 指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军队。——译者

然一无所知的西方秘密情报机构。他们笑着对我说，美国和英国军官在夜总会里听到这一消息都大吃一惊，动员西方军队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我们大家又喝了许多伏特加。后来，那些东德军官再也掩饰不住他们的失望心情了，对我们抱怨说："那时，我们本来满可以用我们的坦克横扫整个西柏林，这只不过是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决的事，这样一来这个伤疤就不会再使我们感到疼了。但是，苏联人害怕了，他们不允许我们这样干。可惜坐失了良机。不过，我们会另找机会的。这将是我们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贡献。"

他们一再为"解放西柏林"而干杯；我也跟着碰杯，但是同时，一阵恐惧的寒颤掠过心头。这些人会不会有朝一日把我们拖进一场新的战争？

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我先前的那种自信心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已经丧失殆尽。我不得不考虑：斯大林主义是不是现在又卷土重来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难道又被人遗忘了吗？难道这样的历史经验也能简单地被抛弃，也能从人们的记忆中被一笔抹掉吗？难道我们是这种向五十年代的倒退的第一批牺牲者吗？

我带着这些问题回到了布拉格。等着我的是什么，我心里没有底，因为最后决定权在莫斯科。

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会后一切都变了。我们得救了。赫鲁晓夫再次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他还攻击了阿尔巴尼亚，讲了南斯拉夫的好话。直至后来，我们才找到解开这场所谓阴谋活动之迷的钥匙：当时仍然坚持斯大林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尤其是秘密情报机关企图证明，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存在着一个南斯拉夫的阴谋集团，想以此作为对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献礼。但是，诺

沃提尼在抵达莫斯科时，发现风向变了：同南斯拉夫人保持联系如今反倒成了好事。这就是说，再想搞反铁托主义的审判已经不可能了。

赫鲁晓夫的这条路线暂时使我们摆脱了困境。诺沃提尼返回布拉格以后，他们就把这件事情了结了，我们因“缺乏警惕”而受到了纪律处分：我们之中有的人被开除出党，有的人被送往工厂。我本人的情况使我们的领导人感到有点难办。我告诉他们，国际学联代表大会已经推选我为主席，因此他们不能撤我的职。以“缺乏警惕”为理由对我进行了警告处分，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要求：例如，我得另找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担任了两年国际学联的主席，因为苏联同志找过诺沃提尼，对他说：我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但是，党和警察机构里的其他人并没有忘记我：他们在继续努力，以求解除我的职务。

1962年1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坐在一个素不相识的同志身旁。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贝利康同志，最好让我们认识一下，我就是你的继任者。"

我的继任者？没有任何人通知过我。当晚，我就给诺沃提尼写了一封信：难道这是惩罚措施吗？党是否仍然认为我是有罪的？我请求给予明确的答复。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大约七时光景，我屋里的电话铃响了："诺沃提尼同志希望同你谈一谈。"我心想，也许是在开玩笑吧。可是，不。

"你的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叫道。"我对所有这些无休止的争吵一无所知。我将派人进行调查。我请你不要对苏联同志谈这件事！"

我后来得知，诺沃提尼在党的书记处内掀起了一场风波，但是，我始终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得到了平反。我并不知道，赫鲁

晓夫当时对诺沃提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纠正政治审判案，给受害者恢复名誉。同样地，我也并不知道诺沃提尼一再试图拖延平反工作。

一阵新风

在这种压力下，组成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科尔德尔为首的捷共中央调查委员会，对五十年代的政治审判案进行调查，并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报告。1963年4月，这个相当富有爆炸性的报告①确实提出来了，报告指出，苏联顾问应对反犹太主义负责，一些政治领导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秘密警察应对政治审判案这一大骗局和进行逼供承担罪责。当然，报告闭口不谈诺沃提尼的个人责任；不允许报告的作者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对这一可悲的司法丑剧的根源进行揭露。因此，报告作者便设法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斯大林、贝利亚以及当时已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几个捷克斯洛伐克前领导人身上。

这虽然不尽令人满意，但毕竟是前进了一步。这确实是一阵新风。我们不仅在报刊上、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而且在党的正式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文章中感觉到了这阵新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63年乃是“布拉格之春”的一个前奏；尽管这个时期只延续了两、三个月之久，然而，却是在谴责政治审判案、谴责那些使社会主义遭到歪曲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革新的一种尝试。

有一天，我被叫到中央委员会。齐萨日书记向我宣布，明天将任命我为电视台台长。“党需要能够向公众说明这条新的开放

① 见伊·贝利康：《病态的司法》，1972年维也纳（欧洲出版社）出版。

路线的有远见的人。”

“人们始终还在怀疑我，甚至至今尚未对我的公开指控进行昭雪，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出任电视台台长呢？请给我一些时间考虑，”我说。

“为了你自己，也为了其他人，我建议你接受这一任命。你在电视屏幕上的出现将意味着，所有迄今尚未恢复名誉的人都即将得到平反。但是，特别不要去要求党作自我批评：这样就走得太远了。”他又补充道：“诺沃提尼同志说过，必须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大门‘稍微打开些’。我们将来要取消岗哨；所有人都能到这里来谈问题。我们将采取一条新的路线，而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因为你一不是官僚，二不是搞宗派的干部。我们会对你的工作给予帮助的。”

我征询了我的那些被开除出党的朋友们的意见以后，接受了这一任命。他们认为这不仅仅关系到我个人的任命，这意味着，党终于开始奉行一条看来是赫鲁晓夫所期望的新的民主化路线。为了我们的斗争，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他们说。

我不得不同国际学联告别，偏巧又是在阿尔及利亚：对我们来说，这个国家多年以来已经成为同殖民主义进行决战的象征。从阿尔及尔回来以后，我便专心致力于电视台的各种问题了。

对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关于向外界打开党的大门和给社会主义恢复名誉的诺言，我是认真看待的，所以我为自己规定了三项主要任务：

1. 电视台应当成为体现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理想工具，保证国家领导与公民之间的经常对话。

2. 电视台应当反映社会现实，形象地介绍社会发展的情况。

3. 电视台应当在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上作出重大贡献。

党的机器

我很快就明白，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我当时低估了某些人的影响，这些人在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审判案期间曾经担任秘密警察的头头、法官或在法院和党的机关里当干部，他们因告发自己的朋友和同志而得以发迹。这些人不是参与了审理和判决，就是直接取代了那些被判了刑和被开除出党的人的职位，为此，他们曾获得了党和国家授予的奖章和勋章。我起初以为，只要罢免了那些最危险的负责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或内务部成员——，我国的政治生活就可以健全了。此外，这种解决办法可以使诺沃提尼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并且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可是，怎样才能清除那些隐姓埋名的人呢？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里，秘密警察机构不仅拥有成千的工作人员和军官，而且还有几十万通风报信的人，他们通过某种方式同警察保持着联系。这些人有时候并无报酬，所得到的仅仅是保护以及在他们的本职工作中受到"提拔"。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害怕一旦清洗，他们的巧妙伪装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西方各国往往低估了"社会主义"各国实行自由化的种种障碍。有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领导决定给公众一定程度的自由。然而，即使这种计划被采纳了，领导也不得不把它交由几十年来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形成的、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党的机器来加以实施。我们不应该忘记，即使领导人员因宫庭政变或年老而进行了更换，但在多数情况下，这架机器的变化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成了政局的真正主宰。任何一项改革计划的命运均取决于这架机器：它不是促进"新思想"的发展，就是一个劲地设法

向党的领导证明，这种“新思想”是歪门邪道，从而将其置于死地。

在西方，甚至在一些专家中间，对于这架机器究竟是如何运转的，也只有一些十分模糊的概念。而事实上，这架机器是权力的真正的中心，是权力的骨骼和神经系统。

我已经说过，东欧各国所有大小问题都是由共产党越过老百姓决定的。当然，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不可能处理每个具体问题，因此有一套名册，即一份清单，其中明确规定，哪一级党的机构可以处理和决定哪些问题。它相当严格地规定了各种权限：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由工厂或者地方组织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应由县委会或州委会处理，以及什么样的问题属于中央委员会的权限。

从理论上说来，在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机构。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机构，它的任务是批准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处或总书记的决定。自从斯大林主义时代以来，甚至连党代表大会——它本来是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和选举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最高论坛——，也已沦为演给公众看的地地道道的闹剧。党代表大会永远是同意总书记的报告的，然后，一致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选出最重要的机构——政治局和书记处。但是，就连这种选举也是走走形式而已，因为大多数人事变动是在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在这架机器内部决定的。

当然，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也进行讨论，甚至还有一些工人发言，但是这类讨论的内容大都是党的——即机器的——各项方针在各个部门或工厂里的贯彻情况。这些“讨论”对决定和决议不会产生丝毫影响。决定和决议是由这架机器事先拟就的，措辞很一般，以便留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再由机器自己作出决策。

因此，那些在党的机器内部没有职位的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根本谈不上对党的实际政策有任何影响。

唯一重要的机构是党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主席团）和党中央书记处，不过，它们并不是由基层选举的，而是由始终对这架机器的种种建议表示认可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决定一切问题，然后再拿到议会或政府中讨论；政治局任命一切要职：如各部部长（包括非共产党员部长），工会、青年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电视台、电台和报纸的领导人员以及大使等。没有政治局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在这个国家里担任重要职务。前面提到的名册同样明确规定，哪些职务应由党员担任，哪些职务——只有少数几个——也可由非党员担任。

此外，政治局还决定经济计划、一切重要投资和有关外贸、外交的各种问题，以及诸如布拉格地下铁道的线路、重要的首演仪式或招待会的出席者名单、党的干部出国旅行、中央委员的休假等问题，甚至还有是否可以播放布拉格和维也纳两个城市之间进行对话的电视广播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要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定出组织落实的具体措施。

实际上，这种制度意味着，政府、议会和其他国家机构没有丝毫的职权和自主权。它们的唯一任务是在日常工作中落实这架机器的路线。例如，如果一个共产党议员在议会委员会中想要修改某项法律草案，那他就要冒受党的纪律处分的风险。因为这个草案已经政治局事先通过，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一决定对所有党员都是具有约束力的。作为议员，我们曾多次向党的领导指出这种做法是荒谬的，并且至少已经做到使政治局只规定法律的基调。这样，我们总算能够自己对具体如何措辞施加影响了。

当然，政治局的十二名或十五名成员不可能真正过问一切有关事件。但这个机构在每周的例会上总要解决三十至五十个问

题，如果有一项是“其他”，那么还不止这些。关于每一个问题，总有一大堆材料，先是“一小段”提要和处理意见，接着是十二至二十页详细说明，最后还有经常是长达五十至二百页的参考材料。按理说，每个政治局委员参加一次这样的会议需要研究上千页的重要材料，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通常只是读一读已经归纳成若干要点的处理意见，余下的材料均由他们的私人秘书处理，由秘书把最重要的地方划上条条杠杠再交给他们。

在讨论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曾经多次出席这种政治局会议。这种场面是令人沮丧的：十二个人围坐桌边，决定着一切，至于他们是否对事情已有所了解，是否都看过材料，那是无关紧要的。有时候，专家小组对一个问题研究了数日之久，而一旦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五分钟之内就了结了，而且报告的作者的意见常常遭到反对，因为，不是总书记情绪欠佳，就是政治局全体成员要出席招待会而草草收场。

讨论几乎总是十分短暂，因为大家都知道，总书记对全部材料和建议事先都已作了审核。他对每一个议题都要讲几句，他批评其他政治局委员缺乏监督和主动精神，要求他们作自我批评（而不是辩解）。他还草拟决议，由他的秘书主任记录在案。不过，当政治局委员们数日之后拿到会议记录时，常常会惊讶地发现，总书记对一系列问题又有了新的提法。

在这种制度下，替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准备材料乃是最重要的一环。由有关部门负责干部（在我的部门就是电视台台长）首先提出建议。在这以前，他已经从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人那里得到各种指示，然后再由主管部门对这个干部的报告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如果报告起草人不同意这些修改意见，那么，这份材料又要被封锁，或者中央部门附上一份反对意见，而大多数情

况下，这意味着，报告起草人将受到严厉批评，意味着他的报告会被视为“不能令人满意”而从书记处或政治局退回来。在处理高级职务的人事安排建议时，中央机构还要求保安机关提供有关候选人的材料。总之，通过这种程序，事实已被弄得面目全非，以至党的最高机关得到的永远是一幅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的图象。即使某个干部开始时还决心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然而，由于这种做法，他的决心不久也就动摇了，最后，他就完全照这架机器所提出的要求办理了。

这种做法是干部和党员中产生千篇一律和机会主义的根源。在这架机器中，只有那些不发表个人意见、对领导唱赞歌、唯领导之命是从的人才能飞黄腾达。老百姓在想些什么和需要什么，这些干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他们关心的只是，这架机器和总书记在想些什么和需要什么。替老百姓说话只会给干部自己招来危险，而俯首贴耳，遵守纪律，无条件地忠于党的最高领导却是在党内飞黄腾达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我经常看到，这种倾向在西方国家某些共产党的机构内也同样存在。

在党的各级组织里，从州委会到县委会直至基层组织，同样也是采用这种模式，而党的基层组织可以说是党的机器同外界仍保持着联系的唯一的一级组织。

使领导人了解人民的意见所采用的制度也是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大不相同的。西方各国政府——尽管有若干缺陷——可以通过新闻界的各种意见、反对党的反应、民意测验的结果和其他接触对总的政治气候作出判断。然而，一个排除了政治对手、独立工会以及新闻自由的一党制的领导却连这些途径都没有。领导人只能通过他们自己建立的这架机器——各级党的机构、内务部及其秘密警察机构——来了解人民的普遍情绪，而这些机构对领导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

除了这种官僚机构外，还有一些居民阶层同这个制度有着直接联系，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上述变革。这里，不仅包括保守派，而且，还有无产阶级出身的工厂厂长这类人。党在1948年接管政权、摧毁了旧机器后，把成千的工人——他们都是积极的共产党员——安排在某些岗位上，而这种安排往往是不符合他们本人意愿的。于是，不得不长时间地做说服工作，要求他们遵守党的纪律，答应给他们各种帮助，并说明这是临时性的工作，保证以后调回工厂。事实上，他们在这种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年或十年，有些人成了出色的厂长，然而有些人却难以胜任他们的重要任务。一开始，他们在政治上起着监督作用，防止破坏，维护纪律。但是，随着政权的巩固，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要利用新工艺和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发展生产。于是，这些人要想方设法来完成他们的任务。有时，他们一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便及时了解情况；大多数人感到，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对委托给他们的工厂进行有条不紊的领导了。同样，他们也不能再有别的什么指望，而又使自己不受损失。他们已脱离本行工作十年或十五年之久，原来的手艺已经荒疏。作为一个普通工人重返工厂，意味着是很大的降级。那些重操旧业的人常常受到老伙伴的奚落："我说，你如今在哪儿？党象挤柠檬汁似的把你榨取完了，现在又把你给扔了。而你再也不能象我们一样挣钱糊口了。"

后来，在开始讨论经济管理的改革时，他们害怕遭到冷遇，于是，倒向了保守派一边。他们还同从前的游击队员、抵抗运动战士和政治犯们抱成一团，这些人在武装斗争中曾经作出过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是不善于作政治斗争，而且念念不忘革命初期那种可以进行发号施令、任意捕人和用不容置辩的口号来解决一切困难的日子。许多人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担任着与自己的思想品质极不相称的职务。于是，那种惧怕变革的心理自然就使他们成了

所有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潜在的同盟者。

还必须看到（西方往往无视这一点），这批由一根根无形的线互相连结在一起的保守派，还同莫斯科的领导集团——不仅同第一书记或主席团，而且还同党的机器和苏联秘密警察中的某些派别——保持着联系。因此，他们在必要时可以动员整个保守派“国际”来施加压力。1963年，当诺沃提尼试图实行“开放”时，我们发觉在莫斯科已经开始出现有关布拉格所发生的事情的种种传闻。因为诺沃提尼从莫斯科得到了某些经过歪曲的情报，这些情报警告说有人阴谋反对他，并且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揭露和粉碎这个阴谋。

1968年的事态表明，这种保守派“国际”的活动造成了什么样的可悲的后果。

检 查 员

我在电视台的第一项任务是对某些遭到我的前任禁播的节目和电视剧本作出决定。于是，我得以首次领教，检查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因为禁止这些节目播出，与其说是由我的前任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机关内部的检查员决定的。党的领导人始终公开否认存在这样一种检查。事实上，这种检查巧妙地掩藏在一个配合得十分默契的齿轮转动系统中。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在苏联，这一检查机构的名称叫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系统变得更臻完善了。

新闻检查的领导机构设在内务部：这是一个中心，其任务是对电台、电视台、电影和广告以至对婚丧嫁娶等公告实行检查。它在保护国家利益和机密以及保护党的和其他种种利益的借口下，检查所有报刊，从发行量为数百万份的中央机关报刊到印数

只有五千份的园艺爱好者协会的报道，直至印数不过区区五百份的厂报。一切都必须呈报内务部的代表，只有在他同意和签发后，才能付印或寄发。在电台和电视台每天播送的成百个节目中，任何一个——从儿童节目直至体育运动的实况转播——都要经过检查。什么都逃脱不了这一庞大的、无所不在的机构的监视。在电视台的每一个部门里，在每一个编辑室里，都有一两个人负责检查工作，任何稿件必须经他们过目。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一来在发生争论时记者们就可以“没有责任”了。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检查员如果在送审稿中发现他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句子或段落，那末，他不仅仅是大笔一挥删去了事，而且还把它记录在案送交上级，然后再由上级转呈每天给党的领导和政治局委员呈送秘密报告的总部。记录中所写的是：“这个节目里某句话是某某人写的；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发现了某某作家的某段话；康德拉这本小说里的某一章不可取；这个结婚广告措词可疑，那首诗含沙射影”等等。

然而，这还不算。一旦党的干部们发现电台或电视台居然有人斗胆写“这种东西”——即使它们根本没有播出——，便会勃然大怒，把台长或总编辑叫到中央委员会去，要他们作出详细的解释。“你们用了这么多的自由派或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怎么搞的？你们的编辑怎么会写出如此荒唐的句子？难道你们对自己的部门失去控制了吗？”

于是，在编辑中出现了一种类似自我检查的做法，结果在编辑同坐镇编辑部或守在隔壁办公室里的检查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编辑向检查员征询意见：“同志，你看如何？能不能通得过？”

检查员可以否定一篇文章。不过，如果对一个电视剧本有疑问，检查员就需要同总编辑交换意见。出现分歧时，检查员和总

编辑则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汇报。我经常从我的同事处听到这样的话："台长同志，我认为这个节目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新闻检查大员却认为不行。"

在我们这里有各种类型的检查员：一类是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他们因为跟政治审判案有关，在该案平反以后从警察队伍转业出来的；另一类人都是前部队军官；第三类人（受过专门训练，属于危险人物）以前曾在电影、电视或广播界抱有野心，但是由于才不出众而被淘汰出去了，如今，他们通过后门，又以检查员的身份钻了进来。由于他们对成绩斐然的同事怀有宿怨，致使工作难以开展。这些人还纠集在一起组成形形色色的耍弄阴谋的小集团和宗派。

这些检查员经常同我们一起在食堂进餐。他们同编辑之间有时甚至也会形成一种友好的关系。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会为一个大胆的节目讲话："要留神，"他说，"不过，我希望能通得过。"

检查员有他们自己的指示，而且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指示，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有时，我们往往会因报道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如事故和罪行等）而组织的"大会战"中搞得精疲力竭。例如，我们被严格禁止向公众发布有关捷克领土上有一架飞机坠毁的消息，因为这是国家机密。如果坠毁的是一架军用飞机或者是一架苏联飞机，那末政府经常在两天之后才允许我们报道，有时，根本就不报道。这种制度十分荒唐，因为这类事故在维也纳或慕尼黑马上就知道了，而且奥地利或西德的电台和电视台也立刻予以报道。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我们对中央委员会不知提过多少次。如果奥地利或西德的电视台所提供的有关我国国内情况的消息比我们自己的更好，那么，老百姓还会相信我们吗？事实上，我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收看奥地利和西德的电视节目，

而且对政治消息更感兴趣。

不可能的对话

我初次试图在国内的领导人和公民之间建立对话。我在电视台的第一个行动是向党提出搞一套直播节目，题目是“公民和部长”。

这套节目是参照西方的一些节目编排的：邀请部长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开始时，我甚至想把这种讨论直接安排在普通的群众场合，例如安排在工厂或农业合作社里。但是，政治局决定安排在演播室里，记者要经过挑选。

那时是1963年，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甚至连剧场演出都是直接播出的，因为当时我们缺少必要的外汇购买磁带录象技术（另外，该技术属于“战略物资”，西方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电视台台长最大的梦魇就是节目只能搞直播；我必须守在电视屏幕前，注意观看全部节目，每每直至深夜。因为万一有人第二天对我提出批评，问起我前一天某个节目的细节时，我必须什么都能答得上来。然而，虽说直播要冒很大风险，但是，由于它要求事先把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却也造成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紧张心理；那时候，我们的节目，特别是戏剧节目比后来的要精采得多。

如何才能组织好同部长们进行讨论的节目呢？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位提出了参加讨论的条件：我们必须事先把要提的问题告诉他，在演播室不能即兴提问。记者们提出反对，我也不赞成，但是，为了使这一节目不至于流产，我说服记者们接受这个条件。于是他们把问题寄给部长，然而，等到这位部长驾到时，我

们吃惊地发现，三分之二的问题都被删去了。他的秘书分发给记者的完全是部长自己拟定的新问题。

走廊里群情激动。转播终于开始了。部长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是，在摄象机前仍然显得很不自在。这些人习惯于在幕后发号施令，不向人民汇报他们的工作。他不会即兴讲话，因为他在会议上宣读的报告都是由助手们代笔的。我们对他解释说，最好不用稿子，放开来讲，这样效果较好，而且更具有说服力。一切都白费唇舌。他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讲稿，稿子上写着事先准备好的答案。首次播出后的第二天早晨，出现了一场轩然大波。党政要人们看了部长照本宣科的场面，得出结论说，这给观众造成一种似乎部长不会回答问题的印象，有损于政府的威信。部长竭力为自己开脱，说这是电视台的人的过错，他们想叫他上圈套。

“我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在走廊上一再重复道，“为了确有把握能够正确地体现党的路线，我不能不字斟句酌。”

这个节目就这样继续办下去：第二次稍好些，第三次更差。在重重困难下，我们共进行了六次转播。根据民意测验，观众普遍认为，部长们的回答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使他们感到十分高兴的是，见到了——往往是第一次——他们的部长。然而，有些干部却开始对这些节目提出批评，因为据说这些节目有损于国家的威望。

事实上，有些同志悄悄地跟我说，让政府成员在电视屏幕上亮相，这是我使政府出丑的最好办法。这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客观效果确是如此。观众是这样理解的，党的领导同样也是这样理解的。

后来，在政治局进行了一场大辩论。部长们齐声诉苦说：节目没有达到目的，记者们不仅没有帮助他们，反而企图出他们的

洋相。唯一的结果是，老百姓不但没有更好地理解党的政策，相反，却越来越表示怀疑。最后，决定停止播放这个节目，我也受到了第一次警告处分。

意识形态的颠覆活动

不久，我又遇到了一次痛苦的经历。奥地利电视台台长、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齐尔克来访并同我谈到他在奥地利组织的“城市对话”节目：两个城市共同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探讨。为什么不可以搞一次同布拉格的对话？他力图说服我同意。

“奥地利人民党声称，你们这里还始终存在着斯大林主义。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些情况显然正在发生变化。让大家看看这一点，将是很有意义的。另一方面，你们对今天的奥地利的了解过于片面。为什么不可以搞一次关于我们两国关系的讨论呢？”

我原则上表示同意。党内当时是如何研究的，我现在也仍然不很清楚。但是，政治局后来通知我，同意我的建议，不过需要采取若干预防措施。两国记者共同筹备这次电视广播。由于第一次讨论会在布拉格举行，所以我挑选了二十五位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士；奥地利方面同样也这样做了。我国的大多数代表，或者是党员，或者是我们信得过的人；奥地利则是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多元小组。

节目上了电视屏幕。这可是一件重大“新闻”，捷克斯洛伐克的观众凝神屏息地注视着荧光屏，因为他们第一次听到了批评的声音。我们发现，大家并不是相互见面就一定要激烈争吵的，奥地利人对捷克的电影和戏剧评价很高，捷克斯洛伐克虽然在经济上有某些困难尚待克服，然而奥地利的文化生活却要贫乏得

多。一句话，我们认为有许多东西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而且必须在各个领域里继续发展这种合作。因为赫鲁晓夫的路线也是朝着这个方向的，所以我对自己说，一切都很顺利。

然而，诺沃提尼一回到布拉格（他当时正在旅行，没有看到这次节目），中央委员会书记就把我叫去了。他显得忧心忡忡。“我的印象是，你刚才闯下了大祸——而且是一个政治性问题。遗憾的是，我们大家都要对此负责。对你的节目的反应非常强烈，此外，还对节目的形式提出了批评。我不是亲口跟你说过，某些事情需要留神吗？如今，我们收到了各个党组织的大量抗议信，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

我告诉他，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至今没有任何人对这次节目提出过顾虑或批评，“直接”播出总是会有点风险的。

“下次……”

“不会再有下次了”，他说，“甚至你的台长职务也可能保不住。诺沃提尼同志十分恼火。”

“诺沃提尼同志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节目！”

“他得到了消息。他看了内务部给他的报告后，大发脾气。总之，你必须立刻给政治局写一份报告。”

“好，我可以写报告，尽管我认为这是多余的，因为毕竟每个人都看过这个节目。我要列举它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特别是，这个节目是如何有利于我国的共处政策和意识形态上不妥协的方针的。”

我写了报告，并且摘引了一些来信作为补充，它们都是我们的民意测验部门每天收到的人民来信：90%的来信认为这个节目具有积极意义。“这是一条正确的途径，继续这样干下去”，观众在信中写道。

我被召到诺沃提尼那里，他对我说："这意味着，给你们写信的都是反动分子。我的办公室里有一份民意调查，它证明，大多数人是反对的。"

"我感到奇怪"，我说，"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民意调查的信件？"

"不行。请你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个要求。这是一次相当严肃的调查。"他补充道："你的节目是射向党的一支暗箭。"

我跳了起来，说，"我并不是自己挑选这个角色的。有人告诉我说，我可以根据你的创议奉行这样的政策。如果你放弃这种政策，那么我就让位，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无法进行工作，这一切对我来说也就毫无意义了。"

"我们大家各有各的困难，譬如我吧，就在苏联同志那里遇到麻烦。我们走得太远了。他们把我请到莫斯科，对我提出了警告。帝国主义者的战略中包括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意识形态的进攻，因此，我们必须修正四月份的看法。"

尽管如此，诺沃提尼认为，我们总的方针继续有效，而且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电视台。"我的夫人经常看电视。她告诉我，你的节目很有意思。"

领导人的夫人是我们最大的危险。如果她们的丈夫参加会议去了，她们就坐着欣赏电视，回头再同丈夫通气。我曾多次受到中央委员会领导人这样的训斥："我本人虽然没有看过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节目，但是，我的夫人、我的司机……。"

在诺沃提尼那里，结果是无罪开释。我告诉他，我已经答应在奥地利境内转播同维也纳对话这个节目的第二部分。"好吧，但要注意。要把我们的观点讲透！不要被人家搞意识形态的颠覆活动！"

操纵德国战犯

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对于联邦共和国拖延惩处战犯和对他们从轻发落，都持有相当的保留。我们从我国政治家那里听说并从报纸上看到的是，杀害或折磨过千千万万人的前纳粹分子，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还在联邦共和国内担任了公职，对此我们感到很气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在战争中失去的母亲以及许多朋友和同志。我并没有复仇欲，也不想对德国人民进行集体审判，然而感到必须对真正的罪人加以惩罚，为的是永远不让这种罪行重演。唯有如此，才能结束过去。

当我得知全部真相后，使我感到更加失望了。一个和我同过牢房而如今在保安部门工作的朋友，带着讽刺的口吻对我说："你不妨问问议会，我国政府是否真正把有关联邦共和国境内战犯的文件全部转给了波恩？""我为什么要提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呢？"我回答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愚蠢的并不是这个提问，而是我们自己疯了，所以会受骗。政府在玩弄我们的感情。"

在我一再催问下，他向我讲述了他因工作关系所知道的全部情况。有关纳粹罪行的文件并未交给波恩，而是由保安机关作了仔细的审查。如果特工人员发现某个战犯向当局隐瞒了自己的历史，而他目前在联邦共和国担任的职务正是他们感兴趣的，那么，他们便派出"代表"找上门去，向他出示有关他的罪行的材料，并暗示，一旦材料公诸于世或转交检察院，将会给他的职业和个人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样，他就落入了圈套：他要末向当局自首，要末同布拉格内务部的代表谈判，为了使这些材料不再外传，他应当付出什么代价。接着就告诉他，捷克警察对于

他的不愉快的处境十分理解，假如他反过来也作出某种理解的表示，答应做一些“小事”的话。如果他表示同意，那么一开始确实只叫他做些区区小事：提供一些有关他的工作范围内的、他本人不认为是机密的情况，使他比较容易克服开始时的畏惧心理。随后，交给他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也越来越危险了。但是，他却再也无法脱身了，因为他同外国情报机关的合作已经构成犯罪行为。我的朋友最后说，“就这样，我们不仅使联邦共和国的大批战犯免遭惩罚，而且还使他们变成了我们的同盟者。”

这番介绍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我甚至都不敢相信。我想，我的朋友大概是由于职业关系而堕入了“间谍活动的幻觉”，说得太玄了。于是，我企图从高级干部那里了解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情况，然而，他们或是确实一无所知，或是三缄其口。

关于对战犯进行政治操纵一事，后来我在电视台工作时也有过亲身经历。有一天，青年节目的负责人不安地找到我说，电视连续剧《好奇的摄影机》的记者在波希米亚森林中拍片时，发现池塘里有一只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文件的箱子，内务部的同志现正准备把它从烂泥塘中打捞上来。不过在验明箱子里的东西之前，不允许我们谈论此事。等到验明以后我们才能会同内务部把这些文件作为电视台的特别节目播放。

当然，我也问了他，他们怎么偏偏会跑到这个池塘那里去的？内务部的特工人员究竟是打哪儿突然冒出来的？他认为这些都是巧合，不过，他不想对此再多说什么，因为这涉及一件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国家机密。这一切听起来使人感到事出蹊跷、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哪一个新闻记者会对揭露这样一则轰动国际的新闻不感兴趣呢？

于是，“黑湖”行动开始了。内务部的专家们打捞起装有重

要文件的箱子，这只箱子据称是纳粹于战争结束时投入水里的。内务部长（现任政府首脑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在我们电视台的演播室内亲自主持了一个众所瞩目的记者招待会，还特别邀请了许多外国记者参加。他宣读了其中若干文件，同时暗示，还发现了许多其他文件，不过尚需保密。他想借此宣布，捷克斯洛伐克拥有关于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们的丑事的材料，而且一些文件还用高价卖给西德各家杂志。

在苏联入侵之后，我才正式得知，这全部伎俩乃是公安机关耍的花招。

伪造文件的特别部门的前领导人拉迪斯拉夫·皮特曼博士在1968年8月2日以后逃到了另一边，后来在一本书中揭露了“黑湖”行动的全部细节。事实上，是秘密警察把这只箱子扔进了湖里，事后又悄悄地把我们的记者引到那里。他们把真假文件混在一起装入箱内，目的是要对某些事先确定的人进行陷害。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人民要求惩办战犯的正当要求就是这样被用来进行政治操纵的。

后来，我自己也同伪造文件的部门亲自打过交道。这些专家伪造了好些据称是我写给国内和流亡在国外的朋友的信件，还伪造了出席法国社会党人关于捷克局势的讨论会的请柬和《通讯》杂志（“Listy”）编辑部的贺年片等东西。为了从思想上对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进行瓦解，这个部门编造了他的那些流亡国外的同志的所谓来信，信中不乏贬抑侮辱之词。然后，这些邮件又“十分偶然地”落到了杜布切克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朋友手中，该部门指望这些朋友会把伪造的信件给他看，这样一来，杜布切克便会感到，他的同志背叛并抛弃了他。象大多数这类企图一样，这种伎俩也同样失败了。不过，这种诡计有时确实也引起了恐惧和混乱。

分等级的消息

东欧各国领导人对人对事的看法是怎么形成的？西方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因为这些领导人很少有机会同老百姓直接接触。中央委员会的某一位书记或第一书记有时也去工厂参观，同工人交谈，不过，特工人员要比他们先行一步，对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都作好了准备，把会场的气氛搞得庄严肃穆，使大家不敢提出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在党的会议上，领导人所念的讲话稿一般都是由助手们写好的。

政府的情报来源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系统：每天由检查机关向政治局委员——而且仅仅向他们——呈送特别简报，介绍各宣传机关出版物的内容摘要。这些情况都是由遍布各地的情报人员收集的。此外，内务部长天天收到有关民情的消息，然后再由他每天早晨向党的领导呈送报告。报告的种类五花八门：一类属于绝密，仅供领导人参阅；另一类的对象是中央委员；第三类是供党的某些干部的。因此，甚至在党内也明显地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报等级。据我回忆，约有十来种不同的简报，所用纸张的颜色各不相同，每每视收件者的职务而定。最上层的是政治局委员，然后是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党员议员，最后是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党的积极分子、军队等，这是党内的一种颜色等级制。

如果一个有权阅读第三等级蓝色简报的人有一天得到的是供一般干部看的白色简报，那么，他顿时会神经紧张起来，因为这表明，降级的乌云正在袭来，至于真正原因，他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颜色变换了，级别也就变动了；他连降数级，就必须从头开始，竭尽全力，以求获得原先的或是“更高一级”的颜色。这样，在官僚机器内部和党内就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机会主

义的倾向。每一个干部都必须处处留神，如果他发表了与第一书记或者他的顶头上司相反的意见，那么，这就意味着危险，甚至往往会葬送他的前程。人们并不指望他说老实话或者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只要求他对官方的路线表示支持。如果有朝一日一个尚未完全变得玩世不恭的干部想要在党的会议上表示对领导的路线有怀疑，那么，他事先必须考虑到这样做必然会给自己的妻儿以及大大小小的特权带来风险。要是他同妻子商量，那她一定会极力加以劝阻，因为她完全明白，一旦她的丈夫在党的上层失去了地位，她这一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必须搬家，丈夫得去工厂干活，物质上遭受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周围人的冷眼。机关里的同事再也不愿意同失宠者有任何联系，而旧时的朋友把他看做是一个失败了的野心家。

在苏联入侵之后，有一则笑话把布拉格的这种气氛描绘得淋漓尽致：

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审查一个党员对路线是否忠诚。主席问他："同志，你对党的领导的政策有什么看法？"

"关于我国领导的政策，我的看法同《红色权利报》（党中央机关报）完全一致。"

"你对苏军1968年8月兄弟般的援助有什么想法？"

"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红色权利报》的观点。"

主席火了，"我们不是问你《红色权利报》写了什么，而是问你个人的看法。难道你对这些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

"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受审者平静地回答说。"不过，我根本不同意这种看法。"

在党的等级制度中，简报颜色的变换并不是降级的唯一的后果。降级还意味着工资减少了，汽车小了，住房窄了，意味着不能去苏联度假，而只能在国内。这种制度紧紧地抓住了所有曾经

怀着崇高的理想踏上工作岗位的人，直至他们所最关心的事已不再是现实问题，而是上级对他们的一言一行的反应。一旦他们的意见不再符合上面的意图，那么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同行的干部疗养权利也就随之告吹。最终，问题甚至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哪怕是最坚定的人也会变成机会主义者和这种制度的俘虏。

此外，政治警察拆阅和复制私人信件来搜集情报，有时是有计划的，有时则完全是心血来潮。在发生某些事件期间（例如同南斯拉夫关系紧张时、朝鲜战争、物价上涨、政治审判案等），党曾密令拆阅所有信件，以期了解老百姓相互间在讲些什么。因此，警察的报告具有一定的真实内容，但是，也存在着情报人员（通常是老斯大林分子）进行歪曲的危险。譬如，有一个人在电车里批评了某一次广播节目或电视节目，密探却告密说："整辆电车在批评……。"随后，这份情报又由军官送交他的上级，上级根据自己的看法进行若干修改以后再转给写简报的人，而这个人便可以据此左右党的领导，因为他可以写上："公众对该节目表示愤怒。"那位没有看过这个节目的党的第一书记见到简报后，自然相信自己的警察，于是便得出结论。正是这种程序使得各级警察机构能够使领导面对既成事实。我们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苏联领导作出的决定有时同理智和正常的政治判断完全背道而驰。究其原由，是因为他们所得到的材料常常是经过歪曲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由警察和党的机构的情报人员一手策划的政治大阴谋，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活动有朝一日甚至可能损害国家间的关系。这架官僚机器是如此的强大，以致它能在一定的时刻起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还利用"监听"。这是一种监视全世界各地广播电台——特别是"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广播，"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

的收听系统。对于一般听众来讲，这些电台都受到干扰。1968年我们曾经计算过，我们的干扰台耗资之巨足可以建造一个包括彩色电视在内的电视中心和扩建全套技术设备。但是，当时却称上述两个项目“缺乏资金”。这些干扰台至今仍然存在，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即使在工厂由于电力供应紧张而开工不足时，仍照常一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

一方面对老百姓收听广播进行干扰，另一方面窃听台又录下国外广播电台的所有节目。每天清晨，第一书记收到一大本“监听”记录，上面有维也纳、慕尼黑、伦敦等地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提要，并附有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章摘录。“监听”记录有时长达二百页，由于领导人没有时间看，便转交专职秘书，由秘书从提要中再摘出提要。这个过程也是有隙可乘的。举例来说，假如官僚机构想中伤某人，那么就可以在报告中加进诸如“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对这个人或另外一个人十分赞赏等等的话。在诺沃提尼看来，这就成了这个人背叛的证据和发动进攻的信号。

孩子替父母受过

我曾有过这样的亲身体会：一次诚实的广播甚至可能严重到被看作一场党内的政变。我们在“摄象调查”的连续节目里介绍了大学招生的情况。相当一个时期，大学之门是对小资产阶级子弟关闭的。后来，党改变了态度，认为经过十五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学之门可以重新向他们开放，因为他们的父母在这期间已经被“安排进”工厂，因此，已经同社会主义社会融为一体。我们应当为宣传党的这条路线作出贡献。为此，我们的电视摄影组选择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波希米亚北部的一个小城——奥利策河畔的乌斯季。

他们找到一个年轻姑娘。她的父亲原来拥有一个小小的印刷厂，现在已成为一家大轮胎厂的工人。她以出色的成绩通过了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后来突然又把她从录取的名单上除了名，代之以当地一名党的干部的儿子。姑娘的父亲给部里写了一封抗议信。电视台的一个编辑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为了介绍这件事的始末，我们的摄影小组去了那里。记者采访了这位姑娘（她还是青年组织的积极分子），后来又走访了工厂厂长。厂长告诉记者，那个从前开印刷厂的父亲现在是个优秀工人，同样参加了群众组织，因此，毫无理由把这位年轻姑娘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另外，我们获悉，那个想安插自己儿子入学的当地党的领导干部为整个事情制造了一个借口，说是“禁止小资产阶级的子女上大学”。根据县委书记的决定，那个年轻姑娘被除了名，换上了那个干部的儿子。我们在节目里未提及党的这种干预，而只是推测说，“党没有把事情抓紧”。这个节目的结束语说，采用这种方法会毁了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公民的一生，并且使她永远成为敌人。一句话，这个节目总的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说明，党采取了正确的路线，而地方干部却并不总是执行这条路线的。鉴于该节目的纯客观性，书报检查当局未作任何删节便准予通过。

然而，第二天却出现了一场风波。中央给我打来了电话；被点了名的县委会派了代表团连同书记一起，分乘数辆汽车匆匆赶来布拉格。他们到书记处找了诺沃提尼，对这个节目提出抗议。我对自己说，中央肯定不会被一个态度保守的小小的县委所吓倒。我立刻被召见。政治局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开得十分热烈，甚至很富有戏剧性。会议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我看到他们的脸色十分阴沉和严肃。有人对我说：“这件事会叫你丢乌纱帽的，你的助手也不例外。”

“这个节目使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

“这是一起阴谋。”

调查一个接一个，真象是一场恶梦。令人气愤的是，我发现发生了一些相当奇怪的事情：我们的记者想去采访那位年轻姑娘的父亲，但他们的小汽车被另一辆车撞了；姑娘的父亲当即被工厂开除；有关这个年轻姑娘的某些材料也不翼而飞了；如此等等。

一架无形的机器在运转着。我神情颓丧地去看望一个在中央工作的老朋友。我说：“你对这件事怎么看？我不能理解。如果有人说这个节目不好，这个节目有片面性，甚至播送的不是时候，这都说得过去。但是，竟然扯到了什么阴谋，什么企图推翻这个制度！一个小小的县委会怎么会对第一书记和政治局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们私下说说，问题不在于这个县委会，事情的来头还要大得多！如果他们想在诺沃提尼身上和政治局里贯彻某些决定，他们是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的。拿眼前这件事来说，奥利策河畔乌斯季县委会比其他县委会的份量还要更大。诺沃提尼完全明白，秘密警察的重要头目在那里插了手，这条线甚至一直通到莫斯科。这些人认为眼下正是限制电视台影响的有利时机，只要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发动进攻了。不要想的太天真，以为你能斗得过这些人。他们在党内是紧紧地抱成一团的，各地都有他们的关系。”

但是，我们不想投降。我们终于成功地一直告到诺沃提尼那里，告诉他，人家向他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挤掉那个年轻姑娘的年轻人乃是党的干部的儿子。这显然是一个任人唯亲的例子。此外，我们还向诺沃提尼证明，这个姑娘的哥哥在另一所大学里已经学习了三年，同样也是以这种“档案”被录取的。我们在节

目里没有提及这一事实，以免他也被开除学籍。我们的证据是充分的，以至教育部、甚至党的机构里不少人在这件事情上都支持我们。

最后，党内这场保守分子与进步分子之间的斗争以妥协告终：电视台有错误，因为它在一个不合适的时刻，没有作充分的说明播放了这个节目。青年节目的编辑只好在电视屏幕上露面，作了一番空洞而模棱两可的自我批评。“我们所作的报导，事实虽然无误，”他说，“但是，也许我们过于心急了，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天下太平、和睦相处，对吗？”

我在社会主义电视台工作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有成功、有失败，也有令人筋疲力竭的斗争。我们成功地编排了反映各个方面的精彩节目。我们的戏剧片、新闻片以及儿童节目在蒙特勒和蒙特卡洛的国际比赛中连年获奖。我们生活在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制片人、导演、作家和记者感到有台长在保护着他们，甘冒创新路的风险。

对我来说，最根本的乃是观众对一些精彩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节目的反响。这样，我们赢得了全国的信任。有些节目引起了公开讨论，而且为新思想——它为“布拉格之春”作了准备——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一个官僚的叛逆

诺沃提尼于1975年去世时，西方报刊的报道说：“最后一个斯大林分子消失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由于同政治审判案有牵连和害怕给受害者平反，诺沃提尼虽然确实渐渐地变得保守

了，但是，从他知道可以把政治审判案的责任推给其他人的那一天起，他便从过去这段历史中摆脱出来，走上了赫鲁晓夫的自由化道路。他开始摆脱老一代的斯大林分子（西罗基、巴齐列克、科普日瓦），在自己周围安插上一批年富力强的人。战后，当我同诺沃提尼（当时任布拉格党的书记）在州委共事时，我得以从近处观察他的这一发展过程。他在“阴谋集团事件”期间对我采取的态度，肯定同从前认识我有关。他明白，有人使他上了圈套。也许是他心中仍然存在的那种阴暗的内疚心理使我幸免落入电视台事件的陷阱。这甚至使一些人感到惊诧，他们在想，为什么还不撤我的职。

1964 年我再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在议会中，我得知赫鲁晓夫倒台了。在休会的时候，我被紧急传唤到中央委员会，说是“情况相当严重”。

诺沃提尼脸色苍白，情绪激动。他说：“勃列日涅夫同志打电话通知我说，赫鲁晓夫因健康原因辞职了。因为我不满足于这一说明——因为他毕竟两周前还在我们这里，而且精神状况极佳——，勃列日涅夫同志答应再给我来电话。在这期间，我会把事态的发展随时告诉你们的，至于其中奥妙，我还不清楚。”诺沃提尼显得十分不安。

“难道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路线作废了吗？还是仅仅作一些修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诺沃提尼征询我们的意见。我表示，此事非同小可。不过，根据我对苏联的了解，我认为还不至于会对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全盘否定，这也许是一场内部冲突。不过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忽然，克里姆林宫给诺沃提尼打来了电话。他用一口蹩脚的俄语同勃列日涅夫通话，回话时十分激动：“什么？不过，您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后来，他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我们：勃列日涅夫刚才通知他说，赫鲁晓夫被撤职了，原因是犯了严重错误。"您为什么一开始说他病了？"

"因为事关重大，我们想让舆论界有所准备"，勃列日涅夫回答道。

"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你们现在跟我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那末为什么不久前还派赫鲁晓夫来我们这里参加斯洛伐克起义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诺沃提尼自然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他为了提高个人的威望，曾陪着赫鲁晓夫到处转。这时他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等着，先别忙向报界发消息。我们政治局首先得讨论一下。"他对我们说。

我等着绿灯放行，然而所有国外广播电台都已播发了这条消息。电话铃声不断："苏联是不是发生了政变？"

晚上，在播送电视新闻以前，我终于拿到了捷共主席团的公报，公报对赫鲁晓夫同志辞职一事表示遗憾，并感谢他为维护和平与和平共处所作出的贡献。

这是诺沃提尼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一种挑战。我相信，后者对前者的这一手永远不会忘记。在著名的 1967 年 12 月中央委员会全会前夕，当诺沃提尼在党的主席团内陷入困境时，勃列日涅夫报仇雪恨了。诺沃提尼企图最后挽回败局，邀请勃列日涅夫前来布拉格几天，期待他对主席团委员们说：保留诺沃提尼同志的职位是符合党和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利益的。勃列日涅夫虽然来了，然而，当他听完主席团所有成员发言后，只是干巴巴地说了声："这是你们的事！"

一听这句话，大家便明白，诺沃提尼不再受到苏联支持了。他的命运已定。就这样，由莫斯科一手扶植上台的诺沃提尼，终

因昔日的一时之勇，没有立即服从苏联领导的决定而受到了惩罚。

诺沃提尼无可否认有其自己的弱点——不过这些弱点也不比乌布利希、哥穆尔卡或日夫科夫的弱点更严重——，但他还有过这么一次叛逆行动。毫无疑问，这次叛逆成了他碌碌无为和充满矛盾的政治生涯中的沉重的负担。

我在这里提到这段插曲，只是为了说明事情并非总是象许多“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所说的那样简单，他们老是喜欢向我表明，这个人是个斯大林主义者，那个人是个自由派，而且不加区别地给一个人的整个一生都贴上这样的标签。

第五章　布拉格的星星之火

诱　因

我所说的关于电视台的作用的话，不应引起人们过早地下结论。我们既非出类拔萃，亦非孤军奋战；争取民主化的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十分广泛的阵线。

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以奥托·希克教授为首的一个经济学家小组。他们制定了经济改革纲领，并且在研究南斯拉夫实行自治的经验，组织工厂的厂长、技术员和工人进行讨论。他们虽然遇到党的机器给他们设下的重重障碍，但是，他们这种做法却为人们政治上的觉醒作出了贡献。奥托·希克有时被软禁在家达数月之久，并且不许他参加任何公开的集会，尽管他是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捷共中央委员。

其次，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集合在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里，为首的是年轻的法学家兹德涅克·姆利纳日（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成了中央委员会书记）。这个专门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化的具体措施。当然，他们的工作始终局限在可能的范围内。不过，他们在关起门来所搞的各种分析和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又在大学和科学院内、甚至还在党内——而这是最重要的——引起了讨论。

科学院里形成了以拉多万·里赫塔为首的第三个中心，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科技革命的作用。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大批专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等。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又在努力修正斯大林时代积累起来的某些教条，在那个时代，许多事实不是被歪曲，就是被隐瞒。历史学家们告诉那些思想混乱的读者和大学生们，真正的历史同灌输给他们的那种简单化的、歪曲的解释完全不是一回事。

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强烈地感觉到党的日常实践同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了解到的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叛逆先是表现在向他们的教授提出一些使人为难的问题，后来，则试图成立大学生的的自治组织。早在1965年和1966年，各大学里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会，形成了一个由伊日·米勒领导的运动。米勒1966年被学校开除，并被清除出青年联盟，1968年得到平反，在“正常化”时期再次被开除，最后于1972年被判处五年监禁，指控他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反对派的代表”。

工厂里同样也存在着某种不满情绪。但是不能说，这是工人的政治抗议。须知，东方各国的工人阶级同西方的工人阶级只有一点区别，那就是前者已经非政治化了。一方面，他们比以前有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平、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无可否认的安全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被剥夺了所有传统的斗争手段。禁止罢工和示威游行，独立的工会纯粹成了党的传送带。多年来一直向工人们灌输说，干活和提高产量就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重要的是，你们要好好干活；然后安安心心地回家，国家大事让我们替你们处理。”我们这里的工人运动同西方的工人运动很少有共同之处。在西方，许多左派都曾表示怀疑：“为什么

东方的工人从不组织罢工或上街示威游行？”而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则已渐渐地懂得，必须对政府施加某种压力，才能迫使它对工人阶级作出某些让步……。俗话说，逼上梁山。为了修缮或建造住房，许多工人从工厂里搞材料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为了尽可能少干活，有时竟要弄些十分巧妙的花招。东欧各国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越来越少，而著名的“社会主义工作队”主要是企业领导用来装璜门面的一种手段。

文化战线的各个领域同样也十分活跃。随着从布拉格电影学院毕业的一批年轻人的崛起，在六十年代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的“新浪潮”。新浪潮的出现对已经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米洛什·福尔曼或埃瓦尔德·索尔姆、杨·内麦茨、拉迪斯拉·黑尔格、伊日·门兹尔、杨·卡达尔和埃尔马尔·克洛斯、亚罗米尔·伊维什、维拉·齐蒂洛娃以及其他人的影片证明了这种繁荣局面。

这些反映现实的影片的特点是，它们并不象人们原先对这些年轻人——他们对我们的现实不满、似乎经不起诱惑而设法逃遁到某个抽象的“彼岸”——所料想的那样，“为艺术而艺术”，走回头路，仅仅在形式上做做试验而已。相反，这些影片反映了当代生活的节奏和同时代人的需要。欢欣鼓舞的观众在这些影片中又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同样，在路德维克·瓦楚利克或米兰·孔德拉、伊万·克利马、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和约瑟夫·什克沃雷基的小说中，在帕维尔·科胡特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戏剧里，人们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论。

我已经讲过，长期以来，捷克文化和斯洛伐克文化已经在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子，我国很大一部分最优秀的作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对共产党和社会党寄予同情。因此，不能指责他们

是反动派。由于他们现在逐渐明白了，他们过去曾把自己和一些不再符合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以力图纠正自己的错误，同时仍然保持进步的立场。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卡夫卡讨论会的国际意义。这次会议是在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教授的发起下，由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64年在利贝雷茨组织召开的。当时的法共政治局委员罗歇·加罗迪和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恩斯特·菲舍尔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卡夫卡——他的作品以前曾一度被扫除出所有的图书馆和出版社——就是在这里得到平反的。这次会议以及当时的许多其他文化活动无疑具有帮助人们认识新的现实的政治效果……

还应当提一下报刊、特别是作家协会出版的《文学报》和《文化生活》杂志的作用。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每一期都是同书报检查制度的一场战斗，有胜利，也有失败。这份每周发行量为三十万份的刊物——如果不是纸张受到限制，发行量还会更大——，每出一期都是一个政治事件。在东欧各国，纸张是书报检查制度的一种武器。这份报纸或那份报纸、这本书或那本书能够领到多少印刷用纸，均由党的专门委员会决定。一方面，有些党报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卖不出去的报纸堆积如山；另一方面，作家协会的报刊却总是销售一空，供不应求，甚至有人拿这些刊物做黑市买卖。

捷克斯洛伐克也许是因"索尔仁尼琴问题"而引起政治冲突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索尔仁尼琴的名字第一次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是在1967年，当时，斯洛伐克记者帕沃尔·利奇科来到沃罗涅尔（索尔仁尼琴在那里担任教师工作），作为外国报刊的记者对他进行了首次采访。帕沃尔·利奇科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他在战时曾同一个苏联游击队小组并肩战斗过，他的老朋友（现在都成了干部）帮助他进入了苏联的这个对外国人不

开放的地区。于是就出现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致苏联作家的公开信》，信的内容是有关书报检查制度的，有人把它带到捷克斯洛伐克。这封信在六月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当作家帕维尔·科胡特和亚历山大·克利门特建议大会宣读这封信时，引人深思的一幕发生了。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领域的真正主宰伊日·亨德里赫当时正率领党的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这个又肥又胖、不修边幅的亨德利赫本来一直平静地坐在沙发椅上，这时突然跳了起来，冲着会议主席说："如果你们宣读这封信，那么你们就一切都完了！"

秩序顿时大乱。有的要求宣读这封信，有的反对。于是进行讨论，结果表决通过当众宣读。然而，亨德利赫已经站起身来，提着他的公文包离开了会场。很明显，事情变得严重了。亨德利赫真的回到中央书记处，给诺沃提尼写了报告。领导人的反映异乎寻常的强硬。党决定：禁止公布大会记录，凡表决时赞成宣读索尔仁尼琴信件的党员作家，不能再担任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必须辞职。还进行了纪律处分，作家瓦楚利克、利姆和克利马被开除出党；科胡特和孔德拉受到严重警告。

不容否认，这场激烈的冲突乃是触发"布拉格之春"的因素之一。此外，1967年10月发生了大学生的示威游行。由于对党的政策的普遍不满，大学生们突然于考试前夕将电灯熄灭并在布拉格的大学区举行静坐。成千的学生手持腊烛向市中心行进，并且有节奏地喊道："光明、光明！我们要光明！"

那天，中央全会就党的工作中的若干缺点进行了讨论，会议上，在诺沃提尼和他的反对者之间笼罩着某种紧张气氛。手持腊烛向布拉格宫——诺沃提尼的官邸——行进的大学生遭到警察的残暴镇压，学生们被驱散，在返回校园的途中再次受到袭击。捷克

大学生对这种示威游行毫无经验，要不是有许多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一些曾在巴黎学习过、谙熟这类示威的黑非洲留学生参加，他们也许就会毫无抵抗地被冲垮。留学生们对警察奋起反抗，也带动了捷克学生。结果引起了一场真正的战斗。许多捷克人遭到逮捕和毒打。后来，事情闹大了，惊恐不安的家长们纷纷赶来布拉格，怒不可遏地质问道："你们发疯啦？竟然驱使工人自己的警察去对付大学生和工人子弟，把他们打倒在地，似乎他们就是阶级敌人！"

诺沃提尼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冲突比这场示威游行所起的作用更为严重，也更为关键。捷克斯洛伐克约有一千万捷克人和四百五十万斯洛伐克人；他们的语言很接近，但是，他们的气质、他们的传统以及他们的经济结构却有很大的不同。捷克人居住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早在奥地利君主政体下就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先进的经济和文化，而在匈牙利统治下的斯洛伐克却是一个半封建的农业国。1918年10月，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联合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第一共和国政府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再则，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歧视（不承认斯洛伐克人是一个自治的民族），后来，斯洛伐克准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分子（如赫林卡和蒂索）就利用这一点在斯洛伐克境内组织了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

当时，天主教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一直在警告说，歧视斯洛伐克民族乃是共和国统一的一大危险。在纳粹的压力下，这一威胁迫在眉睫：当希特勒的军队在1939年3月15日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最后一寸土地之后，蒂索神甫靠着希特勒的恩赐在1918年的统一的国家的废墟上建立了"自治的"斯洛伐克共和国，转眼间便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盟国。同年，斯洛伐克同

德国军队一起向波兰发动了进攻；1941年对苏联宣战，并派遣了一个师到俄国前线作战。然而，1944年8月20日的英勇起义证明，斯洛伐克人民是完全赞成同捷克人民重建统一的。1945年解放以后，承认斯洛伐克人是一个享有同等权利的民族，并向他们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将建立某种联邦。这一保证不仅从未兑现，而且由于对胡萨克、诺沃万斯基、克雷万蒂斯等斯洛伐克领导人（他们被控搞民族主义）的判决，布拉格的中央集权制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样一来，斯洛伐克人又出现了新的不满，这种情绪由于诺沃提尼是布拉格人、不懂得斯洛伐克人的心理而更加火上加油；诺沃提尼则又系统地攻击斯洛伐克人，而且这种攻击常常粗暴得不可理解。

杜布切克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时是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并不很出名。当时他和诺沃提尼之间已经有了冲突。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跟着父亲在苏联一直生活到十七岁。1924年，他的父亲携带全家同其他捷克共产党员一起，为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移居苏联。当时，工业化刚刚开始，年轻的亚历山大在苏联念完小学和中学后，为了参加抵抗运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返回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他进入了党的机关。他从不锋芒毕露，堪称遵守纪律的干部的楷模。然而，杜布切克对于他人的意见宽宏大量，襟怀坦白、深通人情，因此赢得了同志们的尊重。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同普通人在进行交谈。与诺沃提尼不同，他终始拒绝采取反对斯洛伐克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措施。如果布拉格作出了某些对付作家或大学生的决议，杜布切克并不反对在斯洛伐克执行这些决议，但是，他只是限于投票表示

赞成，在执行时却不伤害任何人。于是每一个人都明白，杜布切克是不同意这样做的。由于杜布切克在斯洛伐克的声望日高，而且通过电视在全国也出了名，诺沃提尼变得越来越恼火。

1967年，有一天早晨，我因感冒躺在床上，七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我是诺沃提尼。你在电视里又搞了些什么名堂？"他问我。

"同志，请原谅，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发烧39℃，正躺在床上。"

"你们的电视竟对政治局1961年9月的决议完全置之不理！"

"1961年的什么决议？我1963年才来电视台工作，不知道有这个决议。"

"那就找一找！我警告你：你要留神，不要让某些事情再出现在你的电视屏幕上，否则，党的书记处将得出必要的结论。"他扔下话筒，挂断了电话。事情很严重。

第二天，我召集最亲近的助手开会，对他们说："请帮我找一下这份决议。"谁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个决议。

于是，我去找那位大名鼎鼎的党内第二号人物伊日·亨德利赫，请他帮我找一下。这份决议一定在档案室，因为电视台里找不到。亨德利赫委托他的秘书给查一查，然而，秘书什么也没有找到。亨德利赫明显地变得神色不安起来，他要我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一遍，以便弄清诺沃提尼发火的原因。我不得不把打电话的事再跟他讲一遍，并把那天播放的整个节目的节目单拿给他看。他十分仔细地查阅了节目单，突然，我们发现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新闻节目里曾两次出现杜布切克的镜头：一次是他在该市接见古巴大使，接着又是接见苏联代表团。

"好好听着"，亨德利赫说，"不要说我跟你讲过：诺沃提

尼同志对杜布切克十分恼火，他感到你们是在宣传杜布切克。要设法向诺沃提尼解释清楚，说你不知道有这个决议，问问他，这个决议是关于什么问题的。”

于是，我去找诺沃提尼。

“你应该知道”，他说，“政治局搞过一份关于外交方面的会议记录，其中规定：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受到共和国总统接见，电视里要出镜头；在其他各种情况下，不出镜头，只发文字报导。”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如果杜布切克接见外国大使拍了电视片，那末他就显得比诺沃提尼高出一等了。

“为什么我们不改变一下这个规定呢？”我问。“如果你接见大使，我们完全可以派一个电视摄影组来，但是，如果你不允许，我们的人又怎么能进布拉格宫呢？”

“问题不在这里！这是原则，不能轻易改变。你要注意，对于杜布切克，也必须恪守这一原则！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警告！”

我默然不语，对这位领导人的态度感到十分惊讶。他的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而他却把时间消磨在这种可笑的小事上。

这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却使人清楚地看到笼罩在这两个人之间的紧张气氛，这种紧张气氛在1967年10月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公开争论时突然爆发了。那是一次讨论党的工作方法的会议，会上对有些现象第一次提出公开批评：党脱离群众，党政严重不分，党仲裁一切，包括谁担任什么职务，无论是工厂经理、学校校长、大使、大学教授的任命乃至一个工厂或水库的建设，都无一例外地始终由党的最高机构作出决定。杜布切克发言说，党对公民进行批评的倾向太严重了，指责他们工作不够卖力，对他们故意刁难和设置重重障碍。

“让我们丢掉这些消极的想法”，他说，“多找找好的方

面。我们要信任他们。他们希望有所创新，他们在寻找真理，这难道不是积极因素吗？”

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是深有体会的。哪怕电视台播放了一百个精采的节目，也没有哪一个党的领导会向我们表示祝贺。相反，只要出现两个有争议的节目，就足以引起轩然大波，把我们的努力一笔抹煞，甚至要求撤我们的职。我已经在许多领导人身上发现这种有害的作风，我赞赏杜布切克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他把话说得几乎不能再明显了。他的态度同诺沃提尼的态度完全不同，诺沃提尼当时显得特别激动，除他自己以外，人人都被他批评到了。

杜布切克讲完后，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马丁·瓦楚利克（人人都知道，诺沃提尼想把他立为自己的接班人）发言。他冷冷地说道：“难道可以允许杜布切克同志搞两面派吗？他在主席团里是同意这个报告的，并没有提出异议。”

杜布切克反驳说：“不对。在讨论报告时，我曾提出过一些建议。我的建议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写入报告。因此，我认为我有权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因为一些“鸡毛蒜皮”而居然吵得如此不可开交，以至许多人都暗暗地在想，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名堂。老共产党员、中央委员弗郎蒂赛克·沃特斯隆怒气冲冲地说：“我要求诺沃提尼同志表态并告诉我们，党的主席团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主席团成员竟在这里互相攻击。”

诺沃提尼表示，他保留到最后才进行答复的权利，而在一次秘密讲话中对斯洛伐克人进行了不同寻常的猛烈攻击。“如果斯洛伐克人对他们得到的一切不满意，那么完全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预算，而不要花捷克的钱！我们将拭目以待！”

这一反应犹如一颗炸弹在中央委员会里的斯洛伐克委员中，

而且不仅仅只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爆炸。于是，人们明白了，事情不仅仅是斯洛伐克的问题，而是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着意见分歧。来自基层的压力同部分领导的觉悟互相结合起来，于是，便出现了“布拉格之春”。

春天始于元月

1968年的头开得很好。至少，这是我个人的印象。自从我担任电视台台长以来，除夕之夜对我和我的所有助手说来已经成了一种梦魇。我们不得不守在电视屏幕前，直至凌晨一时。如果说，我们在平时还可以对有几个节目不去过问，那么，这一晚上哪怕是出一点最小的差错也会给我们招来大批愤怒的抗议信。宁愿守夜也不要在第二天早上听政治局委员或政府成员说这样的话：“电视台新年伊始就使我们大为扫兴。”

自从九月份以来，我们就生活在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中：我们应该播送一套什么样的节目呢？

1967年的除夕之夜与往常不同。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一月初还要继续举行。由于这个原因，国内笼罩着某种紧张气氛。大家都知道，诺沃提尼将被他人取代，但是还不知道究竟是谁。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都希望出现变化，但是在这次中央会议上，诺沃提尼手中还有几张牌可打，因为他可以动员诸如党的机构内、特别是秘密警察和军队里的保守派。当时，流传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说什么有一份捕人的名单。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我的名字也被列入了这份名单，建议我不要睡在家里。我认为这种想法很荒唐，并反问他们，电视台台长该躲到哪儿去呢。当时，我无法设想，事隔八个月之后我果真只好每夜换一个住处。

我们也有点迷信：凡尾数是“8”的年份，在我国历史上都是不平常的年份：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1938年——慕尼黑协定，丧失独立；1948年——共产党接管政权。1968年会不会使我们的希望得到实现？午夜时分，我们大家举杯，祝贺新的一年到来，大家都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一年将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一年。我们不愿意去想1968年也可能是最不幸的一年。

在那些等待和捉摸不定的日子里，我曾有机会见到诺沃提尼本人。同往年一样，我们来到布拉格宫，为他发表新年祝词拍片。这个讲话总是事先拍摄好的，因为诺沃提尼担心技术上出问题。我们必须制作五份拷贝，分送几个电视发射台，以免因某种技术故障而造成一秒钟的中断。万一出现这种情况，诺沃提尼和秘密警察就会把这看成是一场悲剧和一次具有破坏活动性质的事件。这篇定于元旦下午一时播送的新年祝词使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都处于一种高度的警戒状态，唯恐发生最细小的意外。

我来到布拉格宫参加节目的拍摄和录制工作。由于诺沃提尼的讲话大都相当乏味，我建议他改变老一套的办法，搞得生动活泼一些，例如，采取在布拉格宫同来宾们聊天的形式。然而，他拒绝这样做；他不是那种擅长作即兴演说的人，他担心讲不好，坚持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他不看听众，照本宣科。中间休息时，我注意地观察他，发现他形容憔悴。我明白了，他已经知道，他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第一书记职务。

他的斗争精神似乎已经离开了他。看着他无可奈何地听任各种事情的摆布，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但是，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该回忆录在他去世后由一家外国报刊加以发表）中说，诺沃提尼在最后时刻曾不顾一切地试图反抗。他的那些老朋友——他曾帮助他们谋得了一官半职——以及内务部

和国防部的强硬分子使他鼓起了勇气，这些人害怕变革会使政治审判案的真相以及他们对此应承担的责任大白于天下。

然而，为时已经太晚。诺沃提尼知道，大多数人是反对他的，所以他不愿意冒全军覆灭的风险。于是，他决定暂时认输，以便东山再起。他提议当时的总理约瑟夫·列纳特为接班人。这个提名未能获得通过，他又提议国民议会主席博胡米尔·拉斯托维卡，而反对派则支持副总理奥尔德里赫·切尔尼克。领导层中唯一的农民、农业生产合作社主席博鲁夫卡提议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意见仍然不能统一。最后，有人提到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名字，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诺沃提尼的人。诺沃提尼几乎无法拒绝这个提名，他同其他人一样，对此表示同意——心里想，杜布切克是个意志脆弱的人，很容易受他人影响。当大家找到杜布切克，请他出来担任这个职务时，他拒绝了。"我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我还从未有过这种政治上的野心，我只希望为党服务，别无它求。"

整个晚上，大家都在试图说服他；切尔尼克对他说："我们会帮助你、支持你的……。"

杜布切克终于接受了，但提出一个条件，说他最多在这个岗位上呆一年，即到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为止。

这件事有两点情况值得注意：杜布切克不是想揽这种责任的人，因为他不属于那号政治家，那种人热衷于权力，一旦上台，就以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一帮早就作了充分准备的人马开始工作。如果说，杜布切克曾经对诺沃提尼的某些方法提出过批评，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取诺沃提尼而代之。

另外，杜布切克的当选完全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表决，并没有同莫斯科商量过。自从1948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党内选举产生，而没有莫斯科的表态，这还是第一

次。但是，这种磋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不仅对选举第一书记，而且对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中所有关键性的职务都是如此。除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以外，这一点普遍适用于东欧各国。因此，杜布切克一开始便处于不利的地位：莫斯科对他不信任和持保留态度。

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个相当含混不清的公报，公报对诺沃提尼的工作表示感谢，没有对他进行丝毫的批评，结束语是："团结一致的党在前进。"

真理的爆发

于是，产生了许多疑问。这仅仅是一场党的机构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冲突，是领导集团内部的变动，是权力的更迭还是政策的改变？

开始时，工人们满不在乎，也没有一定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也许只是领导集团内部的清洗，他们对此不感兴趣。然而置身于一场特定的政治斗争中的我们却在考虑怎样利用这一变化。这一变化象征着党内教条主义思潮的削弱，加速了党内民主化的进程。对于我们这些在电台、电视台和报界工作的人来说，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尽一切可能使老百姓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将要发生什么事以及多么需要他们的合作。然而在这些极其困难的日子里，我们得不到任何指示；党的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动使整个官僚机构陷于瘫痪，宣传单位负责人的每周一次的碰头会议——1968年元月以前，这种会议是确定某些节目的一般方针的——现在也告吹了。

这次要我们自己确定正确的调子，我只好依靠在官僚机构内工作的几位朋友所提供的一鳞半爪的、非官方的指示进行工作。

当时想找杜布切克谈话是不可能的，他被各地派来的正式代表团所包围，代表团往往得等上几个小时才能轮到接见。

这种混乱的时刻使我想起解放后的那些幸福的日子，想起那些自发的集会，热烈的讨论和充满幻想的规划。当时，杜布切克正置身于这种喧嚣和骚乱之中，他甚至在布拉格连一所住房都没有，就睡在党的招待所里。此外，他的睡眠时间从未超过四个小时，因为大家都想找他谈话，而他也没法躲起来。尽管如此，他依然镇定自若。我记得杜布切克有一次使他的朋友十分震惊。他当选为第一书记以后，立刻去布拉迪斯拉发——他的妻子和几个儿子都在那里——观看冰球比赛。然而，他的拥护者发出了令人不安的信息：正当杜布切克坐在布拉迪斯拉发体育大厅里的时刻，书记处的某些文件——诺沃提尼本来应当把它们移交给杜布切克——却被诺沃提尼弄得不翼而飞。

在我们的新闻节目编辑部里，大家都感到心中无底。有些记者不知道他们究竟该说些什么；我们不得不说服他们，要他们负起一点责任来，不要隐瞒在工厂、科学院和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场合正在进行的讨论。在这方面，我们的第一步是走访作协主席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他在电视屏幕上对革新表示过欢迎，并对如何纠正以往的错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毫无顾忌地批评中央委员会1967年作出的决定，作家路德维克·瓦楚利克和安东尼·利姆正是根据该决定被开除出党的。他勇敢地提到斯洛伐克作家拉迪斯拉夫·姆纳奇科。姆纳奇科为了抗议政府对以色列采取的片面政策，于1967年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定居以色列，尽管他并不是犹太人。姆纳奇科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还丧失了捷克斯洛伐克国籍。使听众大为震惊的是作协主席的最后一席话，他说：这位作家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抗议行动应归咎于我们政策的片面性，应当允许这位曾经致力于反对斯大林主义斗争的共产党人重

返家园。

“你们怎么竟敢这样干？”中央委员会里的许多人第二天对我说，并且纷纷责怪我。

多少年来，对某些节目持批评态度的党的干部总是一成不变地重复道：“总的来说，节目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你们所提出的问题还不成熟，是党还没有加以解决的问题。”

在他们眼里，任何问题都必须首先由党来加以解决，而大家只有说“党是正确的”的权利，以表示对党的驯服。要使这些人明白，问题有时在党着手解决之前往往就已经提出来了，那只是枉费唇舌。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极为敏感的。

然而，在1968年2月，来自基层的压力越来越大：老百姓希望了解事实真相。斯姆尔科夫斯基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1945年布拉格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48年以前任政治局委员，在斯兰斯基案件期间遭到逮捕，被判处徒刑、以后得到平反，任林业部长，颇有威望。他应青年人的请求准备作报告，阐述自己对一月间中央委员会里所发生的事情所持的态度。官僚机器里的成员和党的领导对于他的这种主动精神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此外，杜布切克也对此抱有疑虑，因为他明白，存在着颠覆的危险（诺沃提尼及其追随者当时仍是政治局委员），因此强调谨慎从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和其他许多人都感觉到来自保守派方面的危险，保守派在党的机构、警察和军队里始终还担任着要职，每时每刻都可能使用暴力扭转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依靠群众，以便使这场进军变成不可逆转的事实。

我们也知道，诺沃提尼在布拉格的各个工厂进行视察，并以工人利益的唯一保护人自居。用他的话来说，唯有他才能保证工人有活干，才能保证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反，其他人，如奥托·

希克，则主张关闭那些不赢利的工厂，从而制造失业，并使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成果面临丧失的危险。这种蛊惑人心的语言在不关心政治的工人阶级中引起了某种反响，因为工人们已经习惯于具有一定的安全保证的生活方式：进工厂做工，在那里呆上三、四十年，一直到退休。

为了正确理解这些事情，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布拉格市内一些大规模的公开讨论会的气氛，在挤满人群的斯洛文斯基大教堂里，听众们一排挨一排地坐着，主要是青年人，甚至连扩音器前、讲台的阶梯栏杆上和地板上都坐满了人。听众的反应是自发而热烈的，这种情况已有二十年没有见到了。

作家帕维尔·科胡特、兹德涅克·海兹拉（他在斯兰斯基案件中被开除出党后一直没有得到平反）、玛丽亚·斯维尔莫娃（她是捷克一位在斯洛伐克起义时阵亡的民族英雄的遗孀）、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以及其他人分别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听众有时提出许多十分尖锐的问题，追究他们个人的、甚至诺沃提尼的责任。讨论结束时，部分听众建议发表一项决议，决议中的一些强烈批评苏联的措词受到很大一部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决议认为苏联应对二十年来我国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因为苏联支持了我国的当权派。凌晨一点，斯姆尔科夫斯基在这种紧张气氛中突然转向一个为决议的最尖锐的措词辩护的十分激动的青年。"亲爱的同志，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现在你也必须听我说几句。我既没有被监狱吓倒，也没有被盖世太保和斯大林监牢里的秘密警察吓倒。当我重见天日后，诺沃提尼拒绝为我平反，但是我也没有被他所吓倒。同样，我也不会被这次集会吓倒，我要把我的看法告诉你们。"

他讲到他本人当青年工人时的生活、作为共产党的青年党员以及后来成为有经验的共产党员时的希望和失望；但是，他仍然

是个共产党员，始终相信社会主义。苏联为了我们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牺牲，社会主义改革不应当反对苏联，相反，必须同她步调一致。他说服会议修改决议，代之以一个比较积极的、对苏联比较友好的决议。斯姆尔科夫斯基还出席了由电台和电视台转播的其它许多集会。他一再表示，事情不仅关系到最上层的小小变动，而且关系到一场改革，对于这场改革的内容和方式，目前任何人都还不十分清楚。他要求大家都来参加这场改革：提出具体问题，追究某些领导人的责任，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世界各地的电视台接连不断地向我们询问，希望采访杜布切克。杜布切克对此不予理睬。他拒绝接见外国记者达三、四个月之久，同样，他也拒绝本国记者的任何采访。他肩负重任，在摄影机前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在这种场合，不寻常的提问可能使他陷人尴尬的境地。二月间，指定我参加党的行动纲领的起草委员会工作。有人当时——今天也仍然如此——指责杜布切克和他的那帮人一开始就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确实如此。但是，我前面已经强调指出，在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由于实行一党制和存在着一个小小的领导班子，根本不允许制定可供选择的、能适用于目前时刻的纲领的。遗憾的是，只要最大的障碍——一党制的垄断——一天不扫除，只要一天不允许自由讨论，就永远不会有“替换班子”。

然而，中央委员会四月间通过的行动纲领已经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因为基层所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这个费时两个月之久才制定出来的纲领。

“布拉格之春”的实质是什么

过去发生的事，我是怎样经历的，就怎样写——完全按照事

情的本来面目。因此，从这种关系出发，我也不想从政治上加以分析，只打算对这一运动的主要思想作一概略的叙述。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中欧和东欧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头上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危机。这种模式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它导致了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布拉格之春”是试图在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来解决这场危机的尝试，这种社会主义在1968年的捷共行动纲领以及其它一系列文件中得到了表达。就这一点来说，大概没有必要去回答苏联宣传机构污蔑它是反革命和企图倒退到资本主义的种种议论。

行动纲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就是说，企业应真正属于工人和职员所有。迄今，集体所有制的唯一形式乃是国有化，这导致了官僚主义，并使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日益疏远。在1968年8月以前的短短几个月里，这个纲领的贯彻自然只能是非常初步的。

2．为了使公民对经济和政治拥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不仅应当在企业和区乡一级，而且还应当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拥有监督政权和参加决策的可能性。人们希望在社会主义中找到一种民主形式，以保证公民拥有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参与决策和对政权实行监督。因此，我们希望在捷克斯洛伐克把代表的民主同直接的民主结合起来；这本可以通过企业里的工人委员会、公社以及体现公民直接参与的其他形式保证实现的。这是在一个发达国家里赋予“一切权力归委员会”的要求以现实内容的首次尝试。

3．如果共产党的垄断还继续存在，那么仅有各种民主形式还不足以保证公民对国家的管理发挥决定性的影响。民主的自治是不可能在一党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

国家里可以允许存在若干个政党，这些政党应当向公民提出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建议和方案，以便赢得他们的信任，这就是政治上的多元化体制。

4．为了使公民发挥自己的影响，必须保证他们了解各种情况并拥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因此，我们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同社会主义民主是格格不入的。同样，必须保证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完全自由。

5．工会以及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其它各阶层的组织均应保持独立。我们发现，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矛盾和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应当拥有捍卫自己利益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对话和正视各种不同的利益，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意味着斯大林主义理论的结束，这种理论认为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都是党的传动纽带。

6．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在联邦的基础上，其中任何一个民族均有随时退出联邦的权利。

7．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的出发点是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结盟，团结世界上其他进步力量。但是，我们同样也要求，任何国家均有权在没有国际中心或仲裁人的干涉下决定本国的发展。捷克斯洛伐克从未提出要退出华沙条约或废除捷苏友好条约。我们只希望赋予国际条约以实际内容，这种内容不应受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力量左右，而应以双方的利益为基础。

我这里所讲的仅仅是纲领的一些原则，我毫不隐瞒尚存在着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在警察一官僚制度下，集体寻求变革或改良的任何尝试都会被看作是派别活动、反党活动而受到惩罚，所以不可能事先准备好一个可供选择的纲领。1968年春的这段时间里，事态的发展是如此的迅速，以至只有极少时间可以

用来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冷静的讨论。然而，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内所进行的创造性讨论和所实现的实际改良等——它们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比二十年党的专制统治期间多得多，而且绝大多数居民都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这些讨论。

杜布切克的困难处境

我们的最大问题自然是，如何使苏联领导人——我们的命运已经同他们联系在一起了——接受并理解这场变革。最初的迹象几乎令人沮丧：1968 年 2 月 23 日是捷共接管政权二十周年纪念日。东欧所有共产党领导人应邀前来布拉格。勃列日涅夫、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齐奥塞斯库、日夫科夫等的出席具有兄弟国家的首脑对杜布切克的领导表示认可的性质。在古老的布拉格广场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群众集会，本来决定由诺沃提尼担任大会主讲人，然而，根据基层的意见，改由杜布切克在大庭广众面前首次亮相并向布拉格市民致贺词。他的演讲风格与诺沃提尼的截然不同，诺沃提尼的讲话向来是冷冰冰的，丝毫也不亲切。杜布切克的演讲成了一篇地地道道对布拉格和捷克人民求爱的宣言，这使听众激动不已，而坐在观礼台上神情木然的外国领导人则对此显然感到不悦。

杜布切克第二天还要在中央委员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讲话，届时，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也将发言。由于杜布切克的这个讲话，发生了一场十分严重的争吵。杜布切克的讲话稿按惯例在前一天送达各国领导人手中。半夜，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杜布切克，说他对杜布切克的讲话十分不满意，如果讲话稿不作修改，那么，第二天他将离开布拉格，不参加会议。于是，为了避免冲突，杜布切克不得不修改了他的讲话。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直到三月底，才第一次得到机会同杜布切克讨论新闻政策和一般政策问题。他邀请我出席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参加的人只有电台台长，通讯社社长和几个党的领导人。杜布切克向我们说明了他的立场。给人的印象是，他似乎对这突如其来的声誉有点经受不住，恨不得悄悄地隐退，而且那艰巨的任务似乎使他感到十分畏惧。

十分明显，杜布切克不是一个能够用自己的魅力吸引并动员群众的天生的领导人。杜布切克心里明白，他之所以当选，只因为他在眼前这种政治局面下象征着一种妥协。他十分正直，不愿意使自己显得比实际情况更了不起。他直言不讳，不象任何谙于世故的人那样设法掩盖自己的怀疑。他的眼镜常常从鼻梁上滑落下来，在这付眼镜后面不时地露出一对恳求给予帮助的眼睛，似乎在说："亲爱的同志们，为了帮助我，你们还等什么呢？"这种经常不断的呼吁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望，同诺沃提尼的严峻表情适成对照，诺沃提尼作起报告来，总是十分自信，用一成不变的腔调，毫无感情地照本宣科。现在，站在这里的是这样一位党的领导人，他在讲话时，注意观察他的听众，看看他们是否能听懂，是否有人想打断他的发言，他有时候甚至中断自己的发言，离开讲稿即兴演说，或者摘下眼镜，用一种在他人看来似乎是在发出呼吁的目光更清楚地打量他人。我见到过许多人，他们都被杜布切克的举止深深地吸引住了。杜布切克并不认为自己一切都懂，握有解决各种问题的钥匙，而是不耻于以一个普通人的面目出现。我已经讲过，杜布切克具有一个政治家不同凡响的特点，即能够倾听他人的意见，而且是十分留意和感兴趣地倾听，不象有些领导人那样常常显得心不在焉。这就使得谈话的对方敢于讲话，而且杜布切克一旦了解到新的事实，往往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他的这个“缺点”（这个“缺点”后来曾使他受到指责）也许正是他的长处，因为它使他能够在自己周围团结一批有才干的人，共同制定政策，并且在出现不同看法时也能当机立断。

在1968年3月中旬的那次讨论会上，杜布切克的真诚坦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试图在社会主义世界中有所创新。虽然我们更换了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但我们并没有把他从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相反，他仍然是共和国总统、政治局委员，我们希望他继续保留这些职位，以便通过民主的途径实现变革。”

他补充道，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在报纸、广播和电视工作中所肩负的责任。他说：“要注意，你们不要毫无必要地去对那些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而有理由感到不满的人火上加油。相反，你们要宣传民族和解。大家都应该参加这场变革。”

他不是用命令的口吻，而是用请求的口吻说，我们要切忌主观主义，对事情不要操之过急，使大家逐步习惯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各种准则并习惯于参与管理国家。我们尤其需要克制自己，避免引起同苏联同志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的不愉快事件。

我们还要指出，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库特·哈格对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对我国的猛烈攻击。他甚至公开怀疑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想讨好西德帝国主义”。对此，我国政府向民主德国大使提出了抗议。

这场论战使老百姓群情激愤。然而，杜布切克竭尽全力不使这场骚动漫延扩大。他要我们特别注意苏联报纸，他们已经开始在批评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了。

“对于苏联同志说来，”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些不同寻常。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

绝不能制造混乱。对于某些争论，最好是不予理睬，保持沉默。”

“这很困难，”我们回答说，“但官方的宣传已经使得老百姓习惯于跟着苏联报纸走，所以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党正在树立一种新的作风，把真象说清楚、不隐瞒苏联同志的顾虑和怀疑，岂不更好？”

“我知道，”杜布切克回答说，“但是，在政治上，谁有权利在任何时候都讲真话呢？苏联人的脾气我是相当了解的，我在他们那里生活过。停止任何争论，这样，他们最终会明白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并且会逐渐同意我们走社会主义改革这条路的。”

同杜布切克的这次会见引起了我的深思。这个人心地善良，但是，我清楚地知道，现在正面临着国内外的压力，他是否能顶得住？他是不是低估了对手的力量？他似乎相信，他可以用良好的愿望最终赢得全世界对他的政策的支持。我却表示怀疑：我对秘密警察以及党和国家机器的情况可以说是了解得太清楚了；他们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对他采取完全容忍的态度，直到最后把他除掉为止。我们还知道，诺沃提尼已经同他在布拉格周围的朋友通了气：“让杜布切克去表演吧，他会把自己弄得名誉扫地的。他意志脆弱，我们可以对他施加影响，然后把他除掉。”

三月间，华沙条约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德累斯顿举行会晤，只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例外，他拒绝前往参加。当杜布切克从德累斯顿回来后，我的这种印象更加深了。我们从西方报纸上获悉，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第一次受到了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的公开批评。我们担心地想，不知这次会见讨论了什么问题。杜布切克召集我们研究新闻报道的政策口径问题。

“苏联同志保证支持并同情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都

无话可说：他谈到德累斯顿犹如谈论伊甸园①一般，似乎整个世界都同我们意见一致。

“但是外国报纸却说，苏联、德国和波兰方面施加了某些压力，”我说。“总会有谣言的，”他回答说，“不管怎么样，你们要把我所说的作为自己工作的依据。不要同苏联、德国和波兰同志发生冲突。他们甚至答应向我们提供经济援助。总之，一切正常。”

这次会见只是更加深了我们的怀疑。但是我对自己说，这一定是一种策略，因为他不得不装聋作哑，否则诺沃提尼及其朋友们可能利用苏联的批评发动进攻，破坏党的最高领导层内尚不稳定的均势。“布拉格之春”还刚刚处在萌芽阶段。

后来，在1968年8月苏联干涉之后，有人指责杜布切克没有把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各国的“担心”如实地告诉党，他解释了自己保持沉默的原因。他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形势下，如果我把这种不公正的批评公诸于众，就会造成一种与苏联敌对的气氛，而我是想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的。因此，我承担了重大的责任，守口如瓶。”

杜布切克曾在德累斯顿进行了一番斗争。他曾试图使勃列日涅夫、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相信：我们决不是向资本主义倒退，而是希望巩固社会主义；党得到群众最广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有可能成为西方世界眼里的“社会主义橱窗”。总之，这场变革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不仅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有利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时，这个榜样将有利于西方各国共产党。

哥穆尔卡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杜布切克同志，您究

① 伊甸园：伊甸乃希伯来语“edèn”之译音，系基督教圣经中指人类祖先居住的乐园。——译者

竟在说什么？我们对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欧洲的形势至少要‘冻结’五十年。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保护我们已有的东西，即捍卫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边界。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进行任何试验。我们在波兰已经看到，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重要的是，保住手中的东西！”哥穆尔卡的这番话使杜布切克感到意外和震惊。

杜布切克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东欧领导人对西方的社会主义不感兴趣，而且只是从边界安全和国家权力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社会主义问题。“我感到震惊，”他事后承认说。不过，当时他不想听从齐奥塞斯库的如下忠告：“无论在哪一级、无论在什么时候，绝不能同意对内部事务进行讨论！”

正因为这个原因，齐奥塞斯库才没有去德累斯顿。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不想参与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的讨论，因为否则他就会为有关他自己的党的政策的类似讨论提供借口。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杜布切克想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同苏联人摊牌，因此，他怀着说服苏联人的希望同意进行这次讨论。这种希望始终萦绕在他脑际，直到1968年8月为止。他认为，苏联人只是因为不了解情况，只要向他们证明我们是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华沙条约、忠于经互会的，那么，就会使他们改变立场。假如有人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杜布切克太幼稚，那就错了：他是十分清楚东方社会主义各国的权力结构的，感到违背苏联的旨意将会一事无成。因此，他力图通过谈判来达到目的。但是，他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铁托，不象铁托那样甘冒引起公开冲突的风险。

诺沃提尼的倒台

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运动在继续。杜布切克也在尽一切可

能使苏联人相信，我们这样做是真心实意的。这场运动在国内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群众纷纷投身到政治生活中来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并不总是同党的领导协调一致的，尽管他们支持党的总方针。

要求撤消诺沃提尼总统职务的呼声越来越高。常常可以听到这种说法：应该对蜕化、政治审判案和在此过程中所犯罪行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前内政部长。“那个操纵党的指挥棒的人是诺沃提尼同志！他应该把他所扮演的角色讲清楚，并承担责任！”

我们转播了在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里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会上，农民们说：“我们在这里批评党的书记，因为他包庇了某些不法行为。我们也批评内政部长，是他同意进行政治审判案的。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诺沃提尼同志是清白无辜的呢？如果我们的合作社主席把两百头母牛折腾死了，让土地荒芜了，拿不出钱来偿还我们的债务，那么，我们大家都明白，这并不是哪个生产队长的责任。合作社主席大概会说：我不知道这个村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合作社主席对他村子里发生的事是有责任的，正如诺沃提尼同志应当对整个国家负责一样，诺沃提尼也应当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为什么不在电台或电视里讲一讲呢？”

我心想：对，应当给诺沃提尼一个机会，让他在电视里进行答辩，这也符合“布拉格之春”的精神。正在这时，他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找我。“我准备讲一讲，请给我四十分钟的时间。”

“诺沃提尼同志，你当然有权发表讲话。不过，你知道，因为你是政治局委员，我必须事先得到政治局的批准。”

我这样做，多少也是对他1967年在杜布切克问题上坚持政治局的“规定”的报复。

我立刻打电话给杜布切克。“诺沃提尼同志打电话找我，他希望在电视里发表讲话。”

“噢，不！现在不是让他讲话的时候，”他回答说。“形势仍然非常紧张，他一讲话只能使事情更糟。”

“但是，我怎么能阻止共和国总统发表讲话呢？这不是电视台台长所能承担得了的，更何况我觉得还是让他讲比较好。”

“这件事由我来办，”杜布切克最后说。

事情究竟如何解决的？反正诺沃提尼再也没有试图发表电视演说。他和杜布切克之间大概达成了某种君子协定：“如果你一定要攻击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奉陪。我们并不想推波助澜……。”

斯沃博达的崛起

尽管如此，诺沃提尼成了党的一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他本人也明白这一点，并于 1968 年 3 月 22 日提出辞职。在党作出答复以前，全国已经开始在准备竞选了。西方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来说，这种程序完全是新鲜事，他们把它看成是制度民主化的一个象征。自从 1948 年以来，历次选举只有一份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提出的统一名单，而每次选举结果都是 99.9 %获得通过。因此，选举成了徒有虚名的走过场，但是，为了不想在工作岗位或其他方面给自己惹麻烦，大家又不得不这样应付一下。

今天，公民们希望享受一下新的自由，再也不想等待“上面”的建议了。反法西斯战士同盟（这是一个由当年的游击队员、前线士兵和抵抗战士组成的组织）首先进行了讨论。该组织的一部人推举路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为候选人，另一部分人投票赞成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相反，大学生们却希望有一个比较年

轻些的候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提议前教育部长维斯蒂米尔·齐萨日，他曾受诺沃提尼的排挤，因此享有很高的威望；另一些人则赞成作家伊日·汉泽尔卡，他因乘坐斯科达汽车几乎遍游世界而闻名。一些知识分子决定投作家协会主席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教授一票。被提名的人很快就数不胜数了。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向捷共中央明确表示，主张斯沃博达将军为候选人。为了全国的团结，他请求对这个提名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斯沃博达当时已经七十岁了，但是，他却有着运动员般的身体，他那富有表现力的、布满银发的“具有个性的脑袋”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

许多人把他作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象征，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作为捷克军团的一员同俄国人一道参加过反对奥匈帝国君主政体的斗争，并被任命为第一共和国的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逃往波兰，并从波兰到了苏联。在苏联，他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志愿军司令。他是第一届民族解放政府的国防部长，在五十年代的政治审判案时期受到排挤，此后便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他才得到平反。赫鲁晓夫曾经突然问到：“我的朋友斯沃博达在哪里？他曾经同我一起在乌克兰前线打过仗。”这使诺沃提尼和其他领导人十分尴尬。应该怎样向赫鲁晓夫解释，说他的“朋友路德维克·斯沃博达”被安排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当一个小小的会计呢？当赫鲁晓夫坚持要斯沃博达出席欢迎他的招待会时，人们才赶紧把军服、勋章等送到斯沃博达所在的村子里。接着，斯沃博达便被任命为布拉格军事博物馆馆长，并被选为国会议员。

苏联指望由斯沃博达来取代诺沃提尼。当时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的这位民族英雄从前在苏联生活时就已经同苏联情报机关有过接触。后来，斯沃博达对他的朋友们承认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曾被派往伊斯坦布尔，策动一名匈牙利外交官充当苏联间谍。我们同样也不知道，他在战争期间就想加入共产党，但是，哥特瓦尔德使他打消了这个意图。“你想参加共产党的愿望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以无党派人士的公开身份出现对我们更有利。”

于是，斯沃博达直到1948年还是政府中一个非党成员。大家都知道，他在布拉格政变期间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他控制了本来可以用来对付捷克共产党的军队。

对苏联领导来说，斯沃博达可谓是1968年最理想的候选人了。1968年3月30日他被选为共和国总统。

如果当时不是由他，而是由斯姆尔科夫斯基当选，那么，情况肯定会有所不同。因为斯姆尔科夫斯基肯定不会接受苏联人在1968年8月20日以后强加在斯沃博达头上的分裂主义角色。苏联人不仅不按惯例同杜布切克和党的领导进行谈判，而且还建议斯沃博达组织新政府并担任政府首脑。他们邀请他去莫斯科，把他说成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玩弄了一场把戏，而他则心甘情愿地参加了这场把戏。他态度暧昧、审慎，直到后来，大家才明白，——斯姆尔科夫斯基证实了这一点——正是斯沃博达帮助苏联人迫使杜布切克和其他领导人接受莫斯科的城下之盟，并于1969年4月排挤了杜布切克，把胡萨克扶上了台。

我们大家都曾经以为这个人没有政治野心，但是后来却证明他成了自己野心的牺牲品。1968年8月22日夜间，苏联坦克已经开进了布拉格，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正在首都的一个工厂里开会，我们选举了斯沃博达将军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党的主席团的组成时，我本人曾提名斯沃

博达将军。“不行”其他人说，“斯沃博达同志根本就不在乎沿袭共和国总统是当然的政治局委员的老规矩。总统应当留在主席团外。”

我的提议遭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否决，我接受委托连夜打电话给斯沃博达，阻止他去莫斯科。我告诉他的秘书说：“中央委员会正在召开会议：斯沃博达同志已经当选。我还想通知他，对他是否应该进入主席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同志们认为，他不愿意进入主席团……。”

秘书打断了我：“绝对不可能！自从四月份当选以来，他整天都在谈这件事！他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进入主席团；他是非常想进主席团的！”

接着，秘书告诉我，总统睡了，早上六点钟他还要去莫斯科。我向他说明，中央委员会认为，他的旅行应该延期，应该由新中央委员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陪同前往。

“总统答应勃列日涅夫今天早上去，”他说。“他已经拒绝了议会提出的类似请求。他坚持今天就去莫斯科，可以肯定，他是不会改变自己意见的。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会转告他的。”

当天早晨，斯沃博达在胡萨克、比拉克、英德拉、楚尔和库切拉的陪同下飞往莫斯科；在苏联坦克的护送下，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陪同他前往机场。

斯沃博达在莫斯科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欢迎和拥抱。在人群的欢呼声中，他同勃列日涅夫乘车驶过市内大街。在同一时刻，布拉格爆发了总罢工，许多捷克青年在苏联冲锋枪的子弹下倒了下去；许多人在临死前高呼：*“Atžije Svoboda”*（“斯沃博达万岁！”），因为“斯沃博达”一词在捷克语中的意思是自由……

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

斯姆尔科夫斯基无疑是“布拉格之春”这支队伍中最成熟的人。我是1963年在议会里认识他的。他以前是工人，战前很久就进入了党的机关。在担任俄斯特拉发州委书记及布拉格党委书记时，就曾积极从事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在抵抗运动期间，他每次都逃脱了盖世太保设下的圈套，他是一个真正的从事地下活动的天才。斯姆尔科夫斯基是1945年5月5日布拉格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这次起义不但违背了当时正在莫斯科的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党的领导的意愿，而且也违背了斯大林的愿望，斯大林希望苏联军队最先进入布拉格，以确保苏联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中的主导地位。

另外，这次起义产生了同斯大林自己组织的华沙起义类似的问题。当哥特瓦尔德回国时，斯姆尔科夫斯基自我介绍说，他是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他们当时就是用充满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因为他的行动使他深得人心，并且使得这次起义带上了民族特色。后来，这一点确实在党内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斯兰斯基审判案期间，他被逮捕，并被加上了“捷克民族主义分子”和“盖世太保特务”（因为盖世太保没有能够把他抓住和处死）的罪名。

索尔仁尼琴宣称，5月9日最先开进布拉格的不是苏联军队，而是弗拉索夫将军——此人曾同希特勒结盟，以后又反正了——的军队。这种说法有一半是对的。不错，弗拉索夫的军队是在起义的第二天即在5月6日和7日进入布拉格的，并且向全国委员会（斯姆尔科夫斯基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表示愿意协同对德军作战。弗拉索夫的军队曾经受到一部分居民的欢迎，这也是事

实，因为他们的军队与德国人不同，人们以为他们是苏军的盟军；由于他们讲的是俄语，许多人甚至以为他们是苏联军队。弗拉索夫的军队曾向德国兵开火，解放了几个城区，这也同样是事实。然而，斯姆尔科夫斯基拒绝了弗拉索夫将军向全国委员会提出的愿意提供帮助的表示，并明确申明，他不能同曾经属于德国军队的士兵进行合作。斯姆尔科夫斯基还拒绝同意美国人来布拉格增援。

我从未见到过像斯姆尔科夫斯基那样能够对问题作出如此简单明了的说明的政治领袖。他很注意使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他的勇气堪称楷模。当他在五十年代同斯兰斯基、克雷门蒂斯、隆多以及其他人一起遭到捷克斯洛伐克公安机关逮捕，甚至被指控为叛徒和前盖世太保特务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今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驳回了对他的所有控告。1952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获释。获释后，他立刻给党的领导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强调指出，他还没有得到平反，从而为自己招来了新的敌人。他不得不又等了十二年，才得到一个与他能力相称的重任。

1968年，斯姆尔科夫斯基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在自己周围集合了一个由年轻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组成的智囊团。他们帮助他起草发言、解决难题。因此，他在辩论中总能提出一些新的、有时是关键性的论点。我在此谨向他表示他在国内始终未曾得到的敬意。官方的宣传对他竭尽嘲讽之能事，自我辩护的可能性被剥夺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970年被清除出党，从此销声匿迹。他身染重病，始终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一再受到传讯，而且面临着重新逮捕的威胁。布拉格的官方报纸对他1974年的去世保持沉默，警察盗走了他的骨灰盒，并禁止他的夫人把遗物安葬在布拉格的家族墓地。

然而，斯姆尔科夫斯基直至生命终止始终是一个勇敢的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的许多同胞对他十分崇敬，并对他寄予厚望，连某些苏联领导人也非常尊重他：经常有红军军官从占领军司令部所在地米洛维策来找斯姆尔科夫斯基，就各种现实问题向他求教。他也可以通过这些客人向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领导人转达他的政治见解。但是，他从未有过丝毫准备投降的表示，与此相反，他对军事干涉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正常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他要求苏联领导同反对派进行新的对话，以便使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局势获得积极的解决。

1971年他对意大利一家共产党报纸（《新道路日报》）发表的大胆的谈话以及1975年2月在他去世后不久发表的回忆录，在国内和西方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反对派来说，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叶皮谢夫将军等人的事件

但是，1968年的布拉格并不象今天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完全沉浸在激情和狂热之中。在这种表面现象下，冲突时隐时现，保守势力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明白，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决战。

叶皮谢夫将军事件十分形象地说明了那些日子的气氛。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则简讯说，身居要职的苏军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将军曾经对他的一些助手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健康力量”受到威胁，苏军将毫不犹豫地立即向他们提供帮助。因为所有外国报刊都转载了这条消息，而且电台也广播了，所以我们的电视台也援引了《世界报》的这则消息。

第二天，苏联新闻专员舒拉夫洛夫在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举

行的招待会上怒气冲冲地质问道："您怎么竟把这条消息给捅了出去？"

"这条消息到处传遍了，"我说，"不过，您只要请莫斯科的同志们辟一下谣就行了。我建议您本人在电视上表个态，或者最好以叶皮谢夫将军的名义发表一个保证声明，这样就能使舆论平息下来。"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您在玩弄敌人的花招！"

"且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是说，所传叶皮谢夫将军的话是错误的，并不存在进行干涉的计划，是吗？"

"确实如此，我们从未打算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

"知道这一点，我很高兴，同志，我要赶快把这件事转告大家。"

"伊日·贝利康，请您不要插手，这不是您的事，"苏联新闻专员回答说。"您所应该做的事情是表明您对使您获得解放的苏联的友谊，而不是去相信那些尽人皆知的反苏间谍，如《世界报》编辑所散布的话。"

然而，就在同一时刻，已经出现了反对杜布切克的传单，传单称杜布切克是"苏联的敌人"、"机会主义者"、"右倾分子"、"叛徒"。更恶劣的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另一些怀有同样敌意的传单，这些传单是由不明国籍的飞机向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散发的。我们在一次特别节目里提到了这些情况。这些传单是从哪里来的？印刷这些传单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网？现在，所有反对派都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在采取这种方式攻击党的现领导和布拉格政府。节目结束后，我收到一个陌生人寄来的挂号信，自称是秘密警察的军官，信中说："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不能署上我的名字，但是，如

果您想知道这些传单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请您在那个时候前往该地，您会在那里看到进进出出的汽车……。”

我把这封信交给了约瑟夫·帕维尔，他是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老战士，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任内政部长。他的任务之一是防止秘密警察被利用来反对我们的新方针。

“我们的调查已经结束，”两周后，他告诉我说，“我们在信中所说的地点找到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可惜不能披露它的地址。运送传单的汽车挂着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刊物《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的车牌。你也知道，它的编辑部设在布拉格，有许多苏联人在那里工作。”

他那极其严肃的脸部表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补充道：“很清楚，这次行动是我们党内的保守分子发动的，并且得到了苏联同志的支持。我们将向领导报告，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在电视上谈论此事。否则事情就会闹得太大。”

五月间，又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事件，这次是在保加利亚和东柏林的报纸的帮助下发生的。有些报刊说，在波希米亚西北部的矿业城市索科洛夫附近发现了美制武器。我们的新闻机关还没有得到这一令人不安的消息，保加利亚和东德的宣传机器就大造舆论，散布谣言，说美帝国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搞阴谋。政府当即下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是这么说的），这是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制武器，由于出色的防腐剂（苏联军队使用这种防腐剂）迄今仍保存完好；武器装在麻袋里，藏在一座桥下，麻袋上有表明莫斯科制造的“GUM”标记。这个确凿的证据说明，这是苏联或东德的情报机关的一次挑衅。他们企图用这个伪造的武器库来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反革命的形势。

1968年，正当这些奇怪的事情发生期间，匈牙利电视台台

长、前国际纵队战士伊·滕派邀请我前往布达佩斯度周末。我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接待。我们同匈牙利朋友又吃又喝、有说有笑、还游览了帕拉顿湖……。尽管如此，他们在谈话中也流露出某种不安。“贝利康同志，请您坦率地说：如果您需要帮助，尽管可以找我们！”

“我需要什么帮助呢？我现在十分满意，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完全明白，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发生了不好的转折；我们也明白，苏联同志正在指责我们走这条老路。如果你们有当时的影片，我倒很乐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电视上放映，因为这样，人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就会尽一切可能避免这样一场悲剧的重演。”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糊里糊涂地上了圈套。1968年8月20日事件以后的某一天，苏联报纸指责我为了学习怎样搞政变，曾经打算在布达佩斯研究有关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文献资料。

恢复名誉

1968年4月行动纲领颁布以后，党转入了攻势。“五·一”的庆祝集会变成了一次支持杜布切克派的自发的和热烈的示威。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想，这一集会又恢复了它的活力和意义，而在这以前已经成为纯粹的例行公事，人们参加集会，只是为了在学校里或是在工作单位里得到一个好的分数。1968年5月1日，兴高采烈的人流在显然是十分激动的领导人面前通过。看到这种情景，我当时想，我们虽然犯了种种错误，做了种种不公正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有权在新的道路上前进，因为我们现在正准备为我们青年时代的理想恢复名誉。

鉴于我对发展电视事业和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贡献，根据党的决定，我于5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解放日的前夕荣获了最高奖赏——劳动勋章。同一天，阿图尔·隆多和五十年代政治审判案的其他受害者也得到了共和国勋章。我所处的社会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杜布切克的一位助手后来向我承认说，勃列日涅夫对此十分恼火，用气得发抖的声音说："你们不把贝利康撤职，相反却授予他勋章，这作何解释？"

然而，我个人最满意的一天还是1968年5月17日。那一天，党的检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对开除党籍和纪律处分案件进行复查——发表了如下公报：

"1961年10月10日，报纸曾发表过一篇声明，声明说，根据一个专门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政治局决定将共产党员卢克什·利斯和奥帕特等人开除出党，并给予贝利康同志纪律处分。这个决定的根据是，有人检举他们参加了一个有组织的、修正主义的、反党反国家的亲南斯拉夫集团。现经复查委员会调查证实，所检举的各点纯系捏造，他们根本不是个有组织的集团，对他们的检举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期所出现的、给党的政策造成了巨大损失的蜕化现象。至于以上同志对党的政策所持有的、后来成为他们的罪名的某些看法和保留意见，现已证明是正确的。因此，把他们说成是国家和党的敌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根据上述理由，党的检查委员会已经建议中央委员会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党外为上述同志恢复名誉，把党证发还给被开除出党的同志，并对那些遭受监禁的同志实行大赦。与此同时，检查委员会确认：尽管遭到重重的困难，上述各位同志作为正直的共产党员从未停止过为促使党实行公正的政策而进行斗争。中央检查委员会对这种立场表示赞赏。"（见《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文件》，布拉格捷共“自由”出版社，1969年3月出版。）

阴谋家：勃兰特、谢尔、克赖斯基

我们本人并不需要这种官方的平反，但是，这种平反在当时具有一种授职的性质。我被任命为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迫使我接见许多前来布拉格同政府或党的领导人会晤的外国代表团。例如，我曾接待过由瓦尔特·谢尔（现任联邦共和国总统）率领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由民主党代表团。

自然，我们讨论了两国关系，当时，我们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实现这一步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我们要求立即宣布慕尼黑协定无效。自由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虽然对我们的立场表示理解，但也并不讳言，这一步骤将会在西德国内碰到什么样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困难。我们还同这两个西德的议员代表团讨论了以下的可能性：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三十周年之际，由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两国的议会外交委员会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对希特勒政权的侵略政策表示谴责，并强调在两国间建立新的友好关系的必要性。

不久以后，当我看到苏联报刊对西德政治家访问布拉格一事进行猛烈攻击时，我大吃一惊。我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也同样遭到了严厉批评，因为我们接见了这些“西德帝国主义的代表”和“战争犯子”。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难道苏联同波恩没有外交关系吗？苏联不是说，西德同东欧其他各国的关系必须“正常化”吗？而这正是我们会谈的目的，因为我们明白，今天，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新的可能性。难道我们应该装聋作哑，象东德要求我们的那样，继续把西德看作是“帝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势力的巢穴”吗？难道苏联领导拥有特权，可以对其他人发号

施令，说这是可取的，那是不可取的，或者由他们来判定某个政治家今天是“战争贩子”，明天是“和平之友”，后天完全相反？

情况大概确是如此。总之，一个可疑的“苏联记者报导组”于1968年8月底在莫斯科发表了题为《论捷克事件》的白皮书，其中谈到波恩的政治家对布拉格的访问时写道：“继帝国主义宣传工具的数百名记者之后，所谓的财政和经济专家们旋即纷纷来到了这个国家，其中包括银行家们以及诸如西德联邦银行总裁布勒辛、自由民主党主席谢尔、社会民主党议员埃普勒这样一些帝国主义公开的头面人物……。”

苏联宣传机构谴责西德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是“布拉格之春”运动的真正的“精神之父”，甚至是这一运动的组织者。上面已经引用过的《白皮书》详细地描绘了勃兰特是如何亲自派遣卡尔·布勒辛前往布拉格，嗣后又如何为布拉格的“反革命”筹措特别基金的：“苏台德地区德国同乡会的领导人和西德总理基辛格、外交部长勃兰特、部长魏纳以及其他波恩内阁成员之间经过协商，于1967年2月21日达成了关于设立这笔用以支持反革命的基金的协议。”对于研究西德国内政治形势的专家们来说，苏台德地区德国同乡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魏纳之间的这种暧昧关系肯定不是没有刺激性的。尤其是这笔基金是为联邦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服务的，而当时的苏联宣传机构总是把新东方政策说成是企图对社会主义各国进行进一步的思想渗透。据《白皮书》称，社会民主党通过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记者和作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通过各种渠道用大量的资金支持颠覆活动。”

这本引人注目的《白皮书》认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他们的主席布鲁诺·克赖斯基特别富于煽动性和特别可恶，因

为他“不遗余力地对捷克事件施加影响”。使白皮书的作者特别不安的是，他甚至对西德《世界报》说：“捷克斯洛伐克最近一个阶段正在发生这样一种真正民主化的过程，使得捷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专政的国家。”令人感到最为可怕的是，克赖斯基正在尽一切努力“使社会民主党在捷克重新复活”。

克赖斯基为什么要这样干？《白皮书》的作者对此是一清二楚的：“克赖斯基先生迫不及待地想在捷克斯洛伐克复辟资本主义：他曾经在那里拥有一座巨大的香肠厂，这个工厂曾为他带来过相当可观的利润。”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克赖斯基是想在布拉格重新出售他的小香肠，为此，他需要社会民主党，以便最终从资本主义中捞到好处！

勃兰特、谢尔、埃普勒、克赖斯基、威尔逊——他们都是阴谋家，他们正在筹划一场大规模的反革命，甚至想通过联邦国防军对捷克实行军事占领。但是这种指责并没有妨碍莫斯科在不久以后把所有这些政治家作为“好朋友”、“现实主义的国务活动家”和“和平力量”待若上宾。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可以说明这种荒谬的情况：当我已经在罗马过着流亡生活时，有一次偶然在大街上碰上了瓦尔特·谢尔，当时，他已成了外交部长。他十分高兴地回忆起对布拉格的访问，并问我现在在罗马干什么。我回答他说：“部长先生，您也许不会相信，我是因为您的缘故才到这里来的，原因是我当时接见了您。由此，您可以看到东方政策的复杂性：今天，您成了外交部长，一个深受莫斯科欢迎的常客，而我却不得不出逃，成了莫斯科和布拉格的攻击对象，说我是东方政策的敌人。”

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假如卡夫卡在天之灵有知，对于事态的这种发展一定会感到高兴的。不过，我只能是苦笑罢了。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会见这些政治家始终是一大罪状。我被

开除出党以后，苏联和捷克报纸说我曾经同西德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谈判把苏台德地区重新割让给德国的问题，从而犯下了叛国罪，还说我同西德驻布拉格首席代表海佩尔茨等策划了一个大阴谋——实际上我只在雅尔塔饭店举行的两次招待会上同他交谈过几句话——，于是，我同西德广播协会和西德第二电视台的业务接触也被说成是为这些舆论工具诽谤捷克斯洛伐克效劳。

一方面，我们在国内被剥夺了发言权，在国外还必须同连篇累牍的谣言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当初同样受到诽谤的西方政治家却坦然地应邀访问布拉格或莫斯科。使我颇感意外的是，他们并没有利用这种新的机会，至少要求他们的东道主赔礼道歉并在种种荒谬绝伦的指责面前为他们从前的会谈对手或同事分辩几句。因为毕竟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事实：在 1968 年和 1968 年以前曾致力于同西德改善关系的绝大多数政治家、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近几年来失去了工作并不得不在没有公民权的情况下生活在政治隔离区内，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如历史学家米兰·许布尔和杨·特萨曰甚至被判处长期监禁。至少在这些人中，即当时遭到谴责、如今又受到热烈欢迎的西德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应该表示同他们的捷克同事的团结。

不过，这也许是违背“现实政治”和新的外交策略的。我常常听到这样说法，不能用道德和感情来搞政治。这一点我理解，但是，我坚信，那种对谎言和欺诈麻木不仁的政治也不是真正的政治。然而，我们的错误也许恰恰在于我们想把现实的政治同真理和道德联系起来。

我也曾会见过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当时他从莫斯科来到布拉格作短暂停留，以便了解我国形势、寻求同北越接触的可能性，以便把美国从战争的死胡同里解救出来。

同一天，我还接见了美国依阿华州——那里有许多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参议员约翰·库尔费尔，他请我寄给他一些可供当地电视台放映的文艺节目。但是苏联《真理报》却利用这次总共只有20分钟的会见作为借口，提出了严厉的指责：1968年8月23日，《真理报》在"一个叛徒的自我暴露"的标题下声称，一家黎巴嫩报纸发表了一篇采访谈话，在那篇谈话中，我曾对美国参议员库尔费尔说，"必须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共产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必须"摧毁红色专政"，杜布切克等人只是一种"过渡办法"，以后必须代之以"更加坚定的反共分子"。

这完全是捏造。能否设想，一个美国参议员会要求对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或者电视台台长进行"采访"？能否设想，我会使用这样的语言？这是苏联宣传及其一整套机器为了使对手名誉扫地而采用的"罕见的方法"的又一例证。对于我来说，在经历了如此众多的痛苦经历之后，已经到了"杯水将溢"的地步。更令人气愤的是，8月20日事件以后占据了我的办公室的那个苏联指挥官把《真理报》上的这篇文章钉在墙上，并亲手用红墨水加上了："叛徒贝利康"的字样。我始终把这份剪报带在身边，把它看作是盲目的狂热性的象征。有一位苏联朋友见我十分气愤，便对我说："你在克格勃内一定有几个死对头。"

后来，我对此又有了进一步了解。在这以前，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及我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对政治审判案的揭露中，我已经对政治迫害有所了解，但是，当我亲身受到这种迫害时，却仍然对谎言之恶毒和手段之残酷感到吃惊。克格勃拥有一批进行这种心理战的新闻记者：若要给某人戴上"叛徒"的帽子，就在随便那一份黎巴嫩刊物上编造一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然后，再由塔斯社向世界上所有报纸介绍这份刊物。如果因这种方式遭到

诽谤的人试图反驳这类谎言，那么，塔斯社就回答说，这条消息只不过是援引自一家阿拉伯报纸的。于是，不管这家报纸如何成百遍地声明说，它从未发表过这一消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消息，消息本身还是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并在政治上被人利用了。

后来，我向国会议员库尔费尔通报了这件事，他回答说，他同此事毫不相干。他认为，从法律上反驳这种谎谬绝伦的事有失于他的身份。当然，他说得有道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舆论工具却成百次地重复这个“故事”，直至我不耐烦再去理会它时为止。戈倍尔博士的这些用功的弟子们以为，谎言重复一百次就能变成真理，他们指望受害者最后将会感到厌倦，丧失斗志，无力再进行反抗。

另外一个例子是：1968年8月，苏联的白皮书谈到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奥托·希克以及我和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似乎我们已经流亡国外，尽管我们大家当时都在布拉格或是持有有效护照逗留在国外。1968年10月，我在布拉格外交部遇见苏联新闻专员舒拉夫洛夫，气愤地向他提出责问。他只回答说：“一切都会清楚的。”

确实一切都清楚了。我们黑天白日地在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这样写我？难道我被列入了黑名单？此外，还有匿名信、电话以及朋友们的警告。如果被他们紧追不放的人最后真的下决心流亡国外，以便摆脱这种恐怖气氛，那么苏联人就会心安理得地说：您瞧，我们没错吧！

捷克人民过去肯定不是苏联的敌人。但当他们后来不给入侵的苏军水喝的时候，心理战的专家们就宣称：“您看，老百姓都是反苏的，我们没错。”当一些共产党员悲观失望、把自己在党内的历史看作是一种错误，并对社会主义表示怀疑的时候，他们干脆就说：“您瞧，他们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党内的外国间谍，

我们没错。”这些人握有最后发言权，因为他们拥有坦克和导弹……

与此同时，杜布切克不得不多次在勃列日涅夫那里替我分辩，向他保证说，我不是反革命。在入侵前几次“传唤”杜布切克前往莫斯科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曾不停地敲打杜布切克，并且批评了地方报纸上的一些文章，而杜布切克根本不知道这些文章。

五月底，在捷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瓦西尔·比拉克突然对电视台发起攻击，把电视台称为“修正主义的中心”。当他建议任命电台和电视台党代表时，我立刻请求发言。我坚决地驳斥了他的指责。接着，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提出抗议说，如果我被党代表取代，他们就举行无限期罢工。于是，比拉克不得不撤回他的建议。

如果取消书报检查制度

但是，一些部长对记者的独立性以及他们的批判性的分析仍然表示不满。我应邀参加了由胡萨克（当时任副总理，现任党的总书记）主持的一次政府会议。胡萨克首先表示，他支持那些有问题的部长，接着，他突然转向我问道：“你能设想英国广播公司或法国电视台会公开批评部长和允许共产党领导人发表演说吗？”

“因为我亲眼目睹过，所以对我来说，这并不难想象。”

他显得不知所措，根本就不相信。然而，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想使他难堪，他不久以前才恢复名誉，我们还是比较尊重他的。

会议休息期间，当招待我们喝咖啡、吃小香肠的时候，胡萨

克问我："你刚才在说什么？共产党员能够在资本主义的电视里发表讲话？"

"这是事实。法国和意大利电视台经常邀请共产党领导人就这个或那个问题发表意见。"

胡萨克还始终不相信我的话。"人们也可以批评政府，"我补充说。"我看过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这些节目里不仅批评了政府，甚至还使政府很难堪！"

我不知道是否说服了胡萨克，因为他象哥穆尔卡一样，同属于这种类型的党的干部：他们不了解西方国家，始终是他们自己宣传的俘虏。

同杜布切克打交道也并不是很顺手。有时在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把我找到他那里去："听说，昨天电视节目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说，有些东西很糟糕。"

他自然没有时间观看节目，而斯大林主义分子则对他添油加醋地说："我们受到了电视台的侮辱和攻击。"

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使他放心，但是，半个小时以后他又把我找去了。"还有一点……我听说……。"

他处在可怕的压力下，我不得不经常安慰他。当然，我们的电视节目也有错误，有时做得过份了。我们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记者们不习惯自由地发表意见，有时对政治生活的看法十分幼稚。但是，我们在尽一切可能改进这些不足之处。我们那里也有这种人，他们过去以教条主义著称，今天却坚决地转入完全相反的方向，以表明他们誓与过去一刀两断。我相信，这种同样也使我感到不安的倾向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不管怎么说，使报纸、广播和电视受到鼓舞的主要推动力和目的是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向公民们提供更多的情况并使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工人、农民和学生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对电视节目的

关注是以往任何时候以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不能相比的。

只有苏联领导——遗憾的是，还有部分西方左派——不理解，发表与官方路线不一致的意见的可能性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斗争的一项内容。对于这种不同的意见，当然可以展开争论，用说理的方法来争取人民支持党的政策。但是，莫斯科却把当时每一篇持反对意见的文章都作为“控制不力的证据”，对我们横加指责。其中，有许多意见也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有些言论使我们同苏联之间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反对对新闻自由实行任何限制。我认为，这关系到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观点：如果社会主义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那么，它无需害怕那种批评性的、或者甚至是怀有敌意的文章。事实上，问题主要不在于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写，而在于是否可以对国内广为流传的种种看法加以否定并据理予以驳斥。

社会主义需要有新闻自由，而且是能够加以实现的，因为宣传工具不再属于几个有钱人或者垄断集团所有，而是属于社会所有。但是在东欧，报纸始终只是统治集团的工具，除了他们自己的意见以外，这些统治集团不允许有其它意见存在。1968年我们曾想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报纸、广播和电视必须真正为全社会服务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们总算已经开始在寻求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了。在这过程中，我同一些友好的记者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想把列宁用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扩大到用来解决宣传工具的问题，主张宣传工具应当属于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所有。但是，我却要维护其他公民——他们是宣传工具的服务对象——的权利；他们同样也应该参与对报纸、广播和电视的监督和管理。

当然，我们没有现成的范例可循，出现一些错误是难免的。

在书报检查制度下，记者们在职业道德方面不会遇到多大问题的，因为对于他们在工作中应当遵守的准则和范围都有详细的规定。而现在，他们什么都可以写，而且对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害的，必须由自己作出判断。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立刻成功地经受住这一挑战的。

第六章　坦克的命令

雅库鲍夫斯基元帅躲起来了

1968年5月底，苏军就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演习了。起初，杜布切克请求把演习推迟至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但是，后来在苏联领导的逼迫下让步了。照官方的说法，这只是一次总参谋部的军事演习，然而，事实上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后来发现，苏联人派遣了数万名士兵和成百辆坦克到我们这里，他们的士兵分散在全国，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军事行动的控制。无疑，这是进行干涉的最初尝试。我们从军事专家和公安机关那里得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苏联人敷设了专用电话线，用以窃听政府和党的谈话。他们绘制了所有机场和军事设施的详细平面图。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想永远在这儿呆下去……。"

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苏军虽说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为什么他们在演习结束后还老赖着不走？政府要求他们撤走，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荒唐。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首脑切尔尼克试图打电话找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时，此人总是让人转告说他不在。显然，他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因而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答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主席。

7月初，随着"华沙五国信件"的出现，形势变得越发混乱

不堪和令人不安；这封信是命令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屈服于苏联压力的一种最后通牒。我在布拉格党组织会议上被选为出席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我才知道有这封信。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会上谈到华沙条约五国邀请杜布切克前往华沙一事。代表们普遍主张拒绝出席这次华沙会议——这是五十年代对南斯拉夫进行调查的翻版——，继续坚持我们的路线，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

党的领导的答复是拒绝参加华沙会晤。这个答复在捷克斯洛伐克报刊上发表了，受到大多数公众以及全党的赞同。杜布切克甚至召开了中央全会，借以证明，拒绝参加会晤不仅是领导的决定，而且也是得到中央委员会支持的。事实上，谁也没有勇气支持"华沙五国信件"。甚至斯洛伐克党组织的书记瓦西尔·比拉克也率先发言，以斯洛伐克党组织的名义建议拒绝出席华沙"最高级会议"（此人今天宣称，他当时曾建议前往华沙）。只是在苏联坦克的保护下，斯大林分子才重新鼓起"勇气"，讲出了他们的真心话。

在筹备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过程中，决定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这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许多中央委员并不赞成新的路线。苏联领导显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希望在领导集团内部出现意见分歧。

杜布切克在电视讲话中解释了党拒绝前往华沙的原因，在为他录音时，我冒昧地提了一个问题："杜布切克同志，全国都同意你的决定，而且你拥有最大的决定权，难道真有必要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吗？"

"如果不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苏联人就会抓住机会，指责我们害怕反对派。十分重要的是，全党都准备捍卫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结果证明，杜布切克是对的。尽管如此，国内仍然笼罩着某种不安。负责电视台警卫的一个同志给了我一支手枪，并向我承认说，这是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我感到十分意外：大多数人不是支持我们的吗？

“目前有一些谣传，”他说，“某些集团企图在今晚占领电台和电视台。因此，负责人必须武装起来。”

换句话说，不排除一些斯大林主义集团企图在秘密警察的帮助下利用休假期间强行占领宣传阵地的可能性。

这支手枪我从未使用过，我把它同秘密文件一起存放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8 月 21 日，即占领后的第一天，一个占据了我办公室的苏联上校正是在那里找到了这支手枪。这一“发现”对苏联和保加利亚的报纸来说真是求之不得：“这证明，”各报纷纷写道，“修正主义分子准备用暴力发动政变：他们已经武装起来了！”

党的领导在拒绝前往华沙的同时，曾表示愿同东欧各国共产党举行双边会谈。它还一再重申：捷克斯洛伐克愿意履行华沙条约中规定的义务；目前国内形势的发展意味着巩固社会主义、杜绝向资本主义的任何倒退。

复信中维护了发表意见的自由，对于我以及所有在电台、电视台和报界工作的人来说，这一事实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华沙五国”的信件称，“报纸、广播和电视落入了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手中”，脱离了党的控制。这种说法使我感到特别痛心，因为这封由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乌布利希、日夫科夫和卡达尔签署的信件悄悄地把我纳入了“敌人”的范畴。因为如果认为宣传工具是掌握在敌人手里，那末电视台台长岂不成了头号敌人？杜布切克也显得忧心忡忡。当电视台为他的向全国说明我们的立场的演说进行录音时，他在录音室的一个角落里对我

说："我在苏联呆的时间够长的了，我知道，这次没有去华沙，苏联人是永远不会原谅我的。"

短短几句话使我大为震惊。我思忖着，一方面他竟然有勇气拒绝前往华沙；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一拒绝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然而，他并没有采取具体的预防措施，以防苏联人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他对苏联领导人的好意还始终抱有不可动摇的信任，以为他们终究会明白，捷克斯洛伐克领导的新政策归根结底对苏联也是有利的。

做一个捷克人是值得自豪的

在那个不寻常的夏季，笼罩着一种奇特的气氛，夏日的温度和政治气候一样，同样令人窒息。然而，我国领导人拒绝前往华沙使大家普遍松了一口气。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一千六百名代表是经过县和州一级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大多数人是支持杜布切克路线的，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加强了老百姓的信任感。但是，苏联军队仍始终赖在我国领土上不走，尽管演习早已结束，部队的撤退却十分缓慢；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想长驻在我们这里，以便对我们施加政治上的、特别是心理上的压力。

面对这种压力，人们自发地进行政治动员，甚至愿为杜布切克派提供物质上的支援。我还记得有些老年妇女准备把自己的结婚戒指——这是她们的最后一点财产——捐献出来。不过几天工夫，老百姓为一个新设立的基金会捐赠了九千多万克朗，这个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在经济上进一步巩固共和国。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是因为许多有关"布拉格之春"的著述有时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布拉格之春"仅仅是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骨干的活动。

我在电视台和各种集会上（我作为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过这些集会）曾经经历过种种事件，作为这些事件的见证人，我一天天地发现，甚至连大街上的陌路人也都感到事情同自己有关。二十年来，还没见到过如此巨大的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甚至渗入到了个人的生活中。最最普通的老百姓在这一政策中重新看到了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多年来，他们第一次感到做一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是幸福和值得自豪的。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出国旅行，而不必害怕受到警方的歧视。

“从前，”他们说，“如果我们到西德、瑞士或者法国去旅行，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物质境遇、特别是因为那些代表我们的人而感到耻辱。今天，我们至少可以自豪地讲述我们正在做的伟大的事业。我们重新赢得了我们的尊严。”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当时的那种气氛：一次，有个东德的老朋友来看我，他以前曾在布拉格工作过，交游甚广，对女人特别感兴趣。他现在想来这里休假，再看一看他的旧情人，享受一下布拉格的夜生活。

但是，没几天，他大失所望地跑来向我辞行。“象以前那些只对爱情和漂亮的服装感兴趣的女人这里再也没有了，”他牢骚满腹地说，“第一天晚上，我去找丽佳，她对我的来访高兴得不亦乐乎。正当令人销魂的时刻，她突然问我：‘你们的乌布利希为什么不喜欢我们？’随后，她又开始谈起杜布切克、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直到我怒冲冲地站起身来就走。第二天晚上，同埃娃见了面，她是个时装展览的模特儿，我还特地为她带来了一些西柏林的时装杂志。吃晚饭时，她向我唠叨个没完：‘为什么东德人不了解我们国家的真实情况？你对民主的社会主义有什么看法？’我只得一个劲地喝酒，喝了整整一瓶烧酒。她还强迫我看电视台的讨论节目，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第三天，

我来到斯特罗莫夫卡公园，想找一位肯定不会对政治感兴趣的年轻姑娘。后来，在跳舞时我认识了一个十六岁的长得十分窈窕的少女，并且陪伴着她穿过昏暗的公园回家。一切都非常顺利，突然，她挣脱了我的拥抱，问道：'你到底是从哪个德国来的？从东德还是西德？'也许我撒个谎就好了，但是，我太着迷了，根本想不到耍花招。'这么说来，是从那个乌布利希的国家来的罗？'她气愤地说，'难道你们就没有杜布切克吗？他可以使你们的生活变得更自由。'接着，她告诉我，她在新的大学生组织成立过程中是如何的积极，而且打算在今年夏天到国外去作第一次旅行。于是，又是斯姆尔科夫斯基、自由、斯大林主义、民主化以及这一套东西。我的情绪自然也就全完了……。"

他无可奈何地向我告别说："政治已经毒化了你们这个美丽的国家。既然你们的时装模特儿、女舞蹈演员，甚至连十六岁的姑娘都已卷入了政治，那末，我也没有必要再呆在这里。布拉格已经完全不是诺沃提尼时代的布拉格了，那时候，谁也不关心政治。"

这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有关"布拉格之春"的政治研究文章虽然对这些小事是不予考虑的，但是，对于想要了解这场运动的广泛性的人来说却是重要的。

人们高高兴兴地工作、度假，举国上下如同喜庆节日一般——但是另一方面，"最上层"的政治形势却变得日益尖锐起来。

加里西亚的犹太人——切尔纳会晤

华沙会议以后，苏联共产党邀请捷共进行双边会晤，杜布切克领导班子表示欣然同意，因为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会晤在哪

里举行好呢？“在莫斯科，或是在基辅，”苏联同志说。可是，我国领导人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前是不能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国土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取得了妥协：会晤在捷苏边境的一个火车站，即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小镇举行。苏联人同意了，因为他们每天早上可以坐专列来，晚上又可以返回苏联境内。他们一定是害怕在我们这儿睡觉。另一方面，捷克老百姓也唯恐我们的代表团晚上在边境的那一边遭到绑架。

在这种奇特的气氛下，党员作家帕维尔·科胡特向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发出的呼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不安："我们准备忘却过去的一切争论"——这是特别针对教条主义者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尔、什维斯特卡……等人而言的——，"如果你们今天能够捍卫被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视为神圣原则的三个'S'①，那末，你们就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所有城市和乡村的成百万公民在这一呼吁书上签了名。

这个自发行动看来使杜布切克感到十分尴尬。党的领导事先并不知道，然而，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行动。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对此极为恼火。7月29日，他一到切尔纳，就对杜布切克进行攻击。"你们在国内组织这场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运动究竟想干什么？我们也可以向你们提供成百万苏联公民的签名！"

"这并不是我们组织的，"杜布切克回答说，"这是人民的意愿，而且也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表明人民在作我们的后盾，在支持我们。"

勃列日涅夫对这个回答无论如何是不会满意的。在这两条政治路线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区别：我方的政策是依靠人民，不隐瞒任何事实真相，准备进行公开的讨论；对方的情况是，政策

① 三个"S"即社会主义、主权和自由。

是由领导人制定的，强大的政权依靠的是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他们希望关起门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除此以外，苏联人民对于切尔纳、甚至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更难以想象，一个苏联作家会主动散发呼吁书，保证人民对勃列日涅夫一伙人的支持。

切尔纳会晤最后取得了某种妥协，形势几乎丝毫也没有得到澄清。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实际上被“监禁”了起来，无法同布拉格取得联系，所以老百姓早就在猜疑究竟出了什么事，直到最后公报的发表。这个公报犹如一瓢冷水，公报的内容依然是老一套——“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重申“团结”和“忠诚”，这些公式虽然并非毫无意义，但是具有片面性。二十年来，这种老生常谈在所有官方文告中已经司空见惯，它始终意味着对莫斯科霸权主义的屈服。

当代表团返回布拉格时，群众聚集在旧城广场上，要求代表团作出解释。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最良好关系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向群众保证说，这次切尔纳会晤应该认为是成功的，因为苏联同志已经表示愿意忘掉华沙信件，在我们的关系中，将从此开始一个新的篇章。为了把华沙条约其它各国纳入这条路线，结束这场风波，计划于 8 月 5 日和 6 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再同签署“华沙信件”的各党举行一次会晤。

我们觉得这一切十分可疑，但由于领导人显得很有信心，所以大家也就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说明。不过，我曾同参加过切尔纳会晤的几个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交谈过，并不乐观。苏联领导人通过皮·谢列斯特的嘴竟把老党员、党的主席团成员弗朗蒂什克·克里格尔博士说成是“加里西亚的犹太人”。对于这些人，我们又能指望什么呢？

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健全的人类理智一定会取得胜利，苏联领导人最终是会让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顺利召开的。布拉迪斯拉发的十分隆重的会谈仍然使人放不下心来；会谈虽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冲突，但是，也没有进行过什么实质性的讨论，而且公报的措辞又几乎都是斯大林主义那一套。乌布利希、日夫科夫和哥穆尔卡的冷冰冰的态度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我们还是答应遵守已经作出的决议。同报社社长、电台台长一样，我也请求我的同事们尊重公报的精神。我对他们说："即使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继续攻击我们，也不要同他们争论。不要去理睬他们。我们的领导人已经够烦恼的了！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召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一旦杜布切克的地位得到加强，一切问题也就好办了。"

大多数记者同意这条路线，但是，少数人继续在对争论作出反应，这使我们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即使是地方报纸上的一篇小小的文章也会使莫斯科恼羞成怒。当时，向苏联领导人提供情报的是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契尔沃年科① 及其顾问乌达乔夫② 。这两个人源源不断地把经过歪曲的、经常是伪造的消息和地方报纸的摘录寄往莫斯科，他们必须对苏联决定于 1968 年 8 月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罪行承担重大责任。

西方几乎都不知道，在那些日子里，布拉格几起有组织的示威游行表面上似乎是支持杜布切克政策的，实际上却是反对他的。

例如，根据我所掌握的情报，那些掀起解散工人民兵的签名运动的激进分子便是受秘密警察的挑衅分子一手操纵的。我们曾多次设法阻止这种诡谲的阴谋。这并不容易，特别是因为我们不

---

① 契尔沃年科现任驻巴黎大使。

② 乌达乔夫现任驻雅典大使。

想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直到后来，我们才得到确凿的证据，证明所有可疑的行动都是由警察局的人一手制造的，这些行动是有利于杜布切克的敌人的。

达摩克利斯剑

紧张、振奋、新的紧张——这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8月9日，铁托总统二十年来第一次重访布拉格。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人民群众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敢于反抗斯大林、顶住了苏联压力的人物。

表面上看来，这次访问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布拉格市民的热情态度上，他们向铁托不断欢呼。然而，在这次访问中使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布拉格宫举行的正式宴会上，首先同铁托拥抱的正是那些在1961年指控我们是“铁托的间谍”、并想把我们开除出党、把我们抓起来的党的高级干部。“亲爱的铁托同志，”他们说，“我们过去始终站在您的一边。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今天能够对您说这句话！”

我感到一阵恶心。

8月15日，齐奥塞斯库来访。他同样也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对我们来说，齐奥塞斯库成了朋友的象征：自从“布拉格之春”开始以来，他断然拒绝出席华沙条约国旨在谴责捷克斯洛伐克对内政策的任何最高级会晤。群众把他看作奉行独立政策的化身，虽然他同铁托一样，在所有的讲话和演说中一方面鼓励我们要坚定，另一方面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纪律性，特别要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各国采取温和的态度。

8月17日，党的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同宣传单位的主要

记者和负责人讨论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前夕的国内形势，该会将于9月9日召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除了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切尔尼克、姆利纳日、齐萨日和支持"布拉格之春"的其他领导人以外，杜布切克本来也要讲话的。这一天是星期六，全城几成空巷。我们聚集在布拉格宫附近的一座旧宫殿里，突然，我们注意到，在政治局委员们就座的主席团会议桌旁唯有杜布切克的椅子空着。

斯姆尔科夫斯基宣布会议开始。"我替杜布切克同志请个假。他被叫去参加一次会见。遗憾的是不能告诉你们会见的目的，但这次会见十分重要……。"

我们大家面面相觑：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杜布切克在莫斯科？难道他背弃了不离开捷克国土的保证？

好几位记者都请斯姆尔科夫斯基同志讲得明白些。斯姆尔科夫斯基看来似乎什么也不打算讲，但他完全意识到局势的紧迫性。这样的一则消息事实上可以使人们对一切都产生疑问。

"我会告诉你们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开了腔，"杜布切克接到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同志的电话，他一定要同杜布切克谈一谈。他们今天在匈捷边境的科尔马诺会晤。杜布切克并没有离开捷克国土。杜布切克同志认为，卡达尔同志的敦促是有十分严重的原因的。因此，他请大家原谅他的缺席。"

斯姆尔科夫斯基继续说道："这是一次私人会晤，丝毫不会改变我们召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我们召集你们来这里，为的是通知你们，紧张局面还始终存在。至于写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你们现在比以往更应该三思而行，因为'有人'想借口一点点小事来阻止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我们都给弄懵了。斯姆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他要我们明白，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也有可能根本举行不了，而他

在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谈判后却向我们保证："今后再不会有任何事妨碍党代表大会的召开了。"

发生了什么事？克里格尔博士在斯姆尔科夫斯基讲完后发言。他的发言使我们变得更加不安起来。"我必须告诉你们，达摩克利斯剑正悬挂在我们头上，我们必须留神，不要让它掉下来！"

这是明显的警告。事态比领导人迄今告诉我们的更为严重。所有人的发言都是同一个内容：呼吁人民和党保持团结，呼吁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各国保持联盟，千万不要给内部和外部的破坏者提供借口！会议给在座的记者们，甚至连那些以写论战性文章或抗议文章崭露头角的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们首先保证在自己的编辑部里尊重谨慎行事的指示。我认为有责任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局势如此严重，那末我们将怎么办？"我问道，"党的领导是否讨论过，一旦有人企图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或者万一华沙条约其它各国对我们施加压力，阻止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我们将采取什么办法？"

我是有意提出这个问题的。我知道，六月底七月初党的领导曾进行过一次讨论，因为当时苏军在演习结束后似乎不想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和中央负责安全和军队的瓦茨拉夫·普尔赫利克将军当时发现，苏联武装部队制定了储存武器的计划，绘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驻地的地图，并且把他们的电话线安装得能够窃听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谈话。总之，事实表明，那时一场针对我们的军事干涉正在准备之中。七月初，普尔赫利克将军向党的领导写过一个情况综合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干涉的可能性以及需要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

这份报告刚到主席团成员手里，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比拉克就急忙向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以及他的乌克兰朋友、苏共政

治局委员谢列斯特——比拉克经常在"狩猎"时同他在边境见面——通风报信。比拉克火冒三丈地说："一个中央委员怎么会想到苏联同志要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

普尔赫利克将军呈送的报告未经任何讨论，立刻被收回。苏联政府借口普尔赫利克将军"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谈到了华沙条约内部的某些改革"，对他进行了公开攻击。于是，杜布切克让步了，普尔赫利克成了替罪羊。为了解除他的职务，并把他清洗掉，只好解散由他领导的整个部门。

毫无疑问，我国领导的这一严重错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向莫斯科的统治者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并未下定抵抗一场军事干涉的决心。更糟糕的是，后来证实，当时苏联领导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干涉，一派反对干涉。苏联情报机构证实捷克斯洛伐克不会对军事干涉进行抵抗，这一理由加强了"鹰派"的力量；相反，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那就会加强"鸽派"的力量，从而为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妥协扫清道路。

我之所以就这个"犯禁"的、然而却是紧迫的题目提出问题，为的是迫使我国领导人作出回答，是否对抵制苏联的压力——我当时考虑的不仅仅是军事压力——有所准备。我还记得中央委员会书记兹德涅克·姆利纳日以及总理奥尔德里赫·切尔尼克的答复，大意是："我们知道，我们与华沙条约其它盟国之间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能够、而且必须通过谈判加以解决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打算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

很清楚：我们将落入莫斯科的手掌。这使我感到不寒而栗。当时，我还没有一个最后的定见。但是，事后我觉得这种立场是一个大错：谁要是走上了某条道路，就必须考虑到走这一步的后果，并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一上来就事先声明我们不想成为第

二个南斯拉夫，即不想冒类似铁托1948年的那种冲突的风险，意味着我们除了投降，别无其它选择。

乌布利希的圈套和阴谋家

杜布切克和卡达尔的会谈和这次会议是在同一天，即1968年8月17日举行的。直到会议结束，我们对于会谈的内容还一无所知，因为杜布切克在会谈后一直呆在布拉迪斯拉发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那里，没有回布拉格。四十八小时以后，他才回到布拉格，象往常一样，举止坦然，笑容满面。当他的同事问起他这次会谈的情况时，他回答说，他还没有完全明白卡达尔同志为什么非要同他会谈不可。“我甚至有这种印象，卡达尔有一些话想跟我说，但是，他没有说……。”

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细节，是因为有些关于“布拉格之春”的著述，特别是一些“知情人”的谈话往往把卡达尔在“布拉格之春”期间的作用理想化了：他们把他描绘成华沙条约“最高级会谈”的调解人。有些人甚至声称，他在8月17日之所以同杜布切克会晤，是为了警告他提防军事干涉，但是，杜布切克没有重视这一警告，因此，他应对所发生的事承担责任。然而，可以肯定地说，杜布切克根本就没有从卡达尔那里得到关于干涉计划的消息。卡达尔只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了“华沙信件”中的批评而已，当然态度比较温和，比较谅解，因为他对1956年苏联干涉的戏剧性结果毕竟有过亲身的感受。今天，甚至不能排除这种假设：这次会晤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杜布切克的注意力，并使他放下心来，就象乌布利希8月12日坚持在卡尔斯巴德同杜布切克会晤那样。尽管乌布利希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安排这样一次会见，但是，为了不致于触犯他，杜布切克还是同意了。乌布利希当时

表现得非常坦率、无拘无束、通情达理。我还清楚地记得，记者向他提出问题时，他笑容可掬地答道："我们那里是没有书报检查制度的，所以我更能理解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希望取消有关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检查制度的心情。"

在分手时，他友好地对杜布切克说："我现在放心了；我发现你们的道路是正确的，而我也可以到克里米亚度假去了。"

乌布利希是诽谤捷克斯洛伐克领导的罪魁之一。他向杜布切克透露说，他打算在苏联度假一个月，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一切正常，在最近一个月里不会发生任何重大事情。乌布利希休假的消息，使杜布切克和我们大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事实上，苏联领导已经丧失了离间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和在捷克内部寻找盟友的任何希望，已经决定采取当时最粗暴的解决办法，即进行军事干涉。

8月17—19日这几天内，我的助手们向我报告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邮电部长卡雷尔·霍夫曼——我同他很熟，因为他曾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台长和我一起合作过——经常在他办公室里开会；他召集来开会的人是党和内务部的某些干部，他们都是有名的反对杜布切克政治路线的人。霍夫曼的办公室同英德拉和科尔德尔在捷共中央的办公室之间不断有消息和情报来往，谁也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我曾经警告过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然而，他们向我保证说，英德拉、科尔德尔和霍夫曼同志受党的书记处委托在为主席团会议起草文件，因此，他们在一起合作是完全正常的。我的助手们不相信这一点，感到这几个人在搞阴谋。我们低估了这一危险，这表明秘密警察已经不再站在杜布切克一边，而军事情报部门不是完全不起作用，就是只把眼睛盯着西方，要不就是已经受到苏联的控制。

八 月 二 十 日

这一天，人人都平静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天气十分炎热。下午两点钟，我们刚召开了会议。我把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以及8月17日会晤的事向助手们作了介绍。我们仔细审查了直至9月9日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全部节目安排，并对可能引起争论的几个比较棘手的节目又一次进行了讨论。后来，一个地位很高的朋友打电话找我："伊尔卡，你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我必须告诉你，外交部收到我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一封电报。电报说，今天下午三点，有一个陌生人给使馆打电话说：'我是匈牙利人民军军官，正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我不能说出我的名字，你们也不要问；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我接到命令，要在23点20分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讲完后，这个人便立刻挂断了电话。"

"外交部的人对此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这一定是挑衅；有人想挑起事端。不管怎么说，我们已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委员会，当时中央正在召开主席团会议。"

象每个星期二一样，8月20日这一天确实召开了主席团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科尔德尔——比拉克——英德拉——亚凯斯集团是了解军事入侵的准备情况的。他们要求对他们起草的一个文件进行讨论。该文件说，鉴于极为紧迫的形势，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务必延期，同时必须对记者采取行政措施。此外，他们摆出一副苏联代言人的架势，要求在党代会之前就撤换一批干部，大概想以此达到推迟召开党代表大会的目的。主席团会议就是在这样

一种惊恐不安的气氛中召开的，具体议程是讨论通过由斯大林主义分子在卡雷尔·霍夫曼办公室里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早已拟就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的目的是要证明“兄弟般的援助”是必要的。然而，主席团的大多数委员反对这一决议草案，坚持要首先讨论第一书记为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报告。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同一天，我的朋友阿图尔·隆多同他的妻子莉赛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们刚从巴黎回来。隆多感到很幸运，他又回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此外，又刚刚获得了共和国勋章，这象征着他已彻底平反。然而，晚上苏联坦克把他吵醒了，这真是一种残酷的巧遇。一大早，他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同我告别，便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十分关心他的命运，因为内务部的几个处在8月21日又开始了他们以往的活动：通缉并逮捕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对他们来讲，这是报仇雪恨的大好机会。

在这天晚上稍晚一些时候，前英国共青团总书记、英共党员蒙蒂·约翰斯顿来看我，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我们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前夕虽然有些麻烦事，但是尽管如此，一切都还顺利。后来，我也就回家了。

晚上，大约11点半钟的时候，我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中央委员会新闻广播处处长杜桑·哈夫利切克打来的，他说：“我通知你，苏联人已经越过了边界。”

我几乎火了。“你要是喝醉了酒，想开个玩笑，那我也管不着。可我明天早晨五点钟还得起床，让我睡个安稳觉吧！”

“这不是开玩笑。眼下主席团正在开会，乱极了。随你便吧，不过，我劝你立刻去电视台或者中央委员会。”

我赶紧穿好衣服，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他们的反应同我一样。

“你是开玩笑吧？”

“不，这不是开玩笑。”

这时，布拉格上空安东诺夫式飞机的隆隆声已隐约可闻，机群正向机场飞来。

从军事角度来看，入侵是经过周密准备的。8月20日下午，有两架苏联飞机降落在布拉格机场。机组人员声称，飞机发生了技术故障，必须在布拉格等候莫斯科空运配件。机上载有据称是去南斯拉夫的乘客。他们中一部分人坐在机场餐厅里，其他人坐着苏联使馆的汽车进了城。一些捷克警察感到奇怪的是，所有人都穿着清一色的鞋子，提着清一色的箱子。不过，估计可能是运动员，这些警察也就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当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得知苏联军队越过边界的消息时，他们以为在苏联坦克抵达布拉格之前还可以有二、三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不知道，这些“过境旅游者”就在同一时刻从他们的箱子里取出了机关枪，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那两架“有毛病”的飞机原来是活动雷达站，并且立刻开始了工作。苏联军用飞机已经开始着陆，坦克隆隆作响地驶出了机舱。带有苏联驻布拉格使馆外交牌照的汽车已经等候在飞机跑道旁，每辆车中都坐着契尔沃年科大使的手下人，负责带领坦克占领市内各既定目标。这是一国大使馆在一个“兄弟国家”里的十分令人奇怪的举动。

我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的同事们，请他们到电视大厦来听候我的指示。午夜时分，我来到中央委员会大厦，那里人声鼎沸，人们从布拉格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有记者，有布拉格市委的积极分子，也有各工厂派来的代表团，他们都已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尽管电台一点消息都还没有广播。全城的“小广播”都开动起来了。

“邀请”失败

主席团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听说，当切尔尼克在晚上11点45分收到报告入侵的电话后，会议中断了。杜布切克几乎要哭了出来，沉痛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剧。我这个一生都致力于苏捷友好的人竟遭到如此的对待！”但是，在经过最初几分钟的惊慌之后，会议又继续进行，讨论了必须采取的种种措施。

我们许多人都认为，党的领导必须立即召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国会议员，对军队和居民实行总动员。我们提出了种种建议，并进行了讨论。随后，我来到布拉格市委。在那里，好些代表对我说：“我们必须使杜布切克相信，召集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唯一的答复，因为他们是由全党选举产生的。应该由国家最高机关作出决定！”

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主席团。在此期间，主席团经过一场激烈而混乱的辩论，通过了姆利纳日和克里格尔提出的决议案；决议谴责苏联人的军事干涉不仅破坏了国际法的准则，而且也违反了华沙条约的准则。极少数人——比拉克、科尔德尔、里戈和什维斯特卡——反对这个决议。在这期间，斯沃博达从布拉格宫来到了中央委员会大厦，但是并未参加表决，因为他不是主席团成员。另外，还有一个许多研究“布拉格之春”的历史学家尚不知道的重要细节：斯沃博达是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中唯一在当晚十一时左右就已从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那里接到入侵的消息的人。也就是说，他在那天晚上就已接受了他的新角色，尽管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四处散布关于他忠于杜布切克的谎言。

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除立即召开了议会和中央委员会会议外，没有具体的实际措施。我们曾设法说服杜布切克同时召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他并不反对，但是，主席团会议结束后，许多参加会议的人已经离开中央委员会大厦。

当我们得知苏联坦克已经在布拉格机场降落，并且正向市内推进时，我们试图劝说杜布切克和其他同志及时离开中央委员会大厦。布拉格的维索昌伊工人区的代表坚决请求党的领导人到工厂去躲避一下，那里有工人民兵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可以保护他们。他们可以在那里召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也许还可以进行谈判。然而，杜布切克却认为，假如他离开这里，那就等于是临阵脱逃，一个船长是不允许离开下沉的船的。因此，他留了下来，而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和西蒙不愿让他独自一个人留在这里……

保守的教条主义分子英德拉、科尔德尔、比拉克、什维斯特卡和亚凯什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看来，他们已经同苏联人接上了关系。由于布拉格和莫斯科之间有一段时差的缘故，他们的阵营也是一片混乱：他们预计苏联人要到凌晨一时才能开进来，并且希望刚好在这个时刻通过电台广播他们要求苏联军队给予援助的“呼救”，但是，布拉格当时是晚上十一点钟，这就使他们乱了阵脚。

从道义上来说，我是十分尊重杜布切克的决定的，但是，我认为从政治上看，这是不策略的。因为还有许多其它解决办法可供考虑：例如，到维索昌伊的那家工厂去，向人民发出号召，在那里召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同苏联人谈判。但是，杜布切克不想这样做。

因此，我们极力主张立即通过电台广播主席团关于谴责苏联

干涉的公报。正常情况下，电台在凌晨一时结束广播。我们把这份公报送交电台，指示值班记者请居民守候在收音机旁，并播放庄严的乐曲，如贝多芬和斯美唐纳的乐曲。听到这种乐曲声的人纷纷叫醒了他们的左邻右舍。许多人想起了1938年慕尼黑协定公布后的那个夜晚：这种音乐令人预感到事情不妙。随后，开始宣读主席团公报，但是，广播马上中断了，接着是一阵绝对的静默。不一会儿，电台技术人员同中央委员会的斯姆尔科夫斯基联系上了："邮电部长命令我们停止所有的广播。"

斯姆尔科夫斯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霍夫曼部长是叛徒，现在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中央委员会决定，谴责苏联干涉，请你们宣读公报！"斯姆尔科夫斯基说。

于是电台继续广播。霍夫曼及其代理人企图使电台停止广播的图谋失败了。他们委托前电台台长米洛斯·马尔科和捷通社前领导人苏列克通过所有电台和电传打字机播发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关于吁请苏联领导给予援助的紧急呼吁书》。然而，电台的记者们已经筑起了一道街垒，并防守在播音室里。他们拒绝米洛斯·马尔科和用机关枪武装起来的秘密警察特工人员入内。在捷通社内，苏列克企图利用电传打字机向国外播发这个呼吁书的图谋同样遭到了秘书们的抵制。

电台的记者们，特别是电台技术人员在这个晚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叛徒们播发"呼吁书"的企图得逞，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呼吁书"反映了党的领导的意见，那末就会在国内，甚至在国外引起极大的混乱。苏联领导就可以宣称，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兄弟般的援助"……。他们虽然是这样干的，但是，却拿不出任何具体的证据证明有这种"要求"。干涉发生至今已有八年之久，莫斯科和布拉格还始终指不

出"党和政府领导人"中有谁签署了这份"呼救书"。此外，一旦"呼救书"广播了出去，毫无疑问会削弱抵抗斗争的力量。电台、电视台以及邮电部门的记者和技术人员团结一致，共同挫败了这个阴谋，这不愧为一件历史功绩。

特别是8月21日以后，当国家领导人被劫持去莫斯科，而无法向人民发出呼吁时，是电台使举国上下保持了团结。

我们从留在中央委员会大厦里的同志那里获悉，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和西蒙等党的主席团委员于8月20日早晨均被苏联军官和一群捷克斯洛伐克秘密特工人员逮捕。切尔尼克当时是政府总理，他是直接在政府官邸里被抓走的。苏联坦克把他们带到机场，再由苏联军用飞机从那里把他们空运到一个目标不明的地方。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被押送到莫斯科之前，先是在波兰华沙条约的格利维采机场，而后又在乌克兰被人看管了起来。

试问，这种政治上的强盗行径在战后欧洲是否有过先例？国家首脑和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受到一个"友好"国家军队的军事包围，并被作为人质绑架到国外，这种情况又曾发生过吗？如果苏联人得逞，在布拉格组成以英德拉为首的"革命政府"，杜布切克和他的同志们的命运又将会怎样呢？他们会遭到和伊姆雷·纳吉或斯兰斯基同样的命运吗？大家也都知道，苏联人曾借口"加里西亚的犹太人"克里格尔博士的家乡现在已经成了苏联领土而企图把他留下来。事实上，他们是想把他投入监狱，因为他坚决拒绝在莫斯科的"城下之盟"上签字。杜布切克愤怒地声明，假如没有克里格尔同行，他将拒绝返回布拉格。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才终于被迫把克里格尔从卡卢加城——他被单独隔离在那里——释放。

我 要 找“鸡”

8月20日午夜一点，电视台停止了播音。我只好安排次日早上七时开始广播。因为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以及其他人仍然拒绝离开中央委员会大厦，而我们也不想落入占领者的手中——他们的坦克已经在凌晨四时开始包围大厦，我们决定走后门离开大厦。

“千万别回家！”我的朋友劝我说，他们都知道秘密警察的这一套惯用手法。后来我真的听说，我的名字已被苏联人和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列入需要立即予以逮捕的三十人的名单之中。从那时起，我便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开始生活在各种人家里，他们都待我如宾客。

第二天早上，即8月21日，苏联士兵占据了电视大楼。我前往议会，那里正在召开特别会议。要进去，是相当费劲的，因为苏联士兵包围了国民议会，禁止他人入内。

我们一起有好几个人，我们出示了议员证件，指出我们有豁免权。负责指挥士兵的一个苏联军官不明白什么叫“议员豁免权”，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一再坚持说：“任何人不得入内！”（这是命令！）

前国防部长隆姆斯基将军也在我们中间。战争期间，他是苏联境内捷克斯洛伐克志愿兵团的军官，荣获过许多奖章。他指着他的将军肩章、他的苏联勋章，以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命令说：“我是将军！我命令你们，让这些议员进去！”

习惯于服从上级命令的士兵十分惊愕，为我们让开了一条路。于是，议会里开始了自战争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议会历史上的一次时间最长、最不寻常的全体会议。

会议持续了六天六夜；议员们不能离开大厦，吃住都在里面。我成功地同我的助手们接通了电话：电视台的办公大楼正对着议会。早晨八时，电视台开始播音，节目是谴责军事干涉。我的助手们定时通过电话向我汇报发生的情况。

"一个苏联上校呆在你的办公室里。他要我们以台长的名义、即以你的名义命令立即停止广播，否则他将炸毁播音室！"

这个苏联上校不知道，新闻节目的播音室并不在这座大楼里，而是在布拉格的另一个城区。我断然拒绝这一要求，并让助手转告他："我，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台长伊日·贝利康，服从合法政府和以杜布切克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我没有义务服从入侵军的上校的指示。"

于是，这个苏联上校命令他的士兵搜寻播音室，而我们则争取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记者们得以广播有关动员群众的消息。当苏联士兵冲进第一个播音室时，第二个播音室便接着工作，然后又是第三个，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地进行播音。为了物色备用的播音室，我们曾采取了种种措施。直到今天，我还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回忆起记者们的表现以及技术人员的出色成绩。在正常情况下，为了组织一次实况转播，他们会向我们提出难以满足的时间要求，如今，在这紧迫的时刻，他们却创造了至今连专家们都不能理解的技术奇迹。不知道他们在短短几个小时里究竟是怎样在私人住房内、在建筑工地上、在工厂里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卓有成效的播音室的。不错，这些广播无法使全国都收看到，但是，它存在着。一旦被发现，它就转移到另一个地点。

相反，电台的工作一切照常。这也是记者和技术人员出色工作的结果。电台的工作容易一些。因为地方电台是同全国的电台广播网连结在一起的；各地方台可以轮流广播。此外，电台在各

大工厂、公安局、甚至军队内都有广播室，军队还向电台提供了强大的发射台。因此，电台能够保证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广播。

我必须再次强调，8月20日以后我们在电台和电视台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仓促上阵的，事先毫无准备，尽管官方的宣传一味声称，说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些电台根据精心安排的计划得到了西德的支持。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搞秘密电台的这一紧张时期也有它可笑的一面，充满了十分典型的捷克式的幽默。

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分散在各处，主要是在私人住宅里，所以我们是用假名进行电话联系的；例如贝利康的假名是“燕子”等。我的一个助手向我讲述了他在特别倒霉的时刻进行的一次谈话。那是在苏联坦克包围了临时电台的时刻，当时他已在那里。他立即打电话给另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我告诉他的，以便同负责人联系。

“我要和‘鸡’讲话，”他说。

“这里没有‘鸡’，”电话线的另一头回答说。

“不！你们那里有一个是‘鸡’，请找一下！”

“谁是‘鸡’？”他听到电话的另一头在喊。

有声音回答说：“我是‘狮子’”，“我是‘老虎’”，就是没有人是“鸡”。在被围困的电台里气氛越来越不安。

“你们一定要找到‘鸡’，因为我们已经被苏联坦克包围，需要你们接替我们，行动要迅速，我们不得不停止广播！我的任务是把这个消息转告‘鸡’。”

一个新的声音出现在电话线的另一头：“这里没有‘鸡’。你们能肯定要找的人确实叫‘鸡’吗？”

“你是谁？”

“我不能说出我的名字。”

“从你的声音来判断，你是……。没错，你准是‘鸡’！”

“我？我对此一无所知！”

有时，假名分配得如此之快，以致有关本人都来不及习惯。

党的秘密代表大会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广播应召前来布拉格。他们被要求在8月22日到指定的工厂集合，然后，再由那里送往开会地点。

议会大厦已被苏联军队严密包围，我和其他几个议员在考虑怎样才能脱身。

“不要着急，我们会有办法的，”外面的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们说。

8月22日早上，有一个医生来到议会大厦，还跟着几个护理人员和抬担架的。“我们把你们藏在麻布被单下，”医生说，“然后，用红十字会的救护车把你们带走。车子就停在议会大楼门前，送你们去参加党代表大会。”同志们想出来的这种办法使我们深受鼓舞。然而，另一个议员——他是一个老党员——所表示的怀疑却象一盆冷水迎面泼来：“如果这是一个圈套呢？”事实上，我们既不认识那位“医生”，也不认识他的“助手”。在电话里经过一阵相当复杂的交谈后，对方终于向我们保证，我们的营救者确实是布拉格市委派来的。就这样，我们坐着救护车来到维索昌伊工人居住区的一个大工厂，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大会，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事情：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的共产党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不得不秘

密地举行，因为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坦克阻止大会公开召开。这次大会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自发性。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在既没有火车又没有汽车的情况下，代表们听到电台广播的通知后从全国各个角落纷纷赶来。他们从工厂、农村和城市——他们在那里十分安全——来到已被苏联军队占领的布拉格。我们原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会来四、五百名代表，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当我们从救护车上下来后一看，竟然已经来了一千人，而且还陆续不断地有人来到。截止中午已经到了一千三百名代表，已占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一些人就说："会议已经达到法定表决人数，根据党章规定，我们可以举行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讨论了。"经过民主讨论，绝大多数代表同意这一建议。

随后，选举产生了主席团（其中也包括我）。我们提出了一个日程安排，这当然是临时性的，因为所有准备好的材料都存放在中央委员会大厦里。代表们临危不惧，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纪律性和决心。每个发言者都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一个同志宣布说，苏联坦克来了。"注意，你们的掌声太响，如果你们表示同意，最好是举双手；如果不同意，就举一只手。"

虽然苏联坦克现在随时都可能开进工厂，把大家杀死，但是，党代表大会还是照常继续进行。任何人都可以发言；各种建议都经过仔细讨论，没有任何歇斯底里；对新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些代表坚持要把所有在事发之前就采取反对新路线立场的人正式开除出党。相反，我的看法是，由于苏联进行干涉，现在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今天必须从新的基础出发，不要再纠缠在过去一些事情上。不管这个人或那个人对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应负多少责任，现在主要看他对军事干涉的态度。如果他反对军事干涉，那末我们必须把他们当作自已人看

待，即使他在争取民主化的斗争中曾经是保守派或教条主义者。”

讨论进行得十分民主，甚至对举行抗议苏联干涉的总罢工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个建议是很自然的事——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场罢工矛头针对谁？针对人民吗？因为人民势必会因供应紧张而叫苦不迭，”一些代表嚷嚷说。最后，取得了妥协：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举行一个小时的总罢工，这次罢工成了举国一致的示威游行。这是实行社会主义二十年来的第一次总罢工。完全可以想象，在示威者十分激动的情绪中掺杂着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感，他们赞成并参与了这一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如此非同寻常的冒险行动。

在党代表大会上，军队代表并不隐讳他们的震惊：“我们的士兵应该做些什么？他们被关在兵营里，眼看着苏联坦克在他们鼻尖底下隆隆驶过，几乎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怒火。至少应该交给他们保护党代表大会的任务！”

一个十分激动的军官再三重复道：“下命令吧，向在我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入侵坦克开火。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些坦克炸到天上去，以示警告，从而证明我们并没有投降！”

正当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切尔尼克等领导人被拘留在莫斯科期间，一些亲苏的领导人不见了，他们躲到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去了。因此，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们这些被本届党代表大会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人准备对付这越来越糟的局势。我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证仔细地收藏好，这张委员证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运动的堡垒之一“斯科达”工厂的一个车间里发给我们的。在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二十九个年头之后，我荣幸地被遴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这样的时刻当选中央委员既不能带来地位又不能带来荣誉，而且正好相反。我在这件事上看到了我的一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在法西斯占领时期，我冒着生命危

险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今天，在另一种占领下，我被选入了党的最高机关。

城下之盟

我同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推选出来的其他干部一起开始在工厂办公。这个工厂有数千工人在继续坚持工作。同志们不断地进进出出，以便同其它工厂和州市取得联系，向中央委员会反映情况，并接受指示。座落在伏尔塔瓦河畔的中央委员会大厦还仍然被苏联武装部队占据着，他们企图使那里的工作人员服从入侵者的旨意，但是，白费力气。我们避难的工厂自然而然地成了新的革命中心。“党又回到了她的源泉，”我们自豪地说。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8月27日。这一天，我们十分高兴地获悉，被带往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正在飞回布拉格的途中。自从我国领导人被劫持出布拉格，象战犯一样地被押往莫斯科后，他们变得更孚众望了，然而他们带回来的将会是什么消息呢？

从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使馆透露出来的消息告诉我们，尽管我国领导人回来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对“协议”的内容抱有奢望。这使人感到事情不妙，不过，我们在心理上对令人失望的后果已经有所准备：当时的气氛同1938年慕尼黑协定颁布前十分相似。

杜布切克、克里格尔、姆利纳日、斯沃博达、切尔尼克以及其他领导人被安置在布拉格宫里，给他们拿来了干净衣服，并派医生为他们检查了身体，因为他们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杜布切克头部受伤，无法立即发表广播讲话；他依然带有在被劫往莫斯科期间所遭受的虐待的痕迹，这种痕迹将永远不会磨灭。苏联领导人迫使杜布切克和他的同志们在签订城下之盟以后又邀请他

们出席在克里姆林宫隔壁房间里举行的宴会，在那里，乌布利希、日夫科夫、哥穆尔卡和卡达尔正举着斟满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的酒杯等他们为“友谊”干杯。试问，普天之下还有比苏联领导人更寡廉鲜耻和玩世不恭的表现吗？实在做得太过份了：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们。

我们从工厂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我国领导人那里，向他们转达：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他们重新当选，我们曾经设法填补因他们被劫持而出现的政治上的真空。我们听从他们的安排。但是不久我们就获悉，他们已经签署了秘密协议，而这个协议只不过是一份经过掩饰的投降书而已。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取消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

杜布切克和他的同志对我们说，一提到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就火冒三丈。这完全可以理解：他怎么可能设想，只根据代表们和党员们的意愿就可以召开党代表大会，而且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所作出的决议事先又没有得到莫斯科的同意？例如，他们竟然根据政治要求，而不是在盲目“忠于”莫斯科的基础上民主地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正因为如此，苏联领导人坚持要宣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无效。

开始时，我们还抱有幻想。我国领导人之所以投降，也许是因为他们在莫斯科的处境十分困难，迫于种种压力而不得不受人摆布？而现在他们可以出席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说明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同莫斯科签署秘密协议的。我们可以肯定，大多数代表是不会接受这个“协议”的，他们将委托杜布切克在布拉格、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新的谈判，以便找到一个我们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然而，除了拒绝在莫斯科城下之盟上签字的唯一的党的主席团委员克里格尔以外，杜布切克和其他人都不无苦衷地对我们说：“已经太晚了。这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既然

已签署了协议，就必须履行这个协议，否则将会出现一场大屠杀。眼前我们必须宣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无效，以后还可以再召开，要有耐心……。”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天无疑是我们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斯沃博达和切尔尼克深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他们甚至成了斗争的象征。公开反对他们的意志，意味着破坏信任这一宝贵的资本，而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堪设想的。与此同时，我们对他们的立场的正确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何况他们在听取各种反对意见时总是带着狐疑的态度，而且纯粹是从感情的角度来拒绝反对意见：“我们现在的处境不允许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讨论。我们不要再给杜布切克增加困难了，应该信任他，赋予他全权处理各种问题的自由！”

当然，我并不是想进行挑剔，不过，对于这种做法我是不能同意的。我并不十分清楚究竟该怎么办。我的印象是，似乎已经在一场重大的战役中吃了败仗，唯有进行新的抵抗才能免遭全军覆灭。苏联人在军事上是主宰，但是，他们却完全陷入了政治上的真空。他们未能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特别是未能达到扶植阿洛伊斯·英德拉“政府”的目的；在国际上，他们同样也是孤立的。我们从无线电里了解到，世界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声援杜布切克的群众集会，我们还听到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表示反对苏联的干涉，这使我们感到十分欣慰，特别是因为我们正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北越人和葡萄牙共产党人阿尔瓦罗·孔哈尔率先对苏联干涉表示欢迎——后来，卢森堡和西德共产党以及希腊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的人也这样干了——而感到十分痛心。当然，我们对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教条主义以及他们对苏联领导人的盲目服从是知道的，然而，他们竟对苏联人的这种最令人发指的极端非法的行径拍手叫好，这是我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不过，世界各

国的声援运动给了我们勇气，我们建议党的领导立即在布拉格召开欧洲各国共产党会议，并请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共产党人在我们和苏联人之间进行调解。但是，杜布切克和他的同志们却说，这样做现在同样也为时太晚了。“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莫斯科的城下之盟，就不能再进行任何活动了。”

问题仍然存在

后来，当我负责发表捷共第十四次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在勃列日涅夫的威逼下，胡萨克宣布这次党代表大会无效——的记录，并为这一文件撰写前言时，我再一次仔细地回顾了1968年所发生的事件。

“你们走得太远了，”有几位左派朋友对我说，“你们如果走卡达尔或哥穆尔卡指出的道路就好了。”

换句话说，走一条由技术官僚自上而下实行改革的道路。我回答他们说：“早在诺沃提尼时代，捷克斯洛伐克就已经处于匈牙利或波兰的那种局面了；然而，群众要求有更多的自由和发言权。匈牙利式的民主化已经过时。如果我们想使社会主义在国内再次赢得人们的信任，那末我们是不能满足于如此微小的改革的。”

今天我深信，如果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1968年8月20日以前，甚至在切尔纳会晤以前就对苏联采取一种明确的态度，那末我们也许能够暂时地，甚至从根本上阻止苏联的干涉。我们本来可以向苏联声明，我们愿意继续做忠实的盟友，丝毫也不打算背叛社会主义的联盟，不过一旦发生干涉，我们将被迫进行自卫。如果我国领导人象齐奥塞斯库和铁托那样，采取具体措施——例如对军队、工人民兵和居民实行动员——来进一步强调这

一声明，那末本来也许有可能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妥协的。

即使在干涉发生以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本来也仍然有可能避免莫斯科协议带来的不幸后果的。杜布切克本来是可以通过辞职来阻止占领者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分子利用他作为安抚精神上受到严重创伤的人民的挡箭牌的。这样一来，苏联人将被迫公开建立军事占领政权，而这样的政权是不可能达到其目的的。

无可否认，"布拉格之春"运动的政治错误之一是缺少一个明确的纲领：这是一场象今天的匈牙利和波兰那样的旨在实行有限的改革和人事变更的"自由化"运动呢，还是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使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化的运动（包括使人民拥有广泛的发言权、甚至直接参与政治，即使这种自发性可能引起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冲突也在所不惜）？

我不认为应当由杜布切克对"布拉格之春"初期缺乏明确的纲领一事承担责任，因为——我再重复一遍——在一个由一党制统治的社会里，是不可能事先拟就新纲领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边干边制定纲领。

另一方面，杜布切克错误地估计了莫斯科的态度。他希望苏联领导人最终会理解，一旦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吸引西方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的"诱人橱窗"，同样也是符合苏联本身的利益的。如果说，这个愿望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似乎还有一定的道理，那末随着赫鲁晓夫的倒台，铁板一块的新斯大林主义便渐渐地抬头了。而这种新斯大林主义根本不允许苏联领导对"布拉格之春"有任何谅解的表示。

最后，我今天深信，当时能够保卫"布拉格之春"的唯一办法是积极动员群众、工人民兵和军队；采取措施，使敌人不得不考虑冒险进行干涉所可能引起的后果：这种干涉将会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难以容忍的局面。正当苏联领

导忙于筹备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而且同中国的冲突日益尖锐的时刻，上述几个方面都不是无足轻重的。

杜布切克的领导班子还低估了在国际上寻找盟友的必要性，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已经摆脱了莫斯科的权威——，还是在西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中间，或是在正在走自己道路的第三世界各国中间，情况都是如此。杜布切克的领导班子本来是可以尽快召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更换中央委员会的。这样，新的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为各种形式的自治开放绿灯，在我国政府首脑被劫往莫斯科以后，也就不会出现政治上的真空，而且国家机关也可以在工人领导下继续发挥作用。

许多目击者都力图理解和解释这些事件：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 1975 年在他的未完成的《回忆录》中，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1974 年在他的《致联邦议会的信》中，特别是兹德涅克·姆利纳日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中都是这样做的(该书对 1968 年捷克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尽管我在其中的许多方面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对于未来，重要的是，应当认识并分析曾经犯过的不容置辩的错误，以保证有朝一日重新振兴的社会主义革新运动不再重蹈覆辙。

外　交　官

1968 年 8 月 31 日，当我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知莫斯科协定——该协定从未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发表过——的内容时，我感到无法向电视台的同事们说这样的话：“你们必须接受这个协定。你们必须避免使用‘占领’一词。你们必须避免涉及这一‘现实’。你们必须装得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所以

当中央委员会书记对我讲下面这番话的时候，我感到如释重负，他说："勃列日涅夫对你和电台台长海兹拉尔，还对内务部长帕维尔同志和外交部长哈耶克——他在联合国里为我们的事进行了辩护——十分恼火。你们最好休一个月假，然后我们再看看情况……。"

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对我的免职，我接受了这一决定，认为这是事态发展和我本人的态度所引起的必然结果。他们把我叫到中央委员会，建议我去罗马参加意大利国际电视节，并在那里听候进一步的指示。

几个星期之后，党的领导决定我担任参赞搞外交。恰巧，捷克斯洛伐克驻罗马大使馆有一个空缺。要长期离开我的国家，这使我感到十分痛苦，然而，我不想使杜布切克感到为难，便接受了这个安排。"如果党希望我这样做，我同意，"我说，"我就在罗马呆一年，但是，有一个条件，中央委员会、议会和政府反对苏联干涉的立场不能后退，不能使入侵合法化。否则，我无法为这个政府服务。"

1968年11日1日，我乘飞机前往罗马。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还能不能有朝一日重返家园？也许这是一种并非出于自愿的流亡生活的开始？我还在想，对于我这样一个多次批评过我们的外交工作的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大使馆会如何接待我呢？

那里的情况相当复杂。既有守旧派的干部，他们都是些欢迎苏联干涉的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但也有"布拉格之春"的同情者。由于我的到来，出现了新的紧张关系，因为教条主义者们估计，我的到来将会加强"自由派"的地位，当时自由派正在设法反击保守派企图控制大使馆的越来越露骨的阴谋。

1968年11月至1969年夏天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困难

的时刻。我当时仍是国家的合法代表，眼见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每况愈下，但是，我远在他乡，无能为力；我也目睹了一些人的卑劣行径，当这些人发现杜布切克不久将失去党的信任时，便开始寻找藏身之地和为自己谋取职位，并且千方百计想除掉那些可以证明他们曾经支持过“布拉格之春”的、使他们感到不快的见证人。这种精神状态使我回想起从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直至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入侵前的第二共和国。大家都知道，每当舆论界因失败和占领而丧失斗志的时候，形形色色的老鼠就会从洞里爬出来四处活动。

德国共产党人

1968年使人特别难过的一件事乃是两个德国的共产党人。德国统一社会党和东德秘密机关是参与准备军事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角色。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库尔特·哈格率先对“布拉格之春”进行公开的攻击，指责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同“西德帝国主义分子”合作。这一攻击自然是针对捷共整个反斯大林主义的进步派的。我们党在东柏林提出了抗议，但是，连一个答复也没有收到。相反，除了苏联和保加利亚报纸外，东德报纸是散布关于捷克的谣言最卖力的一家。例如，东德报纸抓住在索科洛夫附近桥下发现的美制旧式武器大做文章，把这说成是美帝国主义染指捷克斯洛伐克的有力证据——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正是东德国家保安机关把这些“证据”偷运进捷克斯洛伐克的。

不明国籍的飞机在捷克斯洛伐克上空散发反对杜布切克的传单也是东德搞的。他们还在德累斯顿为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中的所谓“国际主义核心”提供基地，已经有好些因从事非法活动

而遭捷克情报机关革职处分的特工人员在那里积极活动。苏联军队1968年8月21日占领了布拉格的内务部后，逮捕了前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的几名助手，并将他们立即带到德累斯顿基地进行审问。在那里，他们还搞了一个“伏尔塔瓦”广播电台，自入侵第一天起就企图通过广播扇动群众反对杜布切克。有意思的是，东德的保安机关早在六月初就开始招募在东德工作或学习的捷克专家为一个“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报导事实真相”的广播电台进行工作，答应付给他们一大笔德国马克，“以后”还为他们安排高级职务。如果他们加以拒绝，并且把这个建议告诉第三者，那就将受到“最严厉”的对待。几乎所有人都拒绝这样干，但是，他们也没有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汇报这一情况。

于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得不招募苏台德地区的旧人员来办这个“伏尔塔瓦”电台。当8月21日开始广播时，捷克人听到的声音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播音员的语调上都使他们回想起三十年前为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准备的维也纳的纳粹电台。

克格勃搞的《消息》杂志也是在德累斯顿印刷的，然后用苏联飞机和汽车运进捷克，再由占领军的士兵们进行散发。苏联和东德的情报机关为这份杂志的编辑部搜罗了一些乌七八糟的捷克斯洛伐克记者，这些人都是在国内被开除的，其中有的是因为无能，有的是因为搞情报活动。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在纳粹统治下还曾为法西斯报纸如《旗帜报》（这是一家类似《冲锋队员报》的报纸）撰写过许多排犹反共的扇动性文章。因此，《消息》杂志和“伏尔塔瓦”电台进行露骨的排犹宣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替苏联的干涉辩护，德国统一社会党对西欧、特别对第三世界各国共产党进行了十分频繁的活动，把捷克的局势说成是西德进行阴谋活动的结果。向古巴提供的情报最多，这些情报把“布拉格之春”描绘成是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维尔纳·兰贝茨

就亲口对劳尔·卡斯特罗这样谈过，目的在于通过他使他的哥哥明白，对于古巴来说，这种发展同样也意味着巨大的危险。事实上，菲德尔后来在1968年8月23日那篇为苏联入侵辩护的著名演说中所提出的论据几乎全部引自东柏林出版的东德报纸。

在华沙条约所有入侵部队中，东德军队对于占领任务准备得最充分。他们带有写着他们占领区内所有城市和乡村的党组织、人民委员会和民族阵线小组主席的地址的信封，用这些捷克文书写的信件邀请他们进行磋商，并且把入侵说成是“兄弟般的阶级援助”。尽管如此，东德部队却不得不马上从居民区撤往林区，因为他们的军队使人清楚地回想起希特勒军队，而且发生冲突的危险也太大。此外，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国家政府的抗议也不是没有作用的，他们谴责东德部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是明显违反波茨坦协定的行为。因此，1968年秋最先撤出捷克的也是东德军队。但是，这并不妨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把侵略说成是巨大的功绩，而且还向成百名军官颁发了高级勋章，以表彰他们的“勇敢行为”。

德国共产党的态度同样也使我们感到十分气愤。我们过去一直坚决维护该党在西德的合法地位，但是，这个曾经深受斯大林主义和宗派主义之害的政党却不惜使用蹩脚和卑鄙的谎言来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和为苏联入侵辩解。

格列奇科元帅的突然袭击

经过一阵兴奋和理想主义热潮，特别是经过1968年8月20日至27日这段紧张的日子之后，正当我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时候，令人厌恶的倒退时期来到了。我感到痛苦不堪，以致夜不能寐，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然而，我一再跟自己说，

一定要让我们的领导人挽救还能挽救的一切。

因为我仍然是国会议员，所以在此期间曾多次回国作短期停留。因此我得以在1969年1月参加捷克青年大学生扬·帕拉赫的葬礼，他是为抗议人民和政府的麻木不仁而自焚的。他的这一行动并非总是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浪漫主义的一时冲动而已。公开自焚还是一种新现象，它并不符合中欧的传统。但是，这反映了青年的抗议，他们清楚地看到，领导集团在“首先拯救青年”的口号掩饰下，实际上是准备葬送青年的理想，举手投降，把国家奉献给占领者。扬·帕拉赫的葬礼是体现人民团结的最后一次伟大的示威，充满着尊严和反抗精神，它也是向领导人发出的呼吁：“行动起来，我们还在支持你们，你们是可以指望我们的！”

然而，党和政府领导人并没有依靠青年、农民、工人（特别是冶金工人，他们在1968年12月曾想举行罢工，保卫斯姆尔科夫斯基，反对胡萨克的攻击）和知识分子这样一些群众，相反，却企图使他们平静下来，同时向苏联人证明，他们能够控制局势，并想以此促使苏联军队撤退。这不禁使人回想起，为了使公众接受莫斯科协议，总喜欢强调说，苏联军队的留驻是“暂时的”——这是白纸黑字写在莫斯科“协议”上的。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然而，杜布切克和人民群众却信以为真。1969年2月，我在布拉格有过一次同杜布切克交谈的机会，他显得十分自信。“如果我向苏联领导证明我已经控制了局势，”他说，“那末，他们就只好撤军，然后，我们大家一起重新回到1968年的道路，并且要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

杜布切克始终相信这一点，直到他在1969年4月17日下台。他的下台是勃列日涅夫一手操纵的，事先由格列奇科将军发了一个最后通牒。格列奇科乘坐的军用飞机没有通知捷克当局就

在驻捷苏军总部米洛维策降落，这证明，他把我国视若殖民地。同样不该忘记的是，在这紧张时刻，斯沃博达和古斯塔夫·胡萨克扮演了多么坏的角色。他们出卖杜布切克以后便同苏联的元帅们搞到一起去了。格列奇科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末杜布切克下台，要末苏联军队接管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出来毛遂自荐，斯沃博达负责执行这一行动。群众因捷克斯洛伐克在冰球赛中战胜了苏联而举行了一次自发的示威游行，这成了格列奇科元帅进行这次行动的借口。捷克秘密警察急忙抓住示威游行这件事，制造了一起反对苏联民航驻布拉格办事处的挑衅行动。似乎纯粹出于偶然，这家办事处当天下午在遭到袭击和焚烧前数小时就已经撤离，而且这天下午有人把铺路的石子卸在苏联民航办事处门前，而那些不明身份的肇事者使用的武器正是这些石块。

第七章　没有尽头的春天

流　亡

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更是不幸。我身患重病的父亲在阿罗木次去世了，终年83岁。为了参加他的葬礼，我最后一次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时局使他感到十分痛苦："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第三次占领，我已经受够了！"

然而，最使他感到痛苦的莫过于我启程前往国外。1969年1月，当我去看望他时，他突然哭了起来。他已经把我看成是一个被驱逐出境的人，一想到这一点，他就无法忍受。后来，他的骨灰被运往摩拉维亚山区他的出生地新乐村。

我迟早是要被召回的——我带着这样一种感觉回到了罗马。到那时，我应该留在国外呢，还是应该回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很难下的决心，因为一切都促使我想回国，那里有我的哥哥和妹妹，有我的朋友。此外，我坚信，一个政治家必须同他的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直至最后一息。然而，我在国内又能干些什么呢？是参加抵抗斗争呢，还是象其他许多人一样，举手投降？不过，我还有一些时间考虑，因为1969年4月17日上台的胡萨克还不敢立即撤回对苏联干涉的谴责。直到1969年8月20日他才撤回了这种谴责。

这一天，我正在罗马以南的一个地方休假。我接到大使馆发

来的一份电报，要我立即返回布拉格。刚好在入侵一年以后召我回国，我知道，回去以后再也不可能离开我的国家了。我写了一封抗议信给我们的外交部：解除外交官的职务不是至少应在三个月前通知本人吗？答复是明确的：我必须携带行李立即回国，不得有误。

当时，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党报上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是胡萨克掌权以来对我所进行的最早的诽谤攻击。例如，其中有的文章说，在我的布拉格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张希特勒像，还说我同西德驻布拉格的代表狼狈为奸。另一方面，有人开始故意歪曲我在电视台的作用：说我歪曲现实，不让真正的共产党员讲话，驱使人们自杀，扇动暴力行动等等。我虽然仍是国会议员和参赞，但却从未收到对我的抗议信的答复，也从来没有发表过我的辟谣声明。事情很清楚，假如我回到国内，那是根本不可能再为自己进行辩护的。

于是，我决定流亡，并不是由于害怕被捕，因为我在精神上已经作好了同敌人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准备，而是由于我在国外能够更好地为我的国家服务。当然，我对政治流亡的种种困难并不存有幻想。事情越来越明显：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对于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更是如此。社会舆论和其它民主力量的声援，对我们今后的斗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尽管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战线还是在国内。因为我曾在国际学联、议会外交委员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工作过，所以我在全世界有许多联系。我想，如果我同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奥托·希克、兹德涅克·海兹拉尔、安东尼·利姆以及其他许多流亡的人一起向国外介绍我国人民的斗争，寻找盟友，捍卫并继续发展“布拉格之春”的思想，那末我呆在国外一定更为有益。遗憾的是，1968 年 8 月 21 日以后， 有十余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

人流亡国外——这是我国在三十年时间内出现的第三次大规模的流亡热。

没有党，没有祖国

因为我住的是使馆的房子，所以必须象小偷一样在夜里偷偷地离开。我还必须离开意大利，以免在外交上给该国政府带来麻烦，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一定会请求意大利政府引渡我这个“违法分子”：他们无疑会拿出“证据”说我没有交纳电费或者其它什么费用，因此，我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欠下了“债”。为了不给官方留下任何借口，我预付了房租、电费和电话费等费用，随后便飞往英国。最初，我是想去法国的，然而，由于我的外交护照出了麻烦：没有我国使馆的签章是不会同意发给我签证的，而我在法国驻罗马大使馆里又没有朋友。相反，英国大使馆倒没有对我进行任何为难，于是，我在妻子的陪同下——她因为同德国一个电视台订有合同，必须去那里演出——来到了伦敦。

我准备了一个声明，《泰晤士报》在1969年10月1日发表了这个声明。这是我对中央委员会决定使苏联干涉合法化的答复。我还谈到了我之所以留在国外的种种理由，并且说，只要允许我公开为自己进行辩护，我将立即回国。声明发表以后没几天，我就被捷共书记处开除出党。真是奇怪的巧合，因为这事发生在1969年10月30日，正是我加入捷克共产党刚满三十周年的时候。对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来说，失去了党证就等于失去了地位，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而我已经再也没有他们这种感情了，因为我感到，我同这样一个已经蜕化的党再也没有共同之处了，尽管许多令人尊敬的人物还继续留在党内，指望改革的过程有朝一日在这个党的帮助下仍然能够得到实现。我的岗位是在党外，

是在五十万被开除的共产党员中间，也就是说，是在社会主义反对派的队伍内，在那里为受到越来越令人气愤的诽谤的“布拉格之春”辩护。

几个星期以后，我被解除了议会中的职务。1970年2月我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国籍。我该如何维持生计呢？在英国，是很困难的；我必须找到一个能使我有时间参加政治斗争的工作。于是，我的妻子和我决定重返意大利，请求政治避难。我妻子的支持大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由于她直至1969年还在布拉格剧院演出，另外，她也知道，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女演员要在国外找一份工作是多么地不容易，因此，当她作出陪伴我的决定时，我内心感到格外的温暖。离开居住在布尔诺的年迈的母亲，这使我的妻子感到十分痛苦。我不得不放弃同家人的任何联系，以免给他们增添麻烦。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意大利朋友所给予我的支持对我是多么重要。他们立刻同我签订了在电台和电视台工作的合同，使我能够以记者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西德第二电视台的同事们也是这样，他们吸收我担任了一个时期的自由撰稿人，以示对我的同情。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不想在物质上依赖我的政治活动或我的朋友。我已下定决心：搞政治只作为一种业余的工作，不做“职业革命家”，因为“职业革命家”迟早会成为官僚机器的基础。即使在罗马，我也仍然受到“正常化”的威胁：苏联驻罗马大使里约夫曾向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经理就雇佣我在该公司工作一事提出抗议，然而，意大利人并没有被吓倒。

党永远是正确的

违反常理的是，我拒绝服从布拉格当局的命令并决定流亡国

外的行动使我有一种内心得到解放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我对所谓的“自由世界”抱有什么幻想。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不再盲目地服从纪律、服从运动的铁的逻辑了。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时间内，我一直在服从这种逻辑，它把党的利益——几乎总是把领导集团的利益或苏联的那套治国办法说成是党的利益——置于党员的政治良心之上。但是，我是否应该满足于默默无闻地谋生度日呢？还是应该打破沉默，发表讲话，采取行动，也就是说进行斗争呢？

我的捷克、意大利和法国朋友经常跟我说：“1968 年 8 月 20 日发生的一切，对于你的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当然是一场悲剧。然而，必须咬紧牙关，服从现实，重新开始，但愿有朝一日一切都将变样。否则，斗争的逻辑有把你立即引向营垒的另一边去的危险。”

这种理由我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为了使心存疑虑的同志相信，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最终将会从真理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胜利中得到补偿，我自己过去也曾多次引用过这种理由。在政治审判案期间，人们正是用这种理由来打消我们的怀疑，并使我们欣然接受诺沃提尼个人权力的奇怪逻辑的；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 1968 年 8 月没有进行抵抗。总之，我们就是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花了很长时间。我才找到使我的一生、并且至今仍使成千的共产党员深感不安的问题的答案：可不可以有个人的看法？可不可以反对党的真理（这种“真理”据说代表了“最高良知”，并使党适应于眼前的需要）？党真是一贯正确吗？

我还是想回过头来再谈谈南斯拉夫的例子。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最初把铁托看成是解放斗争的英雄，对他进行颂扬——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当铁托受到斯大林批判时，他们把他看成是“敌人”和“叛徒”，并且毫不犹豫地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开除出党

——他们这样做也是对的。当赫鲁晓夫为铁托恢复名誉时，他们又迫不及待地赶来亲吻这位“同志”和“列宁主义者”的面颊——他们这样做又是对的。当赫鲁晓夫因铁托在匈牙利问题上的立场再次对他进行批判时，他们又加入了这一批判的大合唱——他们这样做仍然是对的。

相反，那些曾经令人难堪地提出过一些棘手的问题、甚至有时对那些批判表示怀疑的人却“犯了错误”。于是，他们被开除出党，有时候又会得到平反，而那些宽宏大量地为他们恢复名誉的人恰恰是“曾经有理”、而且永远有理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始终不渝地执行“党的路线”的！至于其他这些“犯了错误”的人则必须作自我批评。

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共产党员在检查委员会——这是决定纪律处分和开除党籍的党的机关——的接待室里彼此相遇：“你怎么在这儿？为什么把你开除出党？”第一个人被问道。“因为在战前，当莫洛托夫还是政府首脑时，我就敢于批评他。”“而我，”第二个人回答说，“我是因为在赫鲁晓夫批判莫洛托夫是反党分子时敢于替莫洛托夫辩护。”第三个人说：“至于我，因为我就是莫洛托夫！”

难以相处的伙伴

我的许多朋友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十分清楚苏联和东欧各国目前这种制度的弊端，然而，他们却缄默不语，为的是避免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抹黑。我并不责怪他们所采取的这种立场，但是，我对他们说，我们亲身经历了这种种事情，我们简直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我们必须根据我们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因此，我们成了左派眼中“难以相处的伙伴”。

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属于一种新的情况。大约在1968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以前，政治流亡问题一直是很清楚的。凡是来自法西斯或专制政府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始终是值得同情的同盟者、进步分子和反对派。相反，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人绝大多数是反动派、反共分子和右派的同盟者。对于1947—1948年间大量流亡的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大家故意对以下这一事实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即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或基督教徒和民族主义分子，这些人在抵抗运动期间以及战后曾经同共产党合作过，并且参与了建设多元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尝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应该被算作右派，但由于共产党在接管政权以后把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再加上冷战的开始，他们便转而在西方寻找盟友，并且首先在政治上的右派那里和反共分子那里找到了他们的盟友。

1968年8月20日以后，大批的人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又离开哥穆尔卡统治下的波兰进行政治流亡，其中不乏坚定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他们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去，所以逃亡到西方，希望在欧洲的左派那里找到盟友。因此，欧洲左派面临着一个新课题：面对这些逃亡者，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些逃亡者的到来不是在给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形象抹黑吗？换句话说，他们的证词不是正中右派的下怀吗？

似乎危害社会主义的人倒是那些揭露错误的人，而不是那些犯错误的人！许多朋友怀着真诚的同情接待了我们，并准备帮助我们，但是，他们向我们暗示，他们从根本上说来不希望我们向非共产党报刊透露情况。我们无法满足他们的这个愿望，因为否则我们就得保持绝对沉默，从而违背了我们流亡的最主要目的，

即用我们的言语和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作武器继续进行斗争。

我并不是说，西方左派对这些新的东方逃亡者没有任何进行怀疑的理由。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68年事件的打击下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所经历的已经蜕化变质的制度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并且公开地、有时甚至歇斯底里地反对社会主义。于是，有些左派就说："你们现在看到了吧，真卑鄙。你们的某某同志在攻击社会主义，甚至要我们对你们的不幸承担责任！"

对这些左派来说，他们的怀疑又多了一个根据："这些人全都是右派——不管他们以前是不是共产党员。早在1968年，他们就已经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凶恶的敌人了，现在他们自己撕下了假面具！"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在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中间不乏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但是，他们不能忍受苏联的干涉以及随之而来的"正常化"，如今正起而反对他们自己的过去。但是这还远远不能说，他们从前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反革命。相反，正是苏联的干涉促使他们走上了这一步。

我既不想替他们辩解，也不想对他们表示原谅。我本人选择流亡生活是因为希望能为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而继续奋斗。但是，我反对这种个人的180度大转弯被我们的对手——布拉格的官方宣传——所利用以及被西方的左派教条主义者严重地加以歪曲。这是一种只有少数西方左派能够理解的人类悲剧的恶性循环，因为他们自己还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困境。

我们和共产党人

凡是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抱有类似看法以及对我们的斗争具有一定认识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寻找盟友，主要是在西方各大

党，即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共产党内，他们主张多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尊重民主自由，尊重各国人民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一位捷克党的领导人在1968年8月20日晚间听到苏联入侵的消息时，失声喊道："现在只有西方共产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了，因为他们的大门口没有苏联坦克！"

然而，我们在同这些共产党的代表进行初步接触时，除了感到他们对我们抱有真诚的谅解外，还存在着某种思想混乱，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同情"布拉格之春"，另一方面又支持那场遭到他们谴责的入侵的主谋——苏联党。而问题的核心也恰恰在这里：人们不能同时与杀人犯和他的受害者讲团结。

意大利共产党曾经认为"布拉格之春"运动是社会主义以及他们自己的革新政策成功的巨大希望，因此我们感到同他们最为亲近，难道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吗？苏联坦克使这一希望破灭了，这使意大利共产党人十分震惊。他们不仅在1968年8月谴责了苏联的干涉，而且在杜布切克下台以后也仍然表示反对。我对绝大多数意共领导人的正直和才智怀有最大的敬意。但是，在谈到意大利共产党时也必须看到，它绝不象国外的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除了贝林格和其他"开明"的领导人外，该党还有许多干部仍然受到过去的束缚，他们非常希望再次转向"强硬"的苏联路线。每当我在意大利碰到支持我的观点的党员朋友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害怕同我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如果苏联大使馆把事情传出去，那我就会失去我的地位……。这一点你总可以理解的吧。"我当然理解，但是，同样也使我深感不安的是，他们现在就已经准备接受"正常化"了，尽管他们的党并没有掌握政权，尽管并没有苏联坦克驻扎在他们国内。

我们同样也对西班牙共产党怀有好感。当胡萨克1975年想把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驱逐出境时，该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

略毫不犹豫地起而为杜布切克辩护。澳大利亚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变质的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在理论方面显然是走得最远的。英国和瑞典的共产党人也多次表示反对苏联的干涉。然而，对苏联的干涉进行最激烈抨击的乃是中国共产党，她在最近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甚至要求占领军撤走。日本共产党也曾多次指出苏共政策的自相矛盾。

我们和社会党人

我们同各国社会党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逻辑的。有些党对我们表示极大的同情，有些党对我们迷惑不解。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参加了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很容易把国家的需要同党的需要混为一谈。他们的领导人所关心的主要是维持现状，而认为我们的革命对于现状乃是一种威胁。他们中的有些人很想掩盖自己的反共历史，往往表现出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以取悦于莫斯科。

这些人为什么不愿意看到东欧各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反对派的事实呢？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太幼稚了？如果苏共总书记作为政府的客人访问法国或其它国家，通常总要会见该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即使他们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到莫斯科去时却从未想到要去拜访萨哈罗夫或者麦德维杰夫呢？或者那怕仅仅是出于同情，在到布拉格去时拜访一下老社会党人和“布拉格之春”期间的外交部长伊日·哈耶克教授、克里格尔博士或者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呢？

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洛夫·帕尔梅已经证明，完全可以采取这样一种立场而又不损害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以及同东欧各国的实际合作。他不怕引起布拉格和莫斯科的领导人的不悦，于1975年3月正式接见了我和我的朋友兹德涅克·海兹拉尔。他

同样毫不犹豫地公开表示支持杜布切克，并且在他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当着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面谈论禁止马克思主义杂志《实践》一事。

相反，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社会党人在“布拉格之春”的思想中见到了自己的影子，对我们表示了无限的同情。他们不但谴责了苏联的干涉，而且批评“正常化”的实践，并参加了声援杜布切克的运动。例如，前西班牙国际纵队战士、意大利社会党主席皮特罗·耐尼——他具有非凡的政治远见，为人十分热情——保证给予我们支持。他的同伴里卡多·洛姆巴迪则不遗余力地指责意大利共产党人对于已被开除出党和驱逐出境的“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的命运关心太少。

我们和俄国人

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在东欧各国，特别在我们的左邻右舍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寻找盟友。人们听起来也许会感到奇怪，但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几乎毫无了解！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对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了解甚于对匈牙利或波兰的情况的了解，因为大老板的预防措施之一便是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彼此隔绝。官方的新闻对邻国的矛盾和内部斗争是闭口不谈的。因此，在老百姓中间形成了某种麻木不仁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大家都想迫使苏联作出尽可能多的让步，即使有损于“兄弟国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当我们在1968年想摆脱苏联霸权时，情况也不例外。任何一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变革唯有在其它各国、包括苏联也同样实现变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于这一点，我们认识得太晚了。因此，我们是在孤军作战。东欧其他国家的人民虽然并不怎么赞成苏联的干涉，但是，他们对

此的反应却带有某种幸灾乐祸的成分："我们已经忍受好久了，现在该让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尝尝滋味了！"因为1956年——由于对情况了解得不够——我们认为匈牙利起义做得太过火了，甚至认为它是有害于社会主义的。在对待波兰和东德的问题上，我们同样采取了这种态度。

所以1968年8月20日也给我们上了一堂真正的国际主义课：一堂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课。它告诉我们，唯有各国人民的国际团结，才能有效地反对国际官僚政治。我经常去苏联，然而，直到8月20日我才明白，我们对苏联社会、苏联领导人、苏联的政治动机以及苏联的决策机构和最高领导层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多么肤浅。

我必须再次强调，我们是苏联的真正朋友，对它并不抱有民族主义的感情。对于这样一种背叛，我们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大家知道，爱情一旦遭到背叛，很快就会变成仇恨。莫斯科的官方宣传——有些西方政治家是相信这种宣传的——声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是反苏分子、反俄分子，是民族主义分子！"我们肯定不是这种人，但是1968年8月20日以后，很大一部分人民却变成了这种人。

我们听说，在入侵我国以后，红场上曾发生过一起示威游行。包括帕维尔·利特维诺夫、拉莉莎·丹尼尔、弗拉基米尔·得雷姆留加和维克托·法因贝格在内的一小群人十分勇敢地抗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这起小小的示威仅仅持续了几分钟，很快就被警察所驱散，但是，它对我们两国人民将来的关系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六年以后，我有机会亲自同几个参加这次游行的人结识，向他们表示感谢，并向他们保证，在我们心目中，代表俄国人民的是他们，而不是现在的领导集团。在同他们以及其他苏联反对派的谈话中，我了解到，1968年事件在苏联曾经引起了多

么巨大的反响，“布拉格之春”曾经激起了人们多么巨大的希望。

西方左派常常对这些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语言感到吃惊，这些俄国人十分重视道德概念——真理、正义、正直——，几乎绝口不谈阶级斗争，主要是争取言论自由。人们认为他们都是些旧派人物，却忘记了俄国是一个由沙皇专制政权直接进入斯大林专制政权的国家。今天从苏联来到西方的反对派已经不是托洛茨基式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家，他们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只知道它带来了官僚主义制度。因此，重新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重要概念对于广泛开展有关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的讨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对于苏联的反对派来说，问题不在于——这正是他们同西方左派的明显区别——根据马克思或列宁的语录来说服他人，而在于找到一条具体的道路，以保证人们享有更多发表意见的自由并创造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形式。

所有这些矛盾都体现在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身上：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格里戈连科和麦德维杰夫，其中格里戈连科和麦德维杰夫无疑同我们自己的立场最为接近。

由于苏联反对派的力量还很弱小，所以他们的讨论经常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探讨能导致苏联制度自由化的各种形式的外部压力。虽然我明白，要由现存制度那套完全僵化了的机器来实现必要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同麦德维杰夫一样，我还是相信，这种外来的压力只能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因为唯有这些力量本身才能使国内发生真正的变化。

相反，我们的苏联朋友却对我们说，这种看法也许适用于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并不适用于他们的国家。他们几乎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我们在国外的人数比较多，而且他们认为组织得也比较好。然而，我们的力量既不是因为有组

织，也不是因为团结得好（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团结），而是仅仅因为我们把自己看作国内反对派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在流亡中建立某种领导班子或组织机构，然后从遥远的地方向捷克境内的人提出有益的建议或发布命令。相反，对我们来说，斗争首先是在国内，必须由国内反对派担负起运动的领导责任；我们的任务仅仅在于：在国外宣传他们的目标，在国际上为他们寻找盟友，并使他们了解世界各地的情况，从而给他们以支持。对流亡问题的这种看法使我们能够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并使我们避免了在任何国家的政治流亡者中——如果流亡者们只局限于考虑自己的问题——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派性斗争。我们一再跟国内的同志说，如果他们不在本国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那末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期望从国外得到任何真正的帮助的。

从发表批评发展到成为反对派

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的公开斗争始于1971—1972年。我们的许多同志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逮捕，占领当局准备举行大规模的审判，企图以此证明社会主义反对派同西方的“叛徒”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

我们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动员西方舆论，以便阻止审判和营救我们的同志。1972年3月，我得知警察还搞了“贝利康合资公司”的大量黑材料，以此作为对我提出起诉的依据。然而，这次起诉在最后一分钟延期了。在国际上的压力下，党改变了策略：它巧妙地把被告分成若干个小组，准备在1972年夏对他们进行秘密审判，以掩盖着存在着一个得到广大居民阶层支持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的事实。

为了声援这些同志，我急忙赶写了一本关于捷克社会主义反对派的书①。我根据确凿的文件指出，这是对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政治审判，他们的唯一罪行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同领导集团的看法不一致。

以下事件可以证明，我们当时向舆论发出警告是正确的。1972年7月底8月初，在布拉格和布尔诺进行了多起政治审判，约有上百名同志被判处长期监禁。被判处徒刑的人中有前布拉格党校校长、中央委员米兰·许布尔，中央委员雅罗斯拉夫·萨巴塔，历史学家扬·特萨日，前捷克斯洛伐克学生领袖伊日·米勒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至今仍在狱中，生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

1972年11月，法国社会党主席弗朗索瓦·密特朗创议组织一个讨论会，主题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和民主。"会议的目的是，分析"布拉格之春"的经验及其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他邀请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弗朗蒂塞克·克里格尔，同时也邀请了"正常化"后的共产党第一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以及一些流亡国外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的代表参加会议。

布拉格的占领当局对这一创议十分恼火，《红色权利报》和布拉格电台咒骂密特朗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工人阶级的敌人"和"腐朽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弗朗索瓦·密特朗拒绝放弃这个打算，捷克斯洛伐克警察便制造了一起十分狡猾的挑衅事件：布拉格内务部的一个专门伪造文件和信件的特别部门向流亡在国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发出了约四十份出席这个讨论会的请柬，这些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有些人还曾有过反动的政治历史。这些伪造得十分巧妙的请柬附有弗朗索瓦·密特朗或

① 《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反对派》，1973年科隆欧洲出版社出版。

负责国际关系的罗伯特·蓬蒂隆的签名，用的是法国社会党的信笺。

当我抵达梅里迪恩旅馆时，有一个斯洛伐克政治家因被邀请出席这次会议而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感到十分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后来又来了好些这号人物。于是便出现了一个荒唐的场面：法国社会党人以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客人，而我们则以为是他们请来的。值班的社会党员仔细地查看了请柬，很快发现这是一个骗局。此外，这一伎俩在其它方面也出现了漏洞，因为有些伪造信到达得太迟，还有许多“受到邀请”的政治家拒绝出席这种显然是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会。

不要一边倒的支持

对我们来说，巴黎讨论会是强调我们的斗争的国际性的一次机会。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会见了马里奥·苏亚雷斯以及来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其它社会党的同志。我们怀着争取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巴西和伊朗——总之，在民主自由遭到嘲弄的所有国家——的政治犯获释的同样决心，致力于使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犯及被捕的共产党员，社会党人和民主主义者重新获得自由。

我们认为国际团结始终是必要的。我们支持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同样也支持智利人民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然而，与其它左派同志不同的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种种经验，我们不能满足于一边倒的支持，这种一边倒的支持只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独裁统治下受害者进行支持时才适用。

自由的原则必须时时处处由大家来捍卫。多年来，我自己就曾进行过“一边倒的支持”，直到痛苦的经验使我明白，最初以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所实行的镇压会逐渐地蜕变为普

遍的镇压，而且这种镇压迟早也会降临到共产党人的头上。因此，必须在任何情况下捍卫一定的原则，最终停止以社会主义利益为借口替压制这种或那种自由的行为进行系统的辩解。

我不认为应当把被镇压者中同意我们政治观点的人同那些因为同我们的观点不一致而遭到镇压的人相区别。最近这十年的历史反复向我们表明，起初，遭到镇压的是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徒或自由派，而最后则总是以镇压共产党人而告终。

我想在此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各左派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经常以不干涉其它国家或政党的"内政"的理论来为他们之间不够团结进行辩护。难道说，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应当把其它党或社会主义国家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内政吗？如果明天某一个西方国家里出现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取消所有的民主自由和取缔各政治党派的情况，难道也应当把这种措施看作是该国的内政吗？把这看作是有损于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事情难道不是更正确些吗？

当哥穆尔卡决定让波兰警察向格但斯克的工人开枪时，这难道仅仅是波兰的内政吗？经验每天都在告诉我们，全体左派都不得不为那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所犯的错误和罪行付出代价。

意共中央委员、理论家卢奇奥·隆巴尔多·拉迪克 1974 年在南斯拉夫科尔丘拉岛的夏季学校说："我同我的党的看法完全一致，主张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共产党——不管它们有多么'小'——都享有自由和最彻底的自主。然而，这不等于说，我们不应该关心社会主义各国内部发生的事；这不等于说，我们应该接受作为威斯特伐里亚和平的基础的那种原则：'一国有一国的宗教'。恰恰相反！我认为，今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运动的最大弱点之一正是缺乏公开的对抗、缺乏互相批评以及缺乏一种不仅仅局限于知情者的辩论。"

另一方面，苏共领导人却从来不怕批评其它各国共产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各国的政策，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干涉。

但是，一旦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苏共领导人便总是出来反对，并且谴责这种做法是什么“干涉内政”和“反苏”。当华沙条约五国在1968年开始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形势发展时，我们并没有回避对这一问题的辩论，而只是为了避免有人完全歪曲事实真相，从而对我们进行片面的审判，而由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乌布利希这些法官进行终审判决。

遗憾的是，经验表明，如果我们在夺取政权之前对社会主义的种种“疾病”不加以预防，那末在每次革命以后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疾病，那末即使动机再好，也会犯同样的错误，甚至最终还会为这种错误进行辩护。

正常化的技巧

在智利发生军事政变以后，当我们对智利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爱国者的反独裁斗争表示声援时，有人一再对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把发生在智利的镇压——那里每天都有成百人遭逮捕，受毒刑——同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镇压相提并论。”不错，在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并不象斯大林统治下的漫长岁月中那样残酷和广泛。捷克斯洛伐克不是智利，在这里并没有杀人，也没有施以毒刑。然而，这种旷日持久的镇压和在日常生活中对公民没完没了的刁难其后果也是同样可怕的。数万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成百名科学家不能再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作家不能出版自己的书，导演不能拍摄自己的影片，青年人由于自己父母的政治活动而不能上完中学或进大学读书。

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目前进行的镇压活动所造成的破坏虽然

是无法用数字统计的，然而一点也不轻。毁坏的桥梁、道路、学校和工厂是可以重建的；然而，有谁能够计算并估价“幽灵比夫拉”的废墟价值几何呢？又有谁能够来弥补这害及整整几代人的损失呢？

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说得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存制度下，从部长和中央委员直至最最普通的工人，每个人都可能失去一些东西。想说出事实真相的部长害怕丢掉乌纱帽，变得两手空空；拒绝在反对他自己从前的同事的声明上签字的科学家害怕失去工作；不愿意在赞成入侵自己国家的动议书签名的大学生害怕不能继续求学；流露了不满情绪的工人则害怕被分配干另一种收入微薄的工作。因此，这种制度助长了庸人的利己主义和个人野心，并为唯命是从的内奸开了方便之门。

总之，如今到处是十足的伪善和麻木不仁：要是有人拍案而起并使其他人意识到自己所受的屈辱，那末他就会被认为是疯子，是唐·吉诃德。大家都变得委屈求全，逐渐地只关心自己的私利。统治者对于这种逃遁到个人生活中去的现象并不感到不悦；他们知道，这样一来大家就会丧失认识自己受压迫的程度的能力，变得更容易驾驭。就这样，人们从公民变成了臣民。

我们从捷克斯洛伐克得到越来越严重情况。我们经常得到有关逮捕、迫害、罢工和没收稿件以及被迫进行“自我批评”等消息。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使西方舆论了解这些情况。

我国社会主义反对派在罗马出版的《消息》杂志每期都刊有批评性的文章。而我感到十分自豪、同时也是使秘密警察感到十分恼火的是，大多数文章都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土上写就的，而且大部分杂志也是在那里散发的，从而粉碎了占领当局向居民封锁消息的企图。我们同国内反对派的联系几年来自然早就引起捷

克斯洛伐克警察的极大注意，然而，尤其是1974年我们在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去世一年以后发表了他未完成的《回忆录》并发表了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致联邦议会的信之后，又对我们发起了一场空前卑鄙的运动——报纸和电台的攻击以及使用最下流的语言所进行的造谣中伤成了司空见惯的了，后来又加上了秘密警察的挑衅。

1974年12月的一个晚上，我的门前响起了铃声。一个自称是秘密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人说，他必须把一个受伤的同志留下来，这个同志是在攻打苏联兵营时受的伤，现藏在他的朋友那里，必须赶紧动手术，因此需要帮助他越过边境。来人向我打听能够在财力上或通过人事关系对他进行帮助的人的地址，但是，他拒不说出自己的姓名。一个奸细——我的这个印象进一步加深了。要是警察能够成功地把我们牵扯到一件莫须有的事件中去，指控我们参与武装袭击苏联驻军或拐带人口，那对他们来说真可谓福星高照了。

1975年2月我收到一个炸弹包裹，关于这个包裹，我在前言里已经讲过了。在这次暗杀行动之后，我每隔一天就收到一批匿名信，信中有意大利文的传单："杀死共产党罪犯！向他们发起全面进攻！烧毁他们的房屋！"在警察局里，他们告诉我，暗杀行动可能是新法西斯分子干的，这种解释看起来十分符合逻辑，因为当时大多数这类行动都是极右分子的杰作。我不是左派和反法西斯分子吗？尽管如此，我仍坚持要求进行彻底调查：其他人是否也收到过此类传单？调查证明，这些传单都只有这么一份！此外，对意大利文的文章进行检查的结果表明，传单的语汇同意大利人的习惯用法相去甚远，甚至还有几处文字上的错误。

这些事情同布拉格对我的大规模诽谤运动遥相呼应。1975年1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分子的机关报《论坛报》甚至污

蔑我在战时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是一个利用假名四处活动的奸细，为的是更好地向德国人提供有关抵抗运动的情报。我在读到这些可耻的谣言时的厌恶感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加以形容的。如果在政治上对一个人的思想进行严厉的抨击，那是正常的。但是对流亡在英国的前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这样的共产党人进行污蔑，说他在因斯兰斯基案件而被捕期间"出卖"了同志，或是指责流亡在瑞士的、曾经在德国集中营里关过六年之久的前副总理奥托·希克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或是污蔑奥托·希克的弟弟——当德国占领结束时，他才十四岁——是"盖世太保的情报员"，那简直是卑鄙到极点了。

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但是我也从我的祖国和外国收到了成百封对我表示支持的信件。一些同我素不相识的人向我表示说，这类污蔑使他们感到气愤。即使是神经坚强的人，只要一想到这种罪恶的手段早就成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会感到窒息。对于这种阴谋活动，人们除了感到难过以外，还有一种不堪忍受的无可奈何感。为了拿出必要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人们需要进行自我勉励：谎言总有一天是要揭穿的，而就象我们共和国的官方格言所说的那样，"真理终将取得胜利"。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未经辩论的真理到头来却证明只是一些幻想？我们必须象捷克的共产党员作家斯坦尼斯拉夫·科斯特卡·诺伊曼所说的那样，"乐观地、然而不抱任何幻想地"不断寻找真正的真理。

第八章　建立另一种社会主义可能吗

建立哪一种社会主义

自从 1968 年 8 月 20 日这一夜以来，我经常向自己提出下面这些问题：

东欧各国争取另一类型的社会主义的种种尝试，是否都象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注定要失败？

有人认为：今天存在于苏联和东欧的那种形式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形式。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观点，那末，在苏联（如今已是一个大国）自命是一个“理想的”模式的情况下，西欧的社会主义还能不能采取另一种形式？

有哪些措施可以保证东欧“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种种谬误、蜕化和罪恶——遗憾的是，凡在共产党掌权的地方，迄今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不在西方重演？

对此，不无乐观的答案。我常常听到下面这种说法：这是明摆着的事！西欧的社会主义将是另一种样子，因为西方主要的共产党不同于苏联的党，因为苏联不可能靠坦克在西方推行其旨意，因为今天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不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西方主要的共产党对于苏联愈来愈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它

们具有建设一种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真诚愿望，我现在绝不是要对此提出怀疑。但是，澄清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难道不是防止那种病态现象重演的最可靠的保证吗？这样，我们就可以同谬误、“蜕化”现象以至我们所遭遇的悲剧的根源进行斗争。

对于社会主义的含义，许多人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假若有人问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会承认一个社会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我将提出下面这些条件：

这个社会应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比资本主义社会进步；

这个社会应当使大多数公民享有更多的正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平等、更多的发展可能性、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了解更多的情况和享有更多的人类尊严；

这个社会应当有更加紧密的民族大团结；

这个社会应当建立更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生产率和生产发展的程度，而在于自由、正义、平等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程度上。对于社会主义在这一方面所取得成就，不应当再去同沙皇俄国、蒙古或也门进行比较，而必须将这些成就同议会民主制的成就进行对比。

此外，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在我们社会今后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的。即使当他们强调在革命以后的过渡时期内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也总是不断地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大多数居民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为多数人，而不是为少数人谋求更多的自由和正义。

然而，现实又是怎样的呢？在不发达国家中，在当时的沙皇

俄国、某些东欧国家和中国，社会主义的这种进步作用和解放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在这些国家革命后的最初阶段中尤其如此。但是，这些国家未能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而相应地扩大这种成就，它们并没有使自由与经济得到同样程度的发展。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发达国家里，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使生产得到了发展，保障了一定的社会安全、实行了免费医疗并使更多的工人子弟能够上大学；但是另一方面，它所赋予的自由和保留的政治成果却比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时期已经通过斗争赢得的更少。在1938年以前，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和政治犯（今天这种含义的政治犯当时是没有的）被判处死刑，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却有几十名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判刑和处决，成千的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被投入监狱，遭到长年囚禁。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真正的竞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社会主义必须证明，它有能力使人类不仅摆脱失业的恐惧和经济剥削，而且摆脱书报检查制度形形色色的监护，其中包括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所进行的监护。社会主义必须为这样一种社会开辟道路，在那里，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所有并为他们服务；社会主义必须为没有警察镇压、没有行政压制的政治多元化开辟道路。

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乃是一个历史进程，其进步性与正确性首先表现在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上。

一党制和反对派

法国共产党第一书记乔治·马歇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在他眼里已经成了最起码的常识。我还从左派朋友们那里一再听到这种说法，他们告诉我，社会主义要末

是民主的，要末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东欧各国。1968年，当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具有人道面目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我们完全明白，这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表达方式。然而，为了在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同苏联的那种社会主义——在那里，社会主义和民主是彼此对立的——之间划清界线，我们认为这种提法是必要的。

我们发现，同发达国家相比，“现实的社会主义”在自由方面表现得相当落后。一个突出的、意味深长的例子是：议会民主制尽管有它的种种弱点，但是在这种制度下存在着一个政府的反对派，这一现象同这种制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共产党公开表示要改变这种制度，但是，共产党仍然可以合法地存在，并且往往拥有相当大的影响。

相反，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世界中，在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里，我们找不到存在一个合法的反对派的迹象，甚至在掌权的党内也不容反对派的存在。

我知道人们为此辩解的理由：社会主义各国还太年轻，政治上的反对派可能蜕变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但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就要庆祝她的六十周年纪念日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建国三十余年。罗莎·卢森堡就不承认“年头短”、甚至“不发达”可以算作一种理由，她在论及俄国革命时说：“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①

---

①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见人民出版社《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1981 年2月中文版第7页。——译者

我们不应该再拿历史条件来为不容许反对派存在的现象进行辩解了。这只说明了问题的一部分。一切认为社会主义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优越的人都应当郑重声明，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政治上持反对意见的权利，也就不可能有民主，特别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如果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其它各国共产党如他们声称的那样——我并不怀疑他们的真诚——真正赞成这一原则，那末他们不仅应该在本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这一原则，而且今天就应当要求苏联和东欧执政的共产党把这个基本真理付诸实践，或者至少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信用正处在危险之中。

遗憾的是，甚至连独立性最强的共产党也只是限于对苏联现实的若干个别方面进行批评，而不敢就这个制度的真正性质提出疑问。而苏联共产党却继续把党的机器的专政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最好的民主形式。

社会主义和自由

我想起了 1945 年至 1948 年间的成百次集会和连续好几个夜晚的热烈讨论，会上有人问我们，我们是否真的主张民主的自由。当时，我们生气地回答说："你们怎么竟对我们共产党人表示起怀疑来了？为了自由，我们毕竟同法西斯主义作过斗争，而且在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牺牲。"我们当时这样说是真诚的。如果西欧共产党人今天同样也这么说，我也不会怀疑他们的真诚。

因为，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 1948 年完全取得政权之后，所有这些自由遭到了践踏，而建立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被剥夺发表意见的种种可能性、被拒之于公共生活之外，遭逮捕，被判刑，甚至被处决的，不仅有党外的

同盟者，而且后来还有参加过抵抗运动、同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过斗争的著名共产党人。在这几十人中，特别是前西班牙战士和站在苏军一边参加过战斗的游击队员中，共产党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外交部长克雷门蒂斯就是这样的例子。而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我们却为这一切辩解，并且天天在宣称：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我认为，为了避免罪恶和谬误的重演——如果这是可能的话——，“独立自主的”西方共产党人应该对权力的这一令人不安的逻辑深思再三。否则，他们将受到怀疑（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人们会说他们所作的诺言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后就会立刻背叛自己的诺言。当初，哥特瓦尔德保证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走一条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仿效苏联的制度。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这些话是出于真心，那末对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就只有一种解释：它们是共产党垄断政权的必然结果，是屈服于莫斯科的“世界中心”、把苏联制度理想化的结果。之所以如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由于对苏联的现实和客观情况根本不了解。今天，“独立自主的”共产党人虽然对苏联采取一种更带批判性的态度，但也不能保证不受这种危险的影响。我知道，西方共产党人对这种论点会回答说：“你在对我们进行道德说教。我们是真诚的，我们的政治声明和实践都表明了这一点。要想事先再提出一些保证是不可能的！”

我的看法却相反：可以事先提出一些保证。再说，我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同志们以及其他国家的同志们反复说明过这一点。只要在社会主义掌权的地方处处运用这些原则（即使不能立即做到、也要逐步做到），并且处处保持这条总路线的精神，就足够了。此外，只要同东欧各国违背社会主义神圣原则的任何实践明确地划清界线，也就足够了。我们不应当要求太高。例如，只要

苏联领导人这样说一下也就够了：真的，要马上实现这种程度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因为发生了世界大战和内战，经济不发达和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因为国际形势比较特殊；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原则同样也适用于苏联社会，一旦国内外环境许可，我们将朝这个方向努力。

这样一种完全可以设想的方针将为社会主义在其它各国的高涨开辟道路。

但是，假如有一个西方读者本来就怀疑法国共产党是否真正打算采取一条不同于苏联发展的道路，那末，他在读到乔治·马歇所写的书中这段话时会作何感想呢：

“苏联工人难道不是比他的同一阶级的法国同志自由得多吗？因为他知道，他和他的家人总是有工作可做，他不必为失业而提心吊胆，他的孩子将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和能力而受到相应的教育，发生工伤事故和患病时，他将受到免费医疗，各种业余活动和文化娱乐场所都向他敞开大门，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于是，问题就来了。按照马歇的说法，苏联工人比法国工人更自由，那末我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法国共产党总书记更主张哪一种“倾向”呢：是愿意扩大今天法国所拥有的自由呢，还是愿意向苏联的自由靠拢？苏联工人不能享有工会独立的权利，现存的工会丝毫不讳言它是党的传送带——难道这说明他更自由吗？苏联工人没有罢工的自由，因为罢工在苏联被视为反革命破坏活动，难道这说明他更自由吗？苏联工人有一个劳动手册，可以保证他天天有活干，但同时却又使他不能自由地挑选工作岗位或居住地——难道这说明他更自由吗？苏联工人除了选举唯一的名单上的唯一的候选人以外，不可能选举其他人代表他的利益，名单是由共产党的机器提出的，党的领导以全体公民的名义决定一切重要问题，不管这些公民是否都是党员

——难道这说明他更自由吗？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说，这乃是区区小事，或者说，这是马歇的措辞不当。尽管如此，这种论点还是令人不安，因为它使人对马歇和法国共产党就资产阶级自由这一题目所说的积极方面产生怀疑，因为这个论点认为法国公民的自由程度比苏联公民低，必须把法国的自由提高到苏联现有的自由程度。

当然，从那时以来，法国共产党对苏联国内的“变质”现象的批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马歇今天也完全可能对苏联公民的自由作出另外的评价。这说明，“独立自主的”共产党的发展是复杂和矛盾的。

真 正 的 困 境

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一再出现的论战证明，社会主义运动还始终被束缚在二十年代由于第二国际的分裂、第三国际的创建而出现的框框中。这场论战的实质只是用来掩盖真正的分歧、问题以及这一运动内部的新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之中，而不受党派的限制。共同的背景是，确信资本主义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而且越来越没有能力来解决新问题：通货膨胀、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粮食匮乏、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但是，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适应能力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看法。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已经完全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呢？这是“正统的”共产党的观点。它是不是还有王牌和适应能力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准备经历一个持久的、新的斗争时期。

这些不同的看法反映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种主要思潮：一种思潮是，希望通过逐步改革、通过同其它政治力量结成

多数派联盟——即通过“历史的妥协”或“左派共同纲领”或“民主政府”——来变革社会，同时保持并继续发展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成果。对于这一派人来说，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并不是目的，而是使全体公民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的一种手段，其具体办法是实行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扩大民主自由、实行工厂和公社自治以及工会自主，不搞党和国家的一体化等。这是那些“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和某些国家的社会党人在不同的级别和程度上所走的道路。另一种思潮以“正统的”和亲苏的共产党人为代表，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弱点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并非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他们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发展最薄弱、没有适应能力、而且由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或殖民统治等政治形式而声誉扫地的地方，如葡萄牙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凡是大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妨碍大国干涉当地革命并有可能导致得到共产党或任何其它统一的政党支持的军事政变的地方，都可以这么办。

对这种想要超越议会民主制和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的派别来说，苏联模式似乎是唯一的榜样。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任何革命的当然保护者。这意味着，任何革命都必须忠于苏联，服从它的领导，并且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庭。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大多数小党都属于这种思潮，由于它们不能指望通过自身的斗争来夺取政权，因此，不得不依靠苏联的帮助。同这种教条主义的、亲苏派相反，“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却主张对苏联保持独立自主。但是，他们不愿意公开批评“现实的社会主义”，而是干脆不予理睬。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变革将在一种新的形势下发展，而这种形势是马克思和列宁都无法预见到的：要末同已经变质的社会主义的强大的中心的影响进行斗争，要末屈服于这种影

响。

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正在挖掘自己的坟墓，因为它在这个制度本身的内部造就了一个新的工业基础，这个基础是如此的先进，以至生产关系成了一种桎梏并使政治力量有可能摧毁这个制度，从而为解放这一新的工业生产基础开辟道路。这个阶段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以及在 1917 年均未到来，甚至连今天也仍然尚未到来。从资本主义的整体看来，要进行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革命，目前条件尚未成熟。革命首先只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一环——沙皇俄国——取得胜利。

列宁曾一再重复说，只有继俄国革命之后在象德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中也相继发生革命，或者甚至发生世界革命，俄国革命的成功始有保证。列宁明白，一旦发达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暂时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和根据地的俄国就将退居次要的地位。斯大林把由于俄国在历史上的落后性所造成的俄国革命暂时处于领先地位的事实歪曲为一种模式，把苏联变成了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必须仿效的榜样。换句话说，这种模式不再具有临时根据地的性质，而是成了先锋和永久性的榜样。

特别是苏联对于战胜希特勒所作出的贡献，使它能在由苏军解放的东欧各国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苏联以这些国家反对外来压力的保护者自居，同时也使本国的蜕化现象传染到了东欧各国。于是，出现了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除了对斯大林的压力采取抵制的南斯拉夫以外，这个阵营成了苏联体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最高准则是尽可能地接近斯大林统治下造就的苏联模式。

今天，这些畸形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能力去影响那些正在走社会主义变革道路的比较发达的国家呢？或者相反，那些发达国家是否能够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呢？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似乎这样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为了使社会主义能够在这些国家站住脚跟，需要具备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发达国家里取得胜利，这样才有可能在更广泛的国际基础上在经济、政治、道德和精神各方面全面地取得进步。"

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也相信这一点。因为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获得成功，便不可能不对东欧产生影响。于是，在这两种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会出现一种崭新的竞争（或者冲突）局面：要末这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为另一种，要末另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这一种。

这两种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冲突，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这种冲突也许会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重新组合，导致今天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内部以及左派小组内部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并且导致传统的左派政党以外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在左派政党内从未能占有一席地位）的重新组合。当所有这些民主的社会主义力量——它们今天由于历史的争论、理论的矛盾、过时的框框和口号以及由于公式战和语录战被搞的四分五裂——聚集到一起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它们便能形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不以一个新的政党的面貌，而是以一种十分广泛的、富有魅力的、丰富多彩的、非正统的运动的面貌出现，这种运动将能够实现另一种社会主义，一种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即真正的社会主义。

三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有一种人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只是一定形

势下的产物。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对以下事实作何解释：苏联变成了一个大国，资本主义的包围被粉碎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由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集团，和平共处在世界政治中作为一种必要性得到了承认，而苏联社会并没有朝着政治上的多元化以及朝着人民更广泛地参加政权的方向发展。不错，斯大林镇压的最残忍的形式已不复存在，人民的物质需求得到了进一步满足，同外部世界的接触也日益增多。然而，迄今还存在着一党制和警察的绝对权力，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党和国家的一体化，书报检查制度和禁止反对派。这些现象不仅还继续存在，而且还被这种制度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们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可改变的、需要不断加强的原则。

苏联政权不承认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较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某些创见，不象人们研究那些可能对大家都有益处的实验室实验那样去研究他人的实验，相反，它妄自尊大，并且以独揽评判是非大权的法官面目出现，自封为样板，并且理所当然地试图把其它各国和其它共产党纳入同一轨道。苏联的这种倾向同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显然是相抵触的，然而，它却顽固地坚持把苏联共产党册封为一种教会，只有这种教会才能对什么是神圣的、什么是异端的，什么该赞美、什么该焚毁作出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妨想一想，“自治的”西方各国共产党能不能成为另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以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和东欧各国会支持、哪怕只是容忍这种与它们不同的社会主义吗？它们能保护这种社会主义不受外国干涉的威胁，而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它吗？苏联领导由于害怕受另一种社会主义的“传染”，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伐克——那里毕竟已经实行了一党制，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也已经达二十年之久——进行民主的社

会主义实验，这一事实使人有理由怀疑苏联会容忍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将运用例如法国共产党“关于自由的宣言草案”中的论点或者由意大利或西班牙共产党提出的政治多元化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难道不是存在着一种无情的逻辑吗？一旦社会主义各国的苏维埃承认多元化，那末无疑迟早会出现这种局面：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兰的、甚至苏联的共产党人也会要求在自己国内实行同样的原则。这一要求对于苏联今天的领导集团来说，将是不堪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要末紧跟苏联的模式，要末创建一个自由社会主义的传染中心，除此以外，别无其它选择，尽管他们丝毫也不想输出他们的实验（这是一种审慎的立场，杜布切克的领导班子在1968年也采取了这一立场）。一旦在某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如西欧国家中在“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的联合纲领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变革，那末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无疑将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一个中心将包括莫斯科及其东欧盟国以及各国亲苏的共产党；另一个中心将由罗马、巴黎或马德里及其盟友组成。这种分裂决不会象今天这样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争论，而且将会对政治、经济和军事诸关系起反作用，并且不会局限在欧洲边界之内。中国可能一时置身于这场冲突之外，然而，她那不依附于莫斯科的、独立自主的立场，对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流来说，迟早会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依据和平衡点。

目前，这样一种戏剧性局面仍然有可能避免，但是即使如此，为争取真正的、自治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政治力量也必须对这种可能的分裂作好准备，摆脱那种使大多数共产党干部依附于苏联共产党的传统的脐带的束缚。我们看到，对于象杜布切克这样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当他不得不在捍卫捷克斯洛伐克道路和屈

服于苏联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要割断这条脐带是多么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加强对这些矛盾的认识，并鼓起勇气，甘冒与苏联共产党发生暂时冲突的风险。迄今为止，只有铁托和毛泽东有这种勇气。

我们完全希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冲突能够通过讨论和谈判和平地得到解决。但是，如果要迫使我们投降，如果我们有遭受突然袭击和被解除武装的危险，就象杜布切克 1968 年一样，那末最终的手段只能是进行坚决的抵抗。无论如何，这样一种进程可能是十分痛苦和绵延时日的，因为它不但涉及政治方面，而且还涉及思想和心理方面，许多对于共产主义来说已经习已为常的论点——包括种种习惯，一定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都将因此而加以修正。

各国共产党的这种变化也许是实现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并保护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免遭苏联蜕化的传染的首要条件。这种进程的第二个条件是，在传统的共产党以外，还必须有各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存在，它们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和独立性，以抵制各国共产党企图独占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倾向。这种致力于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的社会党人力量的存在，对“自治的”共产党人本身同样也十分有利；因为他们加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派别的力量，而后者甚至在进步的共产党内部也必须不断地同新斯大林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条主义辩护士进行斗争。然而，即使实现了这些变革，同苏联及其东欧各盟国，“正统的”共产党以及自治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内部的保守派的强大力量相比，这一社会主义思潮的力量仍然是微弱的，况且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为目标的新社会还可能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自己的干部也会由于宗派主义作风而犯错误，而且这些又都是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发

生的现象。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建立另一种社会主义的第三个条件：苏联和东欧各国必须实行民主化。因为唯有这些国家内部的民主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起来削弱党的官僚机器的绝对权力以及苏维埃、军事和工业部门中的当权派的绝对权力并认识到进行变革的必要性，才能开辟一条通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反之，便不可能阻止官僚领导集团再次企图使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屈服于他们的法则和意志。因此，支持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内部的各种社会主义反对派的力量也是西方左派政治力量和真正的、自治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利益所在。

西方左派还始终不能理解，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内部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潜在力量。不错，这些反对派还缺乏理论，还没有深思熟虑的战略，还缺少有效的组织形式，然而，他们正在寻找新的道路，以解决社会主义理想与斯大林主义独裁制度之间的矛盾。即使人们把这场改革社会主义的运动称为“改良运动”，它跟传统的改良主义也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只要这场运动是在现存的生产资料集体化的基础上开展的，对制度的改革是在进一步扩大民主自由，使公民更广泛地参加管理国家的意义上进行的，那末这场运动就会使那些被斯大林搞得名存实亡的“苏维埃”（即委员会）恢复原来的意义。

在捷克斯洛伐克，已有数十万“改革派共产党人”被开除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不得不同苏联、波兰、匈牙利、东德以及东欧其它国家的具有类似思想的同志们一样，生活在隔离区内。代表社会主义未来的力量，不是勃列日涅夫，不是苏联的元帅们，也不是他们的坦克和火箭，而是这些国家的工人、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这些今天还很弱小的力量——它们正在寻找正确

的道路，有时不免也会犯错误——是所有主张真正的、即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人的理所当然的同盟者。

对新的开端的几点结论

在结束本书时，有人也许会问我，根据您所经历的和书中所写的一切，人们还能不能够相信社会主义？

我的答复是：能够的。条件是：这应当是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另一种"社会主义，人们对于这种社会主义的"信仰"不应当象信仰宗教一样，并且应当学会用清醒的头脑来认识这种社会主义可能带来的种种好处以及风险和危难。

我的答复是：能够的。因为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还相当年轻。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一样，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它初期的一些谬误和反常现象同样也不应当引起人们对它的全盘否定。尽管社会主义还很年轻，然而，它并不总是以"历史条件"来原谅自己目前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这是它表现得足够成熟的地方。它的未来将在本世纪内、在今后数十年中决定。

我的答复是：能够的。因为如果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的民主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同官僚社会主义相比，它还是具有无可否认的、体现了人类历史进步的种种特点）就不可能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军事的和警察的独裁政权和专制主义的威胁。很明显，本世纪末的种种重大问题（能源危机、人口爆炸、粮食匮乏、通货膨胀等）对于民主和更广泛的自由来说是不利的。

我的答复是：能够的。因为西方的民主——尽管它同苏联式的专制的社会主义相比较为优越——同样不能满足公民对于自由

和参与决策的要求。事实上——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怪事——，东西方的领导所追求的理想是相同的：秩序、祖国、家庭和消费。如果说，社会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有“勃列日涅夫主义”和古拉格群岛，尽管有布拉格、布达佩斯、格但斯克和中苏冲突——，那并不是因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成果（莫斯科的宣传家们是这样说的），也不是因为“莫斯科的阴谋”（这是西方的宣传家们的说法），而是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另一种性质的生活”。

然而，为了使这一巨大的希望不再彻底落空，光有意向声明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证据，是另一种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的具体例子。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八个月之久的“布拉格之春”证明，受到大多数公民支持的，没有书报检查制度、没有警察镇压的社会主义是能够建立的；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同时又促进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的、没有国家垄断的社会主义是能够建立的。它证明，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农民参加合作社管理，学生参加学校管理，公民参加国家管理，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它的民主是直接的（通过工人委员会）和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它尊重普选权和政治观点的多元化）。这种社会主义肯定还不理想，它只是一个开始，还存在许多谬误，并且正在探索中。但是，它的方向、它的倾向却是具有生命力的、现实的、具体的，而且最终也是正确的。

奇怪的是——这是历史的无情的逻辑——，在一个发达国家里首次建立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尝试，既不是被本国资本家和右派掀起的反革命所扼杀，也不是被“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所扼杀，而是被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所扼杀。

人们可以认为——并且希望——，这是暂时的失败，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甚至莫斯科的“春天”会继续到来。然而，今天对于建立另一种社会主义是否可能的问题，不得不由罗马、巴黎和西方来回答。因为唯有发达国家才能作出回答，那里已具备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预见的那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如果未能作出这样的回答，那末就会再次失去实现另一种社会主义的良机。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将继续站在为这条道路而奋斗的人们一边，但是，我拒绝盲目地响应这种号召：“为了砸碎旧社会，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然后，我们将会看到，在废墟上可以建立一些什么。”根据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我要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就应当认识到布满在这条道路上的种种危险；我们必须要求给予保证，以免逃出了虎穴又入龙潭……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希望本书的读者对于我们的经验进行一番思考，并且寻找由此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不是结论，而是开端，这是更成熟地进行新的探索、执行新的义务的开端，是希望所有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多少会有所帮助的开端。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是否改变了原来的信念和观点，是否同意我们的看法，这并不重要。但如果他变得更加不平静了，如果他变得不满足于冗长的目录上的现成的答案和迷人的引证而开始考虑新的问题，如果他变得更富于批判性、更具宽容心、对他人的痛苦不再无动于衷了，那末我可以欣慰地说，他理解了我们的信息。

（完）